

传统文化与人生丛书

CHUAN TONG WEN HUA YU REN SHENG CONG SHU

# 《周易》

# 与人生

蒋凡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周易》

与人生

B · 427 定价: 20.00 元  
ISBN 7-5325-3669-6



9 787532 536696 >

新学社  
PDG



CHUAN TONG WEN HUA YU REN SHENG CONG SHU



蒋凡 主编

人生

新学社

PDG

上海古籍出版社



CHUAN TONG WEN XUE YU REN SHENG CONG SHU



蒋凡 主编

人生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周易》与人生 / 蒋凡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4

(传统文化与人生)

ISBN 7-5325-3669-6

I. 周... II. 蒋... III. ①周易—研究 ②人生哲学—研究 IV. ①B221.5②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11289号

责任编辑 黄益元

传统文化与人生丛书

《周易》与人生

蒋 凡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46,000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5325-3669-6

B·427 定价: 20.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65414992



# 序

三伏酷暑，挥汗如雨，一个老头，可怜兮兮地伏案工作而无法纳凉清闲，但他却无怨无悔，甘之如饴。是什么力量推动他如此卖力呢？是名，还是利？都不是，他只是为了准备迎接《周易与人生》的诞生而尽其绵薄之力而已。

2002年的下半年，承蒙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信托，约我撰写《周易与人生》一书，以便和《佛教与人生》、《唐诗与人生》等书配套出版。我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关系较深，从李俊民社长的时代到现在，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当然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既然已经答应，就必须讲诚信、重然诺，有义务保证质量，如期完稿，以便对出版社及广大读者负责。当时，正巧我在给复旦大学攻读中国古典文学的博士生教授《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为了及时完成任务，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了锻炼几位未来博士，让他们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来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因此，我就和几位准博士分工负责，把自己读《易》过程中的人生感悟，其中体会最为深刻的闪光之点写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学习，切磋讨论，并在面红



耳赤的争论中,相互促进,不断提高,从而形成了一篇又一篇的生动文章。在这时,不管是老年人或年青人,也不问是女生或男生,各抒己见而不断变换读书视角,因而容易打破固有的定势思维的旧框框,这就为新的开拓与突破,创造了可能的条件。

《周易》位居群经之首,是上古殷周之际的一座巍峨的文化殿堂,其中富藏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可资借鉴。

时下研读《周易》,已成时髦而出现热潮,于是著作如雨后春笋而不知其几百几千。其中虽然不乏颇有质量的学术著作,但因其写作表达理性思维较重,面孔过分严肃,而难有生动的微笑。如此著作,大都只在少数的学者圈中流传,普通读者则因其过分严肃而望之生畏,不能认真阅读。在中国古代,视《周易》为“三玄”之一的重要经典,因此《易》学之作,大都讲得玄而又玄,这就很难把广大精深的科学《易》理,深入到普通读者的心坎中去。而一旦减少甚或失去了读者,则严肃的《易》学著作也会日渐萎缩,其学术生命力也将日趋暗淡。另外,更糟的是,还有许多《易》学著作,鱼目混珠,滥竽充数,不管作者自己是否真正读懂,就假借《周易》经纬预测学的名义,大搞算命迷信来赚钱惑众。这类假冒伪劣产品,纯是骗人勾当,任其充斥市场,则危害更大。

有鉴于此,我们的《周易与人生》,就想另换一付面孔来和广大读者见面。

首先,是注意严肃的学术性和生动的通俗性相结合。本书的内容,大多征而有信,言必有据,只因体例的篇幅限制,未能一一注明出典。但说话是负责任的,而绝非信口雌黄的胡编乱造,在这方面,读者不必担心受骗。不过,我

们同样又想化严肃为生动，把较为枯燥的学术内容，运用通俗形象的文学笔墨，来加以生动的表现，让读者在追求知识的读书过程中，时而发出会心的微笑。力争严谨的学术性与通俗化的生动表述，二者完美统一，是我们的首选目标。

其次，本书所述虽是上古之作，但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力争贯通古今中外而作现代反思，实现今人与古人的交流与对话，以便为现在甚或后世人们的人生思考，提供有益的启迪。这不仅是对中国，就是对世界，相信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第三，本书虽然分为“自然篇”、“成长篇”、“婚恋篇”、“社交篇”、“事业篇”、“为政篇”、“养生篇”、“阐释篇”、“人物篇”及“占筮篇”等十大方面，对于扩大见闻知识，不无助益；但对于完整的世界人生来说，只是择其要而加以描述，并不是全面而系统的《易》学著作。在这里，作者只是企望以古鉴今，批评假戏真做的现代迷信，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以便指点人生迷津，期于激发人们认真读《易》而加以反思活用的兴趣和热情。

本书作者，以笔画为序，依次有丁进、王启才、赵彩花、章原、曹建国、蒋凡及谭雯。于每篇文章之后，署名以示负责。其中，章原君协助主编，于分内分外之事，出力甚多。最后由蒋凡修订、统稿和主编。由于书出众手、水平参差，加以《易》道广大，唯恐挂一漏万，讹误之处在所难免。因此，欢迎方家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改正并继续提高质量。

最后，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高克勤、



黄益元等同志,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指导,并为其诞生付出了劳动和心血,在此一并致以衷心之谢忱。

蒋 凡

2003年7月6日

于海上望珠楼半万斋



# 目 录

序 .....	1
---------	---

## 一、自然篇

1. 中华古人宇宙观 .....	1
2. 同声相应通天人 .....	5
3. 切实保护水资源 .....	9
4. 人要学习大自然 .....	14
5. 天人和合敬自然 .....	19
6. 生生不息说《乾》卦 .....	23

## 二、成长篇

1. 人生万事开头难 .....	28
2. 父母老师先上课 .....	33
3. 初生牛犊不怕虎 .....	37
4. 防微杜渐谈教子 .....	42
5. 人生莫要忘等待 .....	46



6. 识时务者为俊杰 ..... 50
7. 走出困境有诀窍 ..... 54

### 三、婚恋篇

1. 刍议“生殖崇拜”说 ..... 60
2. 血泪涟涟话抢婚 ..... 64
3. 夫妻反目成仇人 ..... 70
4. 老夫少妻来相配 ..... 75
5. 家庭分工不可少 ..... 80
6. 琴瑟和鸣万事兴 ..... 85
7. 劝君莫娶文盲妻 ..... 90
8. 《咸》卦谈“性”坦荡荡 ..... 94
9. 夫妇相处有学问 ..... 99

### 四、社交篇

1. 巧读《贲》卦妙包装 ..... 103
2. 解读“人无信不立” ..... 107
3. “元亨利贞”话君子 ..... 112
4. 多结交大人君子 ..... 116
5. 谦谦君子终获福 ..... 121
6. 安全防范慎莫忘 ..... 125
7. 小心谨慎过难关 ..... 130
8. 同舟共济渡难关 ..... 134
9. 忧勤惕厉人生路 ..... 139
10. 女性交际善与同 ..... 143

## 五、事业篇

- |                    |     |
|--------------------|-----|
| 1. 君子宜有所不为 .....   | 148 |
| 2. 怎样做个能干兵 .....   | 152 |
| 3. 人间沧桑循正道 .....   | 157 |
| 4. 坚持不懈才能赢 .....   | 161 |
| 5. “另类”智慧作领导 ..... | 166 |
| 6. 柔弱也能胜刚强 .....   | 170 |
| 7. 得意之时莫忘形 .....   | 174 |
| 8. 处泰虑否防隐患 .....   | 178 |
| 9. 趋吉避凶成大业 .....   | 183 |
| 10. 邮政大臣洗马桶 .....  | 188 |

## 六、为政篇

- |                    |     |
|--------------------|-----|
| 1. 泪眼婆娑话刘备 .....   | 192 |
| 2. 任贤图治兴家邦 .....   | 196 |
| 3. 顺天应人谈改革 .....   | 200 |
| 4. “万国咸宁”孽暴力 ..... | 205 |
| 5. 水能载舟也覆舟 .....   | 210 |
| 6. 飞龙在天话君威 .....   | 214 |
| 7. “弹性限度”莫超越 ..... | 218 |

## 七、养生篇

- |                  |     |
|------------------|-----|
| 1. 扶正祛邪阴阳通 ..... | 224 |
| 2. 颐养以正说养生 ..... | 228 |
| 3. 勿药有喜说预防 ..... | 231 |



4. 以《易》治心疑病消 ..... 234

## 八、阐释篇

1. 《易》理暗合计算机 ..... 239  
2. 《易》乃中华建筑魂 ..... 243  
3. 阴阳相济乐和谐 ..... 247  
4. 《易》道广大话科技 ..... 251  
5. 文学源头话《周易》 ..... 255

## 九、人物篇

1. 韦编三绝说孔子(上) ..... 260  
2. 韦编三绝说孔子(下) ..... 263  
3. 范蠡功成泛五湖 ..... 267  
4. 李斯临刑悲恋“位” ..... 271  
5. 短命天才叹王弼 ..... 275  
6. 通《易》惜未通人生 ..... 279  
7. 占卜奇才数管辂 ..... 283  
8. 诸葛亮名成八阵图 ..... 287  
9. 杨仪默然遇《家人》 ..... 293  
10. 苏轼与《东坡易传》 ..... 296

## 十、占筮篇

1. 灵龟蓍草皆非神 ..... 302  
2. 蓍草占筮不神秘 ..... 306  
3. 邵雍与《梅花易数》 ..... 310  
4. 《易》无达占说占筮 ..... 316

5. 掀起《周易》盖头来 .....	320
6. 形形色色看占卜(上) .....	325
7. 形形色色看占卜(下) .....	329
8. 冷眼淡看“《周易》热” .....	333
9. 象数、义理主千年 .....	337

# 一、自然篇

## 1. 中华古人宇宙观

牙牙学语的儿童,睁着纯真无邪的眼睛,好奇地看着陌生新奇的世界,一点轻微的声音、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都会引发他们欢欣的笑声。

人类童蒙时期也是如此。面对神秘莫测的大自然,人类的力量显得非常渺小。他们敬畏,他们好奇。因为生产力水平低,科技知识不发达,许多今天看来极为普遍而寻常的现象,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却是无比的神奇。隆隆的雷声、霹雳闪电、日出日落、风雨霜雪……,在人们的眼里是如此的变幻莫测,人们慑服于大自然的威力,充满了崇拜之情。

人是一种求知不倦而不断寻求解释的动物,当他们无法在已经掌握的常识范围内找到这种种自然现象的合理解释的时候,便诉求于神秘的神灵,认为这种种的现象都是神灵在操纵。“神话时代”正是大多数民族发展早期必经的一个阶段,例如古希腊有以宙斯为首的发达的神系,古罗马的众神则以太阳神朱庇特为首,古埃及和古印度等都有自己的神灵系统,即便是现在,在许多偏远的部落中,仍然有信仰神存在。中国

的神灵系统虽然散乱不成系统,但也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等极具浪漫色彩的神话流传。

然而,神话毕竟是神话,经不起现实生活中的细细推敲。日积月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地积累知识,不断地接近真理。理性的火花不断地闪现,自然之谜也一步步地被揭开诡谲的面纱,露出庐山真面目。《周易》作为一部上古时代的知识百科全书,集中反映了中华古人对于世界的认识。《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几句话集中表述了古人眼中的宇宙观。

拨开罩在《周易》身上的层层神秘面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阴阳思想无所不在,它是《周易》全书的基石,深刻地反映了先民的高度智慧。“阴阳”,或许我们今天看到这两个字眼会觉得玄妙神秘,但是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由于阴阳学说在与后世的五行学说相结合后,在天人感应、机械对位的基础上渐渐趋向于具有某种宗教巫术性质的神秘主义所致。实际上,这种观念发生的初期,在人们的脑海里,阴阳并没有那么复杂,是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日为阳,月为阴……。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时时接触的事物,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了事物具有两种相反的属性,开始或许只是发现了一种事物,例如日光照到的地方具有温暖等特征,照不到的地方则阴暗湿冷;白天和晚上也具有不同的属性等等,但慢慢地,人们积累的多了,逐渐就引申开来,发现在万物身上,都具有类似的属性。阴阳思想在我国产生很早,但确切的年代不可考。在考古发现的商代甲骨文中,已经有“阴”、“阳”二字出现。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在殷周之际,阴阳的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与



《周易》大约同时或稍后的《诗经》和《尚书》中,都已经有了阴阳的字眼。第一次将“阴”和“阳”合起来使用,是在《诗经·大雅》中的《公刘》一诗中:“既景迺冈,极其阴阳。”《公刘》是《诗经》中著名的周人史诗之一,叙述周人祖先公刘带领周部落民众从邠迁到豳的故事。这两句诗歌是公刘观察豳地地形的叙述。意思是,看了平原又观察山地,山的阴面和阳面都看遍。可见,这里的阴和阳都是和太阳光的照射有关。在《国语》中,伯阳父用阴阳二气的和谐与否来解释地震的发生,已经具有了较强的抽象性。

但在《周易》中,只有“中孚”卦九二爻辞“鸣鹤在阴”中,出现了“阴”的字样。但是,这里的“阴”是单用,自然中“阳”字并未出现过,更不用说“阴、阳”连用的情况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说《周易》以阴阳为基础呢?原来,《周易》中的阴阳观念是通过卦象表现出来的。卦的最基本元素是阳爻和阴爻。阳爻用符号“—”表示,阴爻用“--”表示。这两个看似简单的符号到底是什么含义,现在还是一个谜。历来的解释众说纷纭,有人主张生殖崇拜说,认为阳爻是男根的象征,阴爻是女阴的象征;也有人认为阳爻和阴爻是占蓍所用蓍草的象形;也有人认为是结绳记事年代的遗迹;还有人认为是以太阳光照时的向与背来分阴阳等等。总之,关于这两个符号的具体含义和起源,有种种不同的说法,迄今仍然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人们对这两个符号所具有的属性则没有什么异议:阳爻代表阳刚,阴爻代表阴柔。阳刚与阴柔交错组合,就构成了世间万物。中华古人对阴阳的认识,通过阴(--)、阳(—)的卦画符号系统,明白无误地确定了阴阳矛盾相互转化的文化观念,并使它构成了《周易》神殿的坚强柱石。

《周易》六十四卦的核心和基础是八经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这八卦都是由阴爻或阳爻叠三而成。乾卦(☰)，是三个阳爻相叠，阳爻具有阳刚的属性，三个阳爻相叠，代表阳气蒸腾，故象征天；坤卦(☷)，三个阴爻组成，象征地；震卦(☳)，则是两阴在一阳之上，象征阴阳相迫，故为雷；巽(☴)两阳在一阴之上，象征风；坎(☵)，二阴包一阳，为水象；离(☲)一阴位于二阳之中，代表火；艮(☶)，一阳凌驾于二阴，代表山；兑(☱)，一阴位于两阳之上，代表泽。

我们可以看出，八经卦代表的基本象征物都是人们日常所熟悉的事物，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组成世界最基本的物质。这八种基本事物，人们都用阴爻和阳爻交错组合形成的符号来解释，无疑体现了远古人们的宇宙观念：阴阳交错组成了整个世界，阴阳正是世间万物构成的基础。从八经卦所代表的基本象征物引申，后来这八个卦象所代表的事物已远远超出了自然界的范畴。例如，以人体为例：首为乾，腹为坤，足为震，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人体也是一个小宇宙，各个部分的组成同样可以用阴阳来解释。如以家庭为例，则父为乾，坤为母，震为长男，巽为长女，坎为中男，离为中女，艮为少男，兑为少女。依此类推，八经卦所象征的事物可以在不同的象中有不同的体现。

八卦所象征的事物虽然很多，但是在纷繁的世界面前，仍嫌不够，于是人们又把八卦两两相叠，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从而形成了无所不包的《周易》符号系统。看似复杂，实际上基本原理仍然是阳爻与阴爻交错组合，人们观察揣摩阴爻和阳爻符号之间的关系，来领会自然与人生的哲理。而且不仅六十四卦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组成，各

爻所在的卦位也有了阴和阳之分，一卦由六爻组成，从最下方开始，一、三、五位是阳位，二四六则是阴位。看似不难，但是阳爻、阴爻与爻位的阴阳组合起来，就具有了更为复杂的变化。

“易”字本身就有“变动不居”的意思，阴阳虽然矛盾对立，但同时也具有相互转化的一面，如此一来，爻位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整个卦象的含义自然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就是一个流动不居、互动不定的系统。正是在这种不断变动中，人们观察、体味着宇宙与人生的哲理。

阴阳元素组成世界的宇宙观，阴阳对立与转化的发展观，虽然产生在几千年前甚至更早，但它的原理却与现代高科技完全吻合。对此，我们不能不惊叹古人高度的智慧。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曾多次公开谈到《周易》阴阳之道对于他们的创造发现的有益启迪。这说明直到今天，天地阴阳的文化观念，仍然存活在人们的心中，并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章 原）

## 2. 同声相应通天人

陈遵妫在《中国天文学史》中曾讲到：“中国古代天文学，是在《周易》哲学思潮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话一点不假。《周易·系辞》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足见其中包含了天地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其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关联自是毋庸置疑了。

最显而易见的就在于,在古代,占筮与占星都肩负着占卜的功能。众所周知,《周易》原是一部占筮的书。古人将烧裂龟骨而成的纹路,或摆弄蓍草演算的结果折合成阴阳六爻,组成卦象,然后根据《周易》中对应的卦爻辞来预测吉凶。而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就是“占星术”,古人通过观测天象来预测国家和部族的前途。一方面,人们对于常规的天文现象有所了解,用以指导有规律的耕种、收获等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他们更重视异常的天象以及其与人事变幻之间的微妙关系。

《史记·天官书》:“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说明只要天象有变,那就预示着人间将有不平常的事情要发生;那么,就需要占筮以测吉凶了。当时人们都相信天上人间是相通相连的,《史记·天官书》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秦始皇在位的时候,十五年中曾出现了四次彗星,其中历时最久的竟然延续了80天,而长度则达到了横贯整个天空的地步。与此相应,人间果然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先是秦始皇兴兵征讨六国,伐灭四夷,一统天下,死人如麻。嗣后秦始皇施暴政致使民愤难平,张楚王陈胜遂揭竿而起,海内一时又陷入了兵荒马乱之中,如此动乱持续了30年,天下之人死伤无数,这是从上古蚩尤之乱以来未曾有过的。《天官书》又列举了诸多实例,如汉朝的兴起,就有五星会聚在东井之象;吕氏作乱,意图篡位,就发生了日全食;吴楚七国将要反叛的时候,则出现了数丈之长的彗星,并且有月食。最后司马迁得出结论:“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也就是说,天象的异常预示着人间的动荡;天象大异,则人间大变;天象小违常规,人间也会小有变动。古人所论,虽然并不一定符



合现代科学的内容,但自此以后,“天变则人变”成为贯穿中国各朝各代天文学的一条红线,同时也是各代“天文志”关注的焦点。《旧唐书·天文志》开篇即称:“《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以此表明天文学的学科意义。古人认为人世间任何事情发生之前,自然界都会出现一些迹象和征候,这就是上天在警告人们要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悖天理,或者提醒人们即将到来的自然灾害,以便及早做好应变措施躲避灾难造成的伤害。圣贤的君主则能够根据这些征兆来施行教化,探究物理,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合理地治理国家,从而远离灾祸,长处安康。《旧唐书·天文志》记载了唐代多次彗星出现的情况,尽管每位帝王的反应不一,但对此都很重视。唐太宗贞观年间曾经有彗星出现,他问自己的大臣:“这是什么妖孽作怪呢?”虞世南回答说:“齐景公的时候有彗星出现,晏子就劝诫景公说:‘您平时开凿护城河时唯恐河不够深,修筑城墙高台时生怕墙不够高,执行刑法时也是越重越好,让人民生活在辛劳困顿之中,现在上天用彗星来警告您了。’齐景公听了,感到非常害怕,于是开始修养自己的德行,十六天后彗星才熄灭。我听说,如果君王不修德政,即使是麒麟凤凰这些吉祥之物一再出现,也是于事无补的;而如果政教没有缺陷,就算有天灾,对于国家也不会产生大的危害。如今,皇上功盖万世,国家太平繁荣,但臣深深希望陛下不要骄傲自大,耽于安逸;而是能够始终如一地谨慎修身治国,那么一颗彗星的出现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太宗听了深以为是,重重嘉奖了虞世南。

到了唐太宗的儿子高宗总章年间,彗星再次出现,皇帝李治非常担心,于是搬离正殿,并且节制饮食,又让朝廷五品以上的官员上奏章讨论施政的得失,希望找出天现异象的原因。

朝中重臣许敬宗上奏说：“彗星的光芒很弱，这并不是国家的灾祸，皇上不必为此忧虑，请您搬回正殿，恢复日常的饮食吧！”高宗觉得他说的理由并不充分，不肯放心搬回去住。

许敬宗又说：“彗星是在东北方向出现的，一定是高丽国有违背天理的行为。皇上如果出兵征讨他们，就应验了天象；无须如此检讨自己呀！”

李治听了，十分不满说：“我是万国之君，怎么能够把罪责推到小国身上呢？”之后，他坚持从自身找不足并加以改正，不久彗星就熄灭了。可见对于天象的关注有助于帝王不断警惕自己的行为，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

这些事例明显透露出天人相应的意识。那么，这种意识渊源何在呢？就在《周易》之中。《史记》中所谓“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这种天地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就本于易传。《周易·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其中的阴阳本为太阳的背向，背日为阴，向日为阳。天上有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地上则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与之相应。《周易·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可见，天之所以能对人事作出反应，是因为天上的众星和地上的人事都是阴阳二气组成的，所以能够相应相承；不过天体和天象是阴阳之精，地上的事物是阴阳之变而已。

《周易》中的一些卦爻辞，也能够给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些线索和证据。如《丰》卦中六二、九三、九四三爻，就记载了一次关于太阳的天文现象。其卦爻辞原文如下：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一般认为这是一次日全食现象的记录。正午时分突然天色暗下来,人们可以看见只有夜里才能见到的北斗星,于是心中充满疑惑,感到非常紧张。接着,天全黑了,连天上的小星星都能看见,人们更加恐慌,有人在奔逃的过程中摔断了右臂。过了一段时间,遮住太阳的黑影不断地移动扩大,天空昏暗一片,依稀可见夜晚方才显现的北斗星。不久,阴影逐渐移开,太阳又重新出来了,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冲出家门共同庆祝重获光明。从这里看出,日食的出现当时的社会中曾经引起过巨大的心理恐慌,《周易》才将其如此详细地记录下来,以此平缓后世人们的恐惧心理,毕竟太阳的消失是短暂的,光明很快就会到来。而黄显功先生则认为,这是上古人民观测太阳黑子爆炸的记录。无论属于何种现象,它都是现代天文学宝贵的历史资料。

《易》卦中天文星象知识是古代科技知识的一种概括,对后世的文明发生多有启发之功。而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思想不但贯穿整个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历程,也影响到我国“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谭 雯)

### 3. 切实保护水资源

水是生命的摇篮,是最好的溶剂,是生态系统中其他物质循环的基础。《易经》是我国上古的重要典籍,其中自然有不少卦谈到了水,如《坎》、《兑》、《井》、《涣》、《既济》、《未济》等。

我国水资源总量较丰富,但人均拥有量较少,即以全球 6% 的淡水资源养活着世界 22% 的人口,而且水资源的地区分布很不均匀,大致说来,北方贫乏,南方较丰富,南北相差悬殊。就是同一地区不同年间、年内的径流流量变化又很大,分布也不均;人口、耕地与水资源的自然配置很不合理,以致于北方的一些城市供水不足,东北、西北的一些土地得不到开垦、利用。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一步加快,不少城市的地表水资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的地方已相当严重,“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引水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断代”。这一民谣就是对水污染过程及其后果的生动描述。由于地表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污染和破坏,人们只好开采地下水,以满足生活、工业用水的需求;而对地下水持续过量开采,又引发了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地面下沉,防洪、抗震能力下降等一系列的问题。我的家乡安徽北部的某城市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该城市地下水质优良丰富,甘冽可口,尤其是深井的水,做饭、泡茶味道特好;但由于近年工商业发展较快,地表水污染较为严重。工农业、日常饮用只好用地下的矿泉水。对地下水的滥采滥用,数年内也使其枯竭。于是市政府只好投巨资兴建水厂,从远处引进河水,经处理后变为饮用水输送到城区的千家万户,原先深井的水不准再使用。有一年放假,我从千里以外的都市回到家乡,本想好好品尝一下那甘冽的泉水,不料所饮用的水不但寡淡无味,还微微地带有一股腥臭气,一问才知道现在只能饮用水厂的水!这时,我感慨万端,想到了《周易》的“井泄不食,为我心恻”这句话。

“井渫不食,为我心恻”是《井》卦九三爻辞。“渫”,意为淘去污泥使水洁净;“恻”,凄恻。该爻辞说,水井底部污泥已被



淘浚干净,泉水清洁,却未被汲取饮用,使人心酸凄惻。这确实是一种深层次的悲哀。人们都是吃家乡水长大的。古时八家为一井,四井为一邑,人们围绕水井而居,自然形成村落、邑镇,所以“井”是中国人家乡的代名词。古代中国以农立国,重农抑商。人们安土重迁,视离开家乡为“背井离乡”。因为井水是生命之源,若无水井便难见村邑,所以又有“井养”之说。古人以淘井喻修身,并把它与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如王粲避乱荆州,寄人篱下,有才能、有抱负却得不到施展,于是想回归故乡。他的《登楼赋》:“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就是借用《周易》的这一典故,来抒发登楼销忧、怀才不遇、思念家乡等复杂感情的。中国文学史上历来多有以井为题材来抒发思乡感情的作品。家乡有甘泉却不能饮用,犹如空有一身本领却得不到施展的机会,哀莫大焉!从环保角度看,造成今天“井渫不食”的后果,实在是人为因素,是人们的短视行为,是不惜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暴利的必然结果。古时候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对大自然的局部破坏,远没有超出其承受能力,各朝政府都还颁布了保护自然资源的禁令;但是,现在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拥有毁坏地球无数次的能力,人类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结果,是自然界的生态循环被破坏,水旱灾害的频繁和加剧。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就是一例。人类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

《井》卦讲,水井有常德,能长养人类乃至万物,功德无量。个中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古代有“改邑不改井”之说。村落、城邑可以迁走,但水井无法带走,屹然不动。不管人类有多少恩怨、民族关系是好是坏,它一视同仁,一样奉献。第二,

它“多取不损,少汲不盈”(东汉李龙《井铭》)。人们天天不断地汲用,泉水也不见明显地减少;少用或停用一阶段时间,泉水也不会溢出,好像水面常年保持在井壁的某一部位上下。这一点,与生态系统中水的循环有关。在太阳能的作用下,海水、地表水蒸发为水气,进入大气,随风在全球范围内迁移,遇冷凝结,形成云和冰晶,又以雨、雪、冰雹的形式返回地表,或被生物吸收,或渗入土壤和地下水中,或被滞留于地表低洼处,或进入江河湖泊,形成地表径流返回海洋。然后又开始蒸发、升腾,进行新的循环。在太阳能、大气环流、洋流和热量交换的影响下,大气、海洋和陆地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水循环系统。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吕氏春秋》就对水循环过程作过解释,《圜道》篇说:云气西行,周旋回转,降而为雨,冬夏不停;水泉遂涨,因而东流,日夜不息;云气永远没有竭尽之时,海水永远没有满溢之时;水泉汇成大海,水湿而重,升而为云,变而为轻,这就是“圜道”。这就说出了大河的水日夜奔腾不息、井泉里的水用之不竭的道理。水是众生物的自然生境,它的循环,为生态系统中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提供了基础,起到了调节气候、清洗大气、净化环境等作用。如果未经科学论证,只凭一时热情,盲目地乱修建水库、堤堰,远距离大规模地调水,围湖造田,过度开采地表水或地下水,滥伐林木,大面积地破坏植被,沿江河湖泊建工厂致使环境污染、水质变坏等等,都会影响或破坏地球的水循环系统,造成水污染或水资源短缺,严重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周易》的环保意识,来自于古老的环境禁忌。仍以水资源保护为例,八卦中与水相关的是《坎》、《兑》两卦。《坎》象征物有水、雨、云、泉等,指自然界因降雨而造成的水流现象,它

是活泼泼的,不断流动的,其符号为☵,二阴包一阳,属性归阳;《兑》象征物主要是沼泽、湿地,是静止、不流动的水,其符号为☱,一阴居二阳之上,属性归阴,现在有学者称之为地球的肾脏。二者在生态循环中各有其不能代替的作用。古人强调取法天地,尊崇自然。在他们看来,大自然的属性是神圣不可改变的,如果逆天而行,人为地予以破坏,种种灾祸就会降临人类社会。比如阳性的《坎》卦有流动的属性,就要疏导使其流动,不允许对水流进行人为的遏止。《国语·周语》说:“不防川”。就是不准在河川上建堤防。人为地设堤,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其结果只能是堤坝越筑越高,而一旦堤坝崩溃,伤人就会很多,损失必定很大。阴性的《兑》卦有静止的属性,对于用来蓄洪的大泽、湖泊来说,就应当筑起围堤,要使它进一步的安静,起到防洪、抗旱,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不允许在湖泽边缘填湖垦田,或是开口打洞,使其水流动起来。《国语·周语》说:“不窴泽”,“不崇藪”。就是不准在湖边打洞,不准人为地填高泽藪。从历史上鲧、禹治水,到今天长江、黄河的治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证明了尊重自然规律、保护水资源、维护水资源良性循环的重要性。

“流水不腐”。井水只有经常汲用,及时地淘洗底部的污泥,才能清洁、甘冽;否则,成了一口臭井、废井。大自然的水资源也是这样。人类只有维护、保护水源,促使它良性循环,不断地循环,水资源才不会污染、枯竭。现在,有的地方天是灰的,水是臭的,环境的恶化已经影响到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天蓝蓝,草青青,水碧绿,成了人类的生态理想和奋斗目标。人类有了清洁、优美、适宜的环境,生活才会更美好。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仅此一个!保护水资源,人人有责。让

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

(王启才)

## 4. 人要学习大自然

成书于秦统一前夕的《吕氏春秋》,在其总序《序意》中,载有一段秦王嬴政的“仲父”、文信侯吕不韦教导嬴政的话:我曾经学过黄帝教导颡顼的话。皇天在上,大地在下,你能效法它们,就能做百姓的君主。听说古代的清平盛世,都是效法天地的。……天地人三者都得当了,就可无为而行了。行,指的是行天之道。行天之道,就要顺其理,去私欲。《吕氏春秋》中的“法天地”思想,明显地受到《老子》和《周易》的影响。《老子》二十六章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说法;《易经》的思维方式是“推演天道运行的规律来指导人事活动”。《易经》成书在《老子》之前,对《老子》一书有一定的启发和影响。

《易经》的产生,是古人对大自然模拟、效法的结果。《系辞下》说,远古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他抬头观察苍天的表象,俯身细察大地的形状;观察飞鸟、禽兽身上的纹理,以及适宜在地上生存的各种事物;从近处选取人的自身作象征,从远处选取各类物形作象征;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贯通神奇光明的德性,用来归类天下事物的情态。《系辞上》说,《周易》的创造与天地相准拟,所以能普遍涵容天地间的道理。……足以拟范周备天地的化育,而不至于偏失;足以曲尽细密的助成万物,而不至于遗漏。《易经》的符号系统,是对天地万物生成模式的模拟。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其象征物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



火、山、泽。这八种自然物，是构成宇宙的最基本的东西。64卦在编排上，显示出要把握宇宙整体的意向。《易经》作者以代表天地的乾坤二卦起始，以既济、未济为终，逐层展开64卦。64卦详尽地反映了万物的真情和虚伪，包含了宇宙的多种信息。就每一卦来说，它又潜涵着所有64卦的内容，藏纳着关于宇宙变化的一切信息。从卦的体例看，各卦基本上都是先讲天地自然现象或规律，然后再就与之相应的人事发表体会或议论。64卦每卦六爻，上二爻代表天，下二爻代表地，中二爻代表人。每卦都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宇宙整体。《说卦传》认为天地人“三才之道”，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三者虽有所区别，但互有联系。人处于天地之间，其作用就是效法、顺应自然，调节自然的变化，协助万物，以达到圆满的目的，实现“与天地合其德”的人格理想。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周易》认为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序卦》说，有了天地然后才有万物，有了万物然后才有男女两性，有男女两性然后才能配成夫妇，有了夫妇生育后代然后才产生父子，有父子然后出现了君臣，有了君臣然后产生了上下尊卑的名分，有了上下尊卑的名分然后礼义才有所安置。可见，天地（自然）是万物的根本。包括男女在内的万物是天地产生或依次衍生的结果。人生活在自然界之中，本来就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远古时代，人类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但与大自然十分亲近，他们的生存技巧和智慧多是直接从大自然中学来的。而且，在古人看来，天、地、人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由物质性的“精气”所构成的。人类的某些特点源于自然的特性。正因为先民有与万物同化、互为一体的认识，又从对大自然的观察与体

悟中,感受到大自然的和谐与完美,所以产生了效法和学习自然法则的强烈兴趣和愿望。正如《吕氏春秋·情欲》所说,人与天地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万物的形状虽然不同,但它们的情理是一致的。所以,古代修身养性与治理天下的人,一定要效法天地。

取法物象最大的就是天和地。在《吕氏春秋》之前,《周易》的《彖》传就比较集中地表达了社会人事应当效法天地自然的思想,如《丰·彖》说,太阳正居中天以后,一定会西斜;月亮圆满盈盛之后,一定会亏虚。天地自然有盈满有亏虚,都随着一定的时期更替着消亡与生息,更何况人事呢?自然界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社会人事也是如此。人们要从自然界的变化中得到启示,以持盈保泰,趋吉避凶。《豫·彖》说,天地顺沿物性而运动,所以日月的周转不至于有过失,四季的更替不出差错;圣人顺应民情而行动,于是治国的刑法清明,百姓纷纷服从。天地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明君也要按人事的规律治理国家。《周易》这种以自然现象联类取象,以比附社会人生的例子还有许多。如《颐·彖》说,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人并养及万民。《咸·彖》说,天地交感带来万物的化育生长,圣人感化人心天下和平昌盛。《泰·彖》说,天地阴阳交合,万物生长之道畅通;君臣上下交合,众人思想意识协同。《节·彖》说,天地自然有所节制而一年四季得以形成;君主作典章制度以节制,不浪费资材,不残害百姓。这说明人事生活的准则,都是受大自然某种规律的启示,或直接效法自然规律的结果。

《周易》认为,人们为人处世的前提是效法天地,乃至自然万物;要善于因顺自然界变化的规律,去认识自己当前的处

境,设计自己应该采取的行动。如《系辞传下》说,尺蠖毛虫回缩身体,是为了求得伸展;巨龙长蛇冬眠潜伏,是为了保存自身。人们精心研讨《易》道,是为了进献才用;增进美德,安处其身,是为了利于施用。圣人君子从动物身上受到了如何立身处事的启发:尺蠖以曲求伸,龙蛇冬眠安身。人类就应当学习它们,提高道德修养,善于保全自身,以求得施展才华、大显身手的机会。

《周易》解释“象”就是像,像就是自然或人事所显示的具象或征兆。所以,在《象传》中有大量的以天道说明人事的事例。这些事例,基本上都是先阐述自然物具有某种属性,启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相似问题如何去做的。换句话说,天道具有很多可供人类效法的品质,人们要善于取法自然,向自然学习。如《乾·象》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刚健雄壮、运行不已,人生之道应当以天为法,自强不息。具体说来,一是要刚健中正,二是要奋斗不已。《坤·象》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顺应天道,承载万物、生长万物,具有宽厚的品德和无限的包容精神,君子应当以大地为法,养成宽厚、柔顺的德性。《坎·象》说:“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洊,再也。习,重叠。水流滔滔而至,象征“重重险陷”。君子观《坎》之象,悟出守持德性,应当像水那样长流不息,习政事要像两坎相受那样,前水至后水又至,反复熟习。《晋·象》说:“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从《晋》卦(䷢)的卦象看,上卦离三,象征日;下卦坤三,象征大地;卦象是太阳出现在地平线上,光芒四射照大地。君子要效法这种自然现象,不断加强品德修养,使自己的美德显现于人世

《周易》取法天地的理想境界,是与大自然和谐统一。《周易》贵中、贵和。它认为,天地万物的最佳状态和最高境界是“太和”(《乾·彖》)。太和为“阴阳会合、冲和之气”(《周易正义》),也就是万物的太和元气。元气变化,产生万物,养育万物,所以,太和是一种最高的和谐。人与天地万物如能进入并保持这种境界,一定能够守持正固,寂然无为,相互养育而无咎害。《乾·文言》说,大人君子的德性,像天地那样覆载万物。他像日月普照人间大地那样圣明。他的施政纲领像四时的运行那样井然有序。他预示吉凶像鬼神那样神妙莫测。他在天象变化之前行动,天并不违背他;在天象变化之后做事,也能遵循苍天运动变化的规律。连苍天都不违背他,更何况人呢?更何况鬼神呢?这种与天地万物和谐一体、长生共荣,和天下万民团结一心、同乐共济的崇高境界,便是今人的热门话题——天人合一。

《周易》把天地人看作一个整体,认为大自然的运行是圆满和谐的,主张社会人事要取法天地,向天地自然学习,以天人合一为理想境界。这些观点和做法,如果舍弃古人机械比附的成分,而取其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合理因素,对于千秋后世,都是有益的启迪。在物欲横流、片面强调“人力”,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导致生态恶化、自然灾害日趋频繁、自然惩罚加重的今天,仍有其可资借鉴之处。地球只有一个,她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我们要增强环保意识,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求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的统一,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相反,一旦人类疯狂,破坏自然,残损环境,地球也将哀叹哭泣,则寄身于地球的人类又将如何生存?

(王启才)

## 5. 天人和合敬自然

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国,由于农业生产对天时自然的依赖性很强,使得我们的先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产生了敬爱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源的《周易》,便具有这方面的论述。《周易》对天地自然的认识带有很强的理性色彩,它认为天地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能化生万物。比如,乾卦有四德:“元,亨,利,贞。”用以象征天的阳气充沛刚健,云行雨施,化生万物。《泰卦》彖辞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姤卦》彖辞也说:“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意思说,天地阴阳相和,万物便能茁壮成长。中华古人认为,人与自然应该保持一种和谐融洽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人应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不要违逆自然。《大有》彖辞说:“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人应该保护自然。《复》卦彖辞说:“先王以冬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后,与“王”同义,泛指古代君王。意思说,古代政府在阳光微弱的冬至到来之时,下令闭关静养,商人不再外出经商,君主也不再巡视四方,以免打扰百姓。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的需要。

《周易》的这种思想,在后世得到了具体而系统的阐发。先秦古籍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比比皆是。《国语·鲁语》载鲁国人里革的话说:“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罾罟,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人,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罟罗,矰鱼鳖以为夏槁,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乎禁罟罾,设阱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



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古之训也。”明文规定生长期中禁止渔猎，表达了要保护自然的思想。这种思想渊源已久，且有水虞、兽虞等职官专司其事。此外，《论语》、《孟子》、《管子》、《礼记》、《逸周书》、《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均有相似的论述。就是著名的“天人相分”论者荀子，也在《荀子·王制》篇里，阐述了与里革相一致的重视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考虑到《周易》的成书年代，我们可以认为，《论语》诸书相关论述是受到了《周易》的影响，是对《周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尤其在今天，大力提倡和宣传《周易》关于敬爱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并且显得尤为迫切。因为人口的增加，人类经济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如果没有注意对自然的保护，不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过度开垦、过度耕作、滥伐森林、过度放牧，就必然会对自然造成巨大的威胁，对生态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破坏。

例如，土地沙漠化是世界各地广泛存在的环境问题。它对生态系统、人类生存、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都构成了巨大威胁：大片干旱半干旱乃至半湿润地区的土地生产力大幅下降，甚至变成不毛之地，许多森林、牧场、农田、村庄、城镇被流沙淹没，沦为荒无人烟的沙漠。据1977年联合国沙漠化会议统计，全球沙漠化面积在当时已达3800多万平方公里。而且每分钟就有10公顷土地变成沙漠，每5个人中就有1人受到沙漠化的危害，而且近年来的速度又有加快的趋势。就我国而言，沙漠和沙漠化问题尤为严重，我国北方沙漠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沙漠化土地32万平方公里，而且还在以平均每年2100平方公里的速度递增。如今每到三四月份，漫天的沙尘暴搅得我国华北地区天地浑沌一片，即使白天能见度也很低，

汽车行驶都需亮灯。而不洁的空气对人们的身体也造成很大的危害,以至人们不得不戴着口罩出门上班。我们的首都北京也受到沙尘暴的袭击,甚至远在淮河以南的安徽、江苏也受到沙尘暴的危害,每年春夏之交,也有几天黄沙漫天的日子。

造成土地沙漠和沙漠化的原因,除自然因素外,人为破坏是最主要的因素。以我国为例,我国的沙漠化土地,在大规模的人类行为没有介入之前,曾经都是绿茵遍地的森林草原,绿色资源十分丰富。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粮食需求量的加大,从而对草原不断地开垦,森林乱砍乱伐,导致地表植被被破坏,并最终导致土地的沙漠化。此外,滥牧、滥伐,也是危害巨大,是土地沙漠化的重要原因。

地球变暖也是灾难。自工业革命以来,煤炭、石油等燃料释放的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有害气体一直笼罩着地球,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导致地球逐步变暖。过去华北地区,每到冬天,总会有漫天的大雪,把世界装扮得银装素裹、分外妖娆美丽。可如今,这样的景色已经是很难看到了。“暖冬”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了。地球变暖对全球造成的危害还表现在,南极上空臭氧层的空洞越来越大,使得地球少了一层保护膜,太阳紫外线的强烈照射使许多人患上了皮肤癌。而美国的科学家近日发出警告,最新科学考察结果表明,2002年夏季,北冰洋冰块和格陵兰冰川大量融化,速度达到几十年来的最快。12月7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环境专家在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上称,9月份北冰洋冰面缩小了百分之四,冰层厚度由20年前的4.88米锐减到2.75米。截至2002年9月夏季结束,北冰洋的冰块覆盖面积跌至约518万平方公里,比历史同期至少缩小了103万平方公里。格陵兰冰川面积在2002

年也缩小了 68.6 万平方公里。多年的卫星观察结果表明,格陵兰岛的冰雪融化面积以百分之十六的速度增加,海平面也在不断上涨。冰川的大面积融化,导致北极生态环境被破坏,使得海豹及北极熊等生物生存变得艰难;海平面上涨,世界各地洪水泛滥,陆地面积减少;而且缺少了海洋冰面和冰川这一地球“凉爽剂”,地球变暖的速度就会加快,因为冰面和冰川在春季能反射百分之八十的阳光,在夏季冰雪融化的集结也能反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阳光。

此外,地球变暖导致疾病泛滥,疟疾和登革热可能再次席卷南美;干燥变暖的空气极易诱发森林大火,今年仅美国西部就发生了十多起森林大火;而且地球变暖使北极淡水增多,并使大洋暖流受阻,这可能导致北欧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冷。

在浩瀚的宇宙中,那蔚蓝色的地球恰如一叶扁舟,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保护它,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没有它,我们真的将无家可归。可是北极的冰在融化,南极的臭氧层空洞越来越大,良田变成沙漠,亚马逊的森林一片片消失,长江、黄河肆虐,洪水一年比一年凶猛。开封市一带的黄河大堤,已使黄河的河床高出开封大地十几米,这是一把悬在人们头上的剑,一旦溃穴破堤,成千上万的人将化作鱼鳖而荡然无存。大自然以它的方式在警告人们的同时,也在毫不留情地惩罚着人们。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反思吗?《史记·殷本纪》载,商朝有一个国君叫武乙,他十分仇视上天,他用木头刻成人的形状,将这木头人叫做“天神”,然后跟它对局博弈,让旁边的人代替木偶人运动筹码,如果木偶输了,就把木偶砍碎,算是诛杀天神。武乙还用皮囊装满鲜血,高悬在空中,然后他用箭射皮囊,说是射天。正因为武乙怠慢亵渎上天到了这种程度,所以

他在位仅有五年，有一次他到黄河与渭水之间狩猎，被雷电给劈死了。武乙不知敬爱上天，日日与天斗，时时与地斗，毫不爱惜自然，不知天高地厚，最后终于受到了天地自然的无情报复和惩罚。这是一个多么形象的警世寓言啊！（曹建国）

## 6. 生生不息说《乾》卦

《周易》有六十四卦，第一卦是乾卦，第二卦是坤卦。乾代表天，坤代表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说卦传》）。天地是创造万物的根源，所以反映在《周易》中，则乾、坤两卦为六十四卦的第一、第二卦。

乾的六爻全是阳爻。阳爻代表进取、创造。六个阳爻以象征天的功能是最纯粹的阳。它刚健进取，祥和有益，无所不正，生生不息，是万物创始的伟大根源。卦辞“元，亨，利，贞”四字，高度概括了天的功能；而乾的六爻则具体展现了化成于其中的万物的成长过程。

“初九：潜龙，勿用”，是乾卦由最下方开始的第一爻的爻辞。“龙”是我国传说中最受崇敬的神秘动物，能够三栖，或潜在深渊，或行在陆地，也能腾空而飞，具有变化莫测、隐现无常的特点。所以，乾卦中以它来象征具有无穷潜能的天，以及天道变化、阴阳消长、事物进退的变化无常。初爻位置在最下方，阳气刚刚在地下发生，它的力量还非常微弱，处于这种状态时，就应当像潜藏着的龙般隐忍不动，以等待时机。就像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其时地中虽有一阳来复，有一股阳气开始运动；但主流却是阴气，大地为其控制，表现为严寒、肃杀。假如此时这一缕阳气不是潜伏着酝酿更大的势力，而是不讲策

略与阴气硬斗,则立刻会被阴气所扼杀,明媚的春天也就可能永远告别人间。以人事为喻,就像中国共产党在初始阶段,它需要保存自己,保存革命的火种,为将来取得胜利而做准备。

乾卦第二爻的爻辞是“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它位于下卦的中间,卦位“得中”,处于有利的形势。这时,“初九”潜藏的龙已经上升,出现在田野上。它的力量比初始之时已大得多。假如把“初九”比作一粒种子发芽了但还没钻出地面,“九二”则是幼芽钻出地面时的情态。它给人们带来了无比的生机与希望,但它毕竟还不够强大,还需要谨慎保存自己同时发展自己,所以第三爻的爻辞是“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乾”即健健,努力不懈。“惕”是警惕,“若”与“然”同,“厉”是危险。这条龙离开“二”的中位,上升到下卦的最高位置。“三”是阳位,阳爻得阳位,因而是阳刚得正,但过分刚正,反而有危险。这一爻辞以人事设喻,说是有德行的君子,本性刚健正直,此时如果终日努力不懈,日夜警惕,继续致力于德业的完善,就能避免过失与灾难。如果骄傲自大,就会招致危险。

乾卦第四爻的爻辞是“九四:或跃在渊,无咎”。经过“九三”阶段的积蓄力量后,新生事物变得更强健一些了。仍然以龙为喻,此时龙已经有升腾的力量,它跃跃欲试,但它刚刚离开下卦,升到上卦的最下方,“或跃在渊”的龙的状态,象征着进退要把握最有利的时机,它反复练习,谨慎地等待最佳时机的到来。

这个最佳时机,乾卦以位“五”象征它。“五”在上卦的中位,同时也处于整个六爻卦的中位,又是阳爻在奇数的阳位,得正,既中且正,是最理想的地位,最好的时机,故爻辞也很吉



祥：“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得天时地利，茁壮强大，飞腾在天，拥有无限的活动空间。这是大展鸿图的全盛时期，是事物发展最完美的阶段。

假如龙这时尽力而飞得过高，停在某一点既不能上升，又不能下降，进退两难，以致后悔，则事物发展至所谓“亢龙有悔”的阶段。乾卦全部是阳爻，在“五”的位置，阳刚恰好平衡；但再上一层，超过阳刚的极限，则物极必反，走向反面。这时如果再有行动，必致后悔。处在这种状态，就必须居高思危，注意警惕，不可过分追求满足。这一爻说明盛极而衰，是大自然的规律，应当时时警惕和节制。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的功能，就是生生不息，就是生成万物而不自觉。当这一伟大功能开始时，同时就产生了一切。万物皆取用于天的功能，得以发生，随着时间的展开，由潜伏、显现、成长、跃动、飞腾到满盈，完成六个阶段的变化。事物发展到满盈以后，如果仍然不顾一切地发展，则必然由衰竭走向死亡。由于天的生生不息的功能，新的事物必又将在死亡体中产生，又经历由弱小到强大的阶段性变化；假如事物发展至满盈的时候，注意警惕与节制，则事物将在新的高度作另一阶段的由积蓄力量到强大飞腾的过程。天在化育万物的同时，也使万物各得其宜，保持自然的大和谐，从而使天生生不息的伟大功能得以顺利实现。

生生不息表现在自然方面，则是“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是草长莺飞到零落残红、到关河冷落万物肃杀的景物次第。它藏在“池塘生春草”的惊喜中，在“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感喟里。

天地自然有生生不息之德。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同

样处处体现和履践着它。人体就是一生生不息的有机体,血液循环往复,五脏六腑年复一年地各司其职,完成着各种新陈代谢,保持着血脉肌理的通畅无滞。所以中医认为,血脉畅通则百病不生,人生百病源于肌体的某一部分壅滞不通,只要以针灸或草药调理肌体,打通关节,则身体又恢复其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所谓的病也就消失了。生生不息也贯彻在人的认识中,中国历史的“三统说”,就认为历史是文质相代,循环往复,千秋万代,没有穷尽。也正是这种认识,使愚公面对巍峨的太行、王屋二山的阻挡,非但不气馁,反而豪情万丈,立志要搬去它们,其心理支点就是我死有子,子死有孙,子子孙孙,绵绵不绝。假如不是知道人种延续生生不息,可能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为皇位、权利绞尽脑汁,不惜牺牲一切。秦始皇登基伊始,就自号始皇,他的原意,是要把天下传给子孙,二世、三世,以至无穷。可惜他横征暴敛,二世而亡,徒留笑柄。面对邪恶的时候,人之所以能保持浩然正气,是因为他认为天地之间存在的正气源于遥远的过去,已经有无数的仁人志士为赓续它而流血牺牲,今天自己正应该以“舍我其谁”的勇气,挑起绍续传统的重任,即使自己牺牲了,仍然有后面的人继续它,传递它。所以夏明翰在面临流血牺牲之时,写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豪气干云的诗篇,真理的火种终将薪尽火传,绵绵不息,这种信念使志士仁人含笑就死,了无遗憾,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也就在这样的信心中陶铸形成。

当然,天地万物都生生不息,这是一大的规律;至于具体到每一人与物,如何保持生生不息,则又需要注意一定的手段与方法。道教认为通过炼丹、辟谷可长生久视,佛教认为戒绝

欲望能超脱生老病死。即是不佞佛不尊道,要避免在生生不息的循环中过早被替代,也要像老子所谓的守雌处弱。因而,功成不居成为中国人特别是追求功名的读书人所认为的长保功名的最佳方法,究其实际,仍然是基于对生生不息的认识和履践。

(赵彩花)

## 二、成长篇

### 1. 人生万事开头难

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情景：二位围棋大师对弈，面对空白棋盘，静心屏气，沉思良久，迟迟难以投下第一颗棋子。是他们在故弄玄虚，搞心理战？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围棋对弈，时间自然十分宝贵，赢得时间，意味着给自己后续放手搏杀赢得更多便利。那么，他们为什么如此看重第一手呢？因为这第一手制约着棋局的发展趋势，后续的无穷变数都与此有关。这就是俗话所说的“万事开头难”。《周易·屯卦》揭示的正是这个道理。

《周易》将《屯》卦紧接在《乾》、《坤》二卦之后，是大有深意的。乾、坤代表天地，由天地产生万物；《屯》卦则象征天地合而万物艰难初生的样子。从字形上看，“屯”字像种子的萌芽在大地的压抑下破土而出。《周易》这样安排卦序寓意深刻，《屯》卦所包含的人生哲理值得玩味。我们常听人说：“人生在世，想做点事真不容易。”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说普通人，就如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吧，他在动手写《安娜·卡列尼娜》之前，已经誉满全球了，百万字的《战争与和平》连巴尔扎

克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它的创作水平正处在巅峰期,但他就是难以写定小说的第一句。他一次一次地写,又一次一次地否定,经历了数不清的沮丧,终于在三十多次的尝试后,写出了这样的句子:“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奥布隆斯基家的一切都乱了。”于是文思如火山喷涌,一发不可收拾。

万事开头难,给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减少困难,战胜困难,少走弯路?《屯》卦卦辞说:“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其中“元亨利贞”正是《易》学义理派所乐道的“四德”。“四德”中尤其要强调的是“贞”字。贞者正也,“贞”的意思是要严格要求自己,培养并保持坚贞美好的品德,不走邪路,不做坏事。联系《屯》卦具体情况,则“贞”之德告诉人们,做事动机要纯,内心要正。

历史上不守“元亨利贞”四德而妄开事端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西汉中期的“马邑之役”就是如此。西汉初期,汉高祖自“平城之役”后,对匈奴采取守势,一方面允许汉、胡民间互市互利,一方面设兵严阵以待。匈奴也知难而退,对汉疆没有造成重大侵害。到武帝初年,汉武帝急于建功立业,以满足虚荣心,恰巧有大行官王恢献计,由边疆小官假装内应,献马邑城,诱匈奴大军至马邑。武帝亲率大军埋伏,企图一举歼灭匈奴;匈奴贪图汉朝土地,竟率大军前往。匈奴接近马邑,发现四野只有牛羊,不见一个汉人,起了疑心。他们攻下汉朝一座烽火台,活捉了汉军亭尉,才获知秘密,于是急忙撤退。汉武帝也无功而返。但此举开启了汉与匈奴长达几十年的战争,匈奴遭受重创,一蹶不振,被迫退居大漠以北;西汉也从此衰落。开启事端的双方由于心术不正,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为了战胜困难,成就事业,需要争取一个充足的准备阶段。《屯》卦卦辞“不利有攸往,利建侯”,说的是不要见利忘义,涉险盲动;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长期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九五爻辞“屯其膏”,同样是讲要充分蓄积克服困难所必须的能量的意思,因为准备阶段本身也充满困难。

据史书记载,商朝末年,商纣王非常残暴,因鬼侯进献的侍女不善奉承,纣王便把鬼侯杀了,把鬼侯的肉制成肉酱分食。王子比干劝谏,纣王剖开比干的胸膛。周文王为此叹息了一声,消息传到纣王耳朵里,纣王把周文王囚禁在羑里。后来姜尚、散宜生以美女、玩好进献,商纣王才放文王归国。正是在羑里,传说文王以推演八卦度日,把他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推翻商纣统治的大政方略寄托到六十四卦卦序中。归国后,文王表面上对商纣王很顺从,暗地里修文德、治武功,诸侯众望所归。而纣王对文王却深信不疑,授权文王管理西方诸国。但终文王之世,文王都没有对商朝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他把灭商大计看成几代人的事业。周武王接着苦心经营,他观诸侯之兵于孟津,实际上是检验自己的号召力,虽然与会诸侯有八百多位,武王仍未大举进攻,直到两年以后,商纣王已经众叛亲离,人神共愤,他才率三百辆战车,四万战士,攻打拥军七十万兵力的商纣王。战斗中,纣王前线部队倒戈,商朝强大战斗群迅速崩溃。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竟然戏剧性地在一天之内结束,这是历史上改朝换代之战用时最少的一次。可见,精心准备是事业顺利成功的关键。

万事开头难,还难在把握时机上。机会看上去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能把握住时机的人又有多少呢?机会又是稍纵即逝的,有的机会甚至永远不会重复。该行动时万不可犹

豫不决,痛失良机。《屯》卦六四爻辞说:“乘马班如,求婚媾也,无不利。”以求婚为例,说明这个道理。“一家养女百家求”,如果你是那合适的人选,却心有疑虑,别人就会捷足先登。因此,看准形势把握时机十分重要。例如蒋介石就曾成功把握时机,走上中国政治舞台。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革命,孙中山被困在永丰舰上,不得脱身。蒋介石却认准时机,从上海赶来,追随在孙中山左右,博得了孙中山的好感。解围后,蒋介石发表了日记体著作《孙大总统广东蒙难记》,捞取了不少政治资本。蒋介石的毅然举措并非出于赌徒心理,而更多是出于对时机的正确判断。

其实辨别机会也很重要。如果机会来了,你却让它白白溜走,事后你会后悔莫及。中国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就有过这种经历。他三十年代留学德国,师从著名物理学家迈特内时,发现当时被称为“r 辐射”的现象有问题,他设想用“云雾室”法将该问题检验一遍,可惜没有获得导师迈特内的支持。一年以后,科学家查德威可用同样的方法获得成功,推翻了“r 辐射”说,发现了“中子”。王淦昌十分懊悔,虽然他后来在物理学领域很有建树,但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相反,王懿荣就把握了机会,成了甲骨文的发现者。上世纪初,安阳出土的殷商时代龟甲被当作“龙骨”在药店出售,不知有多少这样的“龙骨”经过那些卖药的和买药的人手,他们之中也不乏识字者,独有王懿荣注意到了这些“龙骨”上的划痕。同样,当代学者孔凡礼发现大型诗集《诗渊》,也是靠杰出的辨别能力。在他发现该书前,它“遗失”了数百年,其间也有学者翻阅过它,就是没有人意识到它是一部孤本,其所收四万多首诗作,十之二、三不见他书。而孔凡礼之所以独具慧眼,与他终日泡在北

京图书馆苦读二十年不无关系。

《屯》卦六四爻辞说：“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以入林打猎为喻，意思是说，进入深山打猎，如果没有向导，只会陷入深林。应见机行事，放弃打猎。这里揭示了一个人生原则：生活有追求也应有放弃。对普通人来说，因为利益所在，下决心放弃也是一种困难；事业刚开个头就要放弃，实在于心不甘！许多人为这种不愿割舍的情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一个中学数学教师，曾因参加县文化局举办的群众文艺活动，产生了当作曲家的念头。他把微薄的工资几乎都投在购买音乐资料和器具、走访名家上。一位作曲家曾明确告诉他，作为业余爱好是可以的，作为终生追求他缺少基本条件。但他仍坚持追求，四十多岁了还孤身一人，教本专业数学课提不起精神，教中学音乐课又嫌档次太低，心态严重失衡，学校只得将他“闲置”起来。而他由于“创作”过分劳累，不注意锻炼身体，已落得病魔缠身。

相反，生活中不少人勇于放弃，为今后的发展保留了本钱。牛仔裤的发明者如果像其他淘金者一样，义无反顾地挖下去，吊死在“淘金”一棵树上，牛仔裤就与他失之交臂了。鲁迅、郭沫若原本是学医的，如果他们不改弦易辙，也许会成为名医，但决不会有后来的杰出文学成就。如果发动“秋收起义”的毛泽东继续执行攻打长沙的计划，必将是以卵击石；放弃计划，向山区撤退，却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这道理正如下围棋，一粒孤子被围，想救活它就不得不陷入苦战，而且极有可能付出更多牺牲，甚至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而选择弃子，往往获得“先手”，被弃之子也有可能形成“劫材”。放弃，是一种智慧，更需要胆识和勇

气。正如爻辞所说,聪明的人们知己而行,不为小利而涉险盲动;而是果断舍弃,从“往吝”的艰难险途,转向了通往成功的康庄大道。君子要有所建树,就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谨慎开局,迈出胜利的第一步。(丁 进)

## 2. 父母老师先上课

人生伊始,浑浑噩噩,不明事理,正处于蒙昧无知的阶段。这时,他需要父母和老师给他启蒙发智,才能健康成长。但今天的社会对待子女求学问题,人们却有各种不同的态度。有的父母经济困难就不让子女上学,或是只读小学了事,用他们的话说:“认识自己的名字,知道男女厕所就行了”。所以,有许多孩子失学,尤其是边远及贫困地区的孩子,早早就告别了学校。有的地方虽然经济很发达,但是某些父母对孩子上学也不热心,因为这些地方挣钱容易,父母们就让孩子早早辍学,帮助赚钱。前些年,报纸经常报道某百万富翁,或知名企业家,钱赚了不少,但文化程度却不高,小学或初中毕业;而他们的下属却多是大学生、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这样宣传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让人觉得知识不多,能赚大钱,以至逐渐形成了“读书无用”的论调。于是沉渣泛起,一段时间内,有的大学生、研究生也辍学去打工或办公司。其实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行为。启蒙发智,接受知识的熏陶,不仅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发展,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前途利益。古有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的故事,都是父母教育子女的佳话。孟母三迁,培养出一代儒家“亚圣”孟子;岳母刺字,更是教育出一位名垂青史的抗金英雄。二次大战后,日本在

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小学教育,于是全民努力,一起扶持小学教育。这样做,使日本受益匪浅,并最终使日本成为一个经济强国。

但事情的发展,通常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方面是不重视孩子的上学,造成随地可见的童工;而另一方面却是太在乎子女的学习,以致酿成祸端。报纸电视经常报道,有的父母因子女成绩不佳,升学无望,对子女痛加捶楚,甚至致残致死;而子女因学习压力太大、家长期望值太高而厌学、弃学,对抗以至残害父母,酿成惨剧。凡此种种,都在提醒我们,是到了反省的时候了。读《易经》的《蒙》卦,或许有助于我们反思自己的行为。

《蒙》卦谈教育童蒙,是给父母和老师上的一课。从卦序上看,《蒙》卦次于《屯》卦后。“屯”象征万物初生,大凡物之初生必蒙昧无知,所以接着便是象征蒙稚的《蒙》(䷃)。从卦象上看,上艮(三)为山,下坎(三)为水。山中有水,正好比人的智慧尚处于一种潜能状态,此时需要人为之发蒙,方能灵泉涌动。地水山泉,只有经过凿挖发掘,方能冲石击浊、流出淙淙的清甜甘泉。

如何把一个不谙事理的孩童,培养成一个有用的栋梁之才?这是给担负着启蒙发智任务的父母与老师提出的问题。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大脑结构基本一致,少有高下智愚之分。我们说一个人天生聪明或笨,一般说来没有太必然的道理。因为人的能力是多方面的,科学研究也表明,人直到老死都有许多潜能的处女地未被开发。人的大脑的信息储存量也大得惊人,但真正被利用起来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父母老师注意引导,因材施教,每个人都有成功



成材的可能。

这样看来,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和老师的引导起着很大作用。所以《蒙》卦的第一句话就是“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这句话,传统的理解都是强调师道尊严,如《礼记·曲礼上》就明确提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其实,立足于现代语境,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句话理解成父母和老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该如何培养孩子学习兴趣的问题,如何变“要我学”为“我要学”。现在的中国社会,独生子女很多。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爱子心切的父母老是想为孩子日后的社会竞争再增加一些胜利的砝码,于是就拼命往“全面发展”方向努力,让孩子学钢琴、学书画、学舞蹈等等。孩子的星期天没了,寒暑假没了,弄得像艺人赶场子似的,疲惫不堪。可怜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似乎已成为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超出这个度,好事就会变成坏事。真理和谬误就是隔墙的邻居。其实细细想来,爱玩是儿童的天性。哪个小孩不喜欢涂涂画画,蹦蹦跳跳?但为什么一到大人按自己的设想,要求他们去学画画,去学唱歌,去练舞蹈,而这些孩子就打不起精神了呢?这是因为大人并没有真正弄明白孩子的心、孩子的兴趣。父母的心态往往是很功利的,并且常常给孩子定下不切合实际的“远大”目标。这样,孩子就会感到压力,于是有趣的蹦跳玩耍变成了面目可憎的外在强加的“任务”。成功的家长则相反。他们在谈子女教育的经验时,几乎都说到要做子女的朋友,不包办孩子的想法和兴趣。

小孩子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对一切都感兴趣,喜欢发问。这是好事,做父母和老师的应该鼓励,不要压抑孩子的好奇心。所以《蒙》卦六五说:“童蒙,吉。”儿童启蒙是个好事情,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奥斯卡获奖影片《音乐之家》，说一个上校舰长，有七个孩子。孩子没有了母亲，上校常把孩子关在家里，不准他们“乱说乱动”，用军事化的方法来管理孩子，把一个家搞得沉闷不堪。而从修道院里来的家庭女教师玛利亚，一改上校的做法。她用窗帘给孩子们做运动服，带他们到郊外去爬树、游泳，做各式的游戏，满足了孩子的好奇心，开发了孩子的潜能，把一个沉闷之家变成了一个充满生机和幸福的音乐之家，她并且率领这个家庭合唱团在比赛中一举夺冠。玛利亚启发童智的教育方法，不仅孩子们一致拥护，就连机械刻板的上校也心悦诚服。这是成功的事例。相反的例子，如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他小时候上学，有一次借提问之机问老师“什么叫怪哉”，因为他记得东方朔说过“怪哉”是一种鸟，放在酒里就化了，他不清楚是否如此，便想问博学的老师。结果老师很不高兴，只回答了他一句“不知道”，让他很失望，以至很多年过去尚不能忘怀。

但孩子毕竟是孩子，他还不懂事，许多方面尚需要大人的引导，如果一味地放纵，任其发展也不行。《蒙》卦说：“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渎，乱也。意思是说，初次求问决疑则教之，再三再四胡乱发问则不予回答。小孩子好问是好事，但不能乱问，要经过自己大脑的思考。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思考了，才能明白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才能有的放矢地发问。如果孩子有问必答，而不去引导孩子的自我思考，久而久之就会养成他的依赖心理，好心办坏事，适得其反。苏东坡的《东坡易传》曾提出“自得、自悟、自胜、自达”的“四自”方针，强调应培养孩子的自觉性和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这样解《蒙》卦，无疑是一种创见。现实生活中，有的

家长不注意培养孩子的自觉性,甚至主动包办代替孩子去完成作业,以节约孩子的时间。这样做,或许能为孩子争得高分,求得虚荣;但久而久之,必将导致恶果。这是十分要不得的。

教育孩子的时候,适当的引导是十分重要的。《荀子·劝学》篇也说:“问桎者,勿告也。”桎,指恶劣的或不正当的事。这里的“勿告”,只能是止其一端,而引向另一端,并不能简单予以制止了事。因为人的本性如此,对一件事情感兴趣便想追问到底,如果你只是压制,反而会更加激起他的兴趣。正如能量的蓄聚,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爆炸,其结果会更加糟糕。比如“儿童性教育”问题,尽管我们的祖先早就有“食、色,性也”之说,但自宋明以后儒学的影响,中国人形成了讳言“性”的习惯。人们总认为“性”是丑陋的事情,尤其对孩子,更是谈“性”色变。结果越压越糟,有许多孩子因好奇或抱着尝试的心理而早恋,甚至早孕。鲋以堵截治水而失败,禹因疏导治水而成功。教育孩子也是如此,简单粗暴的“勿告”不可取,正确地引导方为上策。

总之,《蒙》卦在谈为孩子启蒙发智的重要性时,先给父母和老师上了一课,让作为教育者的父母和老师明白,如何去教育好自己的下一代。  
(曹建国)

### 3. 初生牛犊不怕虎

《周易》从本质上来说,奉行的是一种“外圆内方”式的人生哲学。一方面强调君子立身须正,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坚守正道;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要审时度势,注意循序渐

进,不能操之过急。这也是传统的中华文化所强调的立身处世的理想状态,其影响甚至辐射到了国外。例如日本的“面子文化”,就深受这种人生哲学的影响。无论是赞成还是否定你的观点,无论身处顺境还是身处尴尬,日本人都会一律面带微笑。实际上,他的微笑表达的含义相当丰富。如果你被他的表象所迷惑,无疑会导致信息错位。

之所以说“外圆内方”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因为人们很难完全做到这一点。圆和方本身便是一对矛盾,并且各人的性情、禀赋不同,再加上环境、对象等等因素,要做到外圆内方,就更是一件难事了。不过,无序中也有一些规律。一般来说,年纪大的人处事,总会比年轻人成熟。或者换句话说,老年人世故的多。中国还有句俗语:“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讲的也是这种情形。或许有人会觉得好笑,这有什么奇怪,人经历的事情多了,就会慢慢成熟,这话自然没错。但是人初生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随着慢慢长大,白纸上逐渐因人而异涂满了各种色彩,到最后已经看不出纸最初的颜色是什么了。从不成熟到成熟,作为人生的一个必经阶段而存在,虽然不成熟必将失去,但是这一段新生的年华却值得每一个人珍视。

《乾》卦在《周易》里是典型的推崇阳刚的强者哲学,但是在初九爻辞中依然强调“潜龙勿用”,让人们在开始的时候要“不显山,不露水”。在条件不具备、力量薄弱的时候,耐心积蓄能量,等待有利时机,这就是外圆其形,而内方其神。一旦时机闪现,有为的青年人常是大胆而及时地捕捉时机,付诸行动。人在少年时期,正是无所畏惧的时候。在他的眼里,没有什么实现不了的目标,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俗话

说得好：“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刚出生的牛犊甚至连百兽之王的老虎都不怕。用初生牛犊来形容少年阶段，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自古英雄出少年”。或许正因为年轻气盛，凭着一股闯劲，许多人在少年时期便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中外古今不乏这样的事例。清代康熙帝即位的时候，年纪才八岁，由四个满族大臣帮助他处理国家大事，叫做辅政大臣。四个辅政大臣中，最专横跋扈的是鳌拜。他仗着自己掌握兵权，欺负康熙帝年幼，独揽大权。别的大臣和他意见不合，就遭到排挤打击。康熙帝满十四岁的时候，开始亲自执政。这时候，另一个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和鳌拜发生争执。鳌拜怀恨在心，勾结同党诬告苏克萨哈犯了大罪，奏请康熙帝把苏克萨哈处死。康熙帝不肯批准。鳌拜在朝堂上跟康熙帝争了起来，后来竟揎起袖子，拔出拳头，大吵大嚷，全然不把康熙放在眼里。康熙无奈，只好由他把苏克萨哈杀了。从那以后，少年气盛的康熙帝决心除掉鳌拜。他派人物色了一批十几岁的贵族子弟担任侍卫，这些少年个个长得健壮有力。康熙帝把他们留在身边，天天练摔跤。鳌拜进宫去，常常看到这些少年吵吵嚷嚷在御花园里摔跤，只当是孩子们闹着玩，一点不在意。有一天，鳌拜接到康熙帝命令，要他单独进宫商量国事。鳌拜像平常一样大模大样进宫去。刚跨进内宫的门槛，忽然一群少年拥了上来，围住了鳌拜，有的拧胳膊，有的拖大腿。鳌拜虽然是武将出身，力气也大，可是这些少年人多，又都是练过摔跤的，鳌拜双拳难敌四手，一下子就被打翻在地，牢牢地捆了起来。鳌拜被抓进大牢，康熙帝马上要大臣调查鳌拜的罪行。大臣们上奏：鳌拜专横跋扈，擅杀



无辜，罪行累累，应该处死。康熙帝从宽发落，把鳌拜的官爵革了。康熙帝用计除掉了鳌拜，消除了隐患，朝廷上下大为震惊，一些原来比较骄横的大臣知道这个年轻皇帝的厉害，再也不敢在他面前放肆。

鳌拜掌握天下兵权，亲信耳目众多，而康熙居然仅仅用一帮粗通摔跤的少年就制服了他，这样的胆识和魄力值得钦佩。但是康熙之所以敢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凭着少年气盛的一次重大冒险，因为双方的实力相差太悬殊，稍有不慎，康熙的帝位能否保住都很难说。无独有偶。在俄罗斯，历史上也有一位著名的少年有为的皇帝——彼得大帝。彼得大帝 1682 年登基的时候，才刚刚 10 岁。但是，他的登基不过是各种政治势力妥协的结果，朝政很快便被有军事势力支持的同父异母姐姐索非亚把持。彼得和母亲被赶出宫廷，被迫住在莫斯科郊外。小彼得从小就喜欢军事游戏。他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把小伙伴编成两个游戏兵团，双方在村庄中布兵排阵，建筑土堡，进行军事演习以及攻防战。彼得从小就表现了出众的军事谋略才能。随着彼得一天天长大，索非亚坐卧不安，于是终于在彼得 17 岁的时候发动了军事政变，企图废掉彼得。但是彼得敏锐地觉察到了危险，并且写信给名义上的沙皇——他的哥哥伊万，表达了铲除索非亚的决心。经过激烈的斗争，索非亚最终失败，彼得牢牢掌握了大权。他即位以后，大力革新，发展工业，很快便使俄罗斯的实力大为提升，并最终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彼得大帝作为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君主，一直被后人所敬仰。

其他少年英雄还有很多，诸如圣女贞德、十二岁的丞相甘罗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少年人凭着一股闯劲和敢于

冒险的精神,初生的牛犊是能够有所作为的。但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少年人冲动之下,考虑不稳妥,有时候也会铸成大错。戾太子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事例。戾太子是汉武帝皇子,立为太子以后,性情温和大度,在臣民中很有威信。但是他的个性与好大喜功的武帝并不一致,因此武帝并不十分喜欢他。戾太子常常担心自己会被废。武帝虽然托大将军卫青转告戾太子,让他放心,不让他去边关等危险的地方;而且武帝出巡的时候,国家大事都交付太子,可以说是对他很信任的;但是戾太子心中的疑虑始终没有解除。戾太子因为过于宽厚,得罪了不少奸邪之臣,他们遂联合起来在武帝面前诬陷戾太子。正好汉武帝久病不愈,于是他们便说宫中有人用巫蛊之术在诅咒武帝,并且栽赃陷害戾太子。当时汉武帝正在都城之外的行宫巡幸,都城由太子主政。太子惶惶不知所措,惊惶之下,便纠集都城里的兵马来自保。实际上,汉武帝此时对太子还是十分信任的。有人说戾太子造反,汉武帝说:“太子一定是因为害怕,才有这样的变故。”但是谣言不断,太子始终没有给武帝奏报。武帝不禁也怀疑起来,发兵围攻。太子骑虎难下,于是终于酿成了悲剧。太子兵败,仓惶出逃,死于乱军之中。后来武帝知道真情以后,深为后悔。但是错误已经铸成,后悔也晚了。假如太子当时能够理智一些,不要太冲动,亲身向武帝奏明情况,结局或许不至如此吧。

《易》中的处世道理可谓多矣。遗憾的是,领悟这些道理总是要以时间为代价。如果少年人的冲劲再加上老成的处世经验,恐怕很少有做不到的事情吧。可惜这样外圆内方的人并不多见。

(章 原)

## 4. 防微杜渐谈教子

某年春节联欢晚会有一个相声节目,讲的是有关教育子女的问题。其中有一句家长的台词:“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会当爸爸了”,引起了观众的大笑。大笑之余,人们发现教育子女的问题,的确是一个越来越值得重视的领域。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孩子们接触的世界越来越大,小脑袋里装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许多知识恐怕大人也不一定知道,家长的确是越来越难当了。

想想也好笑,中国传统的家庭是大户,一大家人聚在一起,理想的状态是不分家,追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的热闹场面。当时又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家有三四个、五六个甚至十来个孩子是很平常的事情。中国的历史这么悠久,教育孩子的经验可谓丰富;怎么发展到了号称文明社会的现在,家长反而不会教孩子了呢?难道是经验落伍了,不切实用了?细细想来,固然有旧的体罚教育方式不适用今天的情况,但是并不能因此全盘否定所有旧的教育孩子的经验;因为毕竟儿童的成长阶段都是相同的,而如何让他们成长得更好,则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目标。以古老的典籍《周易》来说,许多观点都对后世的儿童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蒙》卦等,这已经为人所熟知。其实《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它里边还有许多思想,都能给我们教育孩子以启示,这里我们不妨结合《周易》来谈谈从小事抓起教育孩子的问题。

《周易》所宣扬的“变易不居”的观念,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它强调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这与西方哲言

“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变动的世界当中,没有什么绝对的事情。许多现在看来不起眼的因素,保不准明天就是决定事物大局的关键。我们都知道一句俗语:“千里大堤,溃于蚁穴”。蚂蚁的巢穴能有多大啊,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但不要小看这小小的蚁穴,如果任其蔓延发展,再坚固的堤坝也会崩塌。

具体到教育孩子来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种种行为,有的是正确的,有的则是有待于纠正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必要因为孩子做错了什么事情就大惊小怪。是人就会犯错误,圣贤尚不例外,何况一个小孩子呢?问题的关键是,对于孩子做错了的事情,家长要及时提醒纠正,防微杜渐;否则任其发展,迟早会酿出苦果。这里我们举一个在中国流传很广的故事:

有一家人,和和睦睦,夫妻恩爱,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孩子。夫妻俩不知道烧了多少香,许了多少愿,也许是老天开眼,妻子终于有了身孕。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下一个肉乎乎的胖小子。中年得子,夫妻两个非常高兴,因此对孩子非常疼爱,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着,生怕他受一点委屈。在夫妻两个的溺爱之下,孩子从小就养成了说一不二的性格。后来丈夫不幸病故了,剩下母子两个相依为命。失去了丈夫,儿子是母亲唯一的希望,因此更加溺爱孩子。有一次,货郎到村里来卖东西,孩子趁货郎不注意,偷偷拿了一根针跑回家里,告诉母亲:“我拿了一根针,不花钱的”。母亲心里觉得不妥,但出于溺爱心理,不但没有责怪孩子,反而表扬孩子真机灵。得到母亲表扬以后,孩子很开心。过了不久以后,他又趁人不注意,从邻居家里偷了一只鸡蛋回来,母亲又

一次表扬他。这样的情形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随着孩子长大,他偷的东西越来越多,价值越来越大。这时,母亲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她只有尽量替孩子包庇,生怕别人发现。然而,该来的迟早要来。终于,孩子因为伙同他人偷金子,被官府抓住,要处以死刑。母亲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只好到刑场去见孩子的最后一面。孩子对母亲说,希望临死前能够再吃一口奶,以便到了阴间也不忘母亲的哺育之恩。谁知道在吃奶的时候,孩子竟然将母亲胸口的肉咬了一大块下来,并且恨恨地说:“我小时候偷针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阻止我,还夸我;否则,我怎么会落得这么个下场啊!”

这便是“小时偷针,大了偷金”这句俗语的来历。这位母亲真是可悲啊,她被亲情蒙住了眼睛,错把纵容当成了爱,没有及时去纠正孩子的恶习,最后不仅失去了儿子,还被儿子抱怨不迭。这对母子的经历可谓发人深省。

《周易》在强调事物处在不断变化的同时,还蕴含着及时清除隐患、果断除奸的思想。例如《解》卦。《解》卦位于《蹇》卦之后。“蹇”,自然是艰难的意思。根据《序卦》所说,《蹇》卦之后,事物不可能永远处在艰难困苦之中,故转化到《解》卦。“《解》者,缓也。”因此,《解》卦应该是一个比较平和、舒解困难的卦。但是从卦象来看,并非如此。《解》卦上震(☳)下坎(☵),震为雷,坎为水,雷下有水,正是雷雨交加之象。民间传说中,打雷向来被认为是上天在惩罚恶人,因此,这一卦象具有惩奸除恶的含义。虽然可以消除恶势力,但是本身仍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儿童成长中不良的行为,无疑是健康成长的隐患。正如前述故事里的小孩一样,偷针的行为固然很小,但是因为没有



受到及时的警告,于是逐步发展,一直到后来作奸犯科,落得悲惨的下场。因此,家长一定要注意孩子的言行,对于不恰当的行为要及时纠正,以免养虎遗患。

“孟母三迁”的故事,想必大家都不陌生。相传孟子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子两个相依为命。他们居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孟子学了些丧葬、跌足痛哭这样的事。母亲想:“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就离开了原来的处所,将家搬到街上。这里离杀猪宰羊的地方很近,孟子学了些做买卖和屠宰之类的东西。母亲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又将家搬到文化氛围浓厚的学宫旁边。夏历每月初一这一天,官员进入学宫,行礼跪拜,揖让进退,孟子见了,觉得很有兴趣,就一一记住。孟母想:“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

自然,我们这里并非歧视经商和丧葬行业,只是借助这个流传已久的故事来说明,及时发现孩子言行的恰当与否是多么重要。孟子小时候还曾经逃过学,他母亲就把织布机上辛辛苦苦织成的布匹割断,对他说:“你如果不好好学习,就会像这些断线一样,成不了布。”孟子深受感动,从此勤读,终成著名的思想家。

孟母的确是一个有心人。她能从孩子的言行中及时发现不妥的行为,并且当机立断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阻止这种不良行为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没有这样一位深明大义的好母亲,历史上恐怕不会有大思想家孟子其人,只会有屠宰小贩孟轲了。过去的未必就是落后的。孟母的教子方法,暗合了《周易》中《解》卦所包含的含义,对于我们今天的子女教育同样不无启发。

(章 原)

## 5. 人生莫要忘等待

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的结尾,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类的全部智慧都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或许我们起先并不能真正理解这句话,以为大仲马在说过头话:等待是一种被迫,是一种无奈,是一种消极,怎么能和人的智慧扯在一起?只有进取向上、冲锋闯荡,才能体现智慧和勇气嘛!

但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吃亏碰壁栽跟头,尝到酸甜苦辣以后,再琢磨大仲马那句话,就会理解其中蕴涵的人生睿智。从生到死,人的一生实际上一直处在等待状态。等待满月,等待周岁,等待上学,等待毕业,等待自己最心仪的爱人出现,等待自己人生幸福的理想实现。哪怕是等待一丝夏日午后的清凉,等待一缕冬日暖暖的阳光,所有这些都需要等待。人总是不满足现在的一切,总是将希望的目光投向未来,所以等待成为生命的常态。明白等待的意义,学会等待,对于我们的一生至关重要。知道一幕西方的现代戏《等待戈多》吗?剧中人一直在等待一个叫戈多的家伙上场,从开幕到闭幕,戈多不但没人见过,也始终没有上场。剧中人和台下的观众都万分焦虑地等下去。其实,那个叫戈多的家伙,就是现代人心中的欲望而已。这种欲望就叫做等待。

西方人看到了等待的意义,我们的祖先也知道等待的意义,甚至比他们更早。古老的《周易》就有许多地方谈到等待的问题。《易传·系辞下》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说的是,一个人如果善于等待最佳时机,就没有不吉

利的事情。不仅如此,《周易》还有一卦,名叫《需》卦(䷄),是专门说等待的道理的。从卦形上看,上卦为坎(☵),坎象征着云;下卦为乾(☰),乾象征着天。整个卦形是说云在天上。云在天上,就预示着将要下雨。我们都知道,古人进行农业生产,灌溉是头等大事。除了河流的灌溉,雨水是重要的水资源,甚至比河流更重要;因为河流进入枯水期,人们就无能为力了。所以在《周易》的卦辞中,雨水往往预示着吉祥。那么,《需》卦的“云在天上”也让人看到了下雨的希望,但此时离下雨还有一段时间,人们还要等待。下面的六爻就围绕着等待来设辞。初九说:“需于郊,利用恒。”九二说:“需于沙,小有言。”九三说:“需于泥,致寇至。”六四说:“需于血,出自穴。”九五说:“需于酒食。”上六说:“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整个过程,说的就是一场战争。第一步说在远远的郊外等候;第二步说已经到了护城河边;第三步说已经到了护城河中;第四步说交战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尽管血肉横飞,仍然要耐心地等待战斗的转机;第五步说战斗已经结束,尽管丰盛的庆功酒宴已经摆上,但还要等待,留心事局的发展,以防不利局面的出现;果然,到了第六步,确实有一群不速之客要来分享胜利,这时要审时度势,巧妙应付,方能化险为夷,遇难呈祥。

如果以《需》卦来比喻人的一生,我们可以说,人的一生要时刻处理好等待与前进的问题。生命就像一颗种子,从生根发芽到开花结果,是有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的,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奏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要学会持之以恒地去等待。我国南方有一种水果——荔枝,甘甜爽口,味美异常。唐朝的杨贵妃非常爱吃荔枝,唐玄宗为了讨好她,特设驿站,

从遥远的南方,急递长安。荔枝味美,但不能持久保鲜,从南方到长安,路途遥远,所以为使荔枝味道不失鲜美,必须快马加鞭,一刻不停。因而许多运送荔枝的人员和马匹都被活活地累死了,但唐玄宗却在所不惜,真有点“要美人不要江山”的味道,最后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就一蹶不振了。后来有一位晚唐诗人叫杜牧,写了一首诗《过华清宫》,中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之语,讽刺的就是这件事。大文豪苏东坡也喜欢吃荔枝。他被贬官到当时的荒蛮之地岭南,却丝毫不以为意,反而津津乐道地写下诗句,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但荔枝好吃,树却难栽,从接枝栽种到结出鲜美的果子,需要十余年的时间。这就需要你学会等待、耐心等待。

《孟子·公孙丑上》说,有一个宋人老是嫌他田里的庄稼长得不够快,就把庄稼的幼苗一一拔了一下。事后高兴地回到家里,对家人说:“唉呀,今天我把庄稼苗都拔了一下,帮助成长,真是累死了!”他儿子跑到庄稼地里一看,大事不好,所有的庄稼苗都枯死了。孟子说的虽是一个寓言,但我们千万不能一笑过后,却不去追究它的深意: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发生这种“揠苗助长”的蠢事。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人之常情。但你是否想过应该怎么办?如果你为了让孩子成才,以“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借口,而千方百计给他施加压力,那你就是大错特错了。前一段时间,12岁的蒋方舟《正在发育》一书被媒体大力炒作,蒋方舟因此而被大众传媒称为“少年文学明星”。但一位评论家却及时为公众敲响了警钟。他说,儿童的世界是天真的,因为他们不带有功利心。如果儿童的心灵被功利目的污染,他的人格必将被扭曲。蒋方舟的

《正在发育》说的是对父母重压的反抗,表现的是儿童对天真童年生活的渴望。但由于大众媒体的渲染,蒋方舟变成了少年天才。他的母亲也在大谈如何培养低幼龄写作天才的秘诀。这实在是违背了蒋方舟的初衷,无形中等于否定了《正在发育》一书的社会意义。如果你是一个商界的弄潮儿,你又该如何看待生意场中的一时起伏呢?如果你是一个立志于成才的有心人,你又该如何看待人生一时的失败与挫折呢?

人生需要等待。但等待不是守株待兔、被动挨打;而是在时机尚未成熟时,主动积蓄力量、创造条件来打通未来的康庄大道。

俗语说:“心急嫁不到好汉子,性急吃不了热豆腐。”话虽粗俗了点,但理却是这个理。“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说的就是姜子牙大老远跑到渭水边上,利用钓鱼作掩护,等待时机。他钓鱼用的是直钩,以引起周文王的注意,好把他当成是一个奇人。果然,他终于钓到了周文王这条“大鱼”。借助周文王,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志向,后来又得到了分封齐国的报偿。据说,当年诸葛亮用的也是这一招。刘备见到诸葛亮之前,有许多人劝诸葛亮出山,去施展才华。但他坚持认为时机未到。后来听说刘备这个人心地宽厚,有关羽、张飞等一班猛将,又是皇亲国戚,于是认为时机已到。他有一批朋友,天天向刘备推荐诸葛亮,说他是“卧龙”。舆论宣传工作做足,刘备来请,他又一次次避而不见,把刘备的胃口吊得老高,这样来抬高自己的身价。直到刘备三顾茅庐,他才毅然出山。

当然,说到等待,首先要明白等什么,然后才进一步思考如何等的问题。我们说的等待,是一种人生的智慧,一种人生的策略;决不是一种人生彼此算计的阴谋。在社会多元化和



强调个性的今天,人的价值取向五花八门。等待什么,可以区别一个人的类型和层次。应该承认,正常的名利是人的一种生存需求和动力所在,无可厚非。一般情况下,名利是人综合素质的外化,是对人付出的劳动的等价交换物。从这个角度讲,人盼望名利,是渴望社会对自身的肯定和承认,是展现生命价值的需要。但我们也决不能以自我和个性为理由,去损害他人和社会。同时,我们还要正确地衡量自己的才能,定下一个切合自身实际的目标,去努力,去奋斗。等待中不失希望,等待只是为了下一步的行动积蓄力量。只有这样,我们的等待才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曹建国)

## 6. 识时务者为俊杰

《周易·观卦》六三说:“观我生,进退。”这一爻很耐人寻味。从字面上看,这里的“观”有两层意思:既要观察外部环境的逆顺,又要审视自己内心的渴望。“我生”对应于“观”,也应该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我所处的环境,我此刻置身在何处;另一方面指我自身的所作所为,即我此刻做了些什么。“进退”自然指根据“观我生”的结果所作出或进或退的选择。综合起来说,人处事时要根据外部环境的状况及自身能力的大小,作出有利的选择,能进则进,该退则退。

话虽然这么说,可是人处事之时却常常很难做到这一点。一般人的看法,总认为向上向前之进取为佳,而不倾向于向下向后之退避。如果你是一个喜欢下象棋的人,一定听说过“回头马不如驴”,其实就是这种不愿退让心理的反映。该退不退,结果将会怎样呢?让我们来看一则小故事。清人纪晓岚

《阅微草堂笔记》之《槐西杂志(四)》记载了一则道士恃术斗妖的故事：

雍正初年,有个善于用符箓的道士,曾到过西山最幽静的地方。他十分喜欢那里的林木泉水,准备搭建个草堂去研习静坐。当地人对道士说,那里是鬼怪的老窝,本地砍柴打猎的人不是成群结队都不敢进去,甚至虎豹豺狼都不能在那里久留;因此劝道士不要去。但道士不听从。不久鬼怪妖精都出现了,有的偷窃建房的材料,有的作弄建房工人,有的毁坏道士的器具,有的弄脏道士的食物。这形势就好比人在荆棘丛中走路,每一步都受到妨碍;又像野火四面烧起,即使有千手千眼,也应接不暇。道士愤怒了,设坛召来雷神帮他灭妖。可雷神一到,妖怪早已逃之夭夭。空洞的山谷中一无所有。雷神离开几天后,妖怪又都回来了。这样反复了几次,雷神厌倦了,便不再答应道士的请求。道士只好一手拿着印鉴,一手拿着剑,单独与妖怪作战,结果被妖怪打倒在地,拔去了胡须,弄伤了头脸,剥光了衣服,倒挂在树上,幸亏遇到打柴人把他解救下来,道士便狼狈地逃走了。

这个道士原本仗着自己有点法术,便不顾别人的劝告一意孤行。他看不到形势对自己多么不利,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自不量力硬去碰钉子而不知退让,遭到失败的结局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这里说的虽是荒诞不经的鬼故事,但表达的却是鲜活的人生道理。《周易》有一卦名叫《遁》卦,专门就讲人生应该退让及如何退让的道理。其卦辞“遁:亨,小,利贞”,是说退让就可以得到亨通,力量弱小时,只利于坚固正守,而不可轻举妄动。对此,我们同样可以举《阅微草堂笔记》另一斗鬼的故事为例,来看看人处于不利时,如果及时退让,

便会结果如何?《阅微草堂笔记》之《槐西杂志(一)》讲道:

有一个人赶夜路,遇到鬼,就尽力同鬼争斗。不一会,一大群鬼拥了上来,有的抛砂石,有的抱此人手脚。这个人虽左冲右挡,仍不免处处挨打,跌倒又爬起,爬起又跌倒。这个人更加愤怒,拼死命与鬼搏斗。忽然,山坡上有个老和尚举着灯笼喊道:“施主,不要再打了!这里是鬼的老窝,施主虽然很勇猛,但已经陷入重围了。客主形势不同,人数多寡又如此悬殊。用你一个人的勇猛,去对付这么多狡猾的鬼,即使有古代勇士孟贲、夏育的能力,也没有取胜的希望,何况你还不及孟贲、夏育呢?知难而退,才是豪杰。你为什么不暂时忍让一下,跟老衲到荒凉寺中住一晚上呢?”此人顿时醒悟,奋力脱身,跟着老和尚的灯光而走,最后找到路回家去了。

试想,如果这个人不听老和尚的劝告,仍然同鬼搏斗,最终的结果或许将同那个受辱的道士一样;而他听了老和尚的话,暂时地退让了一下,便一切平安了。他的“顿时醒悟”,就在于他一下子明白了形势的不利和自身力量的弱小,便主动选择了退避。他是否学过《周易》,明白《遁》卦的《易》理,不得而知,但说他是识时务的人,大概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应该说,有时人之所以不愿退让,是因为有所系恋,为外物所牵绕。我们经常说“进退取舍”,说的就是进就将会有所取,退就必须舍去一些东西;而这正是人们不能正确对待进退的心理症结。一个人如果系恋于外物,该退的时候不退,或不能迅速的退,就将十分危险。《遁》卦初六说“遁尾,厉”。逃遁的时候,你落在了后面,危险。九三说:“系遁,有疾厉”。你心里舍不得什么东西,不能及时脱身,有危险,要受到祸害。柳宗元有篇寓言叫《哀溺文》,说的是某天,一群永州人过河时,

船到河中一下子沉了,船上的人都掉到河里去了。最后,大家都奋力游上了岸,但平时游泳技术最高的一个人却被淹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腰缠千钱却舍不得丢下,结果力尽溺水而亡。这些爻辞说的,都是这方面的道理。我们都还知道范蠡、文种的故事,两人同为越王勾践的谋臣,为越国灭吴立下了赫赫功劳。但两人的结局却有天壤之别:范蠡在帮助勾践灭吴后立刻遁去,经商致富,“三徙,而成名于天下……卒老死于陶,故世传曰陶朱公。”他三次迁徙,名扬天下,寿终正寝,无疾而终,且死后犹被尊奉为商贾之祖。而文种却不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贪恋所获的名位和权益,为君王所忌,最终被迫用勾践所赐之剑自杀。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范蠡深明“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他看出越王勾践其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所以毅然遁去,终于全身而退。而文种则心怀系恋,范蠡劝他离开,他既不能毅然决然地离开,又不能让勾践相信自己,只是“称病不朝”,这反而更加重了勾践对他的怀疑,最后便只好落了个赐剑自刎的悲惨结局。

当然,尤其糟糕的是,一个人对所处的环境既缺乏明智的判断,又心怀系恋,以致该进反退,该退反进;这不仅使他处于危险的境地,而且难以让外人对他产生同情。汉代的淮阴侯韩信就是个例子。

韩信是一位能将百万兵且“多多益善”的军事奇才,连汉高祖刘邦都不得不承认韩信能“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而自愧不如;但可惜的是,这样一位军事奇才却仅仅限于会打仗而已,于政治却是一位“高度近视眼”。他既心怀野心,又不能准确地把握机会。想当初刘邦、项羽争天下之时,天下形势

尽决于韩信一人之手,所谓“与汉则刘帝,与楚则项王”。蒯通曾游说韩信,怂恿其三分天下,与刘邦、项羽鼎足而王。而此时韩信却“不忍背汉,又自以为功大”,错失良机。十足的妇人之仁和鼠目寸光!不准备三分天下,就老老实实地做人吧,可他偏不!他对刘邦欲铲除天下非刘姓王而贬其为淮阴侯,心怀不满。陈豨谋反,韩信与之串通,欲起兵响应。但此时天下已定,他失去了与刘邦一争高低的时机,结果被吕后、萧何用计诛杀,只留下一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话头被人把玩。韩信的悲剧,就因为他不能审时度势,该进不进,该退不退。

生活中准确地把握时机,适时进退是十分重要的。该退的时候一定要退。你没有看见那些信奉“回头马不如驴”的下棋人,最后连一头驴都没有剩下吗?与其一无所有,还不如留下一头驴,好歹总比一无所有强;更何况,有时回头驴会比猛虎更厉害呢。所以说,信奉“回头马不如驴”的人,不是真正的下棋高手;生活中不明适时退让道理的人,也只能说是一个蠢汉。

(曹建国)

## 7. 走出困境有诀窍

《三国演义》载,刘备在沛城被吕布击败,失去了栖身之地,困窘不堪,无奈只好投降曹操。在曹操身边,刘备装出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一天到晚摆弄住所后面的一块菜园子,拔草浇地,甚是勤快。一日曹操邀请刘备喝酒,酒酣耳热之际,曹操对刘备说:“方今天下,英雄只有使君与我。”刘备一听,以为曹操已经识破自己的心思,不禁大吃一惊,慌乱中把筷子都弄掉了。正巧天空响起了一声惊雷,大雨倾盆,刘备说:“圣人



说：“迅雷风烈必变”。雷声这么一震，把我的筷子都吓掉了。”曹操说：“雷本阴阳相撞所发出的声音，有什么可怕的？”刘备说：“我从小就害怕打雷，一听到打雷就无处躲藏。”于是曹操一声冷笑，以为刘备是个不成大事的人，从而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刘备因此安全地度过了他的危难期，后来东山再起，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三分天下。

其实，王侯将相也好，平民百姓也罢，谁都不可能凡事一帆风顺。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那只是人生的一种美好幻想而已，任何人都会遭遇这样那样的挫折、各种各样的生命困境。问题在于，当外界的环境对你不利的时候，你该如何自处？古老的《周易》，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周易》中有许多卦、爻辞，都谈及人在逆境中应该怎么办。如《坎》、《明夷》、《困》诸卦，它们都主张在困境中不要轻举妄动。《坎》卦六三说：“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也就是说，你来去都处在危险之中，前进有险，退出难安，落入了陷穴深处，不可去施展才华。《明夷》九三说：“不可疾”，是说不要企望一下子就摆脱危险。《困》九五：“徐有说（悦）”，是说长期努力，终于摆脱困境，于是皆大欢喜。上述几个卦的爻辞，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以前面举到的刘备为例，如果他不问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看不到自己的不利形势，而一味蛮干，在羽毛未丰满之时，梦想立即展翅高飞；在力量微弱之际，立刻参与群雄逐鹿，可能不仅不能达到目的，而且还有可能身死敌手，更不要说三分天下了。三国时曹魏末年，高贵乡公曹髦因为不满司马昭的专权，于是召集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商讨对付司马昭，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等着被废，遭受屈辱，希望你们能帮助我来讨伐

他。”王经以春秋时鲁昭公不忍季氏，以致失国被笑为例，劝慰他不要操之过急，否则，“欲除疾而更深之”，适得其反。结果曹髦不听，在讨伐司马昭时被太子舍人成济刺杀。

但不轻举妄动决不是不动。《坎》卦六四说：“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意思说：用一樽酒，两簋淡食，质朴的瓦罐，来虔诚地敬奉神明，结交贤者，心怀坦诚、光明正大地结纳信约，这样，你最终能免除灾难。《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明夷》卦形(䷣)，下离(☲)为日为火，上坤(☷)为地而暗，象征明入地中，光明被黑暗遮蔽而受到损伤。但九三爻辞指出，人们即使在困境中也不要失去远大的志向，要坚持斗争，直到取得获其首恶的胜利。《困》卦卦辞说：“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就是说，在困境中，只有那些坚持信念、守正持固的君子，才能获得吉祥。在困境中，你应该保持沉默，学会等待；不要失去信心，应该以乐观向上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并做好积极的准备。这样，你最终能够摆脱困境，实现你人生的辉煌。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刚刚继承王位时，朝中大权掌握在令尹斗越椒的手中，于是他每日饮酒作乐，不问政事，以无能的表象来保护自己，却在暗中积蓄力量，期待有反戈一击的机会。有一天，一位大臣申无畏向楚庄王进谏说：“我有一个谜语，请大王猜：楚国的山上有一只大鸟，身披五彩，煞是威风，很是荣耀。只是三年不飞，三年不叫。不知大王可知道这是什么鸟？”楚庄王一听，就知道申无畏在嘲讽自己无能和软弱，便意味深长地回答道：“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果然，斗越椒权倾朝野，便越发目中无人，更不把平时看起来软弱无能的楚庄王放在眼里，甚至贸然起兵，想篡夺王位。结果，楚庄王利用早已积

蓄好的力量,射杀了斗越椒,夺回了大权,并且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从而名留青史。无独有偶,清代前期出现了与之惊人相似的一幕。顺治十八年(1661),清顺治帝福临驾崩,年仅八岁的玄烨继位,是为康熙。顺治遗诏,以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索尼年老多病,不问政事;遏必隆生性慵懒,遇事无主见,不敢与鳌拜唱对台戏;只有苏克萨哈敢违拗鳌拜,但又缺乏心眼与策略。所以鳌拜得以专权,结党营私,日益骄横,凡有违逆者,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甚至将年轻的康熙也不放在眼里。康熙五年(1666),鳌拜以本旗镶黄旗的土地被正白旗侵占为由,执意要重新圈换土地。他命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主持这件事。三人发现圈地危害极大,百姓甚至因为圈地而弃耕,导致大片土地荒芜。于是三人请求停止圈地。但鳌拜反对,他竟然一意孤行,奏请康熙,说三人办事不力,当死。康熙不准。鳌拜压根儿就不把康熙的旨意当回事,矫旨诛杀了三人。康熙六年(1667),康熙亲政,鳌拜专横更甚于前,凡事在家议论,随后即施行,根本不经过康熙。因为苏克萨哈与鳌拜有矛盾,鳌拜便以“怨望”、“不愿归政”、“有异志”等莫须有的罪名,拟将其凌迟处死、诛族。最终,鳌拜并不因为康熙抵制而作罢,公然将苏克萨哈处以绞刑,并诛族。凡此种种,都让康熙感到了一种危机。于是,他暗中加紧准备,以伺机铲除鳌拜。他选拔年轻力壮的侍卫,操练摔扑捕击动作。当时的形势对康熙非常不利:一者鳌拜已经羽翼丰满,势力庞大;另者鳌拜也武艺高强,不易对付。于是康熙一方面加紧准备,另一方面给鳌拜诸多封赏,稳住鳌拜,以麻痹他。康熙六年,就在鳌拜诛杀苏克萨哈以后,康熙还加封他为一等公;康熙七年(1668),又加封鳌

拜为太师。等到时机成熟,康熙八年(1669)五月,康熙终于利用这些年轻力壮的侍卫,将鳌拜一举擒获,消除了隐患;并在以后漫长的执政生涯中,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康熙盛世。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除了有E·Q(情绪商数)外,还有一种A·Q(逆境商数)。它是指人在面对逆境时候的反应方式,是一个人指引自己去勇敢地面对挫折、摆脱困境、超越困境的心理能力,其核心是意志力和智慧的整合能力。不同A·Q水平的人,其人生取向、生活态度、自我意识、面对逆境和面对挑战的反应方式有明显的不同。一般说来,高A·Q的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坚信“谋事、成事都在人”,因而能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对待生活中的挫折和逆境;中A·Q的人,则具有较多的等待意识,以听天由命的态度对待生活,遇到挫折和逆境,往往迟疑不决、犹豫不定;低A·Q的人,则把生活想象成漆黑一片,消沉低迷,经不起一点挫折的打击,面对困境,首先想到逃避、退缩。同样是自然界的风雨,林黛玉凄婉地唱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而毛泽东则表现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概。这就是不同的A·Q所表现出来的差异。A·Q具有后天获得性,它往往是习惯养成的。这就要求我们在他人的帮助下,积极培养自己应对挫折、面对困境的能力,培养一种良好的心理素质。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到处充满矛盾竞争、布满陷阱逆境的时代,应对逆境的能力强,心理准备足,才能迎来生活的光明与新希望。现在的家庭多为独生子女家庭,许多孩子娇生惯养,应对挫折的能力非常差,往往一点小的挫折就可能把他们打倒。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看到一些人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轻生,而且很多是年轻人。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对于儿童青少年的心理成熟,逆境的磨练比顺境的安逸更为重要。培养孩子参与明天激烈社会竞争的能力,我们责无旁贷。在教育孩子的同时,你也应该时时警醒自己:孩子的竞争在明天,而你的竞争就在眼前。面对挫折,置身逆境,你又该怎么办?  
(曹建国)



## 三、婚恋篇

### 1. 刍议“生殖崇拜”说

什么是“爻”？爻是《易经》八卦、六十四卦的组成要素，是《易经》最基本的符号，是卦的最小组成单位。爻分阴、阳，阳爻用符号“—”表示，阴爻用符号“--”表示。那么，阳爻与阴爻真的与生殖崇拜有关吗？

“生殖崇拜”说，是在爻的起源问题方面有影响的观点之一。近世以来，章太炎《易论》、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认为：古代有生殖崇拜的习俗。阳爻与阴爻，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其中，阳爻“—”代表男根，阴爻“--”代表女阴。原始人赤身裸体，生殖器的不同自然成了男女最明显的标志，于是各选用一个形象的符号来区别、象征男女。郭沫若的说法可以作为代表：“八卦的根底，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一以象男根，分而为二以象女阴，由此演化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等观念”，“让《易经》自己来讲《易经》，揭去后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我们可以看出那是怎样的一个野蛮在作裸体跳舞。”

那么,生殖崇拜是怎么一回事呢?它是指对有关性器官、性行为,以及生殖的信仰和礼仪行为,是人类的早期信仰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原始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不断发生的天灾人祸随时都有剥夺个体生命的危险。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极低的增长率,是当时人口生产的特点。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非常重视两个方面的生产,一个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一个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即“种的繁衍”。而人类自身的繁殖,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所以说,生殖崇拜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祈祷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粮食的丰收,一是为了祈祷种族子孙的繁荣,而两者都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

“生殖崇拜”说,有其内外的证据。最有力的内证是《周易·系辞》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该句中的“专”,音团 tuán,义为柔软;“翕”,音息 xī,义为闭合;“辟”,义为开。翻译成白话,就是说,象征阳的乾,当宁静的时候是柔软的,当兴动的时候是坚挺的,所以产生出刚大的气魄;象征阴的坤,当宁静的时候是闭合的,当兴动的时候是辟开的,所以产生出宽柔的气质。这实在是对两性生殖器官形态和功能的生动描述。此外,《系辞传》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氤氲”一词,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解释为天地阴阳二气交感绵密之状;“醇”,义犹“厚”,指万物因天地二气交密而化育纯厚。“男女”,泛指阴阳两性。男女、阴阳交合其精,万物化育孕生。这句话显然是用男女性交来隐喻天地交合、化生万物的情景。《序卦传》说:“有天地

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乾·彖》说:“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归妹·彖》说:“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根据这些男女性行为方面的术语,有人认为,六十四卦是天地、男女生殖力的表述,乾坤代表天地、男女、父母,其余六十二卦展示的是天地、男女、父母的交合与繁殖。《周易》正是通过对两性交媾的描述,赞美宇宙生成万物的伟大,进而把两性的交媾推广到天地交合、宇宙万物的产生与运动等各个方面。这种把男女交合看作像天地造化一般崇高的思想,正是把人的生产与自然万物的形成看作一体的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原始生殖崇拜精神的精华。

相关的外证主要有:第一,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据郭沫若、周予同等考证,“祖”(且)是男子生殖器的象形。从考古发掘方面看,西安三店村出土的铜且,就是男性生殖器的形象。祖先之“祖”,从“示”从“且”,反映的正是古人对男性生殖器“且”的祭祀、崇拜情况。第二,傅道彬在《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中指出,《易经》卦爻辞中有大量的“吉”字。“吉”是“结”字的初文,从士从口,而“士”在甲骨文中是阳具的象征,由此引申为男子的代称。“口”字是女阴之象。“吉”字,甲骨文为男女交媾之意。正因为原始人有强烈的生殖崇拜观念,所以,该字才引申为吉庆、吉祥的意义。第三,从中国先秦的典籍看,不只是儒家如《周易》等的阴阳学说,来源于生殖崇拜;作为道家始祖的《老子》一书,也同样有生殖崇拜现象。如“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章》)一句中“妙(女性)之门”,本指女性生殖器。“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六章》),其中“谷”、“牝之门”,均指女性生殖器,“是谓天地根”,

表明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又说：“大邦者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天下”（《六十一章》）。该句从女阴的生育功能，引申出天地的起源，又从男女交合的特点，引申出人生思想上的柔静、无为之说。第四，中国新石器时期的西安半坡母系氏族公社“鱼祭”祭场，都是模拟女阴的圆形，其彩陶鱼纹具有象征女性生殖器的意义。从国外看，法国冰川时期的石灰石雕像就有乳房硕大、腹部隆起的生殖女神形象。埃及的金字塔、基督教的十字架，都有明显的生殖崇拜的特征。以上证据说明，生殖崇拜活动是早期人类普遍发生的文化现象。卦爻的产生是古人“近取诸身”的结果，与男女生殖器官应当有一定关系。

但是，人身器官很多，再加上《系辞》还有“远取诸物”的说法，因而生殖器官与阴阳符号不是唯一的对等关系。如果我们把“生殖崇拜”讲得太单纯，太肯定，它对我们的先人在与自然、社会打交道中，在“远取诸物”方面似乎考虑得不够。在爻的起源问题上，“生殖崇拜”只是较有影响的说法之一；除此之外，目前有代表性的说法还有：

1. 结绳图画说。《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东汉郑玄猜想上古之时，记大事打一大结，记小事打一小结。近代有人认为，阳爻“—”和阴爻“--”是古代结绳没有打结和打结的反映。也有人认为，“—”为一大结，“--”为两小结。持这种观点的有李镜池《周易探源》、范文澜《易经概论》、陈道生《八卦的起源》等。

2. 竹节、蓍草说。有人认为，阳爻、阴爻是人们在卜筮时所用竹节的象征。阳爻“—”代表一节竹棍，阴爻“--”代表两

节竹棍。也有人认为阳爻、阴爻源于蓍草的排列。整根蓍草为阳爻，中间开裂的蓍草为阴爻。后来抽象成“—”和“--”的符号。持这种观点的有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等。

3. 日月星象说。有人认为，阳爻“—”来源于白天的日象，阴爻“--”来源于夜晚的月象。如《易传·系辞上》说：“刚柔者，昼夜之象也。”《系辞下》在讲到白昼、黑夜循环交替时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也有人认为，“卦”为用土圭测日影，爻是记述日影变化的符号。阳爻即太阳光，阴爻即月光、星光。

4. 龟卜说。古人迷信，尤其是在《易经》所产生的殷商时代，占卜盛行，其方法是烧灼龟甲察看其裂纹，根据兆象来判断吉凶。此外，还有用兽骨来判断吉凶的。人们从烧灼或刻划的兆纹（多断或连的直线）上受到启发，发明阴阳爻。

5. 数字说。近年，人们从陆续出土的文献、文物中，发现阴爻、阳爻是由数字演变而来的。不少学者认为，阳爻“—”起源于奇数一，阴爻“--”起源于偶数六。六，古作八，演化为--。

此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上述诸说也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随着地下资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目前，数字说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这就说明，原始的生殖崇拜，只是《周易》阴、阳观念起源的有重要影响的说法之一，但不是唯一的解释。我们应广开思路，多视角、多层次地加以观察研究。

（王启才）

## 2. 血泪涟涟话抢婚

从远古的群婚到现代婚姻，人类的嫁娶形式曾经发生过



几次重大的变化。时至今日,我们从古老的《易经》当中,还可以窥见我国上古抢婚风俗之一斑。

《屯》六二说:“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如,语气助词。屯,“聚也”(《释文》)。遭如,难行不进的样子。班如,相牵不进的样子。匪,通“非”。贞,守正。字,意为女子许嫁。《礼记·曲礼上》解释说:“女子许嫁笄而字。”《屯》六二爻辞是说:一伙人聚集起来,骑着高大的马,行进艰难,徘徊不前,但他们不是强盗,而是来求婚配者,女子守贞持正不许嫁,等待十年才喜结良缘。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的抢婚习俗中,通常是许多人(亲朋)结成团伙,突击行动。由于不是通过正规途径迎娶女子,违背女方意愿,所以女方不答应;在抢婚已成事实的情况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十年),待男女双方的敌意逐渐消褪后,为争得媒人和社会的认可,两人才缔结了婚约。

《屯》六四说:“乘马班如,求婚媾也,往吉,无不利。”《屯》卦(䷂)六四与初九阴阳相应,表示男女双方虽然情投意合,但男方地位较低,或家庭情况不好,下不起聘礼,女方家庭一再地阻挠他们的婚事。在这种情况下,男方振奋精神,排除障碍,大胆前往,把心上人抢到身边,得到了心爱女子的有力支持,吉祥。《屯》上六说:“乘马班如,泣血涟如。”泣,哭而无声。《诗经·小雅·雨无正》有“鼠思泣血”,《毛传》说:“无声曰泣血。”涟如,泪流汪汪的样子。这则爻辞描写了新娘被掠,在走向男家的路上涕泣不已的情景。男子结队抢婚,兴高采烈;女子却痛苦挣扎,泪尽泣血。一场上古婚礼,或哭或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认为,哭嫁习俗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后,哭泣遂演化为出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礼仪文化。因为在新娘

的哭泣中,既含有生离的悲苦,表达了对爹娘亲人的真实眷恋;也具有某种神秘的祈祷功能,还包涵了她对性的羞怯和谨慎……。《离》六五中也有“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之语,意思是说,涕泪滂沱而流,有忧戚嗟伤之貌,吉祥。考察各地的风俗,多数认为婚仪中新娘的哭泣是吉祥的。民间俗谚所谓的“婚前不哭婚后哭”,就说明了婚礼上新娘的哭泣,有兆示婚后生活幸福的作用。

《贲》六四说:“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贲,“饰也”。皤,白素之貌。翰,本义为稚鸟的一类,引申为高、白等。该爻辞是说,淡然文饰,全身素白,乘着高大的白马,开始以为遇到了强盗;仔细观察,原来是抢婚的队伍。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已把白马与婚姻联系在一起。今天,情窦初开的少女心目中的偶像——“白马王子”,其词的文化渊源与《易经》的抢婚风俗,或有一定的关系。

《睽》上九爻辞是抢婚的一种原始记录。“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脱)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睽,乖异。孤,孤独。豕,猪。负涂,浑身是泥。弧,木弓,泛指弓箭。爻辞是说,(在黄昏时分)一个孤独、乖异的旅行人好像看见一头满涂污泥的丑猪,又像见到一车丑恶的鬼怪;于是拉开弓箭,严阵以待;后来才发现不是强盗,而是满载着去抢亲的人群,于是就放下弓箭。抢亲者此时前往,阴阳和合,犹如久旱遇到甘霖,可获吉祥。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测到,上古抢婚风俗,男方求亲队伍大多戴着图腾面具。上九爻辞说有的像满身污泥的猪,有的像面形丑陋的鬼怪,大概指的是这种情形。人们还赶着车,热热闹闹地前去迎亲。所谓“遇雨则吉”,是借下雨比喻阴阳和合,婚姻美满和谐的。下雨,在古

人看来是大自然阴阳和合的征兆,因为万物生长同样离不开雨水的润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诗经·豳风·伐柯》),“男女不媒不交”(《礼记·坊记》),和谐的婚姻有待于“良媒”的撮合。

在今天的俗语中,依然保留着“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的说法。“猪好吃拱泥,人好吃作媒”,脏猪和下雨只是抢婚事件的隐喻,旨在说明这是一种经过媒人撮合的、合法又和谐的婚姻。《易经》时代,这种“抢婚”并不是真的去抢,只流于一种仪式。这种假掠真婚的记载,在《仪礼·士婚礼》中也可以找到近似的描述:迎亲的时候,(主人)要头戴赤黑色的帽子,身穿红色的衣裳,腰系黑色带子,陪同迎亲的人全身要穿黑色礼服,大家乘坐有黑色幔帐的车子,并有两辆车随同,以烛开路。如此看来,在昏暗的烛光中,娶亲的人马突现为“载鬼一车”的神秘意象,也就不足怪了。

抢婚又称掠夺婚、劫夺婚、佯战婚,是通过或者依靠暴力手段取得婚姻关系的一种古老习俗。换句话说,是男子未经女子及其亲属的同意,用掠夺的方法,强娶女子为妻。从抢婚的遗迹来考察,我国上古时代这种婚姻形式的确存在。如《咸》卦卦辞说:“亨,利贞。取女吉”,《蒙》六三说:“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李镜池在《周易通义》中说:“娶女,抢女也。”《易经》多处提到“匪寇,婚媾”,梁启超解释说:“夫寇与婚媾,截然二事,何至相混?得无古代婚媾所取之手段,与寇无大异耶。”(《中国社会史·社会组织篇》)梁氏的推测是对的,寇婚同称,实际上就是上古的掠夺婚俗。《说文·女部》云:“娶,取妇也。从女从取,取亦声”,含有抢夺之意。《又部》:“取,捕取也”,捕取就是暴力抓获。婚原写作“昏”,《说文》:“礼,娶妇

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许慎的这种说法，本原于《礼记·郊特牲》。所谓“昏时娶妇，以和妇人也”，这显然是阴阳家们的附会。实际上，以昏时取者，昏暗不清，便于偷袭、抢掠，才可能是它真正的涵义。为什么古人要在昏夜里娶妇呢？强盗掠夺妇女一般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只有在昏暗的黑夜，在人们戒备不足的情况下才易于得手。而后世结婚沿用这种习惯，多在黄昏后迎娶。刘师培说：古代劫掠妇女，必趁夫家不备，而以昏时为宜，后世沿用这一惯例，遂以“昏”为婚礼名（转引自陈顾远著《中国婚姻史》）。“昏”礼，在时间上保留了“婚姻”的本意。“婚姻”二字，在中国古籍中都本作“昏姻”或“昏因”。上古时婚礼在晚上进行，婚娶的“婚”字，从女从昏，这个“昏”既是声符，又是义符，表示晚上才举行婚礼。汉代的《白虎通义·嫁娶篇》中仍然说：“婚姻者，何谓也？昏时行礼，故谓之婚也。”由于“娶妇以昏时”、“昏时行礼”，所以春秋文献中“婚”字一律写成“昏”。郑玄在给《诗·郑风·丰》作笺注时说：“昏姻之道，谓嫁娶之礼。”孔颖达作《疏》说：“男以昏时迎女，女因男而来，……论其男女之身谓之嫁娶，其好合之际，谓之婚姻，其事是一，故云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也”。由此逐渐形成了婚姻的观念，把“结昏”之礼叫做婚礼。

据《礼记·曾子问》记载：孔子曾说过：“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这一说法，也透露了抢婚风俗的蛛丝马迹。女家三夜不熄灯，是因为家中（族内）女子被人抢走，思其相离之情。男家三天没有乐声，是怕女家来犯而严守秘密。《礼记·郊特牲》上说：“婚礼不贺”，它的原意或许正是出于这种抢夺婚，怕把结婚的消息泄露出去，惹来麻烦。

这种婚制在先秦典籍不乏记载。远在《易经》之前,已有抢妻、夺妾的传说。据张守节的《史记·夏本记·正义》说,羿夺占了夏代第四个君主的王位后,寒浞又杀了羿,并夺占了羿的妻妾。《诗经》中的《召南·鹊巢》、《陈风·防有鹊巢》、《邶风·鸛鸣》等诗所记录的,都是抢夺婚场面(郭晋稀《诗经蠡测》,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据《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宋国有个名叫华父督的太宰,在路上看见司马孔父嘉的妻子长得美丽,于是就杀了孔父嘉,霸占其妻为妾。类似的事情,在《左传》文公十八年、庄公三十三年、襄公三十年、昭公元年、昭公十九年、桓公十六年等都有记载。战国时期,抢夺婚在秦国等地就较为流行。仅出土的《日书》中所记载的有关秦人“夺室”的简文就有九条。如简文 912 说:“……而禺(遇)人,人必夺其室。”简文 731 说:“结日作事不成,……以寄人,寄人必夺主室。”“室”,在先秦时代主要指妻。如《礼记·曲礼》说:“三十曰壮,壮有室。”郑玄注:“有室,有妻也。”需要说明的是,《日书》中抢掠有夫之妇的事情,虽然与原始抢掠婚不太相同,但从中也可以窥见我国战国时期仍然残存某种抢掠婚俗的情景。

《周易》等典籍所反映的抢婚风俗,表现了人类婚姻“向个体婚制过渡的迹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映了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时期的婚俗特征,以及此时解决矛盾的手段和方式。苏联学者 M·O·柯斯文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曾指出:“婚姻缔结的另一种形式是掠夺妇女。”(张锡彤译《原始文化论纲》,人民出版社,1995)其实,抢婚风俗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曾是普遍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礼仪文化,随着社会的进步,其日渐减弱或舍去暴力



成分,而成为一种包含了怀古文化内涵的婚俗。甚至晚近时代,在我国的傈僳族、景颇族、傣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以及欧美的英国、法国、希腊、挪威、印度,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中都依然存在。(王启才)

### 3. 夫妻反目成仇人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从简陋、低矮的草房里,再一次传来了争吵、叫骂声。声音起先不大,后来却一声高过一声,接着就是“砰”、“哗啦”,东西被摔的撞碎声,后来是撕打声、皮肉的撞击声、女人凄厉的哭声……。村里人纷纷跑来观看。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序卦传》)。自从有了家庭,这一幕夫妻冲突的情景,就一直上演不断。

“輿说辐,夫妻反目”(《小蓄》九三),这个譬喻是《周易》对夫妻冲突、家庭解体的经典概括。輿是古代的车子。说,通“脱”。辐是古代木制车轮中支撑外轮圈、连接车轴的直木条。用车轮脱落了辐条、车子被毁,来比喻夫妻打骂、反目为仇、家庭破裂,倒也十分妥帖。

如果说车辐不肯围绕车轴中心旋转、涣散脱落,导致了车子无法前进;那么,夫妻反目、家庭解体的主要原因,正是一切以阳刚为主的大男子主义。

《周易》较多地带有父系氏族社会的特点,具有褒阳贬阴倾向。它认为阳是积极、进取、向上、刚毅的,阴是消极、退守、卑下,柔顺的;又有崇天卑地的观念,如《系辞上》说:“天尊地

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其中矣”。这种观念运用于婚姻、表现在家庭方面,就是男优女劣、男尊女卑的大男子主义。其主要表现如下:

在家以男子为中心,一切以男的说了算,反对任何形式的“夫人专政”、“妻管严”。《易经》的《乾》、《坤》、《家人》等卦一再强调男为天、为君,女为地、为臣,妻子要顺从、服侍丈夫。如《说卦传》说:“乾,天也,故称乎夫;坤,地也,故称乎母。”《坤·文言》说:“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什么叫“代有终”?《周易正义》解释说:“地道卑柔,无敢先唱成物;必待阳始先唱,而后代阳有终也。”这不就是“扶阳抑阴”、要求夫倡妇随吗?联系《仪礼·丧服传》“夫者,妻之天也”等说法,它要求女子恪守地位卑下的本分、言行不逾相夫育子的职守。在《随》、《家人》、《恒》等卦中,反复申说如果妻子顺遂丈夫,行为就“贞正”,结果就“吉祥”,能受到丈夫的宠爱,使得家庭和睦、幸福、长久;反之,如果不守本分,凌乘阳刚,想搞“夫人专政”,则被看作“失正”,非咎即“凶”。如“女壮,勿用取女”(《姤》),意思是说,不能娶女强人做妻子。又如《小蓄》卦九三《象传》说:“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夫妻反目是因丈夫管不住妻子,妻子也不服管制,所以家室不正。《恒·六五·象》说:“夫子制义,从妇凶也。”只提倡男强于女或妻对夫的从属依附,决不许女子凌驾于男子之上或与之平分秋色,这是多么的不公!从另一方面说,过于压抑女性,想让其俯首贴耳绝对服从,必然会引起女性的不满和反抗。《易经》产生之时,母权制去时未远,越是强化男尊女卑的观念,越说明女性的势力还很强大,男女

权力之争和冲突仍很激烈。

在婚恋方面,《周易》提倡男求女,不提倡女追男。男子可以一夫多妻,女子必须从一而终,决不许移情别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关雎》的这句诗,用来说明《周易》的婚恋观再恰当不过了。在《咸》、《渐》、《随》等卦中,它提倡男子积极、主动的追求,却一再强调女子的“贞”,即要有人格之正、设法成为“淑女”,然后是守静待求。只有阳刚感应自己,方能欣悦相随,如此才会无咎。如《随·彖传》说:“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悦)。随,大亨,贞无咎”。若女方主动追求阳刚,必有“邪媚之嫌”,贻害无穷。

令人深感不平的是,《周易》一方面重视、强调女子的贞操,要求她们婚姻专一、持久;另一方面,却不要求男子贞正,甚至允许男子娶媵蓄妾。《归妹》卦九四《象传》说:“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是说女性应节操坚强,宁可延误婚期,也不要胡乱出嫁。《恒》九三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象》说“不恒其德,无所容也。”该爻辞及《象传》的意思,借用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的解释,是说“(作为女子)在夫妻关系上表现为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没有恒久的德性,……行为很不端正,终被其夫所弃。”《蒙》六三说:“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句中的“金夫”,指美貌郎君,或有钱的男子。女的一见到英俊潇洒或有钱有势的男子,就不顾体统,抛弃原夫而去追求,像这样的女人,娶到家里,是不会有好处的。与此相反的是,《周易》多次讲到“归妹以娣”,指男子娶妾,并肯定了其为“天地之大义也”(《归妹·彖传》)。这实际上是要求男子不必忠贞,他可以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幌子下,娶小老婆,“包二奶”。男的活得倒潇洒!再说,在妻妾成群的大

家庭里,争风吃醋,经济纠纷,矛盾、冲突是避免不了的。

《周易》在肯定婚配年龄相当的前提下,对老夫少妻和老妻少夫两种不正常的现象,作了不同的评价。如《大过》九二说:“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稊,新芽。对老夫少妻的婚姻基本上予以肯定(可参见下篇《老夫少妻来相配》)。相反,对于老妻少夫则态度不同,《大过》九五说:“枯杨生花,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玩味其辞,花与芽、枝大不相同,杨花虽好,能经几日?老妻少夫相配,虽然刚柔也调济,无奈极强配极弱,颇有不适之憾,终难成功。所以,即使不遭咎害,也是口碑不佳。如果说爻辞已涵有不赞同、不提倡的语气;那么,《象传》则明显地反对、贬斥了:“枯杨生花,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今天看来,即便是老夫少妻,性情也难以投合,配合也很难默契,有不适和冲突是自然的。更何况当时仍有抢婚遗风,有些人的老婆是强迫“抢”来的,违背了女性意愿。一味逼迫,必然遭到激烈的反抗。

生育孩子问题也是夫妻矛盾和冲突的导火索。上古时期,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劳动力非常宝贵。因为那时妇女怀孕不太容易,这从《诗经·采芣》一诗中所描绘的三三两两的女性在采摘医治女子不孕的药——车前子草时的情景可以看出;且孩子成活率很低,以至于出现相互争夺人口的现象。在这种状况下,女人生小孩不单是家族延续香火的大事,也是政府、国家的大事。这样说来,那些不能生育小孩的妇女,其处境就惨了。挨打受骂,乃至被休弃是自然的事,这些都被《周易》称为凶险。如《渐》九三说:“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其九五爻辞说:“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可见,妻子不能生育,对家庭、对个人的打击多么大,它直接影响了夫妻

关系。尽管责任不全在女方,但女子有可能成为男方发泄怨气的对象。有了孩子,女人的心理好过多了,不过当她把整个身心都投注在孩子身上,以至于无意中冷落了丈夫的时候,即《随》六二所说的“系小子,失丈夫”,也很容易引起丈夫的不满,使婚姻蒙上阴影。

大男子汉多是小心肠。婚后,闲言碎语,男方对妻子是否忠贞的猜疑,也是夫妻不和、冲突的原因之一。如《震》上六说:“婚媾有言。”“有言”指言语争执,不相和合。意思是说,凡事都要警惕戒惧,敬慎小心。尤其是当有关婚姻的谣言如惊雷滚动、令人战栗之时,如果不辨是非,盲目听信,贸然行事,必然挑起与妻子的争端,乃至爱情和家庭被风雨摧毁,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应该认真处理婚姻中已发生或未发生的大小事情,相信伴侣,不为谣言左右,就能使家庭和谐,婚姻、爱情恒久。可见,看似闲言碎语,实则众口铄金。男人在震惊、冲动之际,千万别干不可挽回的傻事。

男人治家过于苛严,不近人情,或因战争、劳作长期在外,冷落妻子,也是引起夫妻矛盾和冲突原因之一。不过这种冲突是内在的,往往以女子不堪忍受、逃避出走为结局。《周易》从大男子的角度,对女子要求高,防范也严。如《观》六二说:“窥观,利女贞”。窥观,指暗中偷看。限制女子自由,不允许她广泛接触社会,只让她从深闺的门缝中观察世界,以利于女子坚贞,确保不出问题。《家人》初九又说:“闲有家,悔亡。”闲,《说文》解释为:“阑也,从门内有木”,意为闭上门以木拒之。这句话同样是讲防止邪恶、女“正”于内而谨慎持家之事。总之,男人一天到晚在防范女人,不许她干这干那,缺乏夫妻之情,没有温暖,女人心中笼罩着一层抹不去的阴影,脸上也



不见笑容,背地里哭泣叹气,那就很危险。

有那么一种男人,整日埋头外边的事,忽视了与家中妻子的联系与交流;或有的常年累月在外,妻子在家中活受空房的煎熬,致使女方有外遇或出走。《困》六三即是一例:“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这实在比夫妻因鸡毛蒜皮小事的争吵更可怕。所以,妥善处理婚后的关系,尤其是事业和配偶的关系,尤为重要。

从上述《周易》书中所表现出的失败的或有缺憾的婚姻类型看,男尊女卑、男女不平等的大男子主义,的确是夫妻冲突的主要根源。它留给今人的启示是,婚姻为人生大事,应采取认真、敬惧的态度;男女平等、互相尊重,彼此信任,携手合作,才是和谐、幸福、长久婚姻的要素。(王启才)

#### 4. 老夫少妻来相配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公园,在商店,在街头,人们时常看到妙龄女郎亲密地挽着长者的胳膊在散步、购物、浏览……,这种形同父女实为夫妻的婚姻,古已有之。据《鹤林玉露》记载:宋代的陈修七十三岁登第,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者。高宗在召见时,看他年龄大,就问他的孙子多大了。陈修被问得面红耳赤,说自己尚未娶妻。高宗可怜他,当场指配30岁的宫女施氏给他为妻,赏赐的嫁妆非常丰厚,一时传为美谈。人们开玩笑说:“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时间再往前推,早在《易经》时代,《大过》卦就已经记载了上古时代的老夫少妻婚姻现象。

《大过》的卦形是䷛,下巽三,上兑三,象征大为过甚。从

卦象分析看,巽为木,兑为泽,树木在大泽之下,为泽水所淹没,如果为时过久,必然造成“灭顶之灾”。这是说泽水过多、过甚。从卦形看,中间四阳爻,上下仅二阴爻相护持。其“大过”的原因在于阳刚太盛,阴柔不胜负担,阴阳失去了平衡。补救的方法,自然是济之以阴柔。如能积极加强阴柔方面的作用,以柔补刚,做到阴阳相通,刚柔相济,就能补大过的弊病,获得吉祥喜悦的效果。就婚姻来说,这不是指男女年龄相当的正常婚配,而是指老夫少妻或老妻少夫等不平常的婚配,称为吉利的主要指老夫少妻的婚配形式。

《大过》九二爻辞说:“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稊,通“荑”,指树木新生的芽。女妻,年轻的妻子。该爻辞是说,枯槁的杨树逢春生出嫩芽新枝,龙钟老头子娶了个年轻貌美的娇妻,无所不利。从爻位、爻象看,九二阳爻处阴位失正,且与上面九五同性相斥,阴阳无应,按理说应是凶或者不吉利,为什么爻辞反而称“无不利”呢?原来《大过》是个阴阳颠倒的卦,阳虽太过,但它处阴位而得阴柔之助,下与初六阴阳互比,刚柔相济,所以吉利。本爻拟象、譬喻非常生动。从人事方面说,老夫娶少妻,稚老相配,以阴济阳,恰如枯树逢春,又重现勃勃生机,当然非常吉利。王弼说得好,“老则过枯,少则过稚。以老分少,则稚者长;以稚分老,则枯者荣。过,以相与之谓也。”即是说,老者思想成熟,但容易凭经验办事,偏于保守;少者勇于怀疑和进取,但不够成熟老练,容易急躁冒进。老少结合,趋于中道,不刚不躁,稳于进取,所以比较吉利。

在中国古代社会,老夫少妻的婚姻比较常见。其中有的是不合理的结合,但也不乏美满的婚姻。除《鹤林玉露》所举陈修的例子外,再举几例,以示一斑。《女史》记载说:“卢校书

象,暮年娶妻崔氏,结缡后,微有嫌色。象请赋诗,崔口占曰:‘不怨卢郎年纪大,不怨卢郎官职卑。自恨妾身生太晚,不及卢郎年少时’。”幽默风趣,令人解颐。《遁斋闲览》记载说:“丰城有七十翁生子,翁之妻才三十。东坡诗云:‘圣善方当而立岁,乃翁已及古稀年。’”又如明代冯梦龙《古今小说》第三十三卷《张古老种瓜娶文女》,说是文女原为哑巴,七岁时忽然道出四句诗:“天意岂人知?应于楚南畿。寒灰热如火,枯杨再生梯。”后来,十八岁的文女嫁给八十岁的张古老为妻,一家升仙。再从近代看,民国初年第一任总理是湖南人熊希龄(1870—1937),他在妻子朱其慧死后,于1935年2月在上海又与浙江的毛彦文结成伉俪,白发得红颜,一时传为美谈。结婚时,熊希龄66岁,年近古稀,毛彦文39岁,未满“不惑”,可是他们婚后生活非常美满。无名氏(卜乃夫)是崛起于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创作情爱小说的高手,他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曾风行一时。1985年,无名氏濒临古稀之年,在台北又与一位年龄相距39岁的女钢琴家马福美,演了一出“花好月圆”的爱情剧。在西方,毕加索与娇妻年龄相距半个世纪,卓别林57岁时娶戏剧大师奥尼尔的千金乌娜为妻,乌娜时年18岁,两人幸福生活了3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曾有过两次少妇(女)找老夫的时尚。一次是50年代初,一大批未婚的中老年军转干部到地方担任领导,这批人很快成为一些姑娘追逐的对象。当时流行的一首民谣讥讽道:“管他老不老,先要罗马表;存折抓到手,死了再重找。”其中,也有一些已婚干部抛弃了在农村干活的发妻,在城里找年轻姑娘,当时称这种现象为“丢黄脸婆”。一次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在事业有所成就、生活富裕

的中老年男人,往往找比自己小一、二十岁的女性为妻。80年代以后,离婚率高涨。女性再婚选择的对象,其年龄普遍大于前夫;男性再婚的对象,年龄普遍小于前妻。男女婚姻的年龄差重新拉大。

概览古今,老夫配少妻的婚姻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政治型婚姻。男方是官僚人士,在政治上有很大的抱负,中年以后,已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地位。这种政坛大腕,借助其势力,可以很容易地挑到年轻貌美的妻子。他们或者是为了家族利益,或为巩固其政治势力,或为加强民族团结,往往为自己或子女选配门当户对的婚姻。

二是才子型婚姻。男方是个才子,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在事业上有较高的成就。女方是个佳人,也有同样的理想追求,她把男方当成崇拜的偶像,由此而产生爱恋,不顾世俗偏见和年龄的差异,结为百年之好。

三是实惠型婚姻。男方一般是富有、慷慨的商人,或是有钱有势的财主,或是现代的企业家、大老板等,总之是个大款、大腕人物;而女方天生丽质、美貌迷人。一方需要财富,另一方则追求美貌,两者结合,各取所需。中国人追求实际,讲究实惠,这种以对方能满足自己某种需求和利益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婚姻、家庭,占了很大的比例。

四是报恩型婚姻。即在相处中,男方对女方有恩惠,使女方由衷地感激,并由此产生爱慕之情,最终女方以身相许。比如,女子在处于极其困难的时刻,男子如父似兄,关怀鼓励,体贴照顾;或女子在紧急危难时刻,被男子冒死解救,转危为安等,都可能使女子由感激而产生爱慕之情。中国人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果恩人因种种原因还没有婚娶,或者妻

子已经亡故,受人恩情的女子只好以身相许作为报答。

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情况分析看,不少老夫少妻的结合,并非完全以爱情为基础,而是由某种需求为动因转化而成的,其中爱情因素可能有相当的部分,也可能是很少或缺乏。老夫少妻的年龄差悬殊不一,从几岁,十几岁到四、五十岁各种情况都有。仅从年龄方面看,有的如兄妹,有的如父女,有的如爷孙。从双方的经历来看,男方多数有过婚史,或离异,或丧妻等,少数可能是多次结婚;而女方多是豆蔻年华,情窦初开,正处于浪漫多梦的季节。比较而言,老夫少妻在年龄、经历方面如果是兄妹般的结合,最理想,也最好;父女般的结合,较为常见;而以爷孙般的结合为最差。如果是年龄相差两代人以上的结合,婚姻本身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如社会的偏见、舆论的压力。如果老夫仅孤身一人,情况要简单得多;如果老夫有子女,并且是儿孙满堂,情况可就复杂了,很有可能受到儿孙们的不满或反对;女子则可能会受到父兄、家人的反对和阻挠。尤其是老夫少妻的经历不同所带来的性格、精力、情趣上的差异,常常会成为夫妻矛盾冲突的起因和导火索,使婚姻关系很难和谐,这也是不少老夫少妻婚姻难以美满幸福的主要原因。但是,只要老夫少妻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兴趣一致,能正视并学会处理彼此的差异,努力培养和维护双方的感情,相互信任理解,互相关心支持,其婚姻未必不圆满;尤其是老夫主动、热情,妻子体贴配合,对提高婚姻的质量和维持家庭的幸福非常重要。

从古代典籍如《易经·大过》等看,中国古代社会对老夫少妻型婚姻基本上是认可的。因为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里,在一些士大夫眼里,女子只不过是操持家务、传宗接代的



奴仆或工具。“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子择偶不重才能、学识，而追求女子的美貌、青春、性感等自然属性，于是“才子佳人，郎才女貌”成为男人择偶的价值取向。依照古《礼》的说法：“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男女婚嫁的年龄本来就相差十岁，并且是一种大男小女的模式。汉唐流行早婚，对妇女的禁忌较少。宋明以后，要求女子“三从四德”。宋儒提出“饿死事小，失节是大”，对妇女的禁锢较严。妇女的地位很低，成了男性奴役和玩弄的对象。于是男的纳妾狎妓，“白发配红颜”，引以为荣。以后这种病态的时尚，逐渐被社会所接受，以至于一个大龄、高龄的未婚或再婚男人可以在小于自己10~30岁的女性中从容择偶，一个中年、乃至老年男子厌倦发妻后，可以移情别恋妙龄女子。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我们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对传统的男女婚姻不平等，婚龄相差太大等不公平现象应逐步加以改变。（王启才）

## 5. 家庭分工不可少

黄梅戏《天仙配》可谓家喻户晓。董永与七仙女相遇后，有一段唱词叫“夫妻双双把家还”，其中有这么两句：“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这是对小农经济社会形态中家庭性别分工与合作的经典概括。董永与七仙女故事的产生与流传应当是汉以后的事，但这种家庭性别的分工与合作方式则起源甚早。《易经》当中的《家人》卦就有“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之说，倡导在家庭中男女分工与合作。

提起分工，现在人们通常把它分为三种类型，即一般分工、特殊分工和个别分工。一般分工把传统的社会生产分为

农业、牧业、手工业、商业等大类。我国自古以农业立国,手工业为辅助产业;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以牧业生产为主,商业受到限制,不发达。农、牧、商业等生产部门又可分为各个工种,这是特殊分工。家庭内部分工,属于个别分工的范畴。这种自然引起的分工自古有之。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马恩全集》第4卷)。

《易经》反映的是我国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的社会生活,所以它既具有卑阴崇阳的倾向,主张男尊女卑;又给妇女比较高的评价,注意发挥她们的作用。在家庭分工方面,它主张男主外,女主内,男女要积极的配合与合作,这样夫妻关系才能和谐,相处才能永久。为达到这一目的,它在主张家庭内部合理分工之前,特别强调一个“正”字。《家人》卦辞说:“利女贞”。《家人》卦象䷤下离、上巽。离为日为火,巽为木为风。火由木生,风助火势,风火相长,以此作为比喻,说明家庭走上正道,人丁兴旺,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谓“家人”,就是“明家内之道,正一家之人”(《正义》)。可见,《家人》卦重在阐明治家的道理。《家人》卦以内为本,强调了女主人在家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认为家庭要得到治理,走上正道,首先要求女主人必须贞正。在中国封建社会,操劳家务的多为女子。女主人是一家的核心。她的德行对家庭的影响非常大。她能持贞守正,实在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所以,《家人》卦虽把治家的主权赋予男子,要求妇女温柔、顺遂,但同时又强调了妇女在家中的地位及作用。六二爻辞说:“无攸遂,在中馈。贞吉。”遂借为队,即坠,有损失之意。“中馈”代指妇女之职。其意是说,要想治家无过失,就在于家中妇女恪守职责。在传统社会里,广大妇女相夫教子,操劳家务,在维护家庭的

和谐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女主人淫佚不正,家庭就会一团糟;男人如果被家庭拖住了后腿,怎么可能去全力以赴地干事业,去治国、平天下!反过来说,女人贞正,男人在外淫乱,不走正道,家庭也不会和谐幸福。因为家庭是由男女双方组成的,家庭内外的活全由女人干,女人也没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男人所干的事业,即使女人想干,社会也不允许;男人在外花天酒地,挥霍家里的钱财,败坏家风,女人辛勤劳作的成果被挥霍一空,家道怎么可能兴旺?所以,男子也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家人·彖》说:“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先强调女主人要持贞守正,然后再要求男子要稳重正派,不胡作非为。做父母的先严格要求自己,再严格要求家人,每个家庭成员都要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和义务,这样,家庭才能治理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可见,男女行为中正,对家庭乃至对治国、平天下是多么重要!

从《家人》的卦象看,“女正位乎内”系指下卦或内卦的六二,“男正位乎外”系指上卦或外卦的九五,六二和九五的位置都是既中且正。从爻象分析看,除上九之外,其余五爻都是阴爻居阴位,阳爻处阳位,各得其正。可见,只有男女都中正,各尽到自己的名分,司其职,负其责,齐心协力,家庭才能治理好,家道才会兴旺。《中孚·彖》说:“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说”通“悦”,指欣悦。“巽”指和顺。“孚”,诚信。“中孚”即内心诚信。就一个家庭来说,女人柔顺主内而谦虚至诚,男人刚强主外而中实有信,那么,内外就和顺、欣悦;“齐家”,就可泽化邦国。

《周易》治家提倡分工。具体说来就是男主外,女主内,上下有别,男尊女卑,夫唱妇随,齐心合作。六十四卦中乾、坤是父母卦,《乾·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坤·文言》说:“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系辞上》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以上的话,完全适合于夫妻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家庭是一个集生育、生产、教养、生活众多功能于一身的社会基本单位。丈夫从事户外活动,干农活,打猎、捕鱼,或者游学、游宦,起主导作用;妻子“事夫如事天”(班昭《女诫》),在家做饭、洗衣服,抚养小孩,孝敬公婆,采桑喂蚕,纺线织布,依附丈夫,起辅助作用。由于丈夫在家里具有绝对的权威,一切由他说了算,妻子操家但不当家。实际上,男女地位并不平等,作为妇女,只能力求在家庭中获得某种温暖和相对的尊重。

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认为,生产分为两种:物质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在劳动分工中,性别分工是最基本的分工之一。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性别分工,在总体上是与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其中,也包含着一些积极的东西。如充分考虑到男女生理、心理及能力的差别,主张层级管理、分工合作等等,这有利于调动男女双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减少推诿,提高工作效率,在一定的时期也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家庭和谐、社会进步,对后世影响深远。这就是家庭性别分工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意义。

但是,这种分工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既定模式以后,它的消极作用 and 影响也是明显的。第一,家庭劳动的性别分工是等级化的,即男性总是占据和统治着优势领域。所谓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重男轻女等男女性别不平等由此而产生。第二,家庭劳动性别分工的发展,容易形成对女性的压抑、限制和歧视,剥夺了她们的一些权益和机会,形成了所谓的妇女问题。其实,女性的天资不比男性差,“现代科学认为,男女在能力、智力上各有所长,也没有专属的性格和气质,只是不同气质不均衡地分布在两性之间”(《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不仅如此,女性还在许多方面优越于男性,如女孩的骨骼和肌肉神经的发育比男性快,语言表达能力比男性强等。诚然,妇女在特殊生理期间可能会给工作带来一些不便,但她们更有一些显著的足以弥补生理弱势的优点,比如勤恳、耐劳、细致、敏锐、准确等等,历史上巾帼胜须眉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在传统社会下的这种性别分工模式,不仅影响了女性的参政和就业,影响了女孩的受教育权和发展权,甚至剥夺了女婴的生命权。这种对女性的压抑、限制和剥夺,又不利于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第三,家庭劳动、性别分工的结果,容易形成女性的依附性和依赖性,使她们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家庭的范围内,进取心和竞争意识受到了很大的削弱。第四,在现代社会,女性逐渐和男子享受着同样的教育、升学、就业和参政的机会,旧的性别分工模式正在被打破,于是,家庭内部不合理的分工所造成的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比如大男子思想使丈夫不愿多做家务,认为干女人所干的活是“没出息”,靠妻子养家是“没能耐”,是小丈夫,“丢脸”。这样,导致男子压力过大、逞强和脆弱。反之,不做家务的事业



型女性,则被认为是“不顾家”、“自私”、“缺乏女人味”等。男女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容易外化为争吵和冲突。这也是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夫妻双方应该在长期的发展中加以适应和相互磨合,才能在《家人》卦的启发下,力争实现新的现代化的“家和万事兴”。

(王启才)

## 6. 琴瑟和鸣万事兴

在夫妇和谐相处方面,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邓颖超堪称楷模。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时期,尽管两人的家庭出身、生活环境大不相同,但他们有共同的爱国热情,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相识,一起座谈、讨论、研究革命形势、任务。他们彼此爱慕,在分别4年中频繁的书信交流使他们相知,以后结为伴侣。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风雨中,他们并肩战斗,患难与共,心心相印,恩爱弥笃。婚恋和谐是中华和合文化在婚姻家庭方面的要求和表现。《周易》在这方面就自觉地追求和谐美。《系辞上》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这一原则用在夫妇关系方面,就是要求夫妇永结同心,恩爱和谐。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家和,重要的就是夫妇和。《周易》在讲婚恋和谐之前,先阐述了婚姻的产生及其作用。如《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周易》认为阴阳谐和、男女结合,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和基本规律。人类的婚姻由来已久,它是人伦的开端,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归妹·彖》说:“归妹(女子出嫁),天地之大义也。天

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阴阳不交合，宇宙万物就不能顺利地诞生、成长，男女不结合，人类就无法生存、蕃衍，所以说婚姻是“天地之大义”，人们一定要用隆重的仪式来庆祝它。

《周易》认为，正确的婚恋观，是夫妇和谐相处、婚姻幸福的前提。这种婚恋观，和《毛诗序》所提出的“发乎情止乎礼仪”，基本上是一致的。它首先强调了婚姻要欣悦而动：“说（悦）以动，所归妹也。”爱情，说到底是一种主体的感觉。男女双方交互感应，两相亲和，自然产生出的欣悦欢快，是结为夫妻的前提和基础。正如《咸·彖》所说：“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悦），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咸》的卦象为䷞，下艮三，上兑三，六爻阴阳完全相应，象征交感或感应。“咸”是“感”的通假字，是无心之感，即完全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没有人为的虚情与矫饰。下卦为艮，属阳卦，艮为止，为少男，象征少男感情诚挚，谦恭有礼地追求少女，但这种追求是循序渐进的，适可而止，很有分寸。上卦为兑，兑属阴性，为少女，象征少女在上，爱情专一，下顺阳刚而感动喜悦。两人一见钟情，情意投合。又下为艮，艮象征山，属阳刚；上卦为兑，兑象征泽，属阴柔；山辉、水媚，相互滋润，阴阳二气上下交流，通感相应，共鸣和谐。物有所感而亨通，男女有所感而论婚嫁，自然就吉祥如意。可见，两情相悦、情投意合是婚恋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还要稳重自制，有所不为。这一点颇具警戒意义。如《蒙》六三说：“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金夫，指美貌郎君，或有钱的男子。女人如果不能做到身正自重，一见到英俊潇洒或有钱有势的男子，就不顾体统，抛弃了原来走正道的丈夫，像这样的女人，娶

到家里,是不会有好处的。《姤》说:“女壮,勿用娶女。”姤卦(䷫),巽下乾上,具有遇合、婚媾两种意义。女壮,是指女人过于壮盛,气势盖过男子。女人精力过人,竟不要廉耻,与比其地位高的五个男子私通鬼混,像这样的女人是绝对娶不得的。可见,夫妇和谐相处的前提是在符合礼仪下的两情相悦,而不是非礼的苟合。

男女相爱的结果自然是婚姻。婚姻意味着家庭生活的开始,夫妇真正的和谐体现在家庭方面。《周易》认为,夫妇关系要和睦、永久,首先要相互信任。《中孚·彖》说:“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中孚,即内心诚信。就一个家庭来说,女人柔顺主内,男人刚强主外。主内的谦虚至诚,主外的中实有信。内外和顺、欣悦,家庭就得到了治理,“齐家”,就可以泽化邦国。所以,夫妇长久相处,相互信任、彼此忠诚非常重要。其次是沟通、交流。《周易》处处讲求阴阳交合。在六十四卦中,凡阴阳能交合的多为吉卦,如《泰》、《萃》、《同人》、《革》等;凡阴阳不能交合的多为凶卦,如《否》、《讼》、《明夷》、《睽》等。《泰·彖》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家人·彖》说:“‘王假有家’,交相爱也。”天地阴阳交和,万物得以顺利生养;君臣上下交感,万民得以乐业;夫妻相悦相恋、心心相印,家庭就能和睦、幸福。《恒》卦䷟,巽下震上,下卦“巽”为长女、为顺,上卦“震”为长男、为动,下随上而动,比喻夫妇间夫唱妇随,和谐一致;又下卦“巽”为风,上卦“震”为雷,雷借风而远传,风因雷而气盛,雷风相长,比喻夫妇之间如雷与风,相互感应,相互支持,相辅相成,以达到幸福、永恒。《中孚》九二说:“鸣鹤在阴(荫),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一对栖息在树荫中的白鹤,雌雄之间你唱我

和,相互应答,多像琴瑟和谐的人间夫妇!象辞说:“‘其子和之’,中心愿也。”雌雄白鹤心有灵犀,相向和鸣,是至诚感通的结果。它们的和谐是在不断相互应答中产生的。生活亦如此。夫妇间那种思想共融、精神互通、相濡以沫的和谐,也是在不断交流、调适中实现的。夫妻之间要能进行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生活上的耳鬓厮磨,思想感情上的沟通理解,乃至性意识的传达接受等,都是交流的途径和渠道。交流能力是夫妇和谐的最重要的保证。就性问题而言,交流也很重要。要敢于和善于表达自己的喜爱、愿望。夫妇关系的和谐是身与心,灵与肉的。夫妇之间只有不断地沟通、交流,爱情之树才能常青。

《周易》的核心是“变易”。它处处用变化的观点来看待宇宙万物,其要旨在“不易”,即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达到以不变应万变之目的。在夫妇关系方面也是如此。“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慕仙”,“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尽管人们都希望夫妻恩爱、白头偕老,但时过境迁,人及其感情也是不断变化的,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说:“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周易》在夫妇关系方面追求永恒、长远,如《序卦传》说:“夫妻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这就告诉人们,夫妻之道,以“恒”为贵。但“恒”需要小心维持。《家人》初九说:“闲有家,悔亡。”闲,《说文》解释说:“阑也,从门中有木。”意思是关上门再在门内以木棍横拦之。从字面上看,它似在告诫人们应随时关好门,谨防盗贼;但联系该卦治家的主旨,其深层意蕴似在阐述谨慎治家、防止邪恶的根本问题。九三爻辞说:“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象辞解释说:“‘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

也。”说由于家长勤勉努力、心存戒惧以至于治家过严，一家人发出哀愁、埋怨之声，尽管有悔恨、有危险，但结果吉祥，因为此时一家人未敢放纵淫乐，走的仍是正道；反之，若过于宽容、不加约束，任凭妇人孩子说说笑笑、打打闹闹，骄逸无度，就失去了家中的礼节，终将有遗憾、祸难。所以，爱情之花只有植根于互相尊重、互相谅解、互相谦让的沃土，才能越开越艳。若夫妇中有一方与异性正常接触，另一方绝不能偏听偏信、捕风捉影而自寻苦恼。当然，夫妇在外交友，特别是与异性接触，也应当注意检点。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夫妻和谐固然不容易，白头偕老、恩爱如初尤其困难！它需要彼此尊重、信任，需要谦让、谅解，需要珍惜、维护，需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

家庭是联系人与社会最原始、最长久的一种社会组成单位，也是人在社会上生存、发展的起点和归宿。男女结合为夫妇的婚姻，是现代家庭的主要组成形式。冰心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有了健全的细胞，才会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乃至一个健全的国家，……一个家庭对社会对国家要负起一个健康细胞的责任。”可见，夫妇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家庭的和谐与稳定是社会团结的保障，又直接关乎社会的安定团结。个人品德的培养，职业道德的教育，乃至社会公德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开展，都与家庭息息相关，所以《周易》强调治家为本，要求夫妇关系和谐，认为它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把男女平等、夫妻和睦，作为家庭美德的重要内容加以提出。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提倡“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有助



于人们建立文明、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王启才)

## 7. 劝君莫娶文盲妻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夫妇者,人伦之始,是男女两性合乎自然之道的必然选择,也是人性本能的最终归宿。如果上升到国家社会的高度,则夫妇是家庭的核心,而家庭的安定又是国家安定的前提。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给予男女婚姻以极高的意义,认为“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周易》中谈及婚姻、家庭问题的,散见于不同的卦爻中,例如《咸》、《恒》、《家人》、《渐》、《归妹》等;涉及爱情、婚姻各个方面的,如《姤》、《大过》卦谈择偶的标准,《渐》谈婚礼以正,《咸》谈婚恋之喜,《归妹》谈娶妾,《恒》卦谈夫妇相处之道,等等。

男女婚姻的第一要务是确立一个择偶标准。就是说,你要娶一个什么样的妻子,或嫁个什么样的丈夫?做为男权时代的产物,《周易》主要从男性的角度,来谈论择偶标准。娶妻要正,是最基本的要求,《周易》对此也颇为强调。如《蒙》六三说:“勿用娶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要娶这样的女子——看见对方有权有势,就不能坚持自己的操守——娶她没有好处。在男女的年龄上,《周易》认为男的可以适当大点。《大过》九二爻辞认为,老夫娶少妻,犹如枯木逢春,是“无不利”的。而老妻嫁少夫,九五爻辞则予以嘲讽,并不赞成,认为这样的婚姻不能长久,而且是件“可丑”之事。这些论述,对中国人的择偶观都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姤》卦,在论及男女双方的才能时,表现出对妇女的压制,在

传统思想中也很有影响,是应该剔除的糟粕。

《姤》卦卦辞曰:“姤,女壮,勿用取女”。姤,即逅,意指阴阳相遇,也就是男女双方不期而遇。旧注一般都把《姤》卦解释为一个女人周旋在五个男人中间,不能一心一意,必然不守贞操。何况她处于下位运动,以阴伤阳,以柔消刚,她身体强壮,这样精力旺盛又水性杨花的女人,男人还是不去与她婚配的好。还有另一种解释,说是在选择妻子的时候,不要去找能力超过自己的女强人,因为这样的女子你驾驭不了;在家,你可能会是个“妻管严”;在国,你便会是个傀儡。想当年,周武王伐纣,在宣判商纣王的罪行时,其中一条就是:“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尚书·牧誓》)就是说:母鸡不要打鸣,打鸣是公鸡的事;女人不要管太多的事;商纣王因为听信美女妲己的谗言而亡国。据说商纣的许多坏主意都是妲己想出来的,比如炮烙之刑、剖杀孕妇等。商纣要囚禁周文王,甚至都是妲己的主意。那么,周武王恨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于是,《周易》就记住了这一条:女子太强了,就不要找她做老婆。历朝历代都有教育女子的书:儒经有《仪礼》、《礼记》等书规范女子行为;汉代有刘向的《烈女传》、班昭的《女诫》;唐代有《女则》、《女孝经》;宋代是理学兴起的时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理学家们提出来的;明清两代就更不要说了,单看看地方志中的《烈妇传》,就可见一斑。类似的书再多,原则只有一个:“女子无才便是德,”把女子培养成温柔、顺从、忍让、克己的贤妻良母,以适合夫家,取悦丈夫。女子只要懂得“三从四德”的为妇之道就行了,其他才能越少越好。

一句“女子无才便是德”,便轻而易举地剥夺了女性的一

切权利。

首先是她们的才情。她们没有受教育权,也不能展示自己的才华;否则,就是不守妇道,要遭人非议。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具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又精通金石之学,和丈夫赵明诚一起整理我国历史文献。然而,当时的士大夫及社会舆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他们紧紧盯住“无才有德”这一标准,诬她为“有才无德”之人。陆游在《渭南文集·孙氏夫人墓志铭》中记载,孙夫人十余岁时,晚年的李清照爱其材质,欲以其学传之;但孙氏却以“才藻非女子事也”而予以拒绝。这是因为在宋代,人们普遍认为“词为艳科”。李清照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所顾忌地用词写出封建社会妇女不敢启齿的心声,表达自己渴望爱情、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其遭人诋毁也就可想而知了。王灼指责她说:“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实际上,李清照词中抒写的爱情与相思,是健康、真挚的人类之情。与许多封建文人矫揉造作、追欢买笑的言情之作比起来,李词的格调要高得多。古代之所以对李清照有这么多的责难,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她不仅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文学天才,属于今天的“女强人”之类。她没遵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不愿“本分”地做家庭的奴隶罢了。再如,诸葛亮的形象可谓深入人心,一部《三国演义》简直就是把他当作神来写,三分天下就是他的预言杰作,但是又有几个人知道这其中也有他夫人的功劳呢?据载,诸葛亮的夫人是沔阳名士黄承彦的女儿,非常有才华。黄承彦在与诸葛亮的交往中,发现诸葛亮不仅才华出众,且胸有大志,便有心选他为婿。于是就邀请他到家作客,顺便提亲。谁知诸葛亮刚到黄家,便被一只大狗吓了一跳,立

刻又有一只老虎出来赶跑了大狗。诸葛亮简直呆若木鸡,经黄承彦提醒,仔细辨认,才发现,狗、虎都是假的。进屋坐定,便有人端茶倒水,但此人却机械呆板,原来是木头人。假狗、假虎、木头人,都是黄小姐的杰作。这一下诸葛亮算服了,便与黄小姐喜结连理。后来诸葛亮北伐中原,用木牛流马运输粮草,谁能说其中没有诸葛夫人的功劳呢?但又有几个人知道是诸葛夫人的功劳呢?

其次是她们的爱情。女子不能有爱情。在婚姻与家庭生活中,她们只有服从,只有尽义务。《红楼梦》是一部大家都熟悉的小说,写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之间的爱情悲剧。为什么林黛玉与贾宝玉最后没能喜结连理,成就美好的姻缘?为什么贾母、王夫人为贾宝玉选择薛宝钗而舍弃林黛玉?因为在她们看来,宝钗确实是个妥当人。她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下自丫环,上至老太太,无一不称道宝钗行事大方,心胸宽大。湘云无力做东,宝钗慷慨赠螃蟹,怎不让湘云感激不尽;寄居舅家的黛玉不便向王夫人、凤姐要燕窝,是宝钗派人多次给黛玉送东西,怎不使黛玉捐弃前嫌,直以“姐姐”呼之?袭人也多次说宝钗“真真有涵养,心地宽大”;就连那处处令人生厌的赵姨娘也赞说:“那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而林黛玉就不行了。在王夫人眼里,性格乖僻的黛玉,“既不沉重,也不知大礼,没有一点大家闺秀的风范。”在大观园里,上自奶奶小姐,下至丫头老奴,几乎没有人能逃出她的唇枪舌剑。周瑞家的送宫花,让黛玉一阵寒碜;刘姥姥因为讨贾母欢心,受众人礼遇,黛玉却称她“母蝗虫”;史湘云是个咬舌妇,遭黛玉取笑;就连管家婆凤辣子,黛玉也不放过。所以,黛玉给人以“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的印象,是不足为奇的。恪守“女子无才便

是德”古训的薛宝钗,平时“罕言寡语”,说起话来却能左右逢源、四方讨好;表面上“藏愚”、“守拙”,办起事来又八面玲珑。相对而言,林黛玉处处锋芒毕露,争强斗胜,从不知隐瞒,不知有才也要装无才。在这种情况下,她又怎么能获得贾母、王夫人的青睐呢?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了。

“五四”以来,经过一次次的思想启蒙运动,人们已经摒弃了一些封建落后的思想观念,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就择偶观念而言,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爱情婚姻中的“男女平等”,已经是文明时代的常识常理,男性也不再忌讳妻子比自己有本事了。我们也会在乡村的宣传栏里看到“莫娶文盲妻,不嫁文盲汉”这样的宣传标语。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落后意识还没有清除干净,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人们常常会打趣那些追求上进的女孩子:“不要太能了,小心嫁不掉。”一些人对女孩子的上学非常漠视,以为“女孩子识字没用,女子无才便是德。”这都是封建思想余孽在作怪,与今天这样的文明时代是不合拍的。

(曹建国)

## 8. 《咸》卦谈“性”坦荡荡

《周易》中有一卦名曰《咸》卦(䷞)。六十四卦中,《咸》卦排序为三十一,似乎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如果按照古人的解释,则大有深意。《周易》古经的篇章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经自《乾》至《离》共三十卦,重点在于揭示天地自然的运行法则;下经自《咸》至《未济》共三十四卦,重点在于论述人生道理。上经讲自然,以象征天地的《乾》《坤》为首,体现了《周易》天地



交通则万物化生的思想；下经述人事，以《咸》卦为首，自然另有它的一番深意。

从卦形上看，上兑(☱)下艮(☶)，艮象征少男，兑象征少女，预示该卦讲的是青年男女之事。从内容上看，《咸》卦讲的是新婚之夜夫妇交合的事。其卦辞大意说：亨通，利于坚守正道，这时娶妻，吉祥。点明新婚。然后，六爻逐一描述了新婚夫妇的交合过程。初六：“咸其拇”，是讲新郎抚摸着新娘的脚拇指。六二：“咸其腓”，开始抚摸小腿肚。九三：“咸其股”，已经抚摸到大腿了。于是新娘也怦然心动，“憧憧往来，朋从而思，”顺从了新郎的意愿。九五：“咸其脢”，两人拥抱在一起，互相抚摸着对方的脊背。上六：“咸其辅颊舌”，则是说新郎新娘接吻的事。至此，新婚夫妇的第一次交合顺利完成。

《咸》卦讲新婚夫妇第一次交合，《周易》把它放在下经之首，与我们古人对人生社会的思考相一致。所谓“夫妇为道德人伦之始”，《周易·序卦传》也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样就从夫妇结合，进一步讨论了天地阴阳和世事人伦的自然和谐，不仅富有哲理，而且是关系到社会秩序的重大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由《咸》卦也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对“性”的开明态度。可以说，我们的祖先不讳言“性”。这一点，不仅见诸全国各地到处可见的生殖崇拜遗迹；而且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就提出“性”是人的本性之一，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孟子·告子上》：“食、色，性也。”就是说，男女之“性”如同吃饭一样，是人类天生的秉性与基本的需要。我们都知道“民以食为天”的道理，性既然与吃

饭相并列,可见其基本性与重要性。不仅如此,我们的祖先还认为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产生性的冲动,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性之欲也。”尤其是荀子说得更透彻:“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荀子·性恶》)这种达观开放的性观念,至少保持到了唐朝时期。大量的资料表明,唐代有关性的书籍和图册并非禁品,且为许多夫妇所必备、必读,性知识的普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可是宋明时期,理学兴盛,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口号中,“性”逐渐变成了禁忌,成了淫乱的代名词,甚至成了罪恶的根源。人们把性当成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于是,大家好像是商量好的一样,谁也不讲性,谁谈论性谁就是诲淫。现今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孩子看电视时,电视中出现情爱镜头,有的父母情急之下,就捂住孩子的眼睛不让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曾谈起他的一次经历:1985年,潘绥铭在人大开了一门必修课《西方性观念发展史》。在结束讲课前,潘教授问道:“同学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吗?”这时,坐在前排的一位女同学立刻回答道:“因为你脸皮厚。”令人啼笑皆非。

不仅如此,人们甚至还把某个人在性方面的表现,与其整个人格对立起来。它首先假设:如果这个人在性方面“越轨”,那么他必然会危害社会,甚至危害国家;同时此人也就必然一无是处,甚至会整体烂掉。因此,不仅社会和国家有权利来管制和惩罚这样的人,而且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各人自扫门前雪,专管他人床上事。”

即使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以后,中国人在性方面依然恪

守着落后而保守的传统。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前,如果一个人被冠以“生活作风有问题”,那无疑于被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一切就此止步,而且还要承受别人的歧视和非议。尤其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要想整治一个人,最灵便最有效的法宝就是在他的生活作风方面找突破口。

这种对性的压抑所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除了性变态、性异化之外,还有性愚昧。一些健康与生活方面的杂志常常登载夫妇结婚多年却没有孩子,以为是不育,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原来是缺乏性知识所致:结婚多年,妻子依然是处女。真让人啼笑皆非。还有性神秘。性本来是很自然的事,由于种种原因,性变成了很神秘的事,越是遮遮掩掩,人们就越好奇,性兴趣反而得到了畸形的强化。中国著名性学家刘达临有一次到香港性教育促进会会长吴敏伦家做客,他们在大厅里看有关性教育的资料片。吴医生的两个孩子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有时看上两眼,孩子与父母都表现得若无其事。刘达临就问吴医生平时看录像是否避开孩子,吴医生说:“不避。他们从小就看,习惯了,认为是很自然的事,并不特别注意它。”这件事对刘达临触动很大,使他联想到在德国柏林性电影院看到只有几个人的冷落情景。他的德国朋友黑伯乐教授告诉他,这样的电影德国人都看过,人们并不把这当一回事。(事见《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这也会让我们联想到前些年,举办一次人体画展就挤破头的报道。可以说,去看画展的人绝大部分不是为了欣赏艺术,而是为了看新鲜,看刺激。悲乎哉!悲乎哉!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古老的中国大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国人的性观念之变也当占一席之地。1993年

某期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发展变化中的几个人的面孔》。其中,刘达临就是引导中国人进入幸福生活的六个人之一——性的民意调查专家。这种变化标志着社会文明进步的变化,如从立法、研究、医学、教育等方面给“性”以合理的重视和公正的待遇。当然,最明显的还是全民性观念的变化。如“性骚扰”,20年前叫“耍流氓”,10年前叫“猥亵”,如今改称“性骚扰”。一时间,神秘的“性”从幕后走向前台,大有风起云涌之势。这其中,自然也不乏一些人以“革命”、“人性”、“解放”为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在摒弃性道德伦理中的封建糟粕的同时,否定了一切,导致对传统性道德伦理的非理性反叛,甚至陷入“性与道德法律无关”、“性与婚姻分离”的思想误区,只欣赏性自由、性解放,只想追求“性福”,却淡漠了责任感和社会道德风尚。

中国著名性学家李银河在其《同性恋亚文化》一书的跋里,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青蛙的视力有缺陷。它能够看见从眼前飞过的蚊虫,对周围的景物却视而不见。于是,公路上经常看到扁平如煎饼的东西,它们便是被碾死的青蛙。其实,人又何尝不是一种有缺陷的动物呢?如果我们只见其一,不见其余,我们也会成为一只“扁平青蛙”。在重大的社会变化面前,单纯用旧的泛化的道德来维持已不可能;而一味地求新求变也有弊端。如何重建新的性道德秩序,已成为一个迫切的重大社会课题。

怎么办?让我们重新回到《周易》的《咸》卦上来。《咸》卦在描述新婚之夜夫妇交合的过程中,所强调的是“无心之感”,是“阴阳和谐”,是所谓的“憧憧往来,朋从而思”,而不是一方凌驾于另一方。那么,在人人言“性”的今天,如欲构建一种新

的性道德,我们是否应该提倡一种“和谐平等”的精神和价值观念呢?性是个体的,也是他者的、社会的,如果我们在追求个人“性福”的同时,也能以他者的权利为前提,以爱情为主导,并综合进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样的性观念、性道德,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曹建国)

## 9. 夫妇相处有学问

阴阳是易道的根源。《周易》认为男女结合、阴阳和谐是天道自然:“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传》)因而,男女婚姻很有意义。《归妹·彖辞》云:“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归妹,就是嫁女儿。天地阴阳不交,则难以产生万事万物;人道中男女不婚嫁,则人类不能繁衍。更何况,婚姻对于人类社会组织也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通过婚姻组成的家庭是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单元,如《易·序卦传》所说,夫妇家庭是社会组织、社会政治、社会文明的基础。

据说,我国最初的婚姻形式是掠夺婚。《周易》时代尚有这种习俗的痕迹。《屯卦》六二爻辞说:“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黄昏降临,马蹄声儿杂乱,女子哭声悲伤。原来,不是来了土匪,而是抢新娘的人们来了。梁启超曾对《周易》的“匪寇婚媾”解释说:“寇与婚媾是截然二事,何至相混?得无古代婚媾所取之手段与寇无大异哉!”(《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的确,寇与婚并提,应该暗示是掠夺婚。后来社会利用战争手段掠夺妻妾,则是掠夺婚的典型体现。如周幽王讨伐有褒氏娶了褒姒,晋献公伐骊戎娶了骊姬,曹操破邳夺了袁



熙的妻子配与曹丕，元太祖征服衣难察汗获其妻收归己有，清高宗平定回疆掠回香妃，可谓比比皆是。而仗势夺人妻子的也不少见，如春秋时期的卫宣公、楚平王，将自己为儿子娶的姑娘据为己有；唐玄宗颇费周折地夺得儿子寿王的妻子杨玉环，即后来的杨贵妃。至于民间的抢婚，小说戏剧中都有曲折的反映。

但《周易》认为，两情相悦、两情相感的婚姻才是值得称道的。如《咸》卦下卦艮为阳，为少男；上卦兑为阴，为少女。阳刚居下卦，阳气上扬；阴柔居上卦，阴性就下；阴阳交感，成就了婚姻。《咸》卦讲了男女相感的心灵过程，强调情感是婚姻的基础。同时，因为男为阳为积极、进取、向上、刚毅，女为阴为消极、谦虚、卑下、柔顺；故而还应该以男子采取主动，通过正常的礼仪聘娶女子结成夫妻，婚姻才是吉利、和谐的。

《周易》既描绘了男唱女随、阴阳和谐的婚姻形态，也展示了人类不成功的婚姻。《姤》卦讲的是女子水性杨花，周旋于五个男子之间，不能一心一意对待婚姻，因而《姤》卦卦辞断为：“女壮，勿用取女。”认为这样的女子还是不要与她婚配的好。这是由女子的三心二意而导致的婚姻不谐。《随》卦六二那位女子虽然不是周旋于五个男人之间，但不知是因为“好女怕缠”，还是初九占了地利的缘故，本来她与九五应是阴阳和应的很好一对，但是由于不能秉志专一，导致“系小子，失丈夫”。系于初九，失去九五那样极其合适的丈夫。《蒙》六三则是讲一位女子一见九二阳刚之男地位显赫，财多势盛，便急急忙忙跑去黏上，忘记了上九才是自己正当的丈夫。另外，《周易》还认为，如果女子主动追求男子，男子是在女子追求下才动心，这种情况也是“征凶，无所利”（《归妹》），婚姻难以幸福。

从年龄的搭配看,《周易》写到了少男少女相配、长男长女相配,有老夫少妻,有少夫老妻;从是否和谐看,它既描绘了和谐的婚姻,同时又记叙了不和谐的婚姻;从是否两情相悦看,它既涉及了抢夺婚,同时又描绘了两情相悦而结合的婚姻。另外,《周易》还探索和规定了夫妇之道,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夫妻要各司其职。一个家庭的生计,需要各种不同的工作来维持。传统的家庭分工是女子负责养育儿女、侍奉公婆、织布裁衣,照顾一家的起居生活;男子出门在外,或打猎耕种,或为官为吏,借以维持一家生计。假如男子不负责任,则一家缺食;如女子不称职,则一家少衣。《家人·彖》说:“女正乎内,男正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虽然今天,妇女有了自己的社会职业,不一定要纯粹“主乎内”才算“正”,但只要组织成一个家庭,必然有需要分担的家务,夫妻之间协调好各做什么,分工又合作,也是新时代家庭中各司其职的具体表现。

其次,夫妻要允执厥中。也就是说,家庭生活要合乎“中道”。夫妻之间关系的处理,虽说是要男刚女柔、男外女内才是正道,但现实生活的无数事例告诉我们,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周易》认为要恪守好“执中”那个“度”,既不要畏缩,也不要逾矩。如《小畜》卦中九三阳刚为丈夫,以六四阴柔为妻子。九三处下卦之极,想往上行进,可是却被六四所制约,两相冲突,结果就像一辆车子车轮与辐条分裂开来,夫妻反目成仇,家庭解体。其原因是妻子颐指气使,牝鸡司晨,干涉过了头。是不是《周易》认为女子一味和柔才好呢?也并不是的。如《恒》第二爻为妻位,阳爻居阴位,表明妻子是刚行妇道。但由

于她处位能正,所嫁的丈夫又能柔而相应,所以爻辞断定是吉利的。所以说,夫妇之道的执中,也不是有个一成不变的“中”可执,而是要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来体悟“中道”的具体合适之度。这就需要夫妻之间不断地调整适应,相互默契配合,最终才能达到阴阳和谐的完美境界。作为夫妻之一的当事人,一定不能忘记中和之道。男子不要做使气的“愚夫”,女子不要学《红楼梦》中“争闲气”的“愚妇”。如果真正能做到允执厥中,和谐美满应是当然之事。

再次,《周易》还主张夫妻关系宜长久,不能轻易离异。《恒》卦中就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维持婚姻的恒久,双方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原则。在西方,它表现为契约。这契约涉及问题的多方面,如忠贞、责任、义务、财产等等。只有双方都尽职尽责,婚姻才可持久,否则只能是空谈。今天,有一些流行的时髦话语,认为一夫一妻制“不符合人性”、“只要曾经拥有,不要天长地久”,两性关系应“绝对自由”,诸如此类的言论是否正确,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引古证今,这种论调似乎问题多多,说法也并不新鲜。反观《周易》卦辞卦理,人们应该有所反思警觉。《周易·序卦传》说:“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近年来,漂泊者的心理问题、“第三者”入侵、家庭离婚问题成为普遍现象。无数因家庭破碎的孩子受到无辜伤害。社会问题随之产生,社会的稳定性也间接被波及。“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仍然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赵彩花)

## 四、社交篇

### 1. 巧读《贲》卦妙包装

每到毕业时节,招聘、应聘就成了高校的一道风景线。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学子们不得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仅仅追求真才实学,而且在外表方面下的功夫也越来越大。印刷精美的个人简历,穿着超过千元的名牌衣服,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就在人们对于这种手段已经开始见怪不怪的时候,今年的高校招聘中仍然冒出了一件引发很大争议的事情,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一时间,街谈巷议,沸沸扬扬,热闹得很。

武汉某高校的毕业生某女,在自己的求职书中附上了自己的照片。这似乎无可非议,但是,她的照片不是我们通常印象中的学生照,而是一张写真照片。更令人“心动”的是,这是一张低胸写真照。在她的求职书中,还有这样的自我介绍:“本人是学校公认的美丽女生,具有较强社交沟通能力,能喝酒。”

经过媒体曝光以后,某女的名字一夜间变得似乎无人不知了。许多人就此事发表自己的看法,支持和不支持的都不

在少数。后来此事慢慢淡去了。当事人到底怎么样了,也没有具体的报道。只是笔者曾在媒体上看到,某个香港公司的相关人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们招人更看重的是综合素质。对某女的求职,会同其他的求职人一样公平对待,不会有什么特殊。

某女的包装手法是否成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这里不拟多作探讨;倒是这件事反映的包装观念和包装手法值得我们思考。

包装并不自今日始。在许多考古遗址中,都发现了许多明显是装饰用的器物。包装意识源远流长。可以说,包装意识是伴随着人类审美观念的产生而产生的。自从人类脑海中有美的观念,包装、打扮的意识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正如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爱美是人的天性。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也逐渐总结出了关于包装的一些观点。《周易》中的《贲》卦,就包含着人们的包装观念方面的萌芽。

《贲》卦(䷖)是《周易》上经的第二十二卦。《序卦》中说:“贲者,饰也。”点明了《贲》卦的主旨,是有关文饰美化的内容。

我们来看《贲》卦的卦象,下离(☲)上艮(☶)。艮为山,离为火。单从卦象看,是山下有火。这是什么意思呢?月昏之夜,山上绿树丛生,野兽飞鸟藏迹其中。人们远远望去,但见黑沉沉一片而不见其山,山上的景物等都无法看清楚。假设山下点起了熊熊的篝火,则整个山体因此而照亮,流光溢彩。远远望去,山之美更为彰显。这就如同夜晚都市中的摩天大厦突兀在那里,虽然很高,但是夜色蒙蒙,周围皆高楼林立,并不突出。如果在下方用强力的聚光彩灯映射,则高楼远远望去,五彩缤纷,光线扑朔迷离,分外引人注目。《贲卦·彖辞》



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卦的初九、九三、上九为阳爻，六二、六四、六五为阴爻，一阴一阳，交错而成，体现了天的自然文采。日月运行、昼夜晦明的交替，是自然之美的体现，从中可以发现自然界的规律；文章礼乐，则是人类特有的美韵的体现，通过文章礼乐等外在的人为的修饰，就可以在天下构建理想的世界。

“横看成岭侧成峰”，一种事物，总是具有一定的美德。譬如山峰，或巍峨高耸，或小巧玲珑，都具有一定的美感。但是如果没有山下之火的照耀，山的美只能为少数进入山中的游客所独赏，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了。人何尝不是如此？

《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评价李广的一段话很出名：“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司马迁的意思是说，只要自身具有美德，那么即使不说，也会有崇高的声誉。这种观点，正是我们俗话所常说的“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我们不难想到，如果把桃李的美味、酒的醇厚加以宣传，那么知道的人不是更多吗？桃李、美酒的价值无疑能得到更大程度的承认。前些年又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现象，中国许多产品具有非常优良的品质，但在国际上一直打不开销路；而且即便出口，也是以很低的价格，摆放在地摊上。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国内产品的包装意识不强，仅仅抓了产品的质量，却没有在产品的外包装上下功夫，常常是精美的产品却用非常粗糙的纸箱，在顾客看来，恶劣的包装，怎么会有高品质的产品呢？因此销路非常差。后来厂家意识到这一缺点

后,迅速改进,给产品配上了同样精美的包装,很快便销量大增。

我们去某些比较上档次的商场或宾馆等公共场所,有时会在门口发现一块牌子,上书“衣冠不整者恕不接待”。在国外的音乐厅、大剧院之类的高雅场所欣赏节目,比如进入维也纳金色大厅欣赏新年音乐会,人们都会穿上庄重的礼服,衣冠楚楚,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一个人的衣着反映出本人一定的品味和素养。整洁得体的外表,不仅是为了自身有一个好的形象,也是对别人、对公众的尊重。商场写出这样的牌子,也是希望借此表明自己是具有一定品位的场所。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何尝不是一种颇为高明的包装手法呢?

包装对于人的价值是无庸多言的。现在社会里,人们的这种自我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品位”、“情调”等词已经不仅仅是小资的专属。那么,包装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在事物的各种特质里面,包装是否起着决定性作用呢?《贲》卦卦辞或许对我们有所启示。

卦辞曰:“贲:亨,小利有攸往。”意思是:《贲》卦代表文饰包装,亨通吉祥,凭此可获得小利。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小利”。为什么是小利呢?很明显,《贲》卦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对包装文饰作用的认识。包装和文饰是必要的,采用这种手法会带来好处;但好处毕竟是有限的,只能小有帮助。真正决定事物价值的,还是事物内在的本质。《韩非子》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战国时期,一个楚国人在郑国卖珍珠。楚国人精于包装,他放珍珠的盒子制作得非常漂亮和华丽,郑国人居然花高价买下盒子而把珍珠退了回去。这就是成语“买椟还珠”的来历。盒子再漂亮,终究只是个外壳;真正珍贵的则是

珍珠。可笑郑国人不识货,留下千古笑谈。包装是为内容服务的,如果仅仅在包装上下功夫,不去注重内在的品质的提高,就很容易反客为主,起到相反的效果。

回到我们文章开头所提到的事例。作为求职者,在奔赴职场时,适当的包装自然是必须的;但是不能把功夫都下在挖空心思的包装上。作为招聘者,更看重的是人才的潜力和素质,而不仅仅是盯在应聘人的外表和精美的简历上。求职者只要平时注重知识的积累,具有较高的素质,再加上恰到好处的包装,就可以做到“文质彬彬”,在求职场上就有更高的把握和自信。

(章 原)

## 2. 解读“人无信不立”

先从晋文公重耳“伐原示信”说起。据《左传》记载,僖公二十五年冬天,重耳兵围原城。他下令军士各带三天口粮,如果三天攻不下原城,就自动解围而去。到了第三天,原城仍没能如期攻克。重耳依言而行,就下令撤军。这时,有人禀告原城人准备明天投降,将士纷纷要求再等待一天。重耳说:“诚信是治国之宝,有了它,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得一原城而失信于天下,百姓又怎么能取信于我?那样做损失会更大。”于是,兵退三十里。原城人听说后,纷纷前来投降。重耳以诚信取得原城,可见以诚动人的感化力量有多么大!

《周易》中蕴涵着丰富的诚信思想。诚信在《周易》中表述为“孚”。《周易》力倡诚信之德,特设《中孚》一卦,讲“中孚”,即内心诚信的问题。“孚”是《周易》所阐发的为人安身立命的核心范畴之一。据统计,易卦爻辞中,有40多处提及它,如

“有孚挛如，富以其邻”（《小畜》九五），是说内心诚信，率众同奔富裕之路。“厥孚交如，威如，吉”（《大有》六五），是说交往诚信，威望自著，终获吉祥。“孚”就是诚信。清人朱骏声说：“孚，卵孚也。从爪、从子，履手为爪，鸟褻，恒以爪反覆其卵，鸟之孚卵，皆如其期而不失，故转训为信。”在《周易》一书中，凡出现“孚”，多为吉、亨、无咎之义。除此之外，《周易》还有10多次提到“信”，如《系辞传》说：“人之所助者，信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等。“信”，从人、从言，意为言语的真实。它是内心诚信的外在表现及其效果。

《周易》要求诚信，主要表现在为人处世和政治管理两大方面。从为人处世方面看，《周易》主张待人诚恳谦逊，言而有信，如《家人》卦上九爻辞说：“有孚，威如，终吉。”就是说，治家之本，首先是“有孚”，即夫妻彼此忠诚，相亲相爱；然后才是“威如”，即家长要以身作则，树立威信，从而使家庭和睦，家道兴旺。《中孚》卦象为䷼，下兑三，上巽三。下兑象征泽，上巽象征风。蒋凡先生解释说：“泽上和风阵阵，与泽水相感相激。水体虚，风能入而震撼之，犹如人心虚而物能入而感动之。”（《周易演义》）观察《中孚》卦象，阴柔在内而阳刚得中，令人感悟到：只要内心诚信，则其所感无所不至而无所不入，甚至连冥顽无知的小猪、小鱼之类的动物都可感动；所以，可获吉祥，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无往而不胜。其卦辞：“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又如《小畜》卦六四爻辞：“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血，通“恤”，忧愁；惕，惧惕。爻辞是说，内心诚信，则能远离忧愁，脱出惕惧，无灾无难。由此可见，《周易》反复强调，只要人心怀诚信，即便是势单力薄，有遭受伤害的危险，或处于困厄之中，也能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援

助,从而逢凶化吉,履险如夷。

从政治管理方面看,《周易》要求管理者要有至诚之德,以信为本。真正做到“有孚挛(用手牵连状,引申为维系)如”、“孚乃化邦”,就能孚动天地,感化万民,形成一股君民团结一心,共越大川、战胜困难的力量,使社会祥和,江山永固。唐代魏徵曾经明言:“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越是在困难时期,管理者的诚信之德越显得珍贵,如《坎》卦卦辞说:“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坎即陷,有凶险之意。它的意思是说,管理者在处于逆境、面对重重险难时,要时刻注意争取民心,取信于民,获得支持,以冲破重重险关,战胜各种困难,取得成功。若能如此,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嘉奖和崇尚。《革》卦卦辞说:“己日乃孚,革而信之。”己日,在古代十天干纪日的第六天,处在前五数与后五数之中,也即象征交转相变的日子。所以古人称“己”日为“可革之日”。在改革的关键时期,若要成功,管理者一定要抓住根本——“乃孚”,即取信于人,推行正道。只有心诚,去掉各种私欲,一切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获得最广泛的支持,改革才能成功。一个国家总体的改革状况是这样的,一个企业的改革情形也如此。如山东海尔集团,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确保自己的产品具有上乘质量,一举砸毁了76台有问题的电冰箱,从此唤醒了全体工人的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不久便实现了产品质量的“零缺陷”。今天,“海尔”已经成为国际知名企业。正因为他们重诚信,重质量,其产品才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广泛认可,成为名副其实的名牌产品。北京市百年老店“全聚德”烤鸭店和具有300多年历史的同仁堂,都把“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作为自己



的经营方针,其讲求诚信的结果,使它们分别成为中国饮食业、药业的第一品牌。

《周易》在正面倡导诚信的同时,又从反面说明了不讲诚信的后果与危害。如《萃》卦初六说:“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萃,聚集,又训为瘁,有病之意。该爻辞说的是,人虽然有诚信,却没能将其保持到底,结果乱了方寸,行为失去了操守,与人妄为聚合。(一说心智已经迷乱。)\*“萃”本来是好事,人才聚集,人心凝聚,可以干一番大的事业;财富聚集,积少成多,可以使事业蓬勃发展,人民富庶安康。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以人才聚集为例,君子以义会聚,小人则以利苟合。如果不以中正为前提,人们之间就缺乏诚信。在这种情况下,人聚集得越多,越容易出祸乱。财物聚集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敛财、聚财的结果,可以使人钱迷心窍、腐化堕落。胡长清、成克杰之流就是近在眼前的反面教材。

人不能保持诚信,结果尚且不妙;如若不讲诚信(“无孚”),又会是什么样子呢?《讼》卦卦辞说:“讼,有孚窒惕。”缺乏诚信,或彼此的诚信窒塞了,就会出现思想隔阂,产生纷争,互不相让,只好对簿公堂。打官司的结果是两相伤害,后患未除。《周易》认为,人与人相处,发生利害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如果人们多交流沟通,相互谦让,以诚相待,就不至于发生争讼;迫不得已而争讼时,要诚实守信,不虚言妄语,适可而止,以达到缓和冲突、化解矛盾的目的。做人不诚信,尚且会吃官司或者有悔吝;作为君王,如果缺乏诚信之德,就无法取信于民,不能赢得臣子的拥护与支持,以至于人心背离,社会动乱。如《中孚》上九爻辞说:“翰音登于天,贞凶。”“翰”,高飞。“翰音”指高空飞扬的声音。《周易折中》引胡瑗的话说:

“翰者，鸟羽之高飞也。上九在一卦之上，居穷极之地，是无纯诚之心、笃实之道，徒具虚声，外饰以矫伪为尚，如鸟之飞登于天，徒闻其虚声而已。”意思是说，统治者高高在上，诚信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实际做法正好相反；这种虚情矫饰、欺世盗名的行为，带来的多是身死、国亡的浩劫。

“祸莫大于无信”。中国商界近年发生的几件事，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据媒体披露，南京老字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受利益驱动，“钱”字障目，把诚信丢在了一边，竟然用过期馅料做月饼等糕点，欺骗消费者，2001年7月被中央电视台曝光，信誉扫地，砸了牌子，企业经营很快就陷入低谷。2002年春节刚过，该公司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这是“有孚不终”的典型事例。再如，我国是羽绒服的第一出口大国，出口的主要对象之一是俄罗斯；然而个别羽绒制品里面竟然是飞丝、粉碎毛或发霉发臭的羽绒，结果引发了俄罗斯城市焚烧中国羽绒服的事件。在那里，经常会看到“本店没有中国货”的招牌。中国个别厂家不讲信义，竟引起了国际羽协的强烈抗议，使得国家出口创汇锐减，砸了国内整个羽绒服行业的牌子，教训是惨重的。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曾报道，南方某港口城市因缺乏诚信，致使众多的外来投资者纷纷拔营弃寨，另觅良巢，导致当地的经济持续下滑。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一些。其实，经济领域内存在的造假、卖假、行骗、违约、毁约、失信行为，正在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以至于有人惊呼“诚信危机”。甚至是一日三餐，当我们拿起筷子进食的时候，心中会产生恐惧，不知道吃下去的是不是毒大米，注水肉，或者是刚打过农药的蔬菜；至于人际交往中的出尔反尔、行骗欺诈现象，更使人产生

各种各样的疑惑,感叹做好人真难!现在社会上不时出现的有毒大米、黑心棉、假化肥、假种子、假烟、假酒、假药、假数字、假账、假广告、假信息、假币、假文凭、假警察、假人才……,已经说明了“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而且这种公害不仅仅存在于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商品交换领域,在政界、司法界、教育界、学术界乃至新闻出版界,也有程度不同的滋生和蔓延。

针对上述情况,2001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纲要》首次把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概括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个字。其中,“明礼诚信”排位第二。这种排列次序,一方面表明诚信作为“进德修业之本”之重要;另一方面表明,当今中国社会呼唤诚信道德之迫切。

“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威”。从《周易》的启示中,从现实的教训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讲求诚信,请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王启才)

### 3. “元亨利贞”话君子

在儒家看来,社会应该以道德为标准把人分为两类:道德高尚的人称为“君子”,道德低劣的人称为“小人”。君子管理社会,做“劳心者”;小人被君子管理,做“劳力者”。一个出身寒微的人,只要他道德高尚,就应该选拔到统治阶层来。大舜就是儒家塑造出来的这种典范。大舜出身民间,父亲是个盲人,继母待他很苛刻,弟弟是个狡猾自私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大舜还是以孝敬父母、友爱弟弟而闻名乡里。在外面干活

时,不管是烧陶器、打鱼还是干农活,人们都很愿意和他一起做事。后来,发展到人们一听说大舜在做某种行业,都会纷纷聚集到他周围来要和他一起做。他在外与人为善、在家孝悌的德行被尧知道了,尧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并选他做自己的接班人。君子应该被选为统治者。

儒家关于“君子”、“小人”的论述,影响了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但若论其渊源,则《周易》早现端倪。《周易》讲人时,分为“大人”、“君子”和“小人”两类。如“君子道长”,“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君子可凭高尚的道德抵制邪恶,而小人是“不耻不仁”,“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所谓“小人”,都是品质卑劣的人。所以“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小人低下的道德素质使他只能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君子以劳民劝相”,“君子以治历明时”,“君子以议狱缓死”,表明大人、君子品行高尚,是治人之人,是天子诸侯卿大夫等。小人则因道德低下,应被统治,是治于人的人。《革卦》说:“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三者因自身道德素质而表现为与时变化的面貌是不同的。

《周易》对君子的要求,可以《乾·文言》解释卦辞“元亨利贞”那段话概括:“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元亨利贞’。”这样,君子履践《乾卦》卦辞“元亨利贞”,在实际生活中就是仁义礼智,它成为君子的“四德”,是君子人格的基本规定。德行的修养包括知与行两方面,《周易》重视认知,更重视行动。它强调“君子以成德为行”。他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都必须按照“四德”而行。他“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

仁以行之”，其成德表现于实际行为中。君子“崇德”的同时，还须“广业”，要把德行修养与成就事业统一起来，德行培养要落实到成就事业上。如商汤仁及鸟兽，只张一面之网，为其他部落人心所归，最后建立了商王朝。周文王在位时，广推仁德，化及邻近部落，邻近部落纷纷来归附他，周部落因而更加繁荣昌盛，从而为翦商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因“崇德”而使事业兴旺发达，事业的广大又使他们的德泽披及更远的地方，沾溉更多的人们，可以说商汤、文王是《周易》寄予理想的君子，完美地演绎了仁义礼智“四德”。

而《孟子》中的陈仲子则是另一类。应该说，陈仲子也想体行仁义礼智，他洁身自好，因为家里的房屋是用哥哥做官得来的钱修盖的，他认为不干净，便一个人搬到山坡上的茅屋里住。有一天，他实在饿得不行了，跑到母亲那里。母亲杀了一只鹅给他吃，吃了之后，他哥哥开玩笑说，那只鹅也是吃了不干净的钱买的粮食才长大的，陈仲子又把它全给呕吐出来。陈仲子的这种行“仁义”，只有消极的“有所不为”，而没有积极的“有所为”，更没有把它与事业联系起来，因而他与《周易》中“崇德广业”的君子无法相提并论。在《周易》里，君子修己只是初级的目标，更高级的目标是济世化民，是所谓“德普施也”、“德博而化”，使民众都受到德化教育。一个人只想洁身自好，成为餐菊饮露的隐士，那绝不是《周易》及儒家所倡导的理想人物。个人对社会服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当他对社会有贡献的时候，他的自我完善才有意义。

《周易》追求的理想人格有两个层次：低级层次是“君子”，高级层次是“大人”、“圣人”。“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表明《易》中的人并不是普通人，而是君子。其中，君子能与天相



感,认识天道的部分规律;而大人、圣人则进一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能与天地日月鬼神保持完全和谐一致,顺应、运用天的规律,达到天人合一。圣人讲求仁义礼智,能够穷尽人性,人性与天性相通,“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惟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方能“知天矣”。圣人完全掌握了天道、地道与人道,因而能与万事万物圆融和谐,成就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孔门弟子和孟子都说孔子是圣人,达到了这种境界;但孔子在世的时候,认为自己并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可见达成它并不容易。只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提出,为人们不断提升个人的生存境界高悬了风标,使中国人在人生路上追求内外双修,其追求达成的事业便是内圣外王之道。

《周易》不但为人设计了一整套的理想人格,而且还指出了人格修养、完善人生的途径和方法:“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系辞传上》)乾卦的德行是健,特点是易;坤卦的德行是顺,特点是简。君子当法天之健德,孜孜不倦,自强不息;同时法地之简顺之德。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所谓的“一”,即“忠恕”而已。在家尊亲亲之道,出门怀爱人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亲亲之道推而广之,仁及天下,功至百姓,则庶几成为圣人了。在人的修养中,有一个积少成多的过程。人应当“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如果人不能防微杜渐,小恶可积成大恶;小节有问题,将导致大节出差错。所以《系辞传下》说:“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对于坏事不能见微知著，早为预防，顺势发展，终必酿成大害。所以君子要时刻“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文言传》），一辈子都不懈地修身持行，才能屏绝恶而不断接近善，人格才会日臻完善，人生才会日臻完美。

今天，《周易》提倡的这种追求“完人”的人生模式似乎离现代人已经很遥远，现代人有自己的人生设计与追求。但是，临事以忠敬，待人以宽恕，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友爱朋友，惠及他人，注意个人的品性修养，仍然是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做一个合格的人的必要条件。所以《周易》有关君子、小人的讨论，有其现代借鉴价值。（赵彩花）

#### 4. 多结交大人君子

结交怎样的朋友，对人生有着很大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交友得当，遇事顺利；也有人交友不慎，招来灾难。可见，如何交友和交怎样的朋友，并不是一个小问题。《易经》中的《随》、《比》、《同人》、《兑》、《中孚》等卦和《易传》的《系辞》部分，都有如何结交朋友的言论，对我们颇有启发或警戒作用。

《周易·系辞上》说：“方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生不能无“群”，所以，人们要加入某个团体，结交一些朋友，以求得支持和帮助，同时，也向对方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和义务。人若离群索居，孤独无助，就会感到无能、无聊、无趣，时间长了，也是非常危险的；即使没有被现实生活所压垮，也有可能因缺乏人际交流而产生心理变态，形成精神疾病。这就需要积极地“治

疗”，以便摆脱困境。《周易·比》说：“比，吉”，比是相互比附，充分肯定了人结成团体是吉利的。但人加入什么样的集体，交结什么样的朋友，取决于他（她）自己的利益和兴趣。

人应该交什么样的朋友呢？一般说来，领袖或带头人处于社会人群之塔的尖顶。那些具有领导才能和天赋的人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大多数人是被领导者。他们常常被人分派任务：你去干什么，你应当怎么做。正因为如此，孔子说：“勿友不如己者。”（《论语·学而》）意思是说，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吕氏春秋·观世篇》引周公的话也说，不如我的人，我不与他相处，他会牵累我；与我相同的人，我不与他相处，他对我是无益的。只有贤人才与贤于自己的人相处。同样的意思，《周易》要求和贤于自己的“大人”交朋友。

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干得好不如傍得好”。在古代的人事关系上，总有个谁主谁从、相依相傍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跟对了人，事业就能成功，个人也得以扬名，富贵荣华。《周易》中《比》、《随》两卦讲的都是这一道理。

《比》卦的卦形是䷇，下坤☷，上坎☵，坤为土地，坎为水流，地上有水，水泽滋润大地，大地容纳水流，象征相亲相附。《比》彖辞解释说：“比，辅也，下顺从也。”可见该卦主要是讲人们要彼此亲密并比辅于有德的尊长。关于如何比辅，该卦提出了三点：一是要慎重选择比辅的对象，要看准人，不要“比之非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二是要比辅有德长者（有德之君，贤人），以诚相待，守持正道。三是亲比之时，应果决迅速，不能犹豫、迟缓。《随》卦的卦形是䷐，下震☳，上兑☱，下震阳刚之雷震动向上，上兑阴柔之泽随雷震之声欢乐地波荡，象征随从或随和。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

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又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论语·里仁》)。《随》卦主要阐发这一“从善”原则。《周易》认为,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不论是下随上、臣随君,或是上随下、明君随贤臣,都要始终做到诚心向善,不违正道。从中国历史看,比辅关系处理得较好的,可以管仲、鲍叔牙和齐桓公为例。

管仲和鲍叔牙都是春秋时齐国的大夫。据《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年少时,常与鲍叔牙在一块游玩,后来两人又合伙做生意。管仲生活贫困,在分红的时候,常常多拿一些。有人说管仲贪图便宜,不够朋友。鲍叔牙替管仲解释,说他家庭情况不好,是自己主动让给他的。管仲曾经为鲍叔牙出谋划策,结果使鲍叔牙惹了许多麻烦。鲍叔牙并不认为管仲的计谋不好,而是时机尚未到。管仲曾经三次做官而三次被国君驱逐,鲍叔不认为管仲是坏人,而是没有遇上时运。管仲曾经三次参加战斗但三次都败下阵来,鲍叔牙不认为管仲怯懦,而是因为他家中有老母不敢放开手脚。公子纠和鲁国打仗失败,辅助他的召忽因此而死;管仲作为公子纠的辅臣却没能尽节,而是做了俘虏,受了羞辱。鲍叔牙不以为管仲无耻,知道管仲不羞于小节,而羞于不能成就大业。管仲曾感慨地说:“生养我的是我的父母,真正了解我的则是我的挚友鲍叔牙啊!”像管仲这样“不够意思”的朋友,鲍叔牙不但没有离开他,反而和他亲密相处。这是因为鲍叔牙识人,相信管仲是国家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当齐桓公让鲍叔牙出任丞相时,鲍叔牙诚心诚意地推荐管仲,他一连列举了管仲五个方面的杰出才干,说:“要想把齐国治理成最富强的国家,非要管仲不可。”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任用管仲做丞相,“九合诸侯,以

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临死的时候，齐桓公征求管仲的意见，想让鲍叔牙接任丞相。管仲说，千万不可把相位交给鲍叔牙，他决不能当丞相。鲍叔牙对此十分理解，管仲不要他接位，是为了顾全齐桓公和国家，也是为了顾全朋友和自己。“管鲍之交”后来成为“知心”朋友的代名词。

鲍叔牙、管仲与齐桓公之间的关系是从善比辅的典型。今天看来，齐国的强大与管仲的辅佐是分不开的；而管仲之所以能发挥辅佐的才干，是因为齐桓公不计前嫌、重用贤才，其中，鲍叔牙的赏识与推荐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鲍叔牙推荐管仲，自己则甘居其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这三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各自发挥了才能，于国于友于己都有利。由此看来，择友如择师，如果能够选择胜于自己者为友，结交如良师一般的朋友，择善而从，自然就会不断获得教益，取得进步。

《周易》在讲比辅的时候，除了强调“守持正道，择善而从”外，还要求诚信、同心协力，如《泰》卦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系辞上》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在具体交往过程中做到：与地位高的人交往不谄媚取宠，与地位低的人交往不侮辱轻慢。“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黷”（《系辞下》）。尤其强调，不要“比之匪人”（《比》六三）。“匪”，通“非”。“比之匪人”，就是比附于行为不正当、不正大光明的人。匪（非），解释为坏人，于意也通。比附于心地不纯的坏人，而听其指挥，下场实在是可悲。《比》六三象传说，亲密比附于这样的人，“不亦伤乎？”明末天启年间，宦官首领魏忠贤建立“阉党”，遍布特务。内廷有皇帝的奶娘客氏的帮助，朝外有众多的心



腹党羽。上自宰辅重臣,下至文武官员,有“五虎”如文臣崔呈秀等,“五彪”如武将田而耕等;更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流;臭味相投,朋比为奸。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为魏忠贤建立生祠,称魏忠贤为“九千岁”,甚至是“九千九百岁爷爷”。魏忠贤寿诞之日,他们争相献媚,“绶带挤击,挨摩之声铿然,闻有挤伤衣带腿足者”。这些人比附魏忠贤,觊觎帝位,可谓“比之匪人”。到崇祯朝时,阉党虽被一网打尽,但国家的根基业已动摇,岂不是可悲的事!

再看比附失误的一例。明代的唐伯虎曾被江西的宁王朱权聘为上宾。宁王是建文皇帝的叔父,他为了谋反夺权,收罗奇才异能。唐伯虎还以为他礼贤下士。在宁王府呆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了宁王造反的阴谋,知道自己处境很危险,但想走又走不脱,因为宁王怕他泄露机密。唐伯虎只好装疯卖傻,寻花问柳,最后被嫉贤妒能的宾客排挤出府,回到苏州老家。几年后,宁王举兵造反失败,其宾客都被列为逆党,无一幸免;只有唐伯虎逃过此难。但历史上像唐伯虎这样聪明人又有多少呢?所以《随》初九爻辞告诫人们,在随人的初始阶段,在事物的全貌尚未完全清晰之前,不能有所偏系,固执于一;应多加观察体验,可随则随,不可随则弃。出门交往,头脑要清醒,执正以随,才能成功。六二、上六爻辞告诉我们,盲目跟随,或因小失大,或玉石俱焚,必有悔吝!从历史上看,的确如此。秦末韩信、陈平一开始投靠项羽,没有受到重用,转而投靠刘邦,建了大功。唐代诗仙李白,晚年错傍了与唐肃宗争江山的永王李璘,结果遭连坐,发配夜郎。明代的宁王朱权和燕王朱棣都造建文皇帝的反,追随燕王的,成了开国功臣;追随宁王的,却成了阶下囚。所以,跟对了人可以显亲扬名,功业不朽;跟

错了人可能家破人亡,遭人唾骂。所以,比自己强的人也有两类,一类是德才兼备的“大人”君子,一类是居心叵测的“匪人”。结交朋友,要舍后取前,慎重选择。

《兑》卦象辞说:“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意思是说,《兑》卦上下都是兑,兑为泽,两泽交相亲润,象征“欣悦”,君子因此欣然愉快地和良朋好友相互讲解道理,演习学业。《礼记·学记》也说:“独学而无友,谓之孤陋寡闻”。结交大人君子(师友、贤才),以帮助自己进德修业,为自己排疑解惑;或结交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相互切磋,共同进步,这何尝不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王启才)

## 5. 谦谦君子终获福

《周易·谦卦》中说:“谦谦君子,卑以自牧。”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总是以谦逊的态度,自守其德,修养自身。古人多以谦虚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基本准则,并且用“满招损,谦受益”来自警。

在文明社会中,人们要进步,就必须学习。从学习的角度来说,人要想获得知识,不断求得进步,谦虚的学习态度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如果总是自恃才高,看不到自己的无知之处,在认识能力上就很难有所提高,在认识内容上也很难有所拓展。事实上,人类的认识就像一座小岛,四周是浩瀚无边的未知世界。认识的事物越多,小岛的面积越大,那么,所接触到的无知的领域也就越大。如果一个人能时刻以“自知无知”的谦虚态度来对待周围的人和事,他就知道自己在哪个方面还存在不足和差距。这样,他才有奋斗的目标和方向。也

只有这样，他在求知的道路上，才能正确地估价自己，客观地评价他人，才能去培养积极上进、互助协作等美好品德。正如英国人托·穆尔所说：“谦卑是深埋在地下的甜根，一切神圣的美德都从那里萌生。”

但是，《谦》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此，读《谦》卦，更能使人明白其中所蕴含的避祸求福之道，把谦虚当成自己的终生守护神。

《谦》卦彖辞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一个人如果自高自傲，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会遭到天地鬼神的厌恶，简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中国有一个童话故事叫做《种梨的人》，讲一个卖梨的人很是骄傲自大，常欺负一个老人；而有一个小孩却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这个老人，并且给老人买了一个梨子。没想到这个老人竟然是个神仙，他把梨核种在地里，片刻之间梨核发芽，长高，开花，结果，长了满满一树的梨。老人把梨分给在场的人吃，那小孩也得到许多梨。这情景把卖梨的人看呆了。等到人们散去，卖梨的人才发现自己的一车梨全不见了。这形象地说明了“鬼神害盈而福谦”的道理。

人们常常因为自己有一点小本事，就看不起别人，其结果吃亏的往往是自己。清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六记载了一则《谑狂生》的故事：

朱天门在家里扶乩，好事的人都前往观看。一个狂生以书画自负，意气傲慢，旁若无人，以至于对着客人脱去袜子，搔爬脚上的污垢，向着扶乩人讥笑道：“姑且请出示下坛诗。”扶乩人当即题写道：“回头岁月去骎骎，几度沧桑又到今。会见会稽王内史，亲携宾客到山阴。”众人说：“这样说来，那么仙人

还赶得上见到王右军吗？”扶乩人写道：“岂但是王右军，一并见到顾虎头。”狂生说：“二老风流，既然曾经亲眼见到过，这时候群贤都来到，古今人相差多少？”扶乩人又写道：“二公虽然卓绝的技艺入于神妙，然而意存谦退。雅人高深的情致，使见到的人意气消融；和骂座的灌夫相比，自然别是一流人物。离之是双美，何必合之使两伤呢？”众人知道扶乩人意有所指，相互顾盼而窃笑；回头看狂生，已经穿上袜子要逃跑了。

当一个人在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时，更要注意约束自己，警示自己，时刻以谦恭待人。不可否认，那些有钱或有权有势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得上是成功人士；但富贵易骄，是人易犯的毛病。作为一个真正有理智的成功者，应该想方设法去克服这一人性弱点。一个贫贱的人在别人面前摆出一副骄人的面孔，大家也许只是觉得他很可笑，损害的只是他自己本人的名声；而一个事业的成功者倘若骄人欺人，则决不仅仅是关系他个人的荣辱得失，损害的还有他的事业。用古人的话说就叫做“失国、失民”。

《资治通鉴·周纪一》中记载有魏文侯之子子击与魏文侯之师田子方的一番辩论，今天读来仍觉耐人寻味。一次，子击外出，途中遇到田子方。子击下车拜见田子方，但田子方却不还礼。子击很生气，就质问田子方：“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田子方回答说，我看只有贫贱者才能骄傲，而富贵者却不能骄傲。为什么呢？因为贫贱者没有什么可失去，他不被重用，计策不被采纳，行为与当权者不合，大不了穿上草鞋离开罢了；而富贵者就不同了，“国君骄人则失国，大夫骄人则失家”。听了这话，子击很受启发，于是化怒为喜，感谢田子方的教诲。

再说东汉末年的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大败袁绍。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袁绍刚愎自用，不听从谋士的计策；而曹操则能从善如流，虚心纳言。两军相遇之际，谋士沮授向袁绍进计：“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及我军。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军不战自败也。”沮授计策切中要害，可袁绍不仅不采纳，反以怠慢军心为名，欲治其罪。曹操催粮书信为许攸所获，许攸劝袁绍夜袭许昌；可袁绍却担心这是曹操的诱敌之计，不从许谋。沮授再次进计，又遭袁绍申斥。反观曹操，却十分重视谋士的计策，虚心求计。他问计于郭嘉、荀彧、弃袁投曹的许攸诸人，集思广益，击敌要害，终于以少胜多，大破袁军。

同样是起事而称王称帝，秦末的陈涉与东汉的刘秀，对待故人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陈涉还在给别人做雇佣的时候，与同伴信誓旦旦地说：“苟富贵，毋相忘。”而一旦作了张楚王，当年的同伴来看他，因为言语稍有冒犯，他便杀了昔日同伴，弄得众叛亲离，不久就败给了秦军，连自己也命丧马夫之手。

而刘秀则不然。据史书记载：刘秀小时与严光同学。刘秀做了皇帝之后，严光就躲了起来。但刘秀始终记得他，希望他能出来做官，于是就派人四处访求。有一天，听说有个人披着羊皮大衣在齐国的池泽中钓鱼，刘秀知道那就是严光，便准备了可以坐卧的“安车”及象征最高礼节的黑色丝帛，派使者去请他。请了三次，总算把他请了来。刘秀亲自到严光的住处去看他。严光佯装不知，不起来迎接，但刘秀丝毫不以为意，走到严光的床前，摸着他的肚皮，喊着严光的字“子陵”，请求严光能辅佐自己治理天下，但严光就是不答应。而后，刘秀又把严光请进皇宫，与他回忆往事，追叙旧情，晚上与他同卧，



以至有一次严光熟睡中,把脚放到了刘秀的肚皮上。第二天,观测天象的官员来汇报说有客星侵犯皇帝星座,而一向迷信谶纬的刘秀竟然笑着说:“这与老天变异无关,是我跟我的老朋友严子陵一块儿睡觉罢了。”正因为如此,后世的大儒都评价光武帝刘秀的肚量能包容到天地之外,历史上才有所谓“光武中兴”的千古佳话。

《谦》卦的象辞说:“地中有山,谦。”高山在地下,用以象征一个人内心高耸如山,外表却谦和如平地,不锋芒毕露,以谦虚谨慎去接人待物,以求得免祸积福。初六爻辞有“谦谦君子,用涉大川”之言,大河巨流,正是艰难险阻的象征,只要你是一个卑谦自守的君子,就一切无碍。《韩诗外传》卷三载周公告诫他的儿子伯禽说:“《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近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陈毅《手莫伸》诗的结尾处有这样几句:“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虚败由奢。”与《谦》卦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曹建国)

## 6. 安全防范慎莫忘

《无妄》卦六三爻辞说:“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好像在述说日常生活里发生的一个小故事:邻居把耕牛拴在村旁小路边的一棵树上,过路人顺手牵牛,把它偷走了。邑中人在家里闲呆,祸从天降,竟被乡里人当作嫌疑对象,蒙受猜疑审诘之灾。看到这个故事,人们马上会想起“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成语。但仔细想来,故事与成语的意思又不太相同。“城门失火”可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也可能是

天灾造成的。自然灾害引发的人身意外伤害、财产损失事件，是难以预见，不能避免，无法克服的，是真正的“无妄之灾”；但是，像小到钱包、耕牛被盗，大到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破坏等，都是人为原因造成的，而这些是可以防范、避免的。

就拿耕牛被盗来说，首先应追究、谴责的是盗牛者，但失窃者和被怀疑对象也不能说没有责任。失窃者把自己家里最重要的财产——耕牛拴在人来人往的路边，又没有很好看管，这说明他本人是有过失的。路人顺手牵牛，邑人无辜地被株连蒙受祸端，确实令人同情！但从他本人的处境及表现来看，乡人怀疑他也不是没有道理。从卦象分析看，“六三”以阴居阳，居位不正，又处于下卦之终而不中。既然邑人原来做事就不中不正，有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习惯，或者曾干过偷鸡摸狗的事，一旦有意外的事情发生，他又怎能避嫌呢？村里人为什么不怀疑其他人呢？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歪”，如果“六三”坚守正道，行为端正，这类“无妄之灾”或许就不会降临到他头上。从以上的分析看，《无妄》涉及到一个人身安全的问题。要想避免或减少人为因素所造成的“无妄之灾”，人们的主观行为就必须“无妄”，要从端正自身、严加防范做起。

《解》卦六三爻辞说：“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负，以背载物。且，犹而。乘，乘车。寇，盗贼。爻辞虽然只有八个字，寓意却十分深刻：某个小人物乘坐君子才能坐的豪华车子，出门远行。因为随身携带很多财物，害怕丢失，就把贵重物品打成包裹，片刻不离地背在身上，结果出现负重乘车的反常现象。人们乘车本图轻便，可此人行为乖异，自然引起了强盗的注意，在半路上把他的财物给抢走了。这是一个多么沉痛的教

训！九三象辞评论说：“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认为此人实在太蠢，咎由自取！孔子也感叹道：“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周易·系辞上》）。慢，轻慢。诲，教唆。冶，妖冶。大意是说，创作《周易》的人，大概了解盗寇的心理吧。本来是小人背负，君子乘车，现在小人乘坐在君子的车上，背上仍然背个大包裹。盗寇一见君子之器竟被小人占据了，还有那么多贵重的财物，自然就要下手抢夺。从国家或君主方面说，如果轻慢地对待国家的“名器”，不辨贤愚，使小人居君子之位，作威作福，必然自招盗寇、兵戎来讨伐。财货积藏不严，露泄于人，容易招引盗贼的抢窃之心；女子容貌妖冶，举止轻佻，容易招引男人邪念之欲。祸害、坏事，很多都是自己行为不当招来的。

“慢藏诲盗，冶容诲淫”。人们处世当谨慎持重，且莫掉以轻心。就人身财产的安全来说，人如果在公众面前点数大把大把的钞票，把钱、工作证、身份证等放在一起，鼓鼓囊囊地装在外面的衣兜里，手机随意乱放，自行车、摩托车不上锁，银行存折不加密码或将密码泄露于人，盛夏大开门窗睡觉，出差或在汽车、火车、菜市场、商店等人多、拥挤的地方，不多留意、防范……，很容易失窃，造成难以弥补的财产损失。

盗窃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方式将他人财物据为己有的犯罪行为。它是一种古老的犯罪，私有制产生以来业已存在。在今天，它一直是刑事案件中占第一位的多发罪，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危害社会治安的

主要因素。要想把盗窃案降低到最低程度,除了严打——狠狠打击小偷、盗贼外,就是重防。首先是从预防着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体公民的道德修养和遵纪守法的意识。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有纯朴的价值观,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视犯罪为邪恶,那么盗窃犯罪就失去了其滋生的土壤。其次是提高居民防范意识,教给他们防盗的技能,把群众广泛地发动和组织起来,防御盗贼,把警防、民防和技防结合起来,形成动静、内外多层面、立体的防范网络,不给偷盗分子留下可乘之机,使犯罪分子无藏身之地。

再说人身安全问题。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告诫人们要离开人身易受伤害的是非之地。如果把这一观点扩展开来,对今天也颇有借鉴意义,比如幼儿玩耍要避开沟边、河边等危险的地段,大学生要注意季节性和周期性的安全问题,像游泳防溺水,冬季防火,青年人谈恋爱不要在夜晚到偏僻无人的角落里去等等。另一方面,自身要正,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蛋”,如果一个人行为不端正,就有可能引火烧身,“冶容诲淫”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对于年轻漂亮的女性而言,尤其是那些从事秘书、供销员、公关员、服务员、招待员、导游员等职业者,接触的人员比较复杂,流动性又比较大,一定要自尊、自爱、自重、自强。要注意外表装束和行为举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性总想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使自己的体态美通过外表衣着体现出来,这是人爱美的天性。但有些年轻女性,在衣着上过分追求华丽、怪异,认为只有这样性感,才能凸现自己的形体美,体现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其实这是认识上的误区,真正的美更重要的是内在的知识修养,如举止文静,神态大方等。从犯罪心理分析,很多犯罪分子正是看

到女性衣着华丽暴露,举止轻佻,认为她不正派,有机可乘,陡起歹心,引发了淫荡的冲动,盯梢、跟踪、伺机进行侵害施暴。所以青年女性要注意着装,不过多佩戴饰物,尤其是盛夏季节不要穿得太少、太露、太透,只顾自我欣赏和陶醉,而忽视其所在的社会环境及周围人群的心理感受,引起不肖男士过多的性幻想。在社交场合,女性应该有礼、有节,大方端庄,不可打情骂俏,随意接受陌生人提出的吃饭、跳舞等邀请。尤其是不要有依附意识、好吃懒做的习惯、贪小便宜和攀高门第的虚荣心理,以免给动机不良的男子抓住,有设置圈套陷害的机会。对于单身女子来说,尽量不要在深夜行走,如不得已最好结伴而行,三班倒的女工在上下夜班的时候,不要贪图省事而走偏僻无人的小道,或靠近路边的树林,要走在灯火明亮的地方。对于来自上级、同事、同学等方面的性骚扰,要大胆地予以回击,态度明朗,不能害羞暧昧,给对方留下幻想,使其得寸进尺。要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来保护自己、解脱自己。如遇到性骚扰难以解脱时,可以直接找妇联,找保卫干部,甚至是依靠法律来帮助排忧解难。

自古以来,安全是人类的第一需要。对个人来说,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它涉及生命安全、生存安全、财产安全、家庭成员安全等;对于国家,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孟子》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离娄上》)如果我们对“慢藏诲盗,冶容诲淫”进行较为广泛的理解,还能得出如下启示:一是在国家检察制度不太严密、操作程序尚存在漏洞的情况下,在掌握钱、权等利益的部门,其领导和职工更要廉洁自律,警钟常鸣。比如随着你职位的不断上升,权力也愈来愈大,如果给下属单位批条子,可以使



自己得到最大的回扣利润,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成富翁,你干不干?在银行整天大把大把地数钞票,动动脑筋,瞅准机会,就能发大财,你是否心动手痒?这时如果意志不坚定,就可能成为蹲监狱、吃枪子的贪污犯,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害了自己,毁了家庭,也祸害国家,在金钱、权利、美女面前,正是考验人的关键。二是国家元首、单位领导一定要选贤举能,任人唯贤,把国家的“神器”、单位的命运交给德才兼备的君子,万不能将其托付给投机钻营的“小人”,以免祸国殃民。《周易》的启示,可谓大矣! (王启才)

## 7. 小心谨慎过难关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在关键时期。朱镕基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形容他当时领导改革的心情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个比喻形象生动,恰当地表达了当时改革的艰难与复杂、中央领导的心情与决心,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这两句诗出自《诗经·小雅·小宛》,后来常用作比喻做事高度谨慎。《周易》也十分强调这一点,例如《履》卦另有形象的表述。其卦辞说:“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卦主要从实践角度谈人生。履,作为名词,指鞋子,可引申为道路准则;作为动词,指行走。卦辞把人生比喻成尾随猛虎的过程。人生充满危险,这些危险正如一只大老虎,它正用饥饿而凶狠的目光搜寻着可以捕捉的猎物。人生若想有所作为,又不得不尾随这只大老虎前进。《履》卦显示了对社会人生的深刻理解。为不被老虎吃掉,又能有所收获,我们应

当时时戒备,终生谨慎。

中国古代有句俗话,叫“伴君如伴虎”,人们形容在朝为官是“伴虎”。老虎要吃人,其凶残可知。把君主比喻成吃人的老虎,可见“伴君”的凶险。因为封建皇帝对臣民有生杀大权,大臣稍有不慎,即获杀身之祸。人们都承认汉武帝雄才大略,但他的残暴也是有名的,被他杀掉或逼死的大臣为数很多。尤其是宰相,除了个别的幸免于难外,多数都不得善终。石庆就是这极少数幸存者中的一个。此人的父亲石奋以谨慎著称,并且以谨慎教育子孙,谨慎一时成了石氏家族的家风。据《史记》记载,石庆的哥哥石建为郎中令,书写奏事本,写后再读一遍,发现“马”字少写了一点,十分恐慌地说:“要是让皇上知道了,肯定要杀头!”于是重写一遍。石庆在石家头脑反应最敏捷。一次陪武帝出游,武帝问他有几匹马,他用手指一头一头地数完,才说有六匹。石家成员做事大多这样谨慎,他们的家族也获得回报:身居高官、俸禄二千石的有五人之多,号称“万石之家”。

上面叙述的历史故事,意思不外是提倡明哲保身。石氏家族在汉武帝时代竟然没有任何功业可言,石庆也以“未有建树”而免官,这对于雄才大略的武帝来说,真是一大讽刺!和董仲舒、司马迁相比,石家人没有体现人生价值;但就石氏家族成员个人来说,不但保住了性命,也避免了许多精神与肉体的痛苦。石氏家族大部分成员当时都获善终。

《周易》告诫我们,要有忧患意识,要随时警惕身边可能出现的危险。《既济》卦六四爻辞:“濡有衣袽,终日戒。”意思是说,乘船渡河要带破衣破絮,如果船漏就可以用来堵塞漏洞。《既济》卦以此说明做事要深谋远虑,常备不懈。即便身为国

王,虽有“虎威”,也不可自恃。权柄既可杀人,也可杀己。历史上,因拥权不慎而酿成的悲剧也不在少数。

春秋时代的鲁隐公,在鲁国历史上可以算得上是个稍有作为的君主。但他不去解脱一条套在脖子上的封建宗法“立嫡不立长”的致命绳索。因为他不是嫡长子,而是以庶长子身分代同父异母兄弟、未成年的嫡长子桓公摄位,做了十一年鲁公。在他事业的顶峰时期,公子翬进计,自告奋勇地要去杀掉桓公。隐公没有接受他的劝告,表示自己已经作好了退位养老的准备,未对桓公有所警惕。公子翬内心恐惧,跑到桓公处告密,密谋后派人暗杀了隐公。

不仅手握权柄的人需要谨慎,就是普通百姓也要提防身内身外的危险因素。《履》卦初九爻说:“素履,往无咎。”即按照平常坚持的准则行事,不要被外物所诱惑而改变初衷。人们常说好人难做,因为几十年如一日保持自己做人准则,的确不容易,一旦放松自己,就会前功尽弃,甚至走向堕落。

重庆市繁江中学数学教师张代泉,曾被评为优秀教师。该校是重点中学,学校领导正考虑提拔他,可见他曾经表现得比较优秀。但是家庭矛盾打破了他的平常生活,为了逃避矛盾,他爱上了赌博,并且沉溺其中,落下七、八万元的债务。为了还钱,他竟然绑架了邻居年仅七岁的孩子,最终沦为阶下囚。任何家庭都有矛盾,有矛盾想逃避是可以理解的,但决不能作为犯罪堕落的理由。他就是对自己内在的危险因素没有防范好。

《乾》卦九三爻也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告诫君子谨慎行事,自强不息。这里的“终日”、“夕”,不仅表示从早到晚,也表示人的一生,从早年直至晚年。有不少人大半

生谨慎小心,兢兢业业,到了晚年,以为事业有成,自己已从生活的前线撤退下来,该放松一下自己了。这一“放松”,使许多人“晚节”不保。社会上所谓的“五十九岁现象”就是这样。前一段时间许多高官倒台自不必说,就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也不能因为“退下来了”而放松警惕。“边缘人”是不存在的,生活没有旁观者。

南京市某高校一位退休教授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他的老伴已去世,儿女都在国外,自己从岗位上光荣退休,突然感到空虚无聊。在街头闲逛中,他发现了所谓“应召女郎”的秘密,于是他享受了“应召女郎”的服务。要命的是此人外语很好,每次完事后他都用外文记下过程和感受。当派出所民警调查他,搜出那本外文笔记时,该君鄙夷地说:“那是外文,你们看得懂?”事情败露后,此人羞愧地说:“斯文扫地”。此君的教训是耐人寻味的。许多老知识分子、老干部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仍老有所事,或著书立说,或扶贫帮困。有的老将军还致力于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教育,老年生活过得有声有色。而此君却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对社会丑恶现象不但不戒备、警惕,反而趋之若鹜,斯文扫地也是咎由自取。

《履》卦九二爻说:“履道坦坦,幽人贞吉。”意思是说,虽然大道平坦,但仍需小心谨慎,哪怕身处偏僻之地,贱为平民,也要坚贞守志,才能有吉利可言。在当今社会,尤其需要讲品行、讲人格。特别要警惕“和尚动得,我动不得?”的心理。攀比财富和地位倒不奇怪,奇怪的是有人竟然攀比堕落、攀比犯罪。例如原辽阳银河工业制板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宗大就是这样走上不归路的。此人资产最多时有两千万之巨,而且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但就是这样的人,居然因为强奸罪和嫖宿

幼女罪被判处死刑。当被问及为什么会犯罪时,他说:“我就是受不了别人‘圈笼’,一有人‘圈笼’我就动心,就控制不了自己”。“圈笼”一词,笔者估计是色情业的行话。在吕宗大看来,别人干得,我吕宗大为什么就不能?头脑中根本就没有自律意识,早把道德和法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吕宗大的堕落因素很多,但主要是他自己得意忘形,既害了别人,又害了自己。

当然,人生道路上的危险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它们往往以斑斓的色彩诱惑着我们。特别是初涉人生的年青朋友,尤其要注意。北京某著名高校新闻系的女大学生黄某某就是一个例子。一个叫谭某某的黑社会头目为了追求她,把女生宿舍楼前十多平方米的地方全堆上玫瑰花。黄某某果然被花海打动了芳心,很快堕入爱河。不久他们就同居了,而且还怀孕堕了胎。“豪哥”抄袭来的求爱方式,在黄某某看来,十分浪漫。他在黑道生活中养成的刚愎、残忍,也成了“锐利”、“霸气”、“男人味”。结果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她随着“豪哥”东躲西藏,受尽了苦难。

《周易》强调人生要谨慎要防范,但我们不必要因此把人生看得一团漆黑,《周易》是不主张走极端的。我们一方面要以乐观的态度生活,一方面要多长一只眼睛,留心那些危险因素。在花丛中要提防虫蛇,但同时也要在荆棘中看到鲜花,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

(丁 进)

## 8. 同舟共济渡难关

首先请看《新闻晚报》2003年4月30日的一则新闻:



昨天,本报读者热线反映:在华山路425号锦君易购超市便利店看到有医用口罩,外包装上标明是16层医用特级口罩,由上海市劳防用品商店经销;于是放心地先后分两批购买了分别为2元和4元的几十只口罩,其中有相当部分发给去广州参加商业洽谈会的公司员工。没有想到这些口罩一经洗涤,立马露出破绽,除了上下两层是棉涤纱布外,其余则是薄薄的晴纶棉充斥其间,且有股刺鼻的异味。

昨天下午,记者专程来到该“便利店”,这是家两开间的私营小店,其营业执照注明是“上海锦君食品店”,一外地口音自称姓刘的女士说她是领班。记者向她说明来意。她却说她们也是受害者。记者要她把老板叫出来,她说老板到外地去了,采购人员也到外地去了,一时回不来。旁边围观者大声告诉她:“在当前发生‘非典’时期,销售伪劣假冒口罩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无奈之下,她只好说出口罩是从黄浦区某小商品批发市场批发来的,进价几角钱一只。据她说这些口罩售出后,已经有消费者来退货100多只了。最后该女士竟“理直气壮”地说:“这些都是你们上海生产的假冒伪劣商品,现在怪到我们头上!”

据了解,这些假冒伪劣口罩实际上是外省市一些不法商贩生产的。希望有关部门不仅要经营者依法查处,最好能寻根刨底,将非法生产的源头堵住。

这样的例子绝非唯一。近期内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报道了大量的相关事例,有的利用“非典”哄抬物价,趁机牟取暴利;有的声称自己是“非典”病人,在大街上公然强拿别人的东西而不给钱;有的人冒充“非典”疫情督导员,公然行骗;还有人利用“非典”带给人们的恐慌,故意散布一些不实消息,以致

造成更大的恐慌等等,不一而足。

这次突如其来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对于人类来说,是一场灾难;对中国人民来说,更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浩劫。在短短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全世界有30个国家发现有“非典”患者;在中国有26个省发现了“非典”病人,广东、北京、山西、内蒙等疫情十分严重。由于是一种新型病毒,目前人们对导致“非典”的新型冠状病毒还束手无策,对“非典”也主要是以预防为主。于是就有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发国难财,利用“非典”想狠狠地捞上一把,凡跟“非典”有关的医药材料,不管真假,立马涨价。原本卖几角钱一个的口罩,涨到几块钱一个;几块钱一瓶的消毒液,涨到十几块钱。国家中药局为了防“非典”,提供了几种中药的药方。这下好了,凡在药方上出现的中药,立刻十倍、几十倍地涨。比如以前0.2元/10克的贯众,一下子涨到了3元/10克。不知从哪得到的消息,说食盐可以防“非典”,于是食盐立刻涨价。弄得国家天天出来辟谣,澄清事实真相;天天派督察组下来检查物价。

困难是一面镜子,它能照出我们赤裸的灵魂。困苦穷厄,最能检验人的品质。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顺境逆境总是会交替出现,没有永远的顺境,也没有永远的逆境。置身于顺境,我们会轻松自如地面对,但置身于逆境呢?我们常常说困难是弹簧,说逆境是一所学校,教育人们要正确面对暂时的困境,但一旦真正的困难来临,人们还是会有种种不同的表现。“非典”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生命与财产威胁的时候,有些人似乎从中看到了无限的财富,于是贪婪的欲望在膨胀,置良心道德于不顾,眼中只看到“钱”,为富不仁,趁机大发国难财。

引起“非典”大流行的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抗击“非典”要相信科学。但有的人却利用“非典”宣扬迷信,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也干扰了防治“非典”的正常进行。有的人则利用人们的这种既害怕又迷信的心理,趁机大捞一把。在湖南宁乡、望城等地农村,自5月以来一直流传一个“哑巴开口说话指导防非典”的谣言,数以万计的农民加入到这场烧香求神以祈福消灾的闹剧中。据说一个30多年没说话的哑巴,在5月初突然开口说话,说这场“非典”是瘟神路过所致,只要家家户户点三炷香,放一挂鞭炮,烧一些纸钱,就能消灾。一时间家家听响,户户冒烟。经查,所谓的“哑巴说话”纯属子虚乌有,连哑巴都没有其人。在安徽阜阳,谣传放鞭炮可以防“非典”,一时间鞭炮价格飞涨。这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同时也是一幕幕令人心酸的悲剧!

《周易》是一部借天道自然讲社会人事的卜筮之书,其中有很多地方讲到人应该如何去应对困难,或许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困》卦说:“困:亨,贞,大人吉。”意思说,《困》卦象征困境,努力自救必能亨通;应当守持正固,君子可获吉祥。《坎》卦说:“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意思说,《坎》卦象征重重险陷,只要心怀诚信,刚直不阿,就一定能度过难关。《坎》卦的彖辞更是明确说:“行险而不失其信。”《蹇》卦:“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周易》的占筮者理所当然是周人,当时周人地处陕西渭水流域,其东北正是强大的商王朝及其诸侯国,而西南方则是一些弱小的戎狄等少数民族,一方面他们是商王朝的对头,可以联合他们共同灭商;如果不能联合,也比较容易消灭他们。总之,向西南方向发展可以壮大自己的势力,以便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再来与商王朝一决雌雄。

这是说,困难之时应该同舟共济,互相支援,所以《蹇》卦九五说:“大蹇,朋来。”蹇者难也,“大蹇”就是大有难处,这时非常需要朋友来帮助。但怎样才能得到朋友的支援呢?《蹇》卦卦辞说:“贞吉”,九五象辞说:“以中节”,都是说要保持内心的诚实与正直。当然,类似的语句在《周易》中还有很多,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三点:一、要不失必胜的信念,勇于开展自救;二、要心怀诚信,立身处事讲求正道;三、要发扬团结互助的精神,同舟共济、共度难关。

对照《周易》的告诫,再看看上文所说的那些人的行为,难道生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我们不应该好好反思吗?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光辉灿烂的古老文明,我们也一向以诚信礼义、坚贞不屈而自豪,为什么在“非典”来临的时候,会出现那么多的民族败类?手扪自己的良心,我们应该想想到底该怎么做。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非典”来临的时候,也大量涌现出令人感动和振奋的故事。就在刊登出售假冒伪劣口罩新闻的同一版,也同时报道了上海市徐汇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用心守护一方平安,哪里需要哪里上,每天抱着15公斤重的电动喷雾器,工作7、8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由于太疲劳,记者采访他们时候,有人竟然睡着了。当然这还不算什么,更有那些白衣天使每天冒着生命危险,与“非典”病人零距离接触……这次“非典”流行期间,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比例很高,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像叶欣、梁世奎等,他们是抗击“非典”的中坚力量,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只要心怀诚信,发扬同舟共济的精神,什么样的困难我们不能战胜呢?

(曹建国)

## 9. 忧勤惕厉人生路

清代易学家王心敬(1656—1738)在其所撰写的易学著作《丰川易学》中,曾总结过《周易》的宗旨:“《易》之为道,总是忧勤惕厉之道;《易》之为学,总是忧勤惕厉之学。其人之为圣、为贤,亦不必一格,总之在忧勤惕厉之中而已。”(《丰川易说·卷首·通论》)所谓“忧勤惕厉”,意思是要人们常怀忧患意识而心存戒惧。《周易》的产生,就是圣人在一种忧患的心境与精神的促动下写出来的。它展示着圣人对社会人生那理性、真挚而长远的关怀。全书中,与《乾》卦“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内容、精神相似的语句很多,凸显着它对人生的理性思考:人应当一生都刚健勤勉、奋发向上于外,而又敬畏、忧患于内。刚健勤勉使人进取、追求,而进取、追求的人生必然会面对失败或成功,有的人经不起失败的挫折,有的人沉迷于成功的鲜花,于是都不能再刚健勤勉地奋斗了。因而,《周易》认为,人还应该在刚健勤勉的同时,时时怀着一种如同身临险境、或即将面临困难的大敬畏意识。这种大敬畏、大忧患的意识,使人在成功的时候清醒地看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成功的今天仅仅代表着今天,明天又必须继续前进;它也使人在失败的时候不会就地躺倒,一蹶不振,而是通过积极地反思自身行为及处事方法,努力寻求解决之道。总之,这种大敬畏、大忧患的意识就像航海轮船上的指南针、汽车上的方向盘,保持人生不停进取并往正确的方向前进、前进。

《周易》所说的“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人生修身之道,



很早就被先民所认同,并用以训示后代。周朝的周公旦曾经督促、警戒周成王要“无逸”,不能忘记祖先创业的艰难和小民生活的艰辛,不要贪求享受,而要勤勉政事,日夜忧劳国事。他还以商朝的帝王为实例,说殷中宗、高宗都能勤劳国事,关心百姓疾苦,日夜不敢放松,因而商朝在他们手里蒸蒸日上,他们也成为有名的贤明帝王。而到了祖甲,他不知道要勤勉政事,却是一味田猎游玩,把国家弄得很不像样,于是伊尹发动官民把他流放到桐宫去思过。在那里,他了解了人民疾苦,明白了君王的责任与做人的道理,三年之后,他便能以忧勤惕厉之心来治理国家,于是商朝又继续繁荣昌盛。只是后来的帝王又不懂约束自己、勤劳国事,因而商朝就被周取代了。

此后,似乎很少有这样的篇章训戒帝王,但有无数的帝王兴国、灭亡的实例,证明着“无逸”的主题。唐明皇李隆基治国由兴而衰就是一个典型。

李隆基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子,原没有继承王位的可能,加之当时的政治形势极其复杂,天下能否姓李还不一定,但他凭着自己的勇与智,最后夺取了皇帝的宝座。也许因大位是自己打拼得来的,格外珍惜,李隆基在早年励精图治,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开元盛世。后来,他在位的时间长了,有点厌倦国事了,加之国家前期发展的状态也使他过于乐观,认为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了,于是把朝廷的事交与李林甫,边疆的事听从安禄山,自己就开始享乐起来。没想到享乐没几年,便“渔阳鼙鼓动地来”,他只好仓惶逃往四川,放弃长安任人践踏。

相对于帝王,中国的文化人更懂得忧勤惕厉之道。长久

地影响着中国人行为、思想的儒家文化,便浸润着这种精神。儒家主张“日乾乾”,多行、多学,认为“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光想是不行的,要有具体的行动。而在行动的同时,他们主张“一日三省吾身”。在行动中不断反思,锻炼才干,才能使接下来的行动更正确。这就是“夕惕若厉”即日夜警省戒惧的意思了。所以儒家那个极其讲孝道的曾子临死之时,吩咐人“启予足,启予足”。意思是一辈子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无一日不在身体力行,无一日不在三省吾身。临死之前回顾一生,终于可以欣慰,自己无愧于道,现在生命即将结束,手足身体可以舒展开来了。这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最具体的演绎。而孔子一生,干谒七十余君,没有一人能接纳他的建议。旁人讥笑他,有时甚至连学生也不理解他,艰难困苦又紧紧缠着他,但孔子行道的步伐从来不曾停止过。年纪大了,不能再周游列国、游说国君了,他便教授学生,让学生继续传播自己的理想。同时,他还整理古典文献,梳理历史,于其中流传自己的思想。“日乾乾,夕惕若厉”的精神,使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从人生的一个认识高峰走向另一个认识高峰,越来越靠近人生的化境。

后世的文化人,以这种守身之道走完人生的人还很多、很多,屈原、贾谊、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等等都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的痛苦便转化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岳飞《满江红》词)的壮怀激烈,陆游可称这方面的代表。前人说他的作品“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罗大经《鹤林玉露》)。陆游诗中贯穿始终的一个特征,就是“拥马横戈”、“手枭逆贼清旧京”的豪情壮志,和“一身报国有万死”的牺牲

精神。他这样抒写自己早年的抱负：“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夜读兵书》）和壮年的志趣：“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以及老年的意气：“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赵燕。”（《老马行》）扫胡尘、靖国难之志，为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呐喊，是他诗歌内容的首要特征。如《金错刀行》：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即使在晚年闲居农村时，诗人也不忘恢复之志。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诗人不计老境凄凉，而惟以报国为念，梦萦魂牵的仍是驰骋战场，但一腔报国献身的热望却长期遭到“报国欲死无战场”（《陇头水》）冷酷现实的扼杀，因此他的诗中有大量作品抒发壮志难酬的悲愤，他叹息着“腰间羽箭久凋零，太息燕然未勒铭”（《夜泊水村》），愤慨于“丈夫不虚生世间，本意灭虏收河山。岂知蹭蹬不称意，八年梁益凋朱颜”（《楼上醉书》），他痛惜空有塞上长城之志，却华发早生；以诸葛亮自期，却壮志蒿莱；怎能不叫英雄扼腕与浩叹？但他却在悲愤中执着，甚至死亡都不是其执着情怀的终止：“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日乾乾，夕惕若厉”的精神使中华正直士人的一生是执着的一生、奋斗的一生。（赵彩花）

## 10. 女性交际善与同

如果常常留心招聘启事的话,会发现很多公司,尤其是一些跨国公司会在招聘要求中注明,应聘者须具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的确,随着社会和科技的高速发展,那种独立完成、手工作坊式的工作方式几乎被完全淘汰,越来越多的课题和项目需要多人、多方甚至是跨国合作。在这种背景下,具备较高的交际与沟通能力,自然是员工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了。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想法都无法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别人怎么能够正确理解呢?

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女性所处的位置非常微妙,尤其是职位较高的领导者,或公司企业中的白领、金领女性更是如此。稍有不慎,她们便会陷入是非圈中,招来流言蜚语,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中国虽然正在快速的向现代化迈进,但是传统的以男子为中心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女性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如何处理与异性关系非常重要,既要保持紧密的工作联系,同时又要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这点上,或许《周易》的《同人》卦能给我们以某些有益的启示。

《同人》的卦形是䷌,下离(☲)上乾(☰)。从卦象分析,为异卦相叠。下离为火,为臣,为女;上乾为天,为君,为男。此卦象表明,君处其上,臣居其下,上下齐心,男女同心同德,所以卦名曰《同人》。从卦的结构看,除了六二为阴爻,其余都是阳爻。六二阴爻,九五阳爻,都是处于中正之位,符合天道自然,所以是一个吉利之卦。从人事的角度来看,此卦的结构是

一个比较特殊的人事结构图：六二阴爻，阴爻性柔顺，象征着女性；其余的都是阳爻，都具有刚健的本性，代表男性。五阳争护一阴，所以六二反而变为成卦之主。也就是说，在以刚健为主的环境中，六二却处位得正，阴爻处阴位，能够与其他爻位的阳爻和谐相处，产生了一股阴阳和谐而相互吸引的强大的向心力，从而形成了同心同德的局面。卦辞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意思是，具有相同目标的人聚集在野外，是吉利的。利于渡过大河，有利于君子的占卜。具有相同志向的人聚集在一起，预示着他们将要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三人同心，其利断金”，所以这自然是吉利的征兆，对于君子的卜问有利。一个组织中，无论男女，只要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劲往一处使，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对于工作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彖辞揭示这段话主旨的时候说：“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从人事角度分析，这里强调了女性要得位，即要把自己摆在合适的位置上，既不能妄自菲薄，又不能恃宠横行。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女性留下美名，汉明帝的马皇后就是其中一个。马皇后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从小聪明好学，喜欢诗书。根据史书记载，她尤其喜欢《周易》，也经常诵读《春秋》、《楚辞》。马皇后性情和善，被封皇后之前，就已经在后宫享有很高的声名；当了皇后以后，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虽然贵为国母，却穿着朴素，衣服都不加花边，当时传为美谈。汉明帝死后，肃宗继位，马皇后被尊为太后，地位极为尊崇，但她却更为谨慎，尤其对自己的亲戚严加管束，多次拒绝皇帝给他们的加封赏赐。她的弟弟身为国舅，对国事勤勤恳恳，但在太后的干预之下，连正常的升迁都很少。她对亲属如此严厉，连皇帝都看不下去了，便出面为他们求



情。最后,她的几个弟弟在她的劝说之下归家不参与国事。在男子为中心的世界中,马皇后贵为母仪天下的皇后、太后,具有崇高的地位,按说,她化权力为利益,为自己的亲戚谋一些特殊待遇,又有谁敢说个“不”呢?但是,马皇后却始终小心谨慎,严格要求自己 and 身边的人,谨慎地处理和周边的人的关系。根据当时的记载,她在后宫中“傍接同列,礼则修备,上下安之”。意思是说,她和各方面的关系都处得非常好,上上下下的人没有不说她好的,从而形成了后宫、甚至是朝廷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马皇后获得这样的美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对自己的位置有着清醒的认识,虽然已经有很高的地位,但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横祸,前代已经有吕后专权等后宫干政导致满门被灭的教训,所以她时刻提醒自己要注意言行,不要重蹈吕后覆辙。马皇后能有这样的见识,正是和她喜欢读《周易》,吸取了里边的人生哲理有关。

女性对自己位置具有清醒的认识只是一个方面。如同彖辞里所讲的,女性不仅要“得乎中”,还要“应乎乾”。我们知道,乾是刚性的象征,在《同人》卦中,乾居上位,起主导作用;尤其位处九五的阳爻,更是阳处中正之位,具有君王之象,是全卦的主宰。六二的阴爻尽管已经处位得当,具有中且正的美德,但还是必须与君位的九五相应,得到强有力的支持,阴柔之美与阳刚之气相互协调,共鸣和谐,才能取得大吉大利。同样的,在公司也好,在组织也好,一个人再有才能,如果没有别人尤其是强有力人的支持,也很难发挥才干。武则天应该算是历史上很有才干和最有权力欲望的女性之一了,她原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官宦人家的小姐,之所以能有后来登基称帝的伟业,与唐太宗和唐高宗的纵容和支持分不开。她善于领

悟皇帝的旨意，故此深得宠幸。据说，唐太宗临崩的时候，对武则天很不放心，担心自己百年之后，武则天会祸乱江山。于是就问侍候在病榻之前的武则天：“朕百年之后，你如何自处呢？”意思是想让武则天也殉葬。武则天何其聪明，怎么会不明白唐太宗的心思呢？她毫不迟疑的答道：“陛下若万一不幸，妾愿出家为尼，为陛下祈福。”回答得何等妥贴，唐太宗于是就准许她出家，免于赐死。但是武则天后来还是凭借着唐高宗的支持，一步步把持了朝政；虽然高宗后来想除掉她，但是已经养虎遗患，无力回天了。

作为女性来说，与人相互交往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握有实权的人物。但凡事都有度，如若交往过分，同样会招致不好的结果。《同人》六二爻辞说：“同人于宗，吝。”宗，根据王弼的解释，即宗主，指本卦的主导之爻位，即九五阳爻。意思是说，如果仅仅与宗主之爻和同，眼睛中只有君王领导，同样也会有弊病。六二与九五相互配合，无疑是有好处的，但是若过分与领导亲近，只走上层路线，疏远了其他的同事，就会给人留下逢迎拍马之嫌，而且作为女性，还会有一些闲言碎语缠身。旧上海著名的影星阮玲玉就是因为不堪忍受流言蜚语所以选择了自杀，留下了“人言可畏”的控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把握一定的分寸。

在现代社会中，女性的作用正日益显著，越来越多的比较高的职位开始有女性涉足；但在总体上看，仍然是男性占据多数，尤其随着职位的递增，女性的人数呈递减的趋势。所以，女性要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广泛地结识同事，团结同心也非常重要。《同人》卦初九爻辞说：“同人于门，无咎。”象辞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意思是说，如果能够走出自己

的狭小天地,与周围的人广泛结交,具有相同的志趣,对于事业是大有裨益的。其实,这话不仅对“白领”、“金领”女性有启发,就是对与女性交往的另一半边天的男性,同样也是金玉良言。

(章 原)

## 五、事业篇

### 1. 君子宜有所不为

台湾学者蔡志忠先生有收藏佛像的爱好。他收藏佛像有一个特点,只收藏铜佛,其他如木刻的、石雕的、泥塑的佛像则一概舍弃。这么做,和什么佛像都收藏的人琳琅满室相比,不免显得单调、贫乏。但是,事实证明了蔡先生的选择是十分正确的。他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收藏了 1000 多尊铜佛;到现在,已收藏了数千尊。特别是他所收藏的中国宋、元、明、清的佛像,堪称世界一流水平。而很多收藏家花十几年、几十年,也没有取得他这么大的成绩。蔡先生成功的秘诀在于“有所不为”。他敢于舍弃其他种类的佛像,才使他的财力、心力发挥了最大的效益。如果没有做出“不为”与“有为”的选择,而是漫无目标地收藏,很可能会各种收藏都不精,难以成为一流的收藏家。所以说,一个成功的人,必须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仅要精于取,而且要善于舍。

战国时,孟子有一句名言:“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如果我们考察这句话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屯》卦六三说:“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

如舍，往吝。”“即”，就，意为追逐或捕捉。“虞”，虞人，古代负责管理山泽的官吏。“几”，动之微，指事物细微变化的迹象。该爻辞说，猎取山鹿，如果没有虞人在前面作向导，就会迷失在茫茫林海中，一无所获；君子应当见机行事，遇到这种情况不如舍弃追捕。如果固执冒进，必然会有凶险，留下遗憾。“即鹿无虞”，不妨作为寓言来看。它告诫人们，在关键时刻，要权衡利弊，果断取舍；如果一味追逐眼前的利益，很可能陷入困境，惹出很大的麻烦。如汉代末年，外戚何进为大将军，他为了驱逐宦官集团，决定召集董卓等割据各地的军阀率兵进京，当时陈琳（何进的主簿，“建安七子”之一）就引《屯》卦六三的“即鹿无虞”加以劝阻。陈琳认为，何进这么做，是不明形势：急躁冒进，引狼入室，一定会带来大的灾难。何进在朝独断专行，根本听不进忠言，终于身死族灭，天下大乱。事见《三国志·陈琳传》。对照历史，可见《屯》卦六三所言的“往吝”，说是遇到了令人悔恨莫及之事，绝非唬人的虚言。

“逐鹿中原”，“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惟刘氏（刘邦）得之”。在汉语言文化环境里，“鹿”早已成了“江山”的代名词。如果鹿指代江山，那么，看守山林的虞官应该是比喻熟悉内情的向导，也就是深谙韬略的军师了。山鹿逃入深山密林，最好莫再追击。好猎手如果没有虞人的帮助，尚且不敢冒失行事；打江山、坐江山的人，不得贤人的辅佐能成功吗？再说，江山是神器，本非人人能取，轻举妄动只能失败。历史上有多少权倾朝野、威震君主的大臣觊觎神器，只往前多走了一小步，就落了个身死族灭的下场。倒是曹操等极少数大臣头脑聪明，把皇袍当作衬衣穿，取其实而不要其名，非仅“无吝”，而且“大吉”，为后来的魏朝开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今天看来,若把“鹿”的内涵无限扩大,看作人们普遍追逐的对象,那么它可以指功名、权势、富贵、金钱、美女乃至事业等等。这样,“即鹿无虞”,即舍与取,不为与有为的矛盾统一问题对现实就很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所谓舍与取,不为与有为,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不要不分主次、不分轻重,胡子眉毛一把抓;要抓中心、抓关键,在统揽全局、权衡利弊的情况下,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突出重点。

我们知道,人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常有限的,而工作、事情总是做不完的,千头万绪,复杂纷纭。人在一切工作中,想什么都去做,那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有害的。如果这样,必然整天忙忙碌碌,身心疲惫,该做的事没做好,又搞垮了身体。尤其是不要做不该做的事,“勿以恶小而为之”,以免劳而无功或贻害无穷。“联合利华”前首席执行官佛罗里斯·梅尔杰斯说:“在每个方面都杰出,不是一个可行的目标,要懂得自己不需要什么”。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不会“舍”就不善于“取”;无所不为,反而可能无所作为,因为企望“样样精”,大多会发展成为“样样松”。仍以收藏为例,如果只会取,不会舍,所取虽多,但取得不精。这是因为,如果人双手抓满了很多不见得那么需要的东西,一旦碰到真正喜欢、真正需要的东西时,他不是茫然错失良机,就是力不从心,根本没有多余的手去抓新的东西了。而懂得舍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两手空空,但是,一旦碰上他真正喜欢、真正需要的东西时,他就可以全力以赴地把它抓到手,加以牢牢的把握。可见,学会舍弃,有所不为,实在是学习、工作的一条重要的方法。运用得好,可以提高学习、工作效率,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尤其是刚刚走上领导岗位的年轻同志,工作方法非常重要。首先,在比较充分的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对全盘工作要有整体思路,找出工作的关键环节,掌握主动权。对该管的要管好,该放手的要放手,以避免四面出击、八方应付的被动局面。有时,中心环节抓对了,有重大突破,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进而取得全盘性的胜利。其次,事情有轻重缓急,要有阶段性的设想。有为与不为是相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情况的变化,矛盾的转化,中心工作也在转移。前一阶段无为,这一阶段很可能需要有为,需要真抓实干。那种“盲人骑瞎马”似的瞎指挥、乱弹琴,容易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害了单位,也害了自己。

对一个单位来说,也是如此。许多名牌企业做到了“不求样样有,但求一样精”,根据自己的实力,选择最能充分发挥自己特长的领域,形成“你无我有,你有我廉,你廉我优,你优我新,你新我特”的相对优势。多数知名企业能做到非擅长的领域“不为”。如美国通用电器公司规定了这样一个经营标准:如果某一产品在同行业里进不到前三名,就要把它卖掉。在价值链上,对处于价值最低的环节“不为”,而对价值高、自己又相对占有优势的产品,则做大、做强,这也是“有所不为而有所为”的一种表现。再如世界著名的体育用品制造商耐克公司,它在耐克鞋的生产中,只生产其中最关键的产品部分——耐克鞋的气垫系统,而其余的业务均由外部供应商提供,公司集中主要力量专攻附加值最高的设计和营销。这种经营策略,现在已被许多企业学习和运用。如我国的山东时风集团规定,凡是外单位比自己生产成本低的产品,一律不生产;而把资金和技术力量集中用于生产自己有一定优势的零部件和工序上,以达到规模生产和降低成本的目的。由此可见,“不为”是为了避己之短,“有为”是为了扬我之长。为了把有限的

人力、财力、资源集中在自己的某一两个强项上,使其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产生最大的名牌效益和经济效益,就需要忍痛割爱,需要非凡的胆略和气魄。真正做到“无为”,才能更好地“有为”。一个高校也是这样,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人才教育、师资培养、重点学科建设等方面,在这些方面要积极有为,形成特色和优势;而对校办企业、附属医院、中小学等,实行“无为”,把它们推向市场,让它们参与社会竞争,自负盈亏。

在市场经济下,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也应当做到有所不为而有所为。对于政府来说,凡是市场能办得到,自己又包办不了、也干不好的,就要“无为”,不进行过多的干涉;凡是市场办不到或办不好的,就必须予以管理和调控,要积极“有为”。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指导我国推进国有企业跨世纪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该《决定》在谈到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时,就提到“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可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改组国有企业,有着重要意义。

所以,从《周易》中我们获得了宝贵的启示:认清自己,审时度势,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是人生事业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  
(王启才)

## 2. 怎样做个能干兵

史书记载: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在洛阳的南宫摆下酒宴招待群臣。酒酣耳热之际,刘邦问群臣:“各位诸侯,各位将军,你们不要欺瞒,尽管告诉我实情。你们说,我为什么会

得到天下？项羽为什么会失掉天下呢？”大臣高起、王陵两个人站起来大声说：“您派人攻打城池、占领土地，在得到那些城池、土地之后，就封赏有功的人，这叫做与天下利益均沾。因此跟随您打天下的人，一个个在战斗中拼命效力，为的是日后论功行赏，这是你得到天下的原因。而项羽就不同了。他嫉贤妒能，打仗有功他陷害你，贤能的人他猜忌你。并且打仗有功他也不论功行赏，不肯分封有功劳的人，所以，在项羽的手下，打仗都不肯出力。这就是项羽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遥远的后方运用谋略，策划行动，或是制订作战计划，就能够决定千里之外战争的胜负方面，我不如张良；在稳定国家后方、安抚百姓、保证后勤供应能够源源不断为前方作战部队输送粮草，使其不至于匮乏方面，我赶不上萧何；而在统率百万大军，指挥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方面，我比不上韩信。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够诚恳地信任、任用他们，因此得到他们的鼎力相助，这是我得到天下的原因。而那项羽，只有一个谋臣范增，可项羽在每件事上都怀疑他的忠诚，不能放心大胆地任用他。项羽这样做，就没有一个人真心帮助他打天下。这是他终于被我打败的原因。”群臣听刘邦这样说，一个个都心悦诚服。

能够任用贤才，确实是刘邦打败项羽的主要原因。但我们看待任何事物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能用人固然是一个方面，人才能否脱颖而出且被完美运用则又是一个方面。这就涉及到君臣关系和谐这一问题了。试把刘邦的谋臣张良与项羽的谋臣范增做一个比较，可以见出这里大有文章。

刘邦初入咸阳，见珍宝美女而心有所动，想要据为己有，

樊哙谏说,刘邦不听,张良于是谏刘邦道:“秦朝无道,天下人都背叛了它,所以您才得以顺利地进占咸阳。您要想为天下除去暴虐,就应该与秦朝相反,这样天下人才能心悦诚服。现在您刚入咸阳就这样贪图安乐,这不是‘助纣为虐’吗?岂不让天下人寒心?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希望大王能采纳樊哙的意见。”樊哙一介武夫,出言无状,所以刘邦听不进去。而张良则晓之以理,导之以利,动之以情。刘邦的最终目的是要得天下,不能只图眼前这点小利;不是不能享受这些珍宝美女,只是还没到时候。这是樊哙的本意,但他说不明白。而张良一开口,就算刘邦再糊涂,也明白了道理,而且说得那么入耳,想不听都不行。

又,汉王三年,项羽围攻刘邦甚急,于是酈食其为刘邦出谋划策,要封六国后人来笼络民心,并以此使项羽屈服。这样做肯定会加剧封建割据,不利于统一,同时涣散天下人的心,而刘邦却听信了,并且决定实行。但是经过张良给他进行一番分析之后,正在吃饭的刘邦急得把嘴里的饭都吐出来了,马上下令把铸好的六国印销毁。刘邦之所以马上听从了张良的意见,不仅因为张良的分析在理,而且与他的进谏方式有关。一句“谁为陛下画此计”,把刘邦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说白了,刘邦听酈食其的话,主要是因为自己目光短浅,就像他把守潼关,招来鸿门宴大险一样,是缺乏远见的表现。但如果张良不问三七二十一,一上来就把刘邦痛斥一番,也许就没有这个效果了。

反过来再看范增。鸿门宴,范增看出刘邦的野心不小,意在争夺天下,就劝项羽杀掉刘邦。当他看出项羽被刘邦蒙蔽,不想杀刘邦时,就干脆自作主张,找项庄,借舞剑之机,杀掉刘



邦,但又因项伯作梗而没能达到目的。后来刘邦从小路逃回霸上,留下张良献璧于项羽,献玉斗于范增。范增当众摔碎玉斗,呵斥项羽是“竖子不足为谋”,并说“吾属今为沛公虏矣!”意思说:这小子没出息,不值得给你出谋划策。现在让你杀刘邦,你不听,以后你肯定要被刘邦俘虏。这让项羽十分难堪。想那项羽是什么人物,他一向自视很高,力能举鼎,年少得志,就连自刎乌江的时候,都不承认是自己的失败,说:“这是老天要亡我,不是我不会打仗。”你这样当面斥责,他心里能舒服吗?正因为范增一次次斥责项羽,让项羽心生不满,所以陈平行反间计,离间项羽与范增的关系,一招得手。当此之时,以范增的情况,他应该知道项羽的为人,他本应该积极为自己辩解,但他却愤愤然说:“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乞骸骨归。”撒手不问,走了。但毕竟心里不平,走到彭城,发疽疮而死。实在是君臣两悲!

对比张良与范增,自不难看出二人的区别。论智谋,范增不弱于张良,就从《史记》、《汉书》所记载的零星资料来看,范增其人也称得上足智多谋,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如果项羽能悉从其计,则刘邦虽不败于项羽之手,也不可能这样轻而易举地打败项羽而一统天下。这是项羽的悲剧,也是范增的悲剧;责任在项羽,也在范增。如果他能像张良对刘邦那样去引导项羽,则事情或不至于此。可见,虽然同为能臣,但其结果却不一样。作为臣下、部下,才能固然重要,但如何去处理与君王、与上级的关系,以便更好发挥才能的有效性,也十分重要。这也就是一个如何作下属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古老的《周易》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不处于阴、阳对立之

中。尽管从“扶阳抑阴”的观念出发,《周易》对“阳”多赞誉之词,但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周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阴阳和谐”。把这种阴阳和谐的观念运用于处理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也颇为合适。阳刚代表君或上级,阴柔代表臣或下级。从这个角度来说,《周易》中有以下诸卦谈到如何作下属的问题:《坤》、《睽》、《离》、《晋》、《鼎》等诸卦。《坤》卦《文言》就说:“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晋》卦彖辞说:“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睽》、《鼎》卦彖辞都说道:“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也就是说,臣下要从大局出发,来为君主、上级出谋划策,君臣相得,上下和谐,目标一致,才能成就大事。

综合以上诸卦,我们不难看出,《周易》在处理君臣关系上,要求臣要柔、要顺,要与君王和其德;但同时要正,即所谓的“得中”。只一味柔顺而不正,是佞臣,是谄臣;光有正,却不能“柔进而上行”,是谏臣,是诤臣。佞臣、谄臣固不足道,但谏臣、诤臣也要考虑进谏的方法和策略。你想去做魏徵,但天下又有几个唐太宗呢?唐太宗在急了的时候,不也愤愤地说要把魏徵这个老头给杀掉吗?所以最上等的臣下应该做辅臣。辅臣立过大功,甚至救过君主的命或挽救过国家的命,因而不但在诸位同僚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与君主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他们是君臣,也是朋友,如刘备与诸葛亮一样的鱼水关系。

这样说来,范增可以算得上是谏臣、诤臣之类,有远见卓识,知道君王犯的是什么错;给却不给君王留面子,结果好心办坏事,还有可能连自己的老命也搭上了。而张良则是辅臣,知道君主错了,但不是直奔主题,而是先兜上一圈子,替君王

设计好几套方案,搭好梯子让君王下来,既收回了错误决策,避免了不利的后果,又保全了君王的面子,一团和气地解决了问题。

如何处理好上下级关系,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尤其对于那些刚刚走出校门、踏上工作岗位的人。要让他们知道:社会与学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学校,你可以不去注意人际关系,尤其是上下级关系,但在社会不行。在现代社会,上下级的关系虽不再是古代的那种君臣关系,但道理还是一个样,两者具有许多共通之处,有许多地方仍值得我们借鉴。本着《周易》所提倡的“柔”、“正”这两大原则去处理上下级关系,尤其是当你面对一个能力比你弱的上司,你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子,做到支持而不虚伪,建议而不代办,深思而不贪功。总之,应该处处注意以诚感人,以诚服人,以诚取信于人,用真诚赢得上司的信任,用真诚消除与上司的感情距离。要做张良,不要做范增,让你的才华成为你实现理想的武器与阶梯,而不要成为你的桎梏与绊脚石。(曹建国)

### 3. 人间沧桑循正道

当今,“与时俱进”四字随着我国领导人的大力提倡,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指导了人们前进。纵观宇宙自然,抑或社会人事,“沧海桑田”,运动变化是永恒的。因此,“与时俱进”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在“与时俱进”时,如何变、如何进,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代的步调保持一致呢?最主要的是应该有坚定正确的立场,也即如《周易》所提倡的保持“元亨利贞”的贞正之道。如果变

不以其正,则将被物欲横流所淹没;甚至有的人在国家民族危难关头丧失民族气节,成为历史垃圾而遭千秋万代唾骂。变而能持正,则可能成为民族英雄,永远为后人所敬仰。

《周易》认为天有“元、亨、利、贞”四种品质。其中“贞”即纯正而执着,《文言传》说它是“事之干也”,“贞固足以干事”。事物得天地之正气而生,依正道而成,这就是《乾》卦之“贞”德。扩而大之,人的立身处世,也要坚守正道。《周易》极其重视“贞”的品质。认为不管处在什么位置,不管处在顺境还是逆境,都是“利贞”,有利于坚持正道者。能坚持正道,则处顺境者不会“亢龙有悔”,能持续地顺利发展;处逆境者则能依靠它走出困难境地,有心病者才能解惑释疑,达到自己所追求的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恬静境地。

虽然人人都知道要走正道,但人类历史留下了极多不走正道、或因偶尔迷糊而悔恨终生者的事例。这说明把坚守正道的理念贯彻于具体操作中,其中困难重重。晋代文学家潘岳一生遭际便印证了这一点。潘岳生于三国魏齐王芳正始八年(247),卒于晋惠帝永康元年(300)。他年少时便“总角辩慧,摘藻清艳”,被乡里称为“奇童”。长大后更是才华出众,高步一时。公元268年,晋武帝耕籍田,潘岳作了一篇《籍田赋》,文采富丽,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年少名高,出身官宦世家,得意的仕宦人生已经在向他招手。但他似乎生不逢时,朝廷先有贾充、荀勖等一党与庾纯、裴楷等另一党结怨很深,后有杨骏集团与贾氏集团的殊死搏斗,他一涉仕途,必归入为此党或彼党。潘岳在朋党的夹缝中沉沦下僚二十多年。孔子曾讲过,生逢乱世,而能平步青云,那很可耻,肯定是以出卖人格得来的。从潘岳多年不得志,可以看出他一直持守清操。也

许是朝廷的朋党斗争太久了,黑暗见得太多,潘岳已经对何谓正道模糊不清;也许是认识到多年持身守正,结果是仕途蹭蹬;或许是其他;总之,在公元291年,潘岳“开窍”了,认识到“匪择木以栖集,鲜林焚而鸟存”,他要“择木而栖”,找一个好主子、硬靠山。当时痴呆无能的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在朝廷弄权,她的侄子贾谧野心勃勃,铲除杨骏集团后,贾氏集团左右朝政。于是潘岳选择了贾氏这棵大树,他自认为这是一条光明大道。之后,他很快被任命为长安令,且成为与贾谧来往密切的所谓“二十四友”之一。历史记载他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他与石崇望贾谧车马经过扬起的路尘而拜;他参预了贾后、贾谧废太子的密谋,并奉贾后之旨,仿照太子的口气作书;最后他因此被杀,同时株连三族。这离他做出“择木而栖”的决定不到十年。为了一时的飞黄腾达,他赔上身家性命,连同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不知潘岳在临刑之前,是否后悔先前的决定了呢?

潘岳临刑之前的心理活动,他并没有说出来,或者说了,当时人不屑去记载,而使它湮没不闻,后世之人只能做无端遐想。而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士钱谦益的悔恨却是记载确凿。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明崇祯帝自缢。五月,朱由崧由马士英拥至南京,称监国后不久又即皇帝位。钱谦益谄事马士英而被起用为礼部尚书,这是他人生的一大污点。第二年,清兵渡江,钱谦益又迎降,虽然他仕清只有五个月,便隐居不仕,此后还秘密联络、支持当时的抗清力量,始终与黄宗羲、吕留良等抗清志士及明遗民密切往还,并在诗文里表达自己沉痛自责,这都不能抵消他在历史重要关头所犯的错误。因迎降而丧失民族气节,成为他人生无法洗清的另一更大的污点。



风骨嶙嶙的气节,向来为中国人所看重;而在外族入侵之时,民族气节更是为人之大节。要是在这节骨眼上,立场不稳,卖国求荣,必定千夫所指,万劫不复。比如汪精卫伪政权即是如此。而文天祥则成为在国难当头时人应当怎样做的榜样。明知前往元营谈判凶多吉少,友人苦劝他不要去,文天祥认为,一则“百万生灵,立有鱼肉之忧……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二则“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三则“更欲一覩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为了将来的抗敌救国,终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后在狱中,元统治者以种种非人的折磨,想挫折他矢志不移的浩然正气;但是,漫长而惨苦的三年多狱中斗争,文天祥没有一次低下高贵的头,同时还写了大量慷慨悲壮的诗篇,激励当时与后世之人。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元世祖忽必烈召见文天祥,“文天祥入殿中,长揖不跪。左右强之拜跪,或以金挝其膝伤,公坚立不动。”当忽必烈表示愿意委以大任时,文天祥平静地答道:“愿予一死足矣!”第二日赴刑场,自觉无愧于国、无愧于民的文天祥心中坦然,从容问左右:“何为南方?”有人告诉了他,他便向南而拜,说:“臣报国至此矣”,慷慨就义,年仅四十七岁。当时燕京百姓,见者闻者无不下泪,即使千年以后的今天,遥想其风节,仍然可使“懦夫立”。

为国家为民族而展现的民族大节,为昭然之正道。在日常生活中,不损人利己,不假公肥私是正道,不做有损自己人格的事也是正道。一言以蔽之,凡事有利于真、善、美,或接近于真、善、美,都是正道。中国人都相信,走正道这种选择,与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受到的教育有很大关系。古代“孟母三迁”的故事清楚说明,假如孟子的母亲听任自己的儿子在不好的环境中成长,天天耳濡目染一些不好的事,孟子能成为有浩

然正气的人吗？俗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人不能沾染一丝一毫的坏习惯、坏思想，不然，面临正道的考验常常难以过关。

其实，知难行更难。真正实行正道，颇有难度。因为不同时代所谓“正道”的标准是变化的，而且不同层次、阶级的人，看法自然有异。《红楼梦》中贾宝玉不热衷当时人眼中的正道——举子业，被假正经的贾政老爷目为离经叛道。《牡丹亭》中迂腐可笑的陈最良老先生“非礼勿视”的高论是他自己认为的正道，但是年轻的小姐杜丽娘却难以接受。《儒林外史》中的陈玉辉鼓励女儿殉夫，经书上都说这是丈夫死后的女人的“正道”，虽然他也忍不住为失去女儿悲戚。这样，真正追求正道的人，常常被假“正道”所遏制、所打杀；还有许多真心信奉、以假“正道”为真正道的人，无意做了杀人者，葬送了自己应有的幸福。

上述正反事例，启人深长思考。我们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因时适变，与时俱进，认清正道，才能创造文明与幸福。具有坚守正道的信念并不难，难的是要能分清真、假正道，不要被赝品假货蒙蔽了眼睛，从而滑向了邪门歪道的深渊。真正以追求真、善、美之心，去追求《周易》的守“贞”持正之道，坚持不懈地贯彻实行，才能达到目标。总之：沧海桑田之间，自有人间正道。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决定于贞正之气的发扬。

（赵彩花）

#### 4. 坚持不懈才能赢

先从东汉末年吕布的事例说起。吕布，字奉先，东汉末五

原郡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人。据《三国志·魏书·吕布传》记载:“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吕布弓马娴熟,武艺高强。他起先投靠并州刺史、骑都尉丁原,为主簿,“大见亲待”。董卓作乱时,以利禄作诱饵,让他杀掉丁原,“布斩原首诣卓,卓以布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后来司徒王允密谋刺杀董卓,用重金交结吕布,于是他“手刃刺卓”,任奋威将军,进封温侯,与王允“共秉朝政”。李傕祸乱发生后,他战败投奔袁术,“术恶其反复,拒而不受”,于是向北方投靠袁绍,“绍忌患之”,又逃奔刘备,不久就反噬刘备,占据其城池。建安三年(198),在下邳为曹操擒获,低声下气,乞降求生。曹操正犹豫不决,刘备劝说:“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于是缢杀吕布。吕布见利忘义,轻信寡谋,如《周易》所说,因其“不恒其德”而“承羞”致亡。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是《恒卦》九三爻辞,意思是说,为人处世,如果盲目追求一己私利,二三其德,反复无常,丧失了做人的最起码的道德,必然会自招羞辱而遗憾终生。以上所举的吕布,就是极为典型的一例。其实,为人、处事,道理都是一样的。

1983年高考作文题目是一幅名为“这里没有水,再换个地方挖”的漫画,漫画的创作灵感可能来自《孟子》,书中有这样的一段:“有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它告诉人们,做事要持之以恒,反对浅尝辄止。《荀子·劝学》说得好:“……故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跬(kuǐ)步,半步。骐骥是千里马之类的良种马,弩马则是能力低劣的庸马。十驾,指

的是十天的路程。千里马再优秀，一跃不过十步之远；但是低劣的庸马只要走下去，则其必定达到预定的目的地。这个比喻，讲的就是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道理。可是，在《孟子》、《荀子》之前，《周易》中就有《恒》卦，主要讲做事要有恒心，如果缺乏恒心就难以成就大事这一道理的。《恒》的卦象是䷟，下巽三，上震三。其卦辞说：“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意思是说，《恒》卦象征恒久，亨通，没有咎害，利于守持正固，利于有所前往。彖传曰：“恒，久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分别从天地、日月、四时、圣人守恒方面，说明君子要效法天地自然，坚持操守；只有恒久不变，才能巩固自己的德性。因此，“君子以立不易方”（《恒》象辞）。“方”，道也。君子要守持恒久不变之道。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恒》卦以“恒”为名，其涵义可分为两方面：一是恒久不已，坚持不懈；一是恒久不易，守持正道不可须臾动摇。这两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养成美德，做成大事，都需要持之以恒，循序渐进；如果动摇、改变，可能会前功尽弃或功亏一篑。由此可见，人有恒心，有恒久的德性，才能担当大事，成就一番事业。

俗话说：“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有恒心、有意志者，即使开始条件非常艰苦，力量非常微弱，只要认准一个目标，咬定青山不放松，自强不息，发愤图强，就有可能成功。如春秋末年越王勾践被吴王阖闾打得大败，只好求降称臣；回国后，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化弱为强，“三千越甲定吞吴”，成为一代霸主。从文学史上看，优秀的作品多是创作者在逆境中发愤努力完成的。司

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总结说,传世的不朽之作,“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在李陵事件中忤触汉武帝而下天牢,但为了继续写作《史记》,他没有自杀,而是忍辱负重,宁受腐刑也要完成《史记》这一名山大业。其持之以恒的精神,正是《恒》卦精神的具体表现。

要真正做到持之以恒,并不容易。古人有“恒之道岂易言哉”的感慨。所以,《恒》卦主要从反面立论,说明缺乏恒心就难以成就大事,“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据《论语》记载,孔子读《恒》卦九三爻辞时,曾作了如下评论:“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从孔子鄙薄的语气可以推测出,缺乏恒心的人连“巫医”都做不成,更不用说成就一番事业了!此外,《恒》卦还要人注意避免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想一口吃个胖子,操之过急。《恒》初六爻辞“浚恒,贞凶,无攸利”,就是告诉人们,如果深求恒久之道,想一蹴而就,结果欲速则不达,只会有凶险而无利益。汉代京房的事例可以作为代表。汉元帝时,宦官石显任中书令,专权误国。京房以《易》卦阴阳之筮进谏元帝,劝他除掉石显;但又暗喻皇上是“危亡之君”。其言一出,语惊朝廷。京房由于没能审时度势,本想危言耸听打动皇上,求得信任,结果反被奸人投入大牢,被迫害致死。京房之谏,行为虽正,但急躁冒进,不合时宜,反而遭遇凶险。二是居位不当,劳而无功。《恒》九四爻辞说:“田无禽”。“田”,打猎。打猎不获禽兽,比喻有其事而无其功。象辞解释说:“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原来,九四徒劳无功,是因为他久居不当之位。从爻象、爻位分析看,九四居大臣之位,辅佐君王,责任重大;但他阳处阴位,居位不正,又居上卦之初,不能持中。阳爻不能守正持中,却一味地冒进,必然是为一己之私利;唯利是图,



必然反复无常,不择手段。这种人想永葆富贵而不失败,是不可能的。苏秦就是一例。苏秦是战国时洛阳人,据《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开始想帮助秦国打败东方六国,于是西行人关,以连横之术游说秦惠王,但秦王认为时机不成熟,没有采纳。说秦失败后,他穷困落魄,引锥刺股,发愤夜读,一年后到东方赵国鼓吹合纵之术,主张联合六国,共抗强秦。游说大获成功,挂六国相印,富贵无比。但此人为攫取富贵,一会儿连横,一会儿合纵,朝秦暮楚,反复无常,最后遇刺身亡,终于像打猎而“田无禽”,一无所获。三是躁动不安,或见异思迁。《恒》卦上六爻辞说:“振恒,凶。”意思是说,上六爻处于恒卦的终位,在恒道转变的关键时刻,应守位居静;如果不安其位,一味地振动躁进,物极必反,必然会背离恒久之道,结果不但无功,反而会带来凶险。东晋的桓温就是例证。桓温所在的时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比较尖锐,正处于宜静不宜动之时,应慰抚安静。但是,作为执政专权的大臣,他为了了一己私利,贸然进行第三次北伐,结果失败。据《晋书·桓温传》记载,桓温在东晋王朝中权倾朝野,威震君主,但他仍不满足,“以雄武专朝,窥觎非望”。他曾在中夜抚枕起叹:“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其野心勃勃,意在受禅。为了邀功固权,他在国家未振、形势窘迫之际,置朝廷上下的意见于不顾,率兵北伐,在枋头战役中,慕容暉军队八千铁骑追击,“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从此朝野震动,国家日趋衰亡。桓温功名未就,反受咎害,不久病死。所以,天下事躁动则难成,无恒则无功。为人处世,干工作,搞事业,如果这山望着那山高,摇摆不定,比如有的女同志,兴趣不断转移,今天学烹饪,明天学裁剪,后天又去学电脑、练打字,看人家做生意赚大钱,赶忙又下

海学生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时间很快过去，到老方觉一事无成。她们看到原来的同学同事或学业优秀，或事业有成，或发家致富，或成为出色的管理者，自己还在为人打工，定会羞愧不已！

对青年朋友来说，做学问也是这样。毛泽东曾有一副对联：“苟有恒，何须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莫过一日暴，十日寒。”只要认准一个目标，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终究学有所成。有学者说：“才能就是坚持不懈”。事实的确如此。恒心是达到目的地的最近通道，只要我们持久不断地努力，一定会迎来胜利的曙光。朋友们，坚持就是胜利！（王启才）

## 5. “另类”智慧作领导

在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中，刘邦是很特殊的一个“另类”。他文才不高，喜欢酗酒，好色贪财，品性也不怎么高尚。他和项羽争天下的时候，一次他打了败仗，在乱军之中坐着一辆马车仓皇逃窜，车上还有他的两个孩子。突然追兵出现，作为父亲的刘邦，为了保全自己，居然把自己的两个子女推下马车，以便让马跑得更快些。“虎毒尚不食子”，刘邦居然如此作为，其为人可见一斑了，难怪后世总有人称他为“无赖皇帝”。看来元代的散曲家睢景臣在杂剧中，将他描写为一个街头无赖，不是没有依据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才能平庸之人，居然能够指挥天下之士为他所用，在与“万人敌”项羽争霸之战中取得最终的胜利，开创汉代数百年江山，这不能不令人深思。细看刘邦的一生，不由感叹，刘邦其他方面或许稀松平常，但唯独在统治之术上称

得上大师级,正是这一点让他取得了天下。

在中国古代,统治之术又称御人之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领导的艺术。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俗话说得好,蛇无头不行。如何领导百姓,如何统治天下,先民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像传说中的尧舜禹,就是很有领导艺术的部落领导。《尚书》中保存的殷代盘庚,在迁都前后对臣民发表的演讲,已经恩威并施,掌握臣民的心理已经颇为巧妙纯熟。《周易》中的《临》卦,就是上古时期领导艺术的一个总结。《临》卦卦形是䷒,下兑☱,上坤☷。兑为泽,为水,属卑湿之所;坤为地,为土,具有包容一切的美德。两者结合,正是居高临下,君临臣子之象。象辞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意思是说,在上位者必须要爱护、包容百姓,要用教化的方式来治理天下。象辞所说,无疑是儒家“王道”思想的折射。王道也好,霸道也好,都是古代不同的统治方式,是领导艺术在不同场合的具体运用。

《临》卦中牵涉到的领导艺术很多,比如要用感化的方式、不能用花言巧语蒙骗百姓等,这些都是古代领导经验的总结,值得今天的领导者重视。其中,六四、六五爻辞所反映的思想,与刘邦的领导艺术关系比较密切,我们这里就着重从这个角度来探讨。

六四爻辞:“六四,至临,无咎。”意思是,领导者在必要的时候要事必躬亲,亲自到现场,这样对统治是有利无害的。这种策略即使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很平常。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某领导去某工地视察,某某领导亲临普通群众家访等。这种深入群众的方式,的确能起到促进双方交流、增强关系的作用。但是刘邦显然不是这种类型的领导,他走的是另

一条领导路线。六五爻辞：“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知”通“智”，指智慧。爻辞是说，真正聪明睿智的领导不必事事过问，而应当以智慧统领民众。刘邦的统治之术正是如此。刘邦一统天下后，在洛阳南宫大摆酒宴，与文武大臣共庆胜利。酒酣耳热之后，刘邦对大臣说：“你们大家说说，我为什么能够统一天下，而项羽为什么会失败呢？”有两个大臣高起、王陵就说：“陛下派人去攻城略地，战利品都给了有功之人；而项羽则妒贤嫉能，有功于他的人，他都要迫害，贤德之人他不能信任，为他取得胜仗的人，从他手里得不到什么好处。这就是陛下和项羽成败的原因吧。”刘邦哈哈大笑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比不上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军粮，不让后勤中断，我比不上萧何；带领百万军队，战必胜，攻必克，我比不上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之英杰啊，我能任用他们，就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啊。”刘邦的这番话，可说得上是肺腑之言。刘邦的天下，如果没有这批杰出的臣属，是无论如何也打不下来的。纵观刘邦与项羽争霸过程，刘邦很少有亲身冲杀的经历。荥阳大战，项羽围攻他的时候，曾向刘邦挑战，要和刘邦两个人单打独斗，一决胜负，免得天下百姓遭受生灵涂炭，刘邦一口就拒绝了。可见，他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论武艺，他无论如何不是项羽的对手；一些重大的谋略都赖于张良，而后勤供应则全是萧何在操劳。然而，就是这看似无能的刘邦，却能够让“三杰”为他所用，死心塌地为他出生入死。刘邦的“知临”之术可谓高矣。

《临》卦六五是阴爻以柔居尊位，貌似无为，但却暗含着大有所为。从这个角度说，刘邦的御人之术颇得道家“清静无为”的宗旨。韩信后来功高盖世，野心膨胀，被刘邦所擒，削为

淮阴侯。刘邦曾经与韩信闲聊,问韩信:“如果带兵打仗,我能够统领多少兵马?”韩信说:“陛下只能率领十万。”刘邦又问:“那你呢,能统领多少?”韩信说:“我统领的兵马越多越好。”刘邦大笑说:“越多越好,那你怎么被我擒住了呢?”韩信说:“陛下不擅长带兵,但是善于指挥大将。”韩信此言,或许有奉承的成分,但的确道出了刘邦的优势所在。

作为领导,尤其是统领全局的领导,不一定要对每个角落的细枝末节都有详细的了解,但是一定要知人善任,适当授权,以众智为己智,善取下级之智慧来为己所用,因时应变地运用恰当的领导智慧来把握全局。刘邦虽无千里马之才,但却有伯乐之眼,这在一件事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刘邦病重的时候,吕后问他:“陛下百年之后,萧相国如果也不在了,谁来接替他呢?”刘邦说:“可以让曹参接替。”吕后又问曹参之后谁来接替,刘邦说:“王陵可以,但是他有些憨直,需要陈平来辅佐他;陈平很有才智,但是独自难以担当。周勃为人厚道少文采,但是将来安定刘氏江山的必定是周勃,可让他担任太尉的官职。”吕后又问周勃以后该是谁,刘邦说:“以后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从这段对话上,可以清楚看出,刘邦对于部下的优点与缺点了如指掌,而且眼光长远,已经预见到自己死了以后,天下会有纷乱,而能够安定天下的必然是周勃。后来局势的发展果然如刘邦所料。他死之后,指定的人选相继接任,都能兢兢业业,辅佐刘家江山,没有大过失。在后来诸吕专权作乱之时,也正是周勃平定了叛乱。刘邦看人眼光之准,不能不令人钦服。

《临》卦六五象辞说:“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意思是说,运用智慧来统领民众的人,是奉行中道的。如果发现犯了错



误,就要及时更正。刘邦在这点上很有大人之量,胸襟开阔,知错能改。回顾他的政治生涯,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例如当他进军关中后,咸阳豪华的宫殿楼阁,后宫奢侈的享受让他不禁怦然心动,就打算在此居住。这时,张良和樊哙苦谏,让他以天下为重,现在还不是贪图享受的时候。尽管内心恋恋不舍,但是刘邦还是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将秦朝的珠宝财物都封存,还军霸上,与关中百姓订立了著名的约法三章,从而获取了民心,为夺取天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点非常重要,项羽的谋士范增当时就对项羽说过:“刘邦在山东之时,贪财好色,但是这次居然财物一点也没有贪,也没有收罗美女。看来他的志向可不小啊。”范增所料不错。其实,刘邦贪财好色的本性可没有变,只是因为他有几个好帮手,而且他也肯听从他们的建议。

中国历史上的领导艺术可谓多矣。《临》卦的领导思想和刘邦的领导艺术,虽然久远,但对于现在的领导来说,借鉴作用不可小视。

(章 原)

## 6. 柔弱也能胜刚强

柔弱包含柔软、微小、幼稚等内涵,刚强包含坚硬、庞大、好强等内涵。《周易》所谓“柔弱也能胜刚强”,大致有这么几层意思:一是以包容、清静、不争的心态对待事物,最终能取得完满的结果。《坤》卦所描绘的即是这方面的内容。该卦主张要像大地一样包容、广阔,以宽厚的德行负载万物。它柔顺地遵循天的法则,安静地谨言慎行,追随而不超越,包容而不排斥,具备至柔的性格;但它以自己的包容与不争,使大地上的

万事万物有着和谐、完美的发展。二是对待具体的人生事务、平常的为人风格,应该谦虚、谨慎。《谦》卦集中体现了这种精神。三是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落死亡的过程。新生事物在最初的时候,虽然弱小、幼稚,但从发展过程看,如果善于保护新生的弱小幼苗的茁壮成长,则它最终能战胜其强大的对立面,这就是柔弱也能胜刚强的体现;同时,它在弱小的时候,采用“潜龙勿用”(潜藏生存而等待时机)、“括囊无咎”(紧束袋口,谨慎小心,免遭咎害)的斗争方式,根据敌我实力的悬殊,注意保存自己,积攒力量,这种示敌以弱的方式给自己赢得了发展的时间与空间,这也是柔弱也能胜刚强的表现。

自然以及社会人生中无数的事例,一次又一次地印证了“柔弱也能胜刚强”的哲理。老子曾经指出,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着柔弱胜刚强的实例。他以“天下莫柔弱于水”为例,水随物赋形,可说是最为柔弱的东西了;但它斩不断、烧不烂,可以养育生物,浮载重物;它可以滴破石头,穿越陵谷,虽曲折万变,而无物可改变它,终不失其为水的品质。空气、阳光都是至柔之物,却可使至坚之物变形、退色、瓦解,这正是“柔弱能胜刚强”的表现。

人类社会中这种例子也不胜枚举。周文王、晋文公、越王勾践都是以柔弱的姿态误导敌人,而最终战胜了强敌。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后,纣王杀了文王的儿子伯邑考,做成肉汤送给他喝,文王知道纣王以此试探他的态度,于是将肉汤喝了下去。被释放之后,他表面顺从纣王,进献了大量美女、珍宝,使纣王大为高兴,他暗地里加紧召集贤能,筹集物资,为灭商做准备。最终有牧野之战、武王灭商之举。晋楚争霸,晋文公为

了报答流亡时楚王礼遇,也为了避其锋芒,在两军相遇时命令部队退避三舍。楚军在毫无抵抗的前进中趾高气扬,松懈了斗志;而晋军却为对方的无礼激怒,同仇敌忾,结果大败楚军。越王勾践被吴王打败后,本来吴可以一举灭了越国,杀其君臣;但勾践卑辞甘言,请身为臣,被吴王放了回来。回越国后,他卧薪尝胆,改革政治,信用贤能,关心百姓疾苦,终于转弱为强,乘吴与晋争霸之机,灭了当年可以轻而易举消灭自己的吴国。这几个例子都表明,弱小者在力量微弱的时候,要善于示弱以保存自己、发展自己,最后必能取得胜利。

柔弱方有时也可以明白地把自己的弱点、弱势暴露给对手,使对手于疑惑中不敢轻举妄动,从而达到争取时间或吓退敌人的目的。典型事例如《三国演义》中描绘的诸葛亮的“空城计”。因为街亭新失,诸葛亮把身边的兵马都调去应对险情,当飞马来报司马懿带领十五万大军往诸葛亮所在的西城而来时,诸葛亮身边并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和二千五百名士兵在城中。敌我力量的悬殊使大家不知如何应变,这时诸葛亮吩咐:“诸将各守城铺,如有妄行出入,及高声言语者,立斩;大开四门,每一门上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如魏兵到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

诸葛亮自己则“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城里四门大开,百姓生活秩序井然,诸葛亮又在城头示以闲情逸致,倒使司马懿警惕躊躇起来,认为:“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天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汝辈岂知?宜速退。”于是,司马懿带兵离去。诸葛亮以示弱、示无戒备的方式退了强敌。

在政治运作上,也宜适当采用柔弱的手段。秦始皇统一

天下后,人们已经厌倦战争,像干枯的禾苗急需甘霖般地渴望抚恤与安宁。但秦始皇继续对人们实行严刑峻法的统治,同时大肆征用民丁,修筑长城,兴建阿房宫。不堪重负的人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强大的秦朝就在这星星点点毫不起眼的反抗中崩溃了。刘邦建立汉朝后,采用休养生息的政策,人们得以重建家园、组织生产。这一段时期,便成了可歌可颂的历史清明期。西汉初物质贫乏的程度,连皇帝坐车找颜色相同的四匹马来拉车都找不到,公卿将相只能坐牛车,老百姓缺衣少食甚至饥饿而死是普遍现象;但人们毫无怨言地忍受,没有一个起来暴动,甚至对朝廷的清静无为政策大唱赞歌。假如秦始皇地下有灵的话,他会惊诧刘邦的柔弱政策,怎么效果远胜过自己的强硬手段呢?

也许,人们颇难理解,长篇小说《飘》中桀骜不逊的白瑞德,何以会无比崇敬柔弱、苍白的韩媚兰?勇于进取、长于应变的郝思嘉,何以一往情深于窝囊无用的贵族青年?但只要观照日常生活,我们从脾气火爆的丈夫常常在柔弱的妻子前俯首帖耳,便能明白《飘》这部作品并非脱离生活,生活中的确存在着许多有关柔弱与刚强的有趣关系的实例。领导者一般都是不愠不火,他的干将倒有的风风火火;有钱人不爱摆阔,没钱人倒爱充富;富人瘦,穷人胖;和气者生财,好斗者倒霉。现今电视剧《小燕子》、《铁嘴铜牙纪晓岚》风靡大江南北,其中幼稚、弱小者以智慧、勇气对抗强大者并取得胜利,看了着实让人痛快。在这些人物的对抗中,还蕴含着一个原则,那就是柔弱不等于弱,不等于毫无反抗力;柔弱是圆中带方,柔中有刚,弱中包含着强大的生命力。这就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周易》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赵彩花)

## 7. 得意之时莫忘形

《宋史》记载,宋太祖知道处士王昭素很有学问德行,就请他到国子监做博士,以便向他随时请教,当时王昭素已经是七十多岁了。王昭素到国子监上任不久,宋太祖就让他讲《周易》,当讲到《乾》九五“飞龙在天”时,宋太祖就问王昭素,“飞龙在天”乃人君之象,按说一般人是占不到这一卦象的,为什么世俗的一般人有时也会占得这一卦象?王昭素就巧妙地回答说,没有关系,当皇上占到这一卦象时,“飞龙在天”是指陛下您,而我们臣子则是“利见大人”。这里王昭素巧妙地把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二句拆开分别来讲,并把“利于大人大展才华”的“见(现)”解释为“看见”,躲过了一场灾祸,体现了他的机智,说明了他不是一个腐儒。接下来,王昭素就利用这一爻给宋太祖讲做君王的道理。他引了许多古代君王的例子,暗中却寓含着讽谏,因为他知道宋太祖有点得意忘形。宋太祖也听明白了他的意思,知道他是一片苦心,心中既惭愧又高兴。于是又问他养生之道。王昭素就回答道:“治民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意思说,挂虑治理天下的方法,不如从爱护、体恤百姓做起;留心养生之道,不如先抑制自己的奢欲。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则国家自然安定;奢欲是腐蚀身体的毒药,奢欲少了,则身体自然安康。宋太祖听了十分高兴,就把王昭素的这句话写在屏风上,以便时时警醒自己。

诚然,“飞龙在天”是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像一条蓄足了劲的巨龙,一飞冲天,翱翔太空,占据了无限的活动空间,居高临



下,得以尽情施展才能与抱负。但是,请你不要忘掉当初要达到这一人生佳境所付出的艰辛。初九“潜龙勿用”,你跟平常人没有什么差别,甚至看上去连平常人都不如。韩信为汉将,统领百万雄兵,留下“韩信用兵,多多益善”的佳话。但在此之前呢?他可以说困苦劳顿,狼狈不堪,饭都吃不上。于是常常在别人家里寄食,母亲死了也无力安葬。他到亭长家吃饭,亭长的妻子不高兴,常常在早上就把中午饭做好,坐在床上就吃了,等到韩信去时,也不为他准备饭,他不得已靠一漂母接济而勉强度日。甚至连乡里的流氓无赖都不把他放在眼里,对他说:“你虽然长得高大,也喜欢舞刀弄剑,却是个胆小鬼。如果不是这个熊样,那你就勇敢地拔出剑来把我刺死;如果不敢,那你就乖乖地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让他遭受了胯下之辱。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就是说,你虽然具有“龙”的素质,但在初始阶段,你的力量还很小,你的资历还很浅,还没有太多的人相信你,支持你,这时你还需要有人拉你一把。想当年,韩信为楚将,项羽对他不重用,一气之下,改投刘邦,但刘邦也没把他当个人物看,只让他做了个小小的治粟都尉。不得已,他准备离开刘邦。幸亏萧何慧眼识英雄,把他追回来,郑重地举荐给刘邦,终于成就一番大事业。试想如果没有“大人”萧何举荐,怎么会有名留青史的韩信?有了大人相助,再加上你自身的潜能,你可能会有一点成就;而这时你要尤其小心才行,否则,你就会功亏一篑。试想哪一个有所成就的人,在将成未成之时,不是众矢之的?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不时刻警惕行吗?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乾,是健而又健。惕,是惊惧警惕。若,语气助词。厉,危险。咎,疾病。爻辞是说,君子自强,时刻警惕,才能避

免灾祸。在达到人生事业顶峰的时候,你还需要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九四“或跃在渊”,以求可进可退。只有经过了这么多艰苦的磨练,你才可以一冲而起,飞龙在天,在属于自己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你说,这一路走来容易吗?确实是历尽了艰辛。

当你达到人生事业的顶峰的时候,你更要加倍小心才行。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极限,到了这个极限,就会穷极必反,走向它的对立面。惟其如此,事物才能发展,社会才能向前。人生事业也是这个理。紧接着“飞龙在天”的,是上九爻辞“亢龙有悔”。龙一冲上天固然是美事,但如果不知回头,只是不停上冲,终有精力不济之时。到那时可能会一头摔下,落个粉身碎骨的下场。公元前 494 年,吴、越大战于五湖夫椒,越王勾践兵败会稽,濒于亡国。伍子胥深谋远虑,主张一举灭越。但沽名钓誉的吴王夫差,利令智昏,倨傲轻敌,一心北进中原,争当盟主,听不进伍子胥不合己意的言论,又加上误国小人太宰嚭的“今已服矣,又何求焉”的姑息之论,昏聩的夫差却亲豁疏伍,近佞远贤(后来竟杀了伍),非但未乘胜灭越,扩大战果,反放勾践返国,使越国有了休养生息、东山再起的良机。吴王夫差的骄纵,为其灭亡埋下了祸根。从公元前 494 年越国战败濒亡,到公元前 473 年吴国由盛而衰以至灭亡,才短短二十余年。其间,吴、越两国的兴衰消长,“胜负之数,存亡之理”竟如斗转星移,天翻地覆。这个历史教训,令人深思。又如秦始皇,他以武力统一天下,想来该是何等的气概,但想不到陈涉揭竿于前,项羽起兵于后,一个强大的秦帝国很快就灰飞烟灭了。为什么呢?原因就是秦始皇不懂居安思危、物极必反的道理。当其兵扫六国、天下一统之后,他本该安抚民心,休养

生息；但他却仍然以高压的手段，用苛政厉法来压制民众，想让民众屈服，以为凭着强大的武力就可以办好一切；于是大兴土木，修阿房宫、建皇陵、修长城，搞得民不聊生；然后又海外求仙、焚书坑儒，最后搞得人神共愤，众叛亲离，终于把一个强大的秦帝国断送了。

不仅身居高位者如此，就是一些普通的人也应该明白“亢龙有悔”的道理。打仗如果只知道一味地猛打猛冲，其结果肯定是全军覆没；唱歌如果只知道用高音，其结果也一定是倒嗓子、折金口，贻笑听众。中国体操名将李宁在鼎盛期的时候，吊环的冠军几乎是他承包的，甚至还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李宁吊环”，何等的风光。可是他没有激流勇退，结果最后一次参加比赛，从吊环上摔了下来。同样的，还有一个美国篮球明星——飞人乔丹。他开创了一个篮球时代。篮球曾经是他手中驯服的道具，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相信熟悉篮球的人一定都看过“飞人”乔丹的进球表演，那简直可以说是出神入化。“老飞人”似乎也懂得一点中国的《周易》，知道一点“亢龙有悔”的道理，在获得第五个 NBA 总冠军的金戒指以后，也曾经宣布退役。但是他终于没耐住寂寞，又重返球场；打了一段时间，发现不行，又退出；最后又回来，搞了个“三进三出”，现在仍出现在 NBA 的赛场上；只是昔日的雄风已经不再，飞人确实老了，飞不动了。每次看到乔丹在篮球场上的老态，被一些无名小卒欺负，人们真替他难过。想一想，如果他真正懂得“亢龙有悔”的道理，及早退役，给人留下的将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乔丹。

人的一生，应该是一个不断进取的生命流程。《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强调一个人要实现人生价

值,完善人生理想,就必须在确立理想志向的同时,要积极进取,发愤努力,孜孜不倦,奋斗终生。如果不是这样,则人生价值、理想、目标,可能难以实现。人要整天勤勉不倦,与时偕行,不断地警惕自己,及时改过。这样进德修业,永不懈怠,才有可能减少过错,避开灾害,从而做到德业双修,取得成功。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限度,事物就要走向反面,好事就要变成坏事。当你的事业取得成功、你的人生走向了辉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警醒自己,以免乐极生悲、亢龙有悔。

(曹建国)

## 8. 处泰虑否防隐患

最近,新闻传媒披露了这么一则材料:一家效益火爆的酒店为进一步拓展业务,进行总经理竞选,三位竞选者先后登台发表演说。第一位雄心勃勃地说:“如果我当选,一定把员工拧成一股绳,奋发努力,使酒店效益再翻一番。”第二位志在必得:“如果大家信任我,投我一票,我一定使酒店效益和员工收入都再翻一番。”第三位一上台,语出惊人:“从我当上总经理那天起,我想到的是企业的破产……。”结果,第三位登上了老总的宝座。他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在酒店兴旺的时候,不沾沾自喜、盲目乐观,激烈竞争所表现出的紧迫感,辉煌中孕育着危机的焦虑感,使他具备了决策者的才干。他深知只有居安思危,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华民族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周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周易·系辞下传》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唐代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提出“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治国原则；宋代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总结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可见，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出自《否》卦九五爻辞。苞，丛生貌。苞桑，桑树根、干互相牵连，比喻根深蒂固。该句是说，只要君子心中时刻自警：有灭亡的危险，有灭亡的危险啊！这样，就可以像把东西系结在丛生的桑树上一样牢固，安然无恙。九五正处于由否转泰，即由艰苦创业走向胜利成功的时机，需要心存惕惧，敲响警钟。俗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愈是在事业即将成功的关键时刻，愈要防止功亏一篑而走向灭亡、失败。能自觉这样做，就可能顺利地化否为泰，转危为安。如1944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革命事业正处于伟大胜利的前夕，3月份，《重庆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对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其中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骄傲必败，腐化必败，分裂必败。李自成1629年参加起义，历尽艰难，1643年占领西安，1644年初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打到北京，三天打下北京城。然而，起义军将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贪图禄位，享乐腐化，争权夺利，宗派斗争，将相不和，最终酿成全军覆没的历史悲剧。毛泽东对李自成的迅速失败，有痛心彻骨之感；对中国共产党人即将取得的胜利会不会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有履冰之忧。因为在如火如荼的抗战进入胜利的关键时刻，党内外普遍存在着希望早日胜利，以松一口气的思想和厌战情绪，对胜利后遇到的新危险，缺乏思想和心理的准备。时局在急剧变化，形势



错综复杂,稍有疏忽,就可能危及全局。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立即把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作为学习和整风的教材,告诫中国共产党人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要以史为鉴,经得起考验:“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让胜利冲昏头脑,避免重犯胜利时的骄傲的错误。”在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并确定了反腐、防败的主调:“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正是这种警戒意识,忧患意识,使得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在由否转泰的最后时刻,避免了失误和失败,走向了更大的胜利。

《周易》中的《泰》卦,象征通泰顺畅;《否》卦则象征否塞不通。人们处在由否转泰的关键时刻,需要戒惧小心;在和平安定、事业有成的顺境里,更应当居安思危。《吕氏春秋》说:“胜非其难也,持之难也。”《周易》告诉我们,否与泰的关系是辩证的,否中有泰,泰中有否,繁荣中折射出阴影,安稳中透露出危机,优势中潜伏着劣势,高效益下掩盖着亏损。这往往是事物正常的存在状态。在通常情况下,繁荣昌盛之时,就是警钟长

鸣之际,切不可高枕无忧,乐而忘忧。《泰》九三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意思是说,广袤的大平原中就有险坡,事物有去就有回。这是警示人们,物极必反,泰尽否来。所以,人们身处安泰的顺境,尤其需要防备可能出现的否闭情况,切勿因泰致骄,忘乎所以。唐玄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执政的前期,针对中宗、睿宗以来的弊政,励精图治,锐意改革,抑制贵戚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启用姚崇、宋璟等为相,任用贤才,虚心纳谏;整顿吏治,严明刑赏;提倡节俭,轻徭薄赋;限制佛教,裁汰僧尼;整顿税制,平抑粮价;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这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的施行,使开元时期(713—741)“家给人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通典》),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被誉为“开元之治”。但当改革取得成效后,玄宗便开始满足现状,奢侈享乐,骄侈淫逸,罢免张九龄的相位,专任奸人李林甫、杨国忠为相,诛杀谏臣,拒谏饰非;贪立边功,轻率用兵;宠爱杨玉环,加封安禄山……在他执政的后期,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使国家从发展的颠峰上跌落下来,于是“唐室遂微”。可见,居安不思危,祸患紧相随!

人在胜利面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不随心所欲、忘乎所以,其实是很难的。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就是这样一个处泰虑否的人。他辅佐其父李渊身经百战夺得天下,在兄弟争斗中获胜、高居皇位之后,并没有因为天下一时的太平而满足。隋王朝迅速覆亡的前车之鉴,使他在成功后深怀戒惧,如履薄冰,惟恐重蹈覆辙。深沉的忧患意识使他特别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训,他曾和大臣辩论“创业与守成熟难”的问题,结果达成共识。太宗谆谆告诫臣下:“今草创之难,既已往

矣；守成之难，当思与公等慎之。”他慎于用人，任人惟贤，从谏如流；反对奢侈，厉行节俭。如贞观二年，群臣因太宗患病，考虑到其居住的皇宫低下、潮湿，再三奏请建造一座楼阁供其居住。太宗以花销大为理由，坚决谢绝了臣下的好意。太宗自登基直到去世，在23年的时间里，居安思危思想一直贯穿其执政的始终。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年，突厥内乱，颉利可汗挾责突利，突利因势孤力单，上表要求入朝，这本是件大喜事，但太宗却对臣下说出了自己的忧虑：“突厥衰落，边境就可以安宁了，这确实值得高兴。但是，如果我治国无方，有朝一日也会像突厥一样，我能不感到忧惧吗！”《贞观政要》一书比较多地记载了唐太宗的这类戒惧话语。如贞观五年，他提出：“安不忘危，理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贞观六年，他再一次对臣下说：“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之事以自戒惧，用保其终。”并一再告诫臣下：“炀帝骄暴而亡，公辈所亲见也。公辈常宜为朕思炀帝之亡。”正是这种忧患、戒惧意识，使得太宗君臣上下一心，励精图治，才出现了“贞观之治”——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

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是这样，对个人来说仍是如此。今天的下岗工人中，有些人曾是单位的劳模和标兵，在已有的成绩面前，有的人陶醉了，满足了，不再奋发努力，积极进取，结果，时过境迁，自己落伍了，感到了生存的危机。所以说，居安思危并不是危言耸听，戒惧意识并不是怯弱、慌乱，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必须时时深谋远虑。

比尔·盖茨曾说：“微软距离破产永远只有12个月。”现在，个人要发展，企业要壮大，国家要繁荣，都需要具有高

度的危机感,要有超前思考,超前决策,以防患于未然。居安思危,“惧”者生存。当今,世界经济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只有自我加压、奋发进取、勇于开拓、不断超越,我们个人和国家的事业,才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真正地做到持盈保泰。

(王启才)

## 9. 趋吉避凶成大业

据《左传·闵公元年》(前 661)记载:春秋时期,有个叫毕万的人,要到晋国去做官,但不知道吉凶如何,就占了一卦,得《屯》卦(䷂)之《比》卦(䷇)。(《屯》卦初爻由阳爻转为阴爻,成《比》卦。)谋士辛廖推断说:吉祥!《屯》卦坚固,《比》卦进入,没有比这更吉祥的啦!震三变成了坤三,《震》卦有奔腾骏马的象征,《坤》卦则有坚固大车之象。车跟随着马,留在晋地,兄弟抚育他,母亲保护他,众人归附他,这是公侯的卦象呀!后来毕万果然得到晋国的重用,屡立战功,被封为魏大夫,成为晋国魏氏的始祖。又据《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载:三国时,魏名士何晏有次做梦,梦见十几只青蝇飞到他的鼻子上,赶也赶不去,就问精通八卦的管辂是吉是凶,管辂根据《艮》、《谦》、《大壮》三个卦象,占定何晏死期不远。过了十几天,何晏果然被司马懿所杀。

以上是史籍所记载的,用《周易》占断吉凶如何灵验的事例。今天看来,未免过于神化了《周易》。但如果我们剔除历史上对《周易》的种种附会、迷信成分,对其卦爻辞所蕴涵的吉凶之道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却不得不承认它是现实人生的指南,是指导人们趋吉避凶的宝典。

吉凶是《周易》的占卜术语。占断吉凶、趋吉避凶、化凶为吉,是《周易》一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周易》中的占断辞,大致可以分成吉、无咎和凶三类。张增田《试论周易的人谋》一文,曾对《周易》的三类占辞所占比例作过统计:其中吉类 166 处,占 43%;无咎类 106 处,占 28%;凶类 94 处,不足 25%。前两类合计 71% 的占辞是鼓励、允许人生有所行动的,只有不足 25% 的部分是阻止人生活动的。这种比例,与爻辞中吉凶休咎互转的比例相契合。在 386 爻辞中,吉、无咎,与凶、厉互转的现象出现了 17 次,但只有两处是吉转为凶的。《周易》对人生行动将有所得的判断,远远多于将有所失的预言,其态度是积极乐观的(《周易研究》1995 年第 1 期)。

《吕氏春秋》说:老天生出阴阳、寒暑、燥湿,四时的变化,万物的演变,莫不有其有利的地方,莫不有其有害的地方(《尽数》)。又说:凡是居住在天地之间、六合之内的事物,都致力于相生相利;可它们之间相互危害的,也是数也数不清。人和事情都是这样(《观表》)。《周易》说:“吉凶生乎动”。既然事物之间,物与人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利、又相克相害的关系,人们要生产、生活,成就事业,就必须有所选择,找出趋吉避凶的方法,以便兴利除害。

如何趋吉避凶,化凶为吉,进而有所成就呢?

首先要树立目标,找准位置。《周易》非常讲究“位”的重要性,以为圣人的大宝是位置,懂得天下的道理,就能遵循天地的规律而居处适中、合宜的地位。六十四卦每卦由初、二、三、四、五、上 6 爻组成,自然形成了 6 种不同的位置。大致说来,初位潜藏勿动,难以知晓,二位伺机而动,多获美誉;三位处下卦之极,多有凶危;四位处上居下,多含惕惧;五位处尊居



中,多见功勋;上位物极必反,凶相可见。各种位置又是不断变换的。其实,把人放在不同的位置上,他的职能和作用是不一样的。打个比方说,木雕泥塑的佛像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就是因为它处于庙宇之中,所占据的位置好。若置于庙外,人们对它就有失恭敬了。判断位置好坏的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看它在不在中位,上下爻是否相应;二是看它正不正。在通常的情况下,一、三、五是阳位,二、四、六属阴位,若是阴爻居阴位,阳爻处阳位,就是得正;否则,就是不正。秦朝李斯曾感叹“厕中鼠”和“仓中鼠”命运大不一样,便去追求荣华富贵;后来因贪恋禄位而被杀,就是太看重了位置,没能持中守正。今天看来,那些跑官、买官,为攫取官位而投机钻营、不择手段的人,或为了保住官位而干昧心事、违法犯罪的人,是应予批判的。因为他们的官位来得不正,以小人居君子位,处位不正。这样的人做官,就像三足之鼎折了一足一样,迟早会摔倒、毁灭的。不中不正的人窃取中正的位置,下场是可悲的;但持中守正的人努力进取,自强不息,结果必然吉祥。“做人应有位置感”。如果我们将位置理解为奋斗的目标,实现了的事业,那是做人所不能少的。因为人生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就会碌碌无为,到头来一事无成。所以,人在青少年时期给自己的人生以较为准确的定位,是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是抓住时机,别浪费时间。中国自古以农立国,靠天吃饭,所以非常看重时令。《周易》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它在讲到变化和改革的时候,尤其强调把握时机,切合时宜。如《系辞传下》说:变化会通,是趋向合宜的时机。各卦六爻相互错杂,只是反映特定的时宜和阴阳物象。《革》卦彖辞说:天

地变革形成了四季；商汤、周武变革夏桀、商纣的王命，正是顺合了当变之机，又应合了百姓的愿望；适时变革的功效是多么弘大啊！《损》卦彖辞说：事物的减损增益，盈满亏虚，都是配合其时而自然进行的。《艮》卦彖辞说：及时捕捉时机，应当抑止就抑止，应当前行就前行，或动或静，适当而不违时，抑止的道理就光明灿烂。可见，只要合时，便能逢凶化吉，穷而能通。人生也是如此。人生道路虽是漫长的，但关键的地方只有几步。善于审时度势的人，能迅速地捕捉时机，杰出的人更是善于创造时机。这种本领使他们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佼佼者。而一般大众则因一念之差、一步之迟，而顿失良机，追悔莫及！有时，成败吉凶就在最关键的一步之间。这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时机。光阴易逝，功业难成。历史上有多少仁人志士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所以，人在短短的一生中要有所成就，有所建树，就要善于把握时机，创造时机。人们要珍惜生命的每一分钟，统筹安排，合理规划，提高工作效率，千万别耽误、浪费时间。

第三是看清趋势，把握潮流，早下决断。《周易》有“研几”之说，主张见微知著，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它说：“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所谓“几”，指的是极其细微的运动变化。所谓“研几”、“知几”，就是要透视运动变化的微观，看出事物的吉凶征兆，发展的大致趋势；对于不好的事物，要防微杜渐。以现实生活为例，有这么两位同学，他们理工科大学毕业后，一起进入了一个效益很好的大企业。一位见微知著，看出企业繁荣背后的危机，看到了自身的不足和整个社会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很快下定决心，要成为

一名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于是一边工作一边刻苦自学。另一位觉得企业效益、福利都很令人满意,自己把分内的工作干好,只要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就行了,不用再吃苦受罪拼搏奋斗了。数年以后,不断拼搏的同学博士后出站,很快成了教授、院士。另一位却成了破产企业的待岗人员,想考研,外语拉下多年,年龄已大,拾不起来了,迫不得已,只好去别的单位充当廉价劳动力。笔者刚在大学教书的时候,给大四学生上过一门选修课,看到有些平时表现比较出色的学生考研失利,情绪低落;一问方知,他们本来没打算考研,看到全班同学绝大部分都报了名,考研已成热潮,自己才跟着报名,仓促应战,准备不足。相反,那些平时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同学,由于入学时就确定了考研的念头,经过三年半的拼搏,终于考上了名牌大学,如愿以偿。由此看来,人们要想做成一件事,人生欲成就一番事业,就要早下决心,早点行动。

最后是意志坚定,坚持不懈。所谓“志”,指坚定的信念。“志”在《周易》一书的《彖传》和《象传》中出现得很频繁,这说明《周易》重视人的意志和信念的作用。人的奋斗目标一旦确立以后,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不移地去奋斗,切不可徘徊犹豫,或胸无大志,贪图一时的安逸,遇到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豫》卦象辞说:“初六鸣豫,志穷凶也”,就是告诫人们不要因欢乐而自鸣得意。因为志气穷尽以后,必有凶险。《萃》卦象辞说:“乃乱乃萃,其志乱也”,是说人若失去操守,乱了方寸,以至于与不三不四的人们妄为聚合,正说明他心智已经迷乱。意志不坚定,行为就乱了;行为乱了,目标也实现不了。意志坚定了,才能持之以恒。《恒》卦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要坚持不懈,缺乏恒心难成大事,只有脚踏实地地努力奋

斗,才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

《系辞上》说:“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又认为“吉凶生乎动”,“动在险中”。其实,吉凶相生互变,吉中有凶,凶中有吉。吉凶的结局,往往取决于人的意志、观念和行为是否合时宜、合规律。只要合时、合理,《周易》鼓励人们自强不息,大胆有为。只有积极去做,才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获得人生的吉祥,实现“崇德广业,盛德大业”。安而忘危,败而气馁,不作为,不努力,最终多有凶险!这在《易》卦《易》理中有生动的兆象显示。

(王启才)

## 10. 邮政大臣洗马桶

《周易》中有一《升》卦䷭。从卦象上看,三下为巽,三上为坤;巽象征着自然界的树木,坤则象征着宽广的大地;所以整个卦象用树木生长在大地上,来表现“上升”这一抽象的含义。但《周易》是一部借自然天道来比喻人事社会的书,所以《升》卦的象辞就说:“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也就是说:树木生长在大地之中,生根发芽以后,承受阳光雨露的润泽,一天比一天高大起来。象传的作者由自然界的物象进一步又联想到社会人生,所以他说君子要成就美德,就要像树木生长一样,一点点地积累,集腋成裘,聚沙成塔。

学过《荀子·劝学》篇的人都知道其中的一段话:“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驎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意思是说:一块块的泥土没什么了

不起的,但如果能积聚成山,就可以兴起风雨;水积聚多了,就会生出蛟龙;一个人如果不断地积聚自己的德行,就会具备圣人之心。千里虽远,但却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江海虽阔,也是由涓涓细流汇聚而成。千里马不能一下子跳十步那么远;只要不停的走,驽马也能走完十天的路程。一个人去雕刻东西,如果刻一下就放弃,即使是腐朽的木头也刻不断;如果坚持不放弃,即使是坚硬的金石,也能把它镂空。荀子在这里反复申说,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要想成就大的事业,有大的成就,必须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却轻视小事,总想一口吃个胖子,一下子就干成惊天动地的大业绩,尤其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一般都有较高的学历,有的甚至还是硕士、博士,这样的人往往自恃自己学历高、知识面广、能力强,对自己寄予的期望值比较高。而刚参加工作,一般都需要从基层,从一些小事做起,每当这时候,这些人就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有一种“大材小用”的怀才不遇感,甚至一天到晚牢骚满腹。试想有这种心态,还怎么能做好工作呢?

一个人有远大理想,想成就大的事业,是一件好事。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想当是一回事,如何当上又是另外一回事。从士兵到元帅,需要你一步步去努力,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元帅。元帅都是身经百战,从士兵做起,一级一级晋升上去的。同样,如果你在企业上班,你要想成为部门经理,就必须从职员做起,一点点地熟悉你所从事的事业,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太多太多的“能人”一生沉沦下僚,有的就是因为心中有太多的不平,以至于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心情去干眼前的“小事”、“琐碎事”,使自



己的才华没有展示出来。也有很多的“能人”在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职位或工作之后,很快就从新职位上摔了下来。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一天到晚惦记着“机会如何来临”,而没有想到机会如果来临应该怎么办,好比心里一天到晚想着当元帅,根本没有想到真正当上元帅怎么办,更谈不上实际去准备了。

所以,尽量做好眼前的工作,这才是每一个梦想成功的人要做的第一件事。一份工作,不管它看起来如何的卑微,如何的不起眼,都有它自身的规律和价值标准,做起来都不那么容易。你学历再高,知识再丰富,能力再强,都无法保证你能做好一件简单的工作,哪怕是清扫马路这样的事情。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个能力的问题,还有工作的态度、为职业献身的精神等问题。每当我们走过马路,看到清洁工人一丝不苟地清扫马路,我们的心里都应该有所触动,为他们的认真精神而感动才对。这种精神,与你的学历、知识、能力等统统无关,这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需要你在具体的工作中去培养,尤其是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我曾经读到的一个故事。

37岁就当上日本内阁邮政大臣的野田圣子出生于名门贵族,从小就没有干过粗活、脏活、累活,长大后接到的第一份工作也很体面,很轻松:在帝国饭店做白领丽人。不过在受训期间,她被安排的工作却是去清理厕所,而且每天都有人去检查圣子的工作,厕所一定要被清理得光洁如新才算合格。可以想象,对于圣子这样一位出生名门的大家闺秀来说,清理厕所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第一天把手伸进马桶的一瞬间,圣子忍不住要呕吐的感觉,而且她从心眼里讨厌这份工作。但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圣子的想法和工作的态度。

有一天,一位与圣子一起工作的前辈在清理干净马桶后,当着圣子的面从马桶里舀起一杯水,一饮而尽,以此来向圣子证明,他清理过的马桶水都可以喝。前辈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惊得圣子目瞪口呆。震惊过后,圣子开始了反思,她发现自己的工作态度有问题,而且认识到如果连一件小小的清理马桶的事情都做不好,根本没有资格到社会上去肩负更重要的工作。于是她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就算是洗一辈子厕所,也要当洗厕所最出色的人。”

从此,圣子的工作态度大变,每天工作得非常辛苦,但也非常坦然。在训练结束的那一天,圣子在清理完厕所以后,也像那位前辈一样,毅然舀起一杯厕所的水,喝了下去。这次特殊的经历也成为圣子以后工作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使得她能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做好每一件事。

读了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如果你能像圣子那样,以喝马桶水的精神对待你的每一件工作,相信你一定能成功。

(曹建国)

## 六、为政篇

### 1. 泪眼婆娑话刘备

《周易》中的《乾》卦，全部由阳爻“一”组成。对应于自然万物，“乾”首先象征着天。天道刚健，运动不息，所以“乾”又象征着刚健，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由《乾》的卦性申发而来的。在具体释卦的时候，《周易》的作者又常以龙来作为喻象。自然界中本无飞龙，它是中华民族祖先远古崇拜的一种图腾，是一种在想象中创造出来的洋溢着刚健元气的神物。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被神话为“天子”，又说皇帝是“龙”，是“真龙天子”，所以人们又把《乾》卦与皇帝联系了起来。《周易》最爱讲“得位”，讲“中”。所谓“得位”，即阴爻处于二、四、六偶数位，阳爻处于一、三、五奇数位；所谓“中”，就是说上卦的“五”位，与下卦的“二”位，分别位于上下卦之中，是好位置。所以，人们就把又“中”又“得位”的《乾》卦“九五”给了皇帝，歌颂皇帝为“九五之尊”。

当人们把《乾》卦与皇帝联系起来的时候，同时也赋予了皇帝当然的处事风格或者说领导方式吧。中国古代强调长幼尊卑的次序，所谓“君臣、父子、夫妇”，作为前者就可以拥有无

限的权威；而作为封建社会的君主更是被加以神化，号称“天子”。天的儿子，代天行事。古装戏中，宣读皇帝的旨意都是先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言下之意，那是天的旨意，你违背了皇帝，就是违背了天。所以封建社会皇帝一声令下，做臣子的都要拼死效忠，而且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什么好含糊的。

但《周易》又最讲辩证法，在崇尚阳刚的同时，也讲究要适当的阴柔，最好是阴阳协调，刚柔相济。如果一味地强调阳刚，就会由盛转衰、物极必反。即便是皇帝也不例外。《乾》卦的上九爻辞是“亢龙有悔”，九五爻辞的“飞龙在天”固然是人君的吉象，但如果一味地穿高激飞而不知回头，总有一天会因力不从心摔个粉身碎骨。所以皇帝治天下时，也要适当来点阴柔手段。《屯》卦初九象辞曰：“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强调要能够“以贵下贱”，不要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架势，必要时也可以眼泪来打动别人。《周易》有几处讲到了“哭”，从总体上看，《周易》对“哭”有时也抱肯定的态度。例如《夬》卦上六：“无号，终有凶。”小人得意一时而无所号哭，但最终必受正义的惩罚。相反，《萃》卦上六：“齎咨涕洟，无咎。”意指在上者犯了错误，但知错悔改，态度诚恳，就会被大家所原谅。这样的痛哭流泪，必无咎害。在中国历史上以柔治天下，甚至说是以“哭”治天下的典型事例莫过于刘备了。

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语：“刘备的江山，哭来的”，还有一句歇后语“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人们要形容一个人哭得伤心，就说：“你看他哭得跟刘备样”。大约因为刘备特别爱哭，所以留下这些话头。刘备是否爱哭，陈寿的《三国志》没有记载，但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时，却爱用“哭”来表现刘备的

性格。这也算是作家塑造人物的一个手段吧。读《三国演义》就会发现,刘备确实爱哭。据不完全统计,整部《三国演义》写刘备哭大约有十次之多。第一、二两次是见到常山将赵云,刘备爱其才,而赵云却不能投靠他;分手的时候,刘备牵着赵云的手,叹息流泪。第三次,因为张飞没能照顾好刘备的家眷,一时心急,想自刎向刘备谢罪;刘备夺下张飞的剑,扔到地上放声大哭。第四次是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但诸葛亮不答应,刘备禁不住失声痛哭。第五次是长坂坡前,赵云带着婴儿刘禅(后主),杀出重围,刘备悲喜交集而泣。第六次是孙权命鲁肃来讨还荆州,刘备一听,掩面大哭。第七、八两次是因为关羽败走麦城被东吴所杀,刘备一次次哭得死去活来。第九次是因为听说汉献帝被杀,刘备痛哭数日。第十次是因为张飞被杀,刘备又一次遭遇失去兄弟的打击,哭得一次次昏厥过去。归纳刘备的哭,要么是为了爱才求才,要么是因为兄弟之情,也可能是为了君臣之义,也可能是为了江山社稷。下面我们来看一次具体的描写,感受一下刘备的“哭”。《三国演义》“长坂坡赵云救主”写道:

那子龙独行二十余里。玄德等皆少憩于树下,见子龙血染浑身,玄德泣而问曰:“子龙怀抱何物?”……子龙双手递与玄德:“幸得公子无事!”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指阿斗而言曰:“为汝这孺子,几乎损我一员大将!”子龙泣拜谢之曰:“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史官有诗曰:“曹操军中飞虎出,赵云怀内小龙眠。无由抚慰忠臣意,故把亲男掷马前。”

这就是俗语“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的来源。后世人在评论刘备的行为时,往往认为刘备的行为太不合常理,以为他



在用心计。这种“用心计”，正是刘备的“另类”领导艺术。

我们这里说“另类”，不是为了赶时髦，只是想借这个词说明刘备以哭打天下、治天下的方式与众不同，在中国历史上算得上是一个特例。一般来说，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神话般的地位，平时在臣子面前，一脸的威严，不苟言笑，更不要说哭了。等到皇帝一哭，十有八九已经大事不好了，不是有性命之忧，就是江山快要保不住了。所以说像刘备这样以哭求才，以哭求治的皇帝是不多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我们才说，刘备的“哭”体现的是一种领导艺术，而且是与众不同的“另类”领导艺术。

从刘备的“眼泪”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有益的启示呢？刘备为情义而哭，为贤才而哭，为江山社稷而哭；作为一个领导者或行政管理人员，你是怎么做的？你像刘备那样珍视情义，爱惜贤才吗？你有一种视单位、事业为生命的责任心吗？你能够像刘备那样，敢于在下属面前展示自己心里最真实的想法吗？可能有许多的人不敢在下属面前展示自己最真实的人性，总认为在下属面前展示得太多，会有损自己的威信。殊不知，这样做等于无形中在自己与下属之间划了一道鸿沟，过分强调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使得自己很难与他人有真正的情感交流，也使自己与他人处于潜在的对立之中，这会让自己处于孤家寡人的地位，工作也难以真正深入开展起来。看看刘备，为什么他的部下、臣子能如此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甚至连诸葛亮这样的智者“卧龙”也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在我看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刘备真正做到了以心与人交，没有动辄就把自己置于“君”的位置，置于“大哥”的位置。现在不是强调“柔性管理”吗？刘备就为我们树立一个“柔性

管理”的榜样。这或许是刘备的“眼泪”给我们的最有益的启示。  
(曹建国)

## 2. 任贤图治兴家邦

《资治通鉴·周纪二》记载：齐威王与魏惠王在郊外一起打猎，魏惠王问：“齐国有什么宝贝没有？”齐威王回答：“没有。”魏惠王说：“我的国家虽小，尚且有直径一寸大的珍珠，其光能照亮前后十二辆车子，这样的珍珠有十颗之多。难道像齐国这样的大国，反而没有宝贝吗？”齐威王说：“你我衡量宝贝的标准不一样。我有一个大臣叫檀子，他守卫南城，楚国就不敢来侵犯，泗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国都来朝拜我国。我有个大臣叫盼子，派他守卫高唐，赵国人就不敢到东边的河里来打鱼。我有个官吏叫黔夫，他守卫徐州，燕国人就对着徐州的北门、赵国人就对着徐州的西门祭拜，祈求平安。我还有个大臣叫种首的，让他专门防盗，结果齐国路不拾遗。这些大臣的光辉可照亮千里之外，岂止照十二辆车子？”魏惠王一听，脸上不由得露出惭愧之色。

是啊，什么是你的珍宝？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你是同意齐威王的见解，还是认为魏惠王说得在理？作为一个领导者，你一定渴望成就一番事业，希望见到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并且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那么你该怎么做？读了上面的故事，你一定会明白要任贤图治的道理。古人认为治国兴业需用贤人，这一点《周易》有很好的阐发。《系辞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可见

《周易》对贤人之德及贤人之业极为重视,认为它们是国家事业可大可久的原因,缺少这些,国运不久,事业不昌。

具体说来,怎样才叫任贤图治呢?

首先要养贤。《周易》有《颐》卦,谈到了养贤的道理。它的彖辞据经卦发挥,就直接点明“圣人养贤以及万民”的主旨。《鼎》卦彖辞也说:“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说只有养贤,才能得到圣贤及万民的拥护和爱戴,否则,等待你的将是无可奈何的悲剧。周文王任用姜子牙、南宫适等贤人,外出看见路边无主的枯骨,就说:“天子有天下,就是天下的共主;诸侯有一国,就是一国的主。今此枯骨,我就是它的主了。我怎忍眼见它暴露荒野呢?”于是就掩埋了它。这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泽及枯骨”的故事。天下人听说后都认为:“西伯的恩德都施于无知的枯骨,更何况活着的人呢?”于是都纷纷归顺文王,所以他的儿子周武王最终打败了商纣,取得了天下。而《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卫懿公喜欢鹤,平时让鹤坐华丽的轿子,给鹤授予官爵,对百姓却是刻薄寡恩。后来狄人进攻卫国,百姓都不愿去打仗,并且说:“让鹤去和敌人作战吧!这些畜生享有官位爵位,我们哪里能作战?”于是卫国就灭亡了。

其次要进贤。《渐》卦彖辞说:“进以正,可以正邦也。”象辞说:“君子以居贤德善俗”。道理其实很简单。天下之大,事务之繁,一人之力岂能胜任?所谓“天下可一人主之,不可一人治之。”俗话也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所以得人者得势。中国的古书都推崇尧舜时代,为什么?因为古人想象那是一个任贤图治的时代,尧命羲和兄弟分掌农事、季节、时令,还要四岳不断选举有才德的人。他听说舜德才兼备,就把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

英嫁给舜。舜接替尧以后,继承尧的遗志,推举“八元”、“八凯”等贤人,所以天下治理得很好。东汉末年,有经营天下之志的刘备,听说隐居在襄阳隆中的诸葛亮有雄才大略,被当时人称为“卧龙先生”,就去拜访他。一共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留下“三顾茅庐”的佳话。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刘备一听,非常钦佩,就诚挚邀请诸葛亮出山,帮自己争夺天下。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刘备打了很多胜仗,渐渐站稳了脚跟,于是他对诸葛亮也越来越信任,以至于桃园三结义的兄弟关羽、张飞心生不满,刘备就去劝慰他二人,说:“我有了诸葛孔明,就像鱼儿得到了水一样,鱼儿没有水,就难以成活生长,而我如果没有诸葛孔明,就没有成就帝业的依托。各位跟我结拜为兄弟,无非是要跟我同心同德,复兴汉室基业,你们不能不亲近、厚待这位贤人哪!希望各位不要对我亲近诸葛先生有意见。”正因为刘备敬重诸葛亮,所以诸葛亮才竭尽全力帮助刘备,尽情施展他的才华,联吴拒魏,攻占巴蜀,成就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刘备死后,他又辅佐刘禅,前、后《出师表》写得多感人哪!这一切都是因为诸葛亮在感念刘备的知遇之恩。

反过来,如果你不能任贤图治,而去亲近任用小人,疏远、甚至迫害贤人,那么你的事业将付诸东流。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东汉末年,汉桓帝把五个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封了侯。而且还卖官,有个叫侯览的因为捐了五千匹缣帛,就被封作高乡侯。同时,桓帝又册封了其他八个宦官作乡侯。从此这些人沆瀣一气,把持朝政,迫害贤良,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其中尤以“五侯”最为嚣张。当时的民谣有“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之说。所谓“回天”、“独

坐”、“卧虎”，言其气焰熏天、骄贵无偶及骄横如虎；所谓“两堕”，则指其把持帝位左右两端而任意干政。不仅“五侯”如此，就是“五侯”的亲戚故旧也一并沾光，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诚可谓“一人得道，仙及鸡狗”。当时，正直的大臣遭到迫害，像窦武、陈蕃、李膺等还被杀害，而百姓则穷困潦倒，无以为生，纷纷造反，最终引发了黄巾军大起义。于是在内忧外患的境况中，董卓趁机而起，挟持汉献帝迁都，军阀纷争，天下大乱，终于导致汉朝灭亡。考察桓帝身边，不是没有好人、贤才，宦官也不尽是坏人，例如吕疆，就是一个喜欢直言进谏的人，而朝廷中更是贤人众多，如李固、黄琼等，只是桓帝不任用这些贤人罢了。那么，汉朝灭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周易·乾》卦《文言》说：“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坤》卦《文言》也说：“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贤人不在位，或贤人隐，事业就不可能大，不可能久。

当今的社会是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国内、国际，同行业之间、不同行业之间，无不如此。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就必须像古人那样善于“用贤”，时时想到人才是科技之源，科技以人为本。科学技术的竞争，行业的竞争，商品的竞争，实质上就是人才的竞争，知识的竞争。可以说，任何一项成功，都离不开人才的参与。人才就是资本，是全球竞争的核心；人才又是知识、科学技术的载体。谁拥有知识和人才，谁的科技就发达，综合国力就强大。企业与同行之间的竞争，无非是产品质量、价格及营销策略方面的竞争；而这些实际上都是科技更新、观念转变的问题，归根到底又都是人才的竞争。如全球著名的微软公司自 1975 年创立以来，始终以超常的速度发展，



他们所生产的个人计算机兼容软件占世界市场 70% 以上。该公司成功的秘诀,正是因为拥有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一大批既精通最新技术又善于经营管理的高级人才。我国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在《新世纪的较量取决于人才》一文中深有体会地写到:“海尔集团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从一个小企业发展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家电企业,近几年来每年以 86% 的速度增长。海尔为什么会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创造一个超越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在于资源、产品和行业,根本来自于人的竞争优势。由于有了人才,资本才得以向企业集中,企业在竞争中才能取得优胜。”企业如此,国家更是如此。美国经济之所以能长期处于世界首位,其真正的优势就在于拥有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以世界著名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为例,美国占了迄今为止的全部诺贝尔科学奖的 41%。最近几年,美国得奖人数超过了当年得奖人总数的一半。1997 年,得奖者 7 人中美国就占了 4 人。因为美国拥有一批创新人才,所以美国经济能持续快速发展。日本在二战后之所以能快速崛起,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他们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这一桩桩生动的事例都说明了在当今时代人才的重要性。

什么是你的珍宝?《周易》告诉我们,历史告诉我们,活生生的现实更告诉我们:贤才,任贤图治、重视人才是你成功的关键。  
(曹建国)

### 3. 顺天应人谈改革

中华民族富有革新思想。每当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周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精神，都在激励着明君贤相、志士仁人自觉地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以推动历史的发展。打开中国历史，从春秋战国以迄清代，管仲、吴起、商鞅、秦始皇、汉武帝、曹操、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玄烨、康有为……，改革者史不绝书。今天，神州大地正进行着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改革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且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自觉行动。

“改革”一词，最早出自《后汉书·黄琼传》：“（左）雄前议举吏先试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门，后尚书张盛奏除此科。琼复上言：‘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帝乃止。”但改革的观念古已有之。《周易》中专有《革》卦谈论改革与革新，而且“革命”一词早见于《革》卦的彖辞。

《周易》是讲变化的一部书，其核心思想就是“变”。变化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现象，表现在自然界，它是天地的表象，四时的变化。如《系辞上》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意思是说，悬挂在天上的日月星辰等成为表象，处在地面上的山川动植物等成为形体，事物变化的道理在这些象、形中得以显现出来。又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这句话的意思是，秋冬之时，宇宙的大门关闭，万物归藏；春夏之时，宇宙的大门打开，万物放出、生长。宇宙的门一闭一开，万物一入一出，叫作变；闭开出入，往来不穷，叫作通。《丰》卦彖辞又说：“日中则昃（偏斜），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具体从自然方面说明了《系辞上》所述“变通莫大于四时”的道理。在社会方面，它表现为事业、功绩、文采、文化等，此所谓“变通者，趋时者也”，“通变之谓事”，“功业见乎变”，“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

《周易》本身是人取法自然的结果,所以,它十分强调借鉴大自然,向大自然学习。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等。《革》卦彖辞说:“天地革而四时成”。唐代孔颖达解释说:“天地之道,阴阳升降,温暑凉寒迭相变革,然后四时之序皆有成也。”(《周易正义》)既然天地由变革而导致四季的运转,大自然总是在不断地革故布新、产生变化;那么,当社会产生种种弊端,在政治、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刻,人们就应当起来革命或改革,以顺应自然社会的要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的作者以商汤、周武王变革夏桀、商纣的王命,来说明上顺天时、下得民心的变革,其功效是多么宏大!

《革》䷰,下离(☲),上兑(☱),其卦辞专门从事物变革的角度,说明如何把握改革的时机、方法问题。“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无”。“革”象征变更、改革。《说文》:“兽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朱熹《朱子语类》说:“更,革之谓,到这里需尽翻转更变一番。”从卦象上分析,下离象征火,火性炎上;上兑象征泽,泽水下注。水在火上受到烧灼,水火相生又相息,正是事物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所以叫“革”。“己日”,古时以干支纪日,“己”在十干中居于第六,处在将变转化之时。《革》卦辞是说,革,象征变革,在利于转变的时机——己日到来之际,宣布鼎故革新,并以诚信来取信民众,这样做自然大吉大利,一切悔恨都得以消亡。按黄寿祺、张善文等的说法,《革》卦的主旨提出了改革取得成功的两大要素:首先,要把握特定的时间与气候,选择亟待转变的“己日”断然进行改革,必能顺畅。如果“即日”进行,条件尚不成熟,则过早;在“来日”进行,积弊已深,积重难返,未免太迟。所以,改革的火候要把握好,不能错过时

机。其次,心理、行为要存诚、守正,即推行变革者必须遵循正道,以孚诚之信取信于人。让人信从,改革才能推行下去,才能获得成功。如商鞅变法在新的措施出台之前,为了向人民表示言而有信,就在都城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旁边贴了一张布告,声明谁能把它扛到北门,赏给他十金。起初百姓并不相信,后来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才有一个大汉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按要求做了,果然得到五十金。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秦国一传十,十传百,迅速传开了,百姓相信政府说话是算数的。第一次改革,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各种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分配,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根据所在国家或单位情况的特点,摸索试验,循序渐进。《革》卦六爻围绕改革阐发,展示了事物由变革初期到末期的整个发展过程,体现了作者对变革规律的思考 and 认识。对今天的改革,颇有借鉴与启迪意义。《革》初九爻说,在力量微弱,条件、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应当固守常制。若急于改革,盲动躁进,不但容易使改革流产,而且会造成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我国 1958 年的“大跃进”就是急于求成的例子,结果并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反而导致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大衰退。六二爻说,在矛盾即将转变的适当时机,果断进行改革,努力前进,必然功德圆满,吉祥如意,没有咎害。如我国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就是在经济停滞徘徊的情况下的英明举措。由于我们坚持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国情和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改革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生活不断改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九三爻,处于改革业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深入前进困难和压力比较大的阶段。这时候急于改革,步子太大,一定有凶险;但当需要深化改革时,改革者如守常不变,一味退缩,也同样是危厉之道。正确的做法是,审慎诚信,大造舆论,争取民心;分段进行,逐步到位。也可以抓典型,搞试点,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如战国时期魏文侯的改革,就是让吴起在西河、西门豹在邺城先走一步,摸索经验,达到预想的效果,再把他们的成功经验向全国推广,从而为全面改革的开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九四爻,处于改革从小有所成到大有所成的微妙转化阶段。改革者不是君主,而是像宋代王安石、明代张居正那样的位极人臣的社稷之臣,他们既要争取君王的支持,又要赢得广大民众的信赖,改革的难度很大,稍有不慎就可能“有悔”,但只要他刚柔并进,既不畏怯,也不妄进,就有可能无悔。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成效显著,影响深远。

九五爻,改革者处于中正的君位,且与“六二”阴阳相应,象征“大人”的改革能得到民众的响应和追随。其刚健果断,威猛如虎,改革事业光辉日新,不用占筮问疑,人们都心悦诚服。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朕即天下”,一言九鼎,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只要帝王是坚定的改革者,改革措施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就能获得成功。如唐太宗、宋太祖、清圣祖等主持的改革,政令畅通无阻,即是明证。

上六爻,是《革》卦的终点,象征变革已经取得成功。君子要不断地革新自己,与时谐行;普通人也应革除恶习,追随领袖,顺应改革的潮流。在变革之后,要用法制建设来巩固和保



证改革的成果;如果仍激进不止,一定有凶险。只有居静、守正,与民休息,才会有安定祥和的局面。

从以上简要的分析看,《革》卦六爻的发展变化,正是对改革过程中各个阶段情况的认识和概括。“改革则强,不变则亡”,唯有改革才有出路。今日中国的改革,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层次之深,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让我们汲取《革》卦的经验智慧,抖擞精神,参与改革,支持改革,勇于改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启才)

#### 4. “万国咸宁”享暴力

哲人有言:“没有参照,存在的容器是空的”。这句哲言精当地点明了,天地万物都是比照而生,需要以他物作为自己存在及存在状况的参照物。作为意识高度发展的人,尤其如此。只有相对于白种人与黑种人,才真切感到自己是黄种人;看到别人痛苦,才感到自己拥有幸福;有了白痴,才衬出正常人。王熙凤在宁国府平庸的众妯娌的衬托下,才越发感到自己言辞从容、威风八面。汉元帝于众女之中,才能分辨出王昭君的玉貌花容。谁能够想象,没有了比较与参照,我们还能定义自己,还有生活的乐趣与勇气?一天又一天,我们急急忙忙走向群体,努力融入社会,难道不是为了从别人那里感受自我存在?从他人的失误、痛苦、失败中,认同自我之高明、幸福与成功?由此,社会学家定义人是“社会的动物”,是需要群体的动物。

人最初“群”的对象是血亲,由父母子女组成;慢慢地变成父母兄弟子女,由家而变成家族。每个成员于其中与他人组

成各种关系,来度过生存的难关与感受自我存在。在社会组织刚刚形成时,一个家族就是一国,甚至一家就是一国。所以,文献记载古代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万国林立的盛况并不足为怪。乃至到了商末周初之际,仍然是一种万国共存的局面。史书记载,周武王要讨伐商纣王,东至盟津,不期而至者有八百诸侯。假如八百诸侯就是当时的八百个家庭或家族的话,相对于当时林立之万国,实在不算多,也就难怪武王取消了那次去灭商的行动。

假如由一家、一族或几族形成的部落能各守樊篱,不窥他部落门墙,保持如老子所言小国寡民般“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那么,“万国咸宁”四字就是它的恰切描绘。但是,人有无穷的欲望。旧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新的欲望又接着产生,可谓“欲壑难填”。欲望这把双刃剑在推动人类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周易》中《比》卦的卦辞与爻辞,真实地记录了人类随着欲望的膨胀,“群”的对象不断扩大为万国遭蚕食的原初状态。《比》卦卦辞曰:“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原即推原。原筮,推原占卦的本意。元,善之始。永,久。贞,正也,即无邪。不宁,指生活不安定。后夫,后来的人。卦辞是说,《比》卦是一个吉利的卦。推原卦的本意,人们能诚心相待,并自觉地比附于善良长者,永远保持真正无邪品格,必然无灾无难。生活不安定,才去想方设法前去比附尊长,心中不满而迟来比附之人,就有凶险。《比》卦的爻位和爻辞分别是: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爻辞是说,初六,心怀诚信以比附贤明长者,免受灾祸;在上的贤明长

者,同样也充满诚信,使远方来归的服外之民获得亲密比附的吉祥。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爻辞是说,内心诚信地比附于在上的君主,坚持正道可以获得吉祥。

“六三,比之匪人。”爻辞是说,六三比附于不是正大光明的人。

“六四,外比之,贞吉。”爻辞是说,六四亲密地比辅于九五阳刚之主,坚守贞正,必获吉祥。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古代渔猎要求“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以便生物能繁殖不息。仁慈的君主在狩猎的时候,三面驱赶野兽,一面张网,逃跑的不禁止,迎面奔向网的才捕获。

“上六,比之无首,凶。”意欲比附于人却又姗姗来迟,必遇凶险。就像大禹在会稽集会诸侯,防风氏最后到,大禹杀了他以儆诸侯。

《比》卦之卦辞与爻辞强调三点:一是应该比附于贤明的长者,生活在不安定的地域或部落里的人尤其应该尽早比附长者,迟疑就有凶险;二是贤明的长者标志是仁慈、惠爱施及禽兽,心中充满诚信;三是比附于人的人要内心充满诚信,同时在行动上辅助所依附的人。虽然由血亲自然形成的社会组织内部也讲究主持事务的尊长要以“德”率人,但《比》卦所提倡的,已经不仅是主张以“德”治理宗亲自然之邦,更强调以“德”兼并当时天下存在的所谓“万国”的众多血亲组织,设立一个有德的共主来统领它们,也就是《比》卦象辞所谓“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周易》的卦辞与爻辞产生于殷周之际甚至更早,《比》卦

所记载的这种“惟德是依”的标准应该就是蚕食、瓦解这林立的万国的策略,于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昔日这方面活动的隐约记录: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史记·周本纪》)

西伯行善,不但本国之中仁风大行,人们尊老爱幼,礼让谦和,而且在邻邦也树立了威信。邻国之人有不能解决的问题,都相信西伯能理平它,并且入界而化,争讼自然平息。周文王行善,在当时是为了争取商王朝管辖下的诸侯归附于他。于此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以“德”服人的缩影。虞、芮之人无形中已经把西伯作为自己的精神与实际事务的领袖,这两国实际上也就已经为周部落兼并,在其囊中矣。

同时,《比》卦认为,生活不安定地域或部落的人应该来归附有德之邦,主动来归附是正确的;反之,迟疑或干脆不来归附的,就是不向善。不向善者,就是冥顽罪孽之人。对于这种人,人人可得而诛之。于是,“仁义之师”出现了。讨伐异己有了美妙的借口。试看历史,行善的西伯同样有着累累战功:“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史记·周本纪》)虽然孟子对这种“仁义之师”有着令人神往的美好描绘:“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人们盼望“仁义之师”,简直就像大旱三年的土地渴望甘霖一样。而信史记载的战争残酷也足以冲刷

掉这种虚构的美景。“屠城三日”、“屠城七日”、“民相食”、“民户十不一二”的记录史不绝书。文学作品也不乏对它的描写：战争的原野是“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战争给城市带来的惨境，读一读鲍照的《芜城赋》自然明白。战争给个人带来的，不但有死的惨痛，更有生的凄凉。读一读蔡文姬描写战争流离的篇章，即使铁石心肠也不由得“摧心肝”。这种关于战争的悲惨记载，哪怕就信其十分之一，也足以令人发指。老子有言：“师之所在，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兵者不祥之器”，实为信言。“仁义之师”不兴也罢。

《比》卦内涵的理想，是因有德而民归之若百川之归海，因而“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创建“万国咸宁”之局面。但是，有德之君旷世难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叫小民比附于谁呢？因而，有人打着《比》卦的大旗，但却在现实中实际充当着破坏和平、破坏团结的工具。心怀叵测的政治野心家可以打着“仁义之师”的招牌，声称要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实际上专为一己私欲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对不亲附自己的人大肆诛伐。据说这也是再一次证明《比》卦“后夫凶”、“比之无首，凶”的正确性。

当今世界，“和平大使”穿梭于干戈相向的两国，“国际警察”时时染指于他国内部事务。国际问题在他们的料理下反而矛盾更深，反目双方更加仇如东海。《比》卦强调做天下共主的人要内心诚信、贞正，并且要有“王用三驱，失前禽”的仁慈，人们才会比附他。而当今想做天下共主的人们，薄于修德却厚责于别人不亲附，声称致力于“万国咸宁”的事业，何异于痴人说梦？实亦是自欺欺人。

（赵彩花）



## 5. 水能载舟也覆舟

中国社会,治、乱相续。一个又一个新王朝在农民起义中建立,一个又一个旧王朝在农民起义中土崩瓦解。在揭竿而起之前,人们忍受着凌辱、蹂躏、剥削、压迫。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等现实主义诗歌,反映的便是这一特定状态下人们的生活。“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下层老百姓在缺衣少食、妻离子散的苦难中煎熬着岁月。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有名句:“人活着就是含辛茹苦”,比照于中国一代又一代下层人民悲惨淋漓的生活,它显得过于轻飘。当善于忍受的人们连苟延残喘都不能的时候,他们才起来反抗。汉乐府民歌《东门行》记载了人们走向反抗的那一刻: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他们一般先反抗直接压榨他们的地方官吏,接着,这决堤的洪水沿途汇集更多的支流,浩浩荡荡直指最高统治者所在地。可以载舟之水,现在要颠覆压迫着自己的那只船了,人们要推翻那个残暴荒淫的皇帝了。这时,已经是“民视君如寇仇”的时候了。

《周易》的《损》、《益》两卦,讲了正确处理君民关系问题。《益》卦卦象䷩是将《否》卦䷋的上卦减少一阳爻,下卦增多一阳爻而成。上损下益,象征统治者减损财富,使人民增益,自

然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与爱戴。所以其卦辞断为：“利有所往，利涉大川。”即使有艰难险阻，人民也会毫无怨言地跟随君主去克服。当年大禹住茅屋、吃粗饭而使天下无饥饿之人，周文王不穿锦衣绣裳而使天下无挨冻之人，汉文帝罢建露台而使天下人殷富；这些，都是以《周易》赞扬的“君待民”的方法而演绎出的典型事例。有时，在某种特殊情况下，需要损下益上。这时，《周易》强调一定要“有孚，元吉”。只有心中有诚信，的确不是为一己私利，而是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这样损下益上才吉利；并且，这种状况不能持续太长时间，长时间的损下益上也是不行的。比如一个国家为了打败外来侵略，这时动员人民勒紧腰带，一切为了国家，是可以的；但要是战争过去了，还大肆把发展民用经济的钱投到军备生产，人民还是在贫困线上挣扎，就不行了。

汉武帝就犯了类似的毛病。他继位的时候，汉王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国库充实，士民殷富。这时，对长期骚扰北方人民生活的匈奴还之以颜色也未必不可；根据匈奴是游牧民族无定居的特点，并不需要多次耗费大量的人力、无数的军费深入大漠，只要守好边疆，使对方不敢入侵即可；而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却多次派兵深入大漠，甚至为了一己之私欲——夺取大宛国的几匹汗血马，跨越千山万水，源源不断派兵去攻打大宛国。最后国家财库空竭，武帝便采用桑弘羊等人的主意，盐铁国有，清查商人财产，勒令诸侯买皮币做进见礼，发行新钱，想尽一切办法从诸侯、商人及其他人们手中掠夺钱财，闹得商人大多破产、人民无法生存。据说，武帝晚年对自己的这种天怨民怒的做法很后悔，封了个宰相叫“富民侯”，希望人们能够再次富裕起来，希望改善统治者与人民的

关系,但这似乎仅仅停留在愿望而已。此后的汉朝皇帝并没有使人民生活好起来。后来王莽篡位,也没有多少人留恋汉王朝。

中国古代老百姓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只有服徭役、兵役等义务,没有自由生活、发展的权利。所以,谈君与民的关系,其实主要是指君王对人民的认识与态度。纵观中国古代帝王,其对人民的认识与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根本没有认识到其所压榨的对象也有反抗甚至推翻自己的能力。比如商纣王,酒池肉林,为非作歹。当有大臣劝说他时,他说自己有命在天,是真命天子,谁能把他怎样呢?一种是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但以为严刑酷法就能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典型代表是秦始皇。它稍加变化就成了汉明帝的做法。汉明帝认为国家治理在于官吏,所以对官吏要求特别苛刻,犯一点小错便严加惩罚。他以为这样的话,官吏就不敢为非作歹,人民的日子就好过了。他哪里知道,因为他苛察,他手下的官吏怕有什么差错被上头查到,因而对人民就更加苛刻。一种是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并且知道要实行仁政,爱护人民,使他们生活富裕幸福,则国家这只大船就能顺利、轻快地往前行。但有了正确的认识与态度,也并不见得都能达成好的结果,这需要根据帝王的个人才能、毅力,以及任用的官员得不得力而定。如东汉的章帝,实行以儒术治国,怀柔大臣,矜恤鳏寡,希望所统治的人民生活幸福安宁;但他所治理的天下并没有出现繁荣安定的景象,原因是他没有好好地约束大臣,特别是外戚,反而让他们恣意勾结豪强、鱼肉百姓,弄得国家吏治黑暗,民不聊生。

有的时候是大臣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利益或其他,有意

不让君王知道真实情况,从而阻碍了君王处理事务。《庚子西狩丛谈》记载了有关怀来知县吴永见慈禧的一件事:慈禧召见怀来知县吴永,问完了正事之后,又问了一些外边的情况。这位吴知县便把有关政局的一些事情、老百姓的看法、人们生活的状况都说了一些。有一些情况是军机大臣在汇报时遮掩着不讲的,所以第二天慈禧召见军机大臣,骂他们隐瞒了多少情况,欺骗自己母子俩。挨了训的军机大臣回来后便警告吴永以后见老佛爷不可乱说。这样隔阂君王了解实际情况,即使君王有满腔爱护人们的倾向,又如何达到呢?

这就需要君王有清康熙帝那样的治国才能、判断能力。康熙任官极其审慎,不但要询问左右之人的意见,还要考验其人平日的实绩,并不以一人、一时之毁誉为进退。有一天,康熙问一个叫秦棠的知府一天办多少件公事,对方回答说办七、八百件。康熙以自己作比较,在平定吴三桂叛乱那样的非常时期,他自己并不是每件公文都亲自签发,常常披阅到午夜,才可批阅五百余件;秦棠又如何可能批阅七、八百件,肯定在说大话;再查这位知府平时居官并没有太好的声名,于是下令降为县丞。康熙断事,于情于理,无不洞烛幽微,可称明君。但假如他不能在自己做皇帝的时期内,一直保持敬慎于政的态度,他的明君之明也就难以贯彻。比如唐太宗从早年治绩来看,富有治国才能,且勤于政事、善于纳谏,可谓明君。但到晚年慢慢地便生出骄怠之心,荒忽政务,很难听进大臣的意见。这样,即使富有治国才能又怎样?由此可见,做明君不但要有治国才能,通达人情事理;还要自始至终都“无逸”,毫不懈怠。这样,他治辖之下的人民才会拥戴他,君与民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和谐的关系。

由以上也可以看出,产生明君的条件极其苛刻,这注定明君是难得一见的稀罕之物;而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竟把河清海平幸福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这难得一见的明君身上,常常失望自是必然。现代的民主政治,让人民参政、议政,领导人须竞选上岗、且有任期,就能较好地改善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人民所向往的幸福生活也就有可能达到。(赵彩花)

## 6. 飞龙在天话君威

在世界范围内,一提到“龙”,人们总是会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中国龙”、“东方巨龙”、“龙的传人”等等充满了民族自豪感的词汇,都是中华民族特有的龙文化的象征。龙是吉祥的象征,风从虎,云从龙,虎是地上的百兽之王,而龙则是天空的主宰,龙腾空中,正是大显身手之际。

以此,《乾》卦中九五爻辞:“飞龙在天”所预示的吉祥之意,也就可想而知了。《乾》卦(䷀)在六十四卦中是逻辑层次非常清楚的一个卦,卦象上下乾相叠,六爻皆阳,充满阳刚之气。从初九的“潜龙勿用”,到九五的“飞龙在天”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刚健而中正。如果占卜的人能占得此卦,不用问,一定是上上签。

在古代专制社会中,最有权威的,自然非帝王莫属。人们也引《周易》来作比,尊称帝王为“九五之尊”。“九五”就是从《乾》卦九五爻位而来。因为一方面,龙被作为天子的象征,天子的眼睛叫龙目,天子的身体叫龙体,穿的衣服是龙袍,天子发脾气叫龙颜大怒……。另一方面,《乾》卦九五爻位所代表的,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是所有人的顶端。这样的位



置,用来形容那高踞权力金字塔尖顶而作为天下之主的帝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九五之上,便是第六爻上九的“亢龙有悔”,这自然是一切君主都力图避免的局面。如何能够一直保有“飞龙在天”的大好形势,而又不要“亢龙有悔”,一直是历代君王苦思冥想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君主嬴政之所以把自己称为始皇帝,就是希望秦朝的江山能够二世、三世地一直传到千秋万代;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到了秦二世的手里就将大好河山葬送了,始皇帝的愿望只能是愿望而已。尽管如此,帝王们仍然苦苦地追寻,用各种措施来巩固自己的江山,希望能够世世代代,一统天下。

保持君主的尊严,将天子神化便是这些措施中的一种。虽然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君王也是人,与普通的百姓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身分不同罢了;但是在政权、宗教以及文化的粉饰下,君主变成了天之子,受上天的委托来统治天下,也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为了突出天子的神性,显示出他的至高无上与神圣不可侵犯,便有了种种繁琐的礼仪与手段,来确保天子的神秘与崇高。关于君臣之间的礼仪,历代都有专门的官员来负责训练监督,已经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礼仪文化。其实,对君臣礼仪的重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汉高祖刘邦是一个马上得天下的君主,天下刚刚统一的时候,有大臣在他面前称颂《诗》、《书》等古代典籍对治理天下有用,刘邦责骂道:“我是从马上得到的天下,要这些《诗》、《书》做什么呢?”而且,刘邦是农村中的流氓无赖出身,本人很粗鲁,对待有知识的人并不尊重。俗话说,上行下效,在刘邦这样粗鲁的君主管理下,大臣的样子也就可想而知了。根据《史记》

记载,刘邦大宴群臣,大殿之上,群臣乱哄哄的喝酒,纷纷向刘邦邀功。有的大臣喝醉了,就在大殿里乱叫乱嚷,有的武将甚至拔剑乱砍。这种乱糟糟的样子,恐怕是后世君臣们所无法想象的。

虽然刘邦生性简易,而且不喜欢繁文缛节,但是这样的场面仍然让他深感头疼。那些人毕竟都是老部下,况且素来如此,刘邦一时之间竟然想不出办法。有个叫叔孙通的博士官善于揣摩领导的心意,知道刘邦对此不快,便想好了办法来劝说刘邦,请他给自己权力来解决这件事。刘邦半信半疑地答应了。叔孙通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找来了三十多个受过一定教育的儒生,带着他们一起来给大臣们开办礼仪辅导班,制定了一套拜见君王的规章制度。

训练了一段时间后,该是检验成果的时候了,正好碰上长乐宫落成,于是便付诸实践。只见大臣们再也没有了以前乱纷纷的样子,文臣武将都在各自礼官的带领下,低着头慢慢走近大殿,分列两旁。然后皇帝坐着辇车出来,百官莫不肃静,按照官阶高低来向皇帝表达敬意。进入大殿依次落座后,开始置酒。满朝文武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粗鲁的行为,都低着头伏在地上,按照一定的规矩来向皇帝祝寿。整个宴会,没有一个敢喧哗和失礼的臣子。于是刘邦不禁感叹:“我今天才知道作皇帝的尊贵阿!”从此以后,这套礼仪便制度化,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增饰。应该说,刘邦前后态度的转变,代表的正是君主脱离普通人的倾向,希望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保持尊严和神秘,使人产生敬畏之心,从而听从政令。

应该说,这样的考虑并非全无道理。臣下对皇帝怀有一定的敬畏之心,对于巩固家天下的政权自然是有利的。皇帝

深怕臣子对自己不尊重,怀有反心,因而对敢于触怒龙颜的人决不轻饶。我们都知道,唐代的魏徵是一个出名的直谏之臣。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回到后宫后,怒气冲冲抱怨:“非杀了魏徵不可。”长孙皇后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知道魏徵是正直之臣,急忙问原因。太宗说魏徵今天又和他争辩,一点也不顾及皇帝的尊严和体面,让他下不来台。长孙皇后百般劝解,太宗才怒气少歇。这则故事的本意是讲太宗是个贤明之君的,但是其中透露出的信息颇值得人寻味:即使像唐太宗这样大度恢宏的君主都难以忍受尊严被冒犯,动了杀人的念头;那么,历史上那些不如他的君主的作为也便可想而知了。难怪在封建官场上流传着一句“伴君如伴虎”的箴言,这的确是用血与泪换来的感叹。历代因触犯君主尊严而被处以极刑的恐怕是数不胜数吧。清代一个书生就因为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而被下了文字狱,丢掉了性命。论其原因则令人哑然失笑。原来,统治者认为“清风不识字”有讽刺清朝统治者不学无术之嫌。

极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固然是好事,但是也便有了弊端,那就是很容易被人利用。作为皇帝来说,虽然名义上拥有天下,但是作为他自己的生存空间来说,则小得可怜,也就是紫禁城那一方天地。皇帝偶尔动了出宫的念头,也是兴师动众,更会有官员极力劝阻。宫外发生的事情,他们是根本无法亲自了解的,消息的来源全是靠臣子的奏折,很容易被人蒙蔽和封锁。历代权臣把握朝纲,宦官掌权,后戚专政的教训数不胜数。他们所共有的特点就是献媚天子,取得天子的宠幸,名义上仍然遵奉着天子,保持着天子的尊严,私下里则为所欲为。东汉末年,在军阀混战中,曹操拥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本——

汉献帝。有了汉献帝这个傀儡，曹操便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握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动权。本来想用礼仪保持尊严的汉高祖刘邦若在天有灵，恐怕要对自己的后代保持如此的尊严而啼笑皆非吧。（章 原）

## 7. “弹性限度”莫超越

在通常情况下，世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萌芽、产生、初兴、发展、鼎盛以至衰亡的过程。《周易》六十四卦以《乾》、《坤》两卦开篇，就预示着天地的开辟，万物的萌生。其余各卦，从整体上象征并演绎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进程。《乾》卦各爻都以“龙”为喻象，潜龙—见龙—惕龙—跃龙—飞龙—亢龙—群龙无首，就具体而微、形象生动地表现了这一过程。尤其是上九爻辞“亢龙有悔”，是该卦精蕴所在。它有力地说明了事物发展都有自己的极限，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

《乾》卦说，高飞到穷极之处的龙，终将有所悔恨。《丰》卦彖辞说，太阳正居中天必将西斜，月亮盈盛圆满必将亏蚀。天地大自然有盈满有亏虚，都伴随一定的时令更替着消亡与生长，更何况人事呢？《尚书》说，圆满招来亏损。《老子》说，事物发展到鼎盛就会衰老。这些话都指出了事物发生质变的临界点问题。就自然现象来说，日中、月盈、寒极、暑极，是事物发展的巅峰；但穷极必反，极盛而衰，很快就走向偏斜、亏蚀、暑热、寒冷。人事也是这样。身居高位，如不能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或一味地贪恋富贵荣禄，不知隐退，到头来会出现无可挽回的后果，招来杀身之祸。吕不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吕不韦是战国末期秦国的丞相，出生于卫国都城濮阳的

一个大商人家庭,从《战国策》、《史记》等书的记载看,他从小就跟父亲学做生意,来往于经济发达的卫、赵之间。家庭的熏陶,经商的实践,使吕不韦练就了一副精明的头脑,眼光敏锐,工于心计,善于谋画,特别擅长捕捉重大的商机与时机,成为“家累千金”的大富商。这是他的成长、初兴期。

吕不韦并不满足于商业上的发财成功,他来到赵国都城邯郸,把眼光投向了政治领域,寻觅着一本万利的买卖。当遇到正在赵国做“人质”的秦昭王的孙子异人时,他以为“奇货可居”,便兴冲冲地赶回家与父亲商量。下面是儿子与父亲的一问一答:“耕田的利有几倍?”“十倍。”“做珠玉买卖的利有几倍?”“百倍。”“如果立一个国王,利有几倍?”父亲愣了好一会,才从嘴里挤出两个字:“无数。”吕不韦认真地对父亲说:“现在拼命耕田,也只能勉强做到吃饱穿暖;若能资助一个人当上国君,我就能做上高官,享受荣华富贵,还可泽被后代。我要去做这样的买卖。”这段出自《战国策》的话,奠定了吕不韦一生事业成功的基础。此后,他结交、劝说异人,送 500 金给他做活动经费,又把自己有身孕的情人——容貌娇艳、能歌善舞的赵姬送给他做妻子。赵姬后来生一男孩,名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他又用 500 金买了珍宝到秦国活动。到了咸阳,他重点公关秦昭王太子安国君妻华阳夫人,投其所好,送其所需。针对华阳夫人无子,他晓以色衰爱弛、难以持久的道理,使安国君夫妇愿意接收异人为嫡子。安国君夫妇请吕不韦做异人的老师,辅助、提携异人。后来秦攻邯郸,在秦、赵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吕不韦又拿出 600 金打通关节,帮助异人逃出邯郸,让赵姬带着儿子躲藏在赵国的富豪家里。异人回到咸阳,更名为子楚。以后安国君(孝文王)继位,子楚为太子,



赵国送回赵姬和嬴政。孝文王只做了三天秦王就猝然死去，子楚(庄襄王)继位，任吕不韦为相，封为文信侯，以蓝田十二个县为其食邑，后改为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庄襄王在位3年就死了，年仅13岁的太子嬴政继位，吕不韦继续任相，并以“仲父”的身分辅政。吕不韦在秦任相达13年，大权独揽，声势显赫，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把秦的统一大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有感于荀卿等著书流布天下，为了给秦国制定治国方略，弥补秦国缺乏文化积累的缺憾，他又召集门客，主编《吕氏春秋》，对先秦的思想、文化进行了系统整理和总结。吕不韦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上多有建树，犹如“飞龙在天”，他的事业走到了辉煌的顶点。

以吕不韦为人的精明、治国的英明，他并非不知道持盈保泰之术，如《吕氏春秋》说：事物完满时便开始缺失，达到极点便开始返回，充盈时便开始亏缺；事物形成之后便开始毁坏，超过一定限度便开始衰败，有锋利的棱角便会倾斜，有作为便会亏损……富贵的人如果不懂得持盈止足之道，富贵便成了自身的祸害，还不如贫贱的好。《吕氏春秋·序意》中黄帝教诲颡项的故事，可以看作是吕不韦对秦王嬴政的教导。吕不韦赶在嬴政登基的前一年，以“一字千金”的轰动效应发表《吕氏春秋》，就是想为秦朝确定基本的政治路线，进而保住吕氏集团的利益。但此时，他想抽身隐退已不可能，他与太后有暧昧关系，因碍于秦王的逐渐长大，加上自己精力不济等原因，错误地推荐嫪毐，使嫪毐的势力迅速膨胀，成了一种能与自己抗衡的力量。秦王是一个有魄力、有作为、随时都想集权、独揽朝政的国君。这使吕不韦想到自己数十年奋斗的成果岌岌可危；再加上他本人雄心勃勃、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天性，

他不想轻易服输。

秦王登基以后,吕不韦成了一条实实在在的“亢龙”。尽管他与秦王是一对特殊的君臣关系,二人在天下统一问题上意见基本一致;但是在治国方略的选择、如何统治等方面,二人有比较大的分歧。更主要的是,秦王专独的性格,容忍不了以“仲父”和导师身分凌驾于其上的丞相的存在。吕不韦的悲剧是必然的。嫪毐叛乱是其悲剧开始的导火索。这次叛乱很快被彻底平定,吕不韦受牵连。秦王因其侍奉先王功大,不忍致法,仅罢免了他的相,留文信侯爵,逐其“就国河南”。按秦国法律,这种撤职处分还是比较轻的。吕不韦到河南封地,如果能深刻反省,向秦王表示“悔过”之心,或偃旗息鼓,纵情享乐,就有可能舒舒服服地安享晚年。但被逐出咸阳的吕不韦很不安分,据《史记》记载,一年多后,在通往洛阳吕不韦领地的道路上,纷纷不断地来往有东方各国的使节宾客,让秦王感到威胁未除,便给他下了一道诏书:“你对秦有何功劳?秦封你河南,食十万户。你与秦有何亲情?号为仲父。令你与全家迁徙蜀地。”这种全盘否定的结论,要了吕不韦的老命。吕不韦为顾全大局,没有反抗,就饮毒酒自杀了。其门客因为其“窃葬”,或驱逐,或流放,多数受到了极其严厉的处罚。

吕不韦之后,曾受其提拔、推荐的门客李斯继任秦相。李斯的子女多和秦始皇的子女结亲,可谓位极人臣,炙手可热。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的长子李由从三川守任上告归咸阳,李斯在家中摆宴为儿子接风,百官前来祝寿,门庭若市,李斯不禁喟然长叹。他曾听老师荀卿说过:“物禁太盛”。自己原来只不过是上蔡的布衣平民,今受秦始皇的提拔,位仅在一人之下,富贵之极,但“物极则衰,吾未知税驾(解驾、休

息,指吉凶转化停留的地方)也!”李斯是秦朝为数不多的、有政治见解、有贡献的大臣之一,但他贪恋禄位,不敢坚持己见,缺乏气节,最后和秦二世、赵高这些昏君佞臣沆瀣一气,以谋反罪被腰斩灭族。“亢龙”不能悔退,步了吕不韦的后尘。

汉代扬雄说:“位极者身危,自守者身全”(《解嘲》)。功成身不退,灾祸紧相随。文种、吕不韦、李斯、韩信……,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功高震主的名臣惨遭杀害,“亢龙”多有悔吝!但如果“亢龙”通晓进退之术,不贪恋富贵利禄,刚而能柔,穷而知反,则吉祥。综观历史,有五种“亢龙”虽有悔吝,但多能善终。第一种是诸葛亮一类人,尽心扶持幼主、匡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二种是曹操、司马懿一类人,“挟天子以令诸侯”,把黄袍当衬衣穿,自己成为实际上的“飞龙”,而将皇帝变成亢龙。第三种是曹参、陈平、金日磾一类人,韬光养晦,守谦自污、避嫌自保,尽量不引起君主的猜忌。此种人由于心存戒虑,小心翼翼,或故意纵情声色,不思上进,既为官又保身,得以两全。第四种是范蠡一类人,向君主辞官没被批准,便不辞而别,带了西施和金银珠宝,乘着一叶扁舟,涉三江,入五湖,后来化名陶朱公经商,发了大财,又成功地干了一番事业。最后一种是张良一类人,功成身退,逍遥自在,安然地享受生活。

“亢龙有悔”在今天,仍具有借鉴与启迪意义。国外,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那蒸腾的泡沫经济,带来了今日的经济大衰退而很难恢复元气。就国内来说,“大跃进”带来的却是经济的大破坏。野心勃勃、权力欲熏天,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官员,总有一天会被摔得粉身碎骨。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在职业选择方面,要知己知彼,小心谨慎,注意扬长避短,既要敢

于啃硬骨头,知难而进,开拓创新;又要穷而知返,知难而退。比如身体不合格,却一心想当飞行员;缺乏艺术天分,没有起码的审美感悟力,却想成为一流的艺术家的,不管怎样努力,多会事与愿违。要充分估计自己发展的极限与潜力,“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另辟蹊径,有可能别具洞天,硕果累累。如跳远,向后退是为了更好的向前进。当人生事业走向成功、迈上顶峰时,要珍惜、戒惧,防止矛盾过早、过快地向对立面转化。所以,人生有进也有退。尊重规律,时进则进,时退则退,动静不失其时,刚柔相济,就可能成功。躁动与亢进,犹如“狂马奔崖”,必有悔吝! (王启才)

## 七、养生篇

### 1. 扶正祛邪阴阳通

话说晚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农历九月的一天,北京紫禁城中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即史称明代“四大奇案”之一的“红丸案”。正史为尊者讳,说不清楚;但综合各种史料,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九月之后,天气凉爽。光宗皇帝好女色,乘着一好气候,就想吃点补品助阳,以便进御时尽兴。他命内侍崔文昇召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服用,美其名曰“仙丹”,实际就相当于今天春药一类的大补之剂。皇帝服下红丸不久,整座皇宫喧腾,说是皇上一夜驾崩。经御医检查,红丸的确并非毒药。一个三十几岁的青春皇帝,为什么会在服用红丸之后立即一命呜呼了呢?这是不是有奸人暗害?正在中外汹汹之时,御史王安舜稍通医道,他上疏指出:“先帝(指光宗朱常洛)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按:即红丸)乃……阴中之阳,纯火之精,投于虚火燥热之症,不速之逝乎!”(见《明通鉴》)说来是见怪不怪,原来朱常洛因纵欲过度,肾精亏涸,阴虚阳亢,早已精力不支;加以庸医奉命,为一时助兴之需,误投以亢阳大补之红丸,这犹如



火上浇油,膏油尽而灯火灭。其人阳极亢奋而阴精殆尽,阴阳二气睽违不通而相克,遂致龙殡归天。从中医的角度看,一个人体内,阴阳二气交通流贯则生机勃勃;反之,只阴不阳,或只阳不阴,阴阳二气违和不通,则疾起身灭。所以中医治病,首先重在阴阳和谐而气脉通畅。一个“通”字,其间寓有深刻的医、《易》相通的生命医学道理。

中医认为,自然是个大宇宙,人的身体则是一个小宇宙。人与自然,存在着同步共构的动态关系。因此,阴阳变化之道,原理一样。《黄帝内经》强调医生治病,“必先知天地阴阳”而“无伐天和”,又说:“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生死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因此,中医之道,最讲究阴阳平衡,要求进行综合、全面的辩证施治。论其方法来源,当与《周易》的八卦、六十四卦的阴阳矛盾观念有关。《周易》书中,并无关于“阴阳”的具体文字,但它以其古代巫术符号系统,确凿无误地构建了自己的思想理论和对世界的独特认识。《周易》以符号—代表阳,以符号--代表阴,阴阳矛盾对立,阳刚之气与阴柔之气交交流贯而运动不息,不断组成新的和谐统一。宇宙万物,其中包括人类本身,因而生生不息,富有生命活力。

《周易》符号系统,有所谓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名目。以阴(-- )与阳(—)三爻交互排列组成八卦;两个八卦重叠,上下二卦阴阳六爻重新排列组合,推出了六十四卦。八卦和六十四卦各有自己的象征物及其卦德卦性。就以八卦中的乾(☰)、坤(☷)为例,乾为天,象征义为健;坤为地,象征义为顺。除代表天与地之外,相关义还很多:乾为男,坤为女;乾为父,坤为母;乾为君,坤为臣;乾为上,坤为下;乾为昼,坤为夜;乾为日,

坤为月；乾为暑，坤为寒……。天地、男女、夫妻、父母、君臣、上下、昼夜、日月、寒暑、向背等等，实际组成了一对又一对阴阳对立统一的矛盾概念。所以后来《易传》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最最基本的宇宙原理。自然如此，人也一样。天地自然一旦阴阳违和，风雨失调，地球就会生“病”而天灾频降。如最近的厄尔尼诺现象所带来的世界灾难。人体内的阴阳二气，如果因体内中焦堵塞、上下不通，或是只吃不拉，不能一气流转，同样也会生病。上述明光宗之死，就是阴阳二气严重违和失调所致。这是反面的事例。相反，如果能发现并注意阴阳交流、和谐通畅是保证身体健康的关键，因势利导，则可化弱为强而转危为安。阴阳气通，一个“通”字，就是养就生命活力的源泉。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有一则调理慢性疾病的故事：

王文正太尉气羸多病，真宗曾赐药酒一注瓶，令空腹饮之，可以和气血，辟外邪。文正饮之，大觉安健，因对称谢。上曰：“此苏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苏合香丸一两同煮，极能调五脏，却腹中诸疾。每冒寒风兴则与饮一杯。”因各出数榼赐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仿之，苏合香丸盛行于时。

宋真宗之言，颇合医、《易》相通之道。看来王太尉的“气羸多病”，与所患慢性心血管疾病有关。苏合香丸及其浸润之酒，正是古代中医具体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良药。其药物作用是“入心以通窍，辟邪以开闭”。因为气血堵塞，“不通则痛”；药到病除，则是燮理阴阳，故而“通则不痛”。所以苏合香丸之类，至今仍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良方。不仅是治病有效，即是平时没病，喝一点苏合香酒，保证气血流畅，循环道通，辟邪开

闭,促进了正常的新陈代谢,其实这同时还具有防疾于未患的养生保健功效。

于此可见,“阴阳”二气并非中医浪言,而是源自上古《周易》的至理名言,从而开启了中华医学的优良传统。今人山东大学《易》学专家刘大均指出:“‘中医’不是‘中国之医’之简称。而是医、《易》结合的一个概念。肇自《易》卦的‘尚中’思想观念。以《易经》中的原理治病,恢复阴阳平衡,即是‘中医’。”原来,《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六爻,第二爻居下卦之中,第五爻当上卦之中,二者象征事物坚持中道而不偏不倚。按《易》卦六爻,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是阴位。若阳爻居五位,阴爻当二位,阴阳处中,上下互应又各当其位,则称中正,是事物尽善尽美的吉祥象征。中医之“中”,即源于《易》卦阴阳气通、扶正祛邪的中正平和。其实,这一医、《易》相通的阴阳医学,不仅影响了中华的中医,同时还扩展海外,具有一定的世界影响。比如近年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记者徐尚礼的专访文章,说明朝鲜医道,是李济马根据“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易传》哲学思想而创立的四象医学。四象医学不仅解释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又根据人体脏局阴阳盛衰变化,把人分为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象的人,通过独特的生理、病理、药物、临床的理论和疗法,维持了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与中国的中医相比,具体治疗方法有异,但论其讲究阴阳矛盾辩证施治的医学观念,则共同起源于《周易》,可说是异流而同源。这又可从宏观鸟瞰的视角,看到了《易》理阴阳在根本观念上对世界医学的影响与贡献。

(蒋 凡)

## 2. 颐养以正说养生

宇宙自然，一阴一阳，矛盾统一，生生死死而流动不息。千万年的人类进化发展，也是生老病死，无一能免，这是客观的自然规律，不管是帝王贵胄也好，平头百姓也好，谁也无计相回避。但是，人同样活着，寿命有长有短，身体的健康与否，关系到生活的质量。一个人如果一生都病歪歪的，吃喝拉撒睡都要人家伺候，这样的生犹如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因此，人生的健康长寿，不仅是人的理想愿望，而且已化为实际行动。不过，人们在健康投资方面，一般只注重生病求医，有疾治病；而对防患于未然的预防和养生医学，则缺乏意识而大多漠然视之。人或以为，大吃大喝就是享受，这样可以大量吸收高蛋白，高营养，一定有利于健康，实际不然。更有甚者，有人盘剥百姓以厚自奉养，终日征逐酒色财气，认为这就是最好的养生，这实在是对养生之学的最大歪曲。汉初枚乘《七发》赋指出：

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饮食则温淳甘脆（脆），脰（肥肉）醢肥厚。衣裳则杂遘（众多貌）曼暖，焯烁热暑。……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與入輦，命曰蹇痿（麻痹疯瘫之症）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窳（懈怠萎弱）；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宴，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

楚太子的厚自奉养,如此养生,只会走到事物的反面。太子山珍海味,羊羔美酒,营养过泰过甚,身体吸收不了,反而破坏了身体的正常消化功能,有害健康,所以枚乘称之为“腐肠之药”。日夜与后宫的万千美女厮混,征歌逐舞,追求性刺激,伤阴损阳,过分纵欲当然有害健康,所以称为“伐性之斧”。整天出门车辇,脚不行走,缺乏运动,长期如此,自然影响血脉之畅,筋骨僵硬,从而造成痲痺残疾。这就从反面说明,营养过泰过甚,羊羔美酒也会化为促寿的毒药。这都是由于不明《周易》那颐养以正、延年益寿的古训所致。

《周易》六十四卦中并没有专设的医卦,但许多卦的卦象爻义及卦爻辞,曾从养生医学角度进行总结,体现了中华古人的文明智慧,并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周易》对养生保健、预防疾病给予高度的重视,如《豫》卦(䷏),上卦震(☳)为雷,下卦坤(☷)为地,大地雷动,人心振奋,象征欢乐。保持欢乐的心情有利于身心健康,这是养生保健的重要内容。其六五爻辞说:“贞疾,恒不死。”贞,正也;疾,病也。爻辞是说,人们如能坚守正道,内心愉悦,就有利于健康长寿而不会暴病夭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人的医学认识。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象传》解释说:“贞疾,乘刚也。”按照卦形爻位的动态分析,《豫》卦六五阴爻居尊位,居位不中不正,又乘凌于前爻九四阳刚之上。从医学角度看,犹如一个好胜之徒,争利逞强,纵乐过度,阴邪之气侵袭了阳刚正气,破坏了人体正常的气血运行,因阴阳失调而导致疾病的发生。有鉴于此,《易》卦作者呼吁人们提高警惕,持正防疾,事先预防,消解病患,从而促进健康。所以《象传》又发挥说:“恒不死,中未亡也。”也就是说,人们应该努力锻炼,事先培养其中正阳刚的浩然正气,行不愧惭



于朗朗乾坤,内心坦坦然,这才能达到“恒不死”的保健目的。所以《乾·象传》又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们内在浩然正气的激荡,增强了机体抵抗阴邪之气侵扰的能力,自会永葆生命活力而健康长寿,这就是《豫》卦六五爻辞所称“恒不死”的奥秘之所在。这对后代的养生预防医学很有启发。

又如《颐》卦(䷚),上卦艮(三)象征山,下卦震(三)象征雷,山有抑止之义,雷有振动之义,山下雷鸣,下奋动而上知止,犹如口中上下牙齿咀嚼食物,食饱知味,适可而止,所以象征颐养之道。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又有谁能离却颐养而侈言健康长寿呢?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食”,都能适合人类的营养需要。《颐》卦辞提醒我们:“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意思是说,颐养之道,养之正则吉祥如意。言外之意,不以其道而饮食,如沉溺酒宴,夜以继日,效果适得其反,伤身害命而有害健康。所以《彖传》解释说:“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颐之时义大矣哉!”就社会生活而言,所谓“颐养”,实际是扩大了的人类养生学。而颐养之道,又分为物质生活的养生与精神生活的养生两大方面,如汉朝鲁匡所谈:“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见《汉书·食货志》)其所称“酒”,是“酒食”的省称,泛指一切美味佳肴。色、香、味俱全的酒食,大大刺激了人们的食欲,增强了消化吸收功能。这样的“扶衰养疾”,不正与后世的药膳食补的养生之道相通吗?这是物质方面的颐养。又汉朝马融《广平颂》云:“夫乐而不荒,忧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脏,颐养精神,致之无疆。”(《后汉书·马融传》)这里说的是精神心理方面的颐养之道。心平则气和,不过泰过甚,心理健全,精神愉快,全在自己平日的培

养,这样有利于生理方面的平和腑脏,从积极方面为身心健康和长寿幸福创造了优良的条件。由此可见,颐养以正,则精神化物质;两种颐养相结合,则有利于人类的养生保健,预防疾病,益寿延年。

(蒋 凡)

### 3. 勿药有喜说预防

唐文宗李昂于大和七年(833)十二月得风疾(即中风),一时不能说话,不仅无法正常料理国家政事,就是个人生活要求,也常难以言传。他虽贵为皇帝,却同样被疾病闹得苦不堪言,后经宦官头目王守澄推荐当时任昭义行军司马的郑注加以医治,几个月后,终于逐渐恢复健康。于是举国称贺。当时任苏州刺史刘禹锡于大和八年春,写了《苏州贺皇帝疾愈表》称贺,其中有“百神奔走以来扶,四海精诚而致感。勿药有喜,如山永安”之言。所谓“百神奔走”云云,作为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刘禹锡,不过是旧时颂辞的一种客套话,不能当真;而“勿药有喜,如山永安”的话,才是贺表的精神所在。意思是希望人们加强身体锻炼,增强健康素质,以便增加预防疾病的内在能力。其“勿药有喜”之言,直接肇源于《周易》,见于《无妄》卦九五爻辞云:“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无妄》卦(䷘)的卦象,上卦乾(☰)为天,下卦震(☳)为雷,天下雷动,声威吓吓,谁敢胡作非为而妄行?所以象征不妄为。身不妄为,持之以正,心安理得,自然有利于养生防病。凡是在生活中胡作非为、倒行逆施的人,虽然可能得逞于一时,但在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常有不安,或是怕人报复,步步防范,内心早已失去平衡,长期阴阳失调,怎能不得迷狂

之疾或是加重病症呢？因此，治病之先，就应该提倡预防为主。后来晋朝葛洪就在《抱朴子·用刑》篇中继续加以发挥说：“明治病之术者，杜未生之病。”唐文宗所患是中风病，依靠药物疏通血气，通窍开闭，当然也有一时的作用；但其中风，说明是脑血管硬化或脑血栓等内在本质性的问题，一旦药物撤除，常会旧病复发。史载刘禹锡精研医理，刘氏家族内的疾病，常是由他自己医治。他认识到健康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深入一步地指出“勿药有喜”的预防思路。只有平时加强身体的适当锻炼，才能克服中风痼疾。除此之外，《无妄》卦九五爻辞还另有深意。“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大意是说，身不妄为而偶染微疾，不必服药而有自癒之喜。《无妄》九五之爻，为一卦之主，阳刚中正，下应阴柔之六二，上下阴阳呼应，自然和谐，犹如身体素质强健，增强了内在的免疫力，所以偶然生点小病，无须服药而疾病自然消失，这就叫做“有喜”。当然，这不是否定药物的治病作用。因为“勿药有喜”是有条件的，其前提是身心“无妄”，即遵循生活的客观规律而秉正以行，身心和谐安泰。不过，体内的阴阳之气永远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在冲破暂时的平衡和更高一层的新的平衡到来之前，也会出现阴阳互为消长、比例暂时失调的现象，因而有时身体偶有不适的反馈，也属正常的范围，只要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提高体内的抵抗力，便能自然克服，无须服药。所以唐朝孔颖达在其《周易正义》中阐释说：“若疾自己招，或寒暑饮食所致，当须治疗；若其自然之疾，疾当自损（自行消失），勿须药疗而有喜也。”古人尚且有此先进认识，但今人有时反而落后。现在社会实行公费医疗及劳保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尚未在全国推行，更有一部分持“红卡”者，医药费用仍然是政府全部报销而享

受优等服务,因而医药费用节节上升而大大超标。公费医疗、劳保及医保,原是一件事关社会保障体制的好事,但是却有少数人不自觉,专门钻吃药不要钱的空子,无病呻吟,小病大养,让医生胡乱开了一大堆贵重补药,结果,老实人一旦有病,却因单位的医疗费用大大超支而无法报销,因而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这是一种不自觉地损害别人的胡作妄行。其实,看得深透一些,这不仅害别人,同时还是害自己。这些“聪明人”自以为占了国家的便宜,实际却是误人害己。不是对症下药而胡开补药服用,怎能治好疾病?因而这些人常是进医院而长住不癒。这就从无病——小病——大病——最后转化为不治之病,成了杀害自己的真凶。这又从反面说明了《无妄》九五爻辞的正确,并揭示了古代提倡“养之以正”预防医学的意义。

另外,六十四卦中还有一个艮卦(䷳),上卦和下卦都是艮(䷳)。艮象征物为山,其性为止;大山嶂峦重叠,巍然止而不动;因此艮卦象征抑止之义。抑止邪念恶习,同样是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保证,因而构成了古代养生保健之预防医学的重要内容。如果说《无妄》九五爻辞的“勿药有喜”,是从锻炼身体积极方面来抗病防灾;那么《艮》卦则是从负面的消极方面来抑止邪念恶习,进行预防。《彖传》曾发挥了《艮》卦的义理说:“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自然如此,社会如此,人的身体亦然。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但是,人也不能毫无休止地运动,长期超负荷的激烈运动,常会破坏健康,毁灭生命。如最近喀麦隆国家足球队的著名球星福,就倒在奔跑的球场上,永远告别了人世。人生健康,动与静必须适当。该行则行,该止则止。当然,《艮》卦的抑止,其目的在于制止盲动和邪念妄为,而不是禁止一切合

理行为和有利健康的行动。其所谓“止”，实际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增加新生命新活力的加油站。人在尘寰，受世俗生活的影响，不可能绝对六根清净，偶有邪念私欲恶性膨胀而养不以正的时候，比如吸毒等违法行为，实际是在毁灭可爱的生命。在这种条件下，无论是政府、社会和个人都必须当机立断，以《易》治心，如《艮》抑止，以正制邪，因势利导而顺应自然，以尽快恢复那“动静不失其时”的阴阳平衡。这样疾患自退，身体健康，自然就“其道光明”了。不过反过来说，人生一世，身体再康强的人也不可能保证永不生病。如孔颖达所说：“若疾自己招，或寒暑饮食所致，当必治疗。”这就说明《易》理虽然重在预防，但又并不讳疾忌医；而是提倡有病就要早看，积极治疗以便保证健康。（蒋 凡）

#### 4. 以《易》治心疑病消

要治病，先治心。精神因素、心理残疾，同样是人类致病的重要原因。读了《周易》之后，经过深入思考，自会明白治病治心的道理。而谈《易》可以清心，净化人的灵魂，这是中医界所承认的。

《易》理非常重视防病治病中的精神心理因素。比如《兑》卦(☱)，上下卦皆兑(☱)，象征欢欣愉悦。八卦之中，兑象征泽，其性为悦，两泽交相滋润，即使处在困境，能够相濡以沫，也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一种精神力量。《象传》就此发挥说：“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丽，附丽；丽泽，即两泽相叠。而所谓“朋友讲习”，就是一种精神颐养。汉郑众注曰：“乐耽于酒，则有沈酗之凶；志累于乐，则有伤性之患。所以君子乐之美



者,莫过于《尚书》、《诗》,敦习道义,教之盛矣,乐在斯矣。”(见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续编三种》引)由于汉朝是儒家经学盛行的时代,所以当时汉人盛称阅读《诗》《书》、相互切磋,能够提高精神境界,愉悦心胸,有利于身心健康。今天时代变了,我们不必复古,但领会精神实质即可。说白了,就是读点情趣高尚、内容健康的书刊,或是干一点有益的公众活动,比如听一场奥地利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奏的新年音乐会,都一样有益于人的身心愉悦。人的精神一旦开朗愉快,那对身体健康是大有好处的。即使在病重之际,人们还是坚持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于此可见精神食粮对于身心健康的重要。所以,《兑》卦九四爻辞说:“介疾有喜。”王弼注:“介,隔也。”疾,泛则指一切邪欲恶习。爻辞意思是谈,能够隔断甚至进一步杜绝邪恶之欲,改换为“朋友讲习”的良好风气,自然无灾无病,欢欣同庆。这就说明了精神治疗的积极作用。相反,如果只是一味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而不去建设欢乐的精神文明家园,鼠目寸光,则将悔之莫及。试想,在花天酒地的暂时物质刺激过后,留下的只有空虚无聊,整天精神闷闷不乐,心理压抑,由于神经指挥系统的失控,造成了内分泌系统的混乱,容易招致种种疾病,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而一旦生活的重压超过一定限度,精神负荷超载运转,就很可能因其极度紧张的心理情绪,如失恋痛苦、失业无望、仇人追杀、惊恐疑惧、恶梦呓语等等,精神堤防崩溃,终于产生虚幻之象,最后导致了精神残疾。这种精神残疾的病根常在一个“疑”字,处处以为人家要算计自己,受人暗害。因而会发生青天白日之下看见“载鬼一车”的幻影(《睽》卦上九爻辞)。据此,则预防和治疗精神疾病,便需用至正至明以释其疑虑。一旦疑云消散,

情绪安定,则疾病自然冰释而精神恢复正常。因此,一旦发现心理有不正常时,就须诱发理智,调控心理,稳定情绪。如《损》卦(䷨)六四爻辞所说:“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爻辞大意是,人们应当医治那因柔弱疑惧而造成的心灵创伤,及时减损思恋疑虑的痛苦,迅速跳出孤独苦闷的小天地,投身于阴阳和合的大地母亲的怀抱,积极参加社会群体的活动,必无咎害而致“有喜”之欢;相反,精神患者如果永远封闭在个人疑妄丛生的小圈子中,怎能不病上加病呢?若是社会大家庭能够及时关怀,伸出友爱之手,加以心理医生的正确疏导宣泄,使患者疑妄尽消,则利于治病救人,有助于恢复健康。爻辞所说“使遄有喜”,重在说明了人类社会对于精神患者的共同爱心和责任。

阅读《节》卦(䷻)。对于防治精神疾病也同样有帮助。《节》的上卦坎(☵)为水,下卦兑为泽(☱),仍然是一湖之水。水上加水,大泽漫溢,则将有洪水泛滥之灾,怎可不加节制和预防呢?因此,如筑堤修闸之类的建设,是早该预备之事;对于精神患者,心理堤防和闸门也一样起到节制和疏导的作用。不过,节制有道,节不以正,超过限度,成为“苦节”,则效果适得其反。此所以《节》卦辞有“苦节不可贞”之言。贞,正也。王弼注:“为节过苦,物不能堪也;物不能堪,不可复正也。”七情六欲,悲怨喜怒,人皆有之,各种心理情绪,利于疏导而不可强加压抑。因此,即使是偏激愤怨之情,也必须为它寻找一个突破口加以宣泄,方可恢复正常。相反,过分克制和压抑,闷在心中而不与人通,则容易导致心理变态或其他精神残疾。据奥地利精神病专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压抑与变态心理是必然联系的。所以《周易》作者断言“苦节”为“凶”,颇

合于科学精神。“苦节”与“甘节”是一对矛盾，二者相反相成。明东林党魁左光斗说：“凡过心过形皆苦，去其太甚则甘。”人们如能因势利导，顺应自然，解放那久被压抑的情绪，则能化“苦”为“甘”，有利健康。所以《节》卦九五爻辞大书特书：“甘节，吉。”“甘节”与“苦节”，一吉一凶，两相比较，作者提倡什么，否定什么，十分明白。汉代淮南王刘安《淮南子·原道训》说：“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提倡积极的疏导和宣泄，以取得内在的心理平衡。相反，有些“以礼乐自防”的伪君子，他们主张禁欲苦节，造成了强烈的内心压抑，导致了严重的情绪混乱和心理变态，形成了精神病患。刘安在《精神训》中严加批判：“出见富贵之乐而欲之，入见先生之道又说（悦）之，两者心战”，于是这些伪君子就“迫性闭欲”，故意“雕琢其性，矫拂其情，以与世交。故目虽欲之，禁之以度；心虽乐之，节之以礼，……外束其形，内总其德，钳阴阳之和，……故终身为悲人。”这就从正、反两方面，形象地描绘了《周易》有关“甘节”与“苦节”的利弊。心战于内，失衡于外，日夜折腾，精神怎能不崩溃？寻根究源，虚伪的禁欲“苦节”，实是精神患疾的病灶之所在。

最后，注重精神心理因素，化消极为积极，是《周易》涉及医道的又一重要方面。如《离》卦（☲）九三爻辞云：“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大耋（diē），极言人之年老。这从反面告戒人们，应该如何进行积极的思考。黄昏时刻，面对垂丽西天的如血残阳，这时的老人，如果不去敲瓦盆歌唱，自得其乐鼓舞精神，而是触景生情，叹老嗟卑而兴人生日暮途穷之悲，那就入于凶险了。精神一旦崩溃，促使内分泌紊乱，致其生理功能衰竭，从而加速生命的老化直至死亡。这就启

示我们,人们(特别是老人)应积极“击缶而歌”,说白了,就是尽量做些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保持昂扬开朗的心绪,化为欢乐的乐章,重新激发生命活力,才能继续为世界文明作贡献。反之,萎靡不振,从精神上摧垮自己,则无疑是自息其生命之火。可见,《离》卦的“击缶而歌”之喻,形象生动,含义深刻。心理及精神因素之于医道,确实重要;所以《易传》用“圣人以此洗心”一语来加以概括。“洗心”之说,就是思想情绪的中正平和,是精神灵魂的净化升华,这样,就会精神化物质,因内心愉快而转化为生理机体的健康并益寿延年。 (蒋 凡)

## 八、阐释篇

### 1. 《易》理暗合计算机

前几年,在《周易》热潮兴起的时候,有一种观点很是盛行,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认为《周易》促进了计算机的诞生。这种说法越传越广,甚至到了后来,不论懂与不懂《周易》的人,都这样说:“《周易》好厉害。没有《周易》,就没有计算机。”但这种观点现在似乎逐渐销声匿迹了,为什么呢?因为以讹传讹的时髦话语,只不过是一桩虚假错案。那么,《周易》与计算机是否有关系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桩公案的真相。

《周易》的《系辞上》有一段话:“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里的太极,表示混沌未分的状态。如果从数学的角度来看,则是一。那么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换成数学符号,则是一( $2^0$ )、二( $2^1$ )、四( $2^2$ )、八( $2^3$ ),稍微懂点数学的人都知道,这是采用二进制的系统。

两千多年后的欧洲,德国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1646—1716)把这层迷雾揭开了。莱布尼兹酷爱中国哲学,读过孔子传记,对中国古代的哲学和学术抱有浓厚的兴趣,并



且进行过一番研究,是一个“中国通”。1697年在他编辑的《中国最新消息》中,他写道:“中国和欧洲各居世纪大陆的东西两端,是人类伟大的教化和灿烂文明的集中点。”对中国的文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有关中国的知识,都是通过阅读中国的书籍和听到过中国的人的转述两种渠道获得的。他与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教士有密切来往,其中最主要的是常居中国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从1679年开始,双方开始通信往来。白晋对数学也很有兴趣,于是数学便是他们通信中常常涉及到的话题。当时莱布尼兹正在从事二进制方面的研究,1701年2月,他将自己最新创制的二进制数表寄给了白晋。同年11月,白晋在回信中认为,二进制与《周易》中六十四卦图的符号是有联系的,并且随信将宋代邵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和方位图寄给了莱布尼兹。莱布尼兹接信后大为惊讶,他惊喜地发现,中国古老的《易》图与二进制有神奇的契合之处。在给白晋的回信中,他充满敬仰之情地说:“你的来信提到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的二进制数学与伏羲《易》图之间的关系……,这个《易》图可以认为是现存科学之最古老的纪念物,然而依我之见,这种科学虽为四千年以上的古物,但数千来却无人理解它的全部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然它与我的新数学完全一致。”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莱布尼兹的二进制发现在前,而看到友人所寄的《易》图和六十四卦次序在后,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说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是受到了《周易》的启发。何况,莱布尼兹的理解还有误差,邵雍的《易》图创制,距离他不过四五百年的时间,绝非几千年的古物。他将《易》图与《周易》经典混为一谈了。二者虽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并非一回事。20

世纪40年代,电子管诞生了,并应用于计算机技术,在设计中,采用了二进制算法,从而揭开了电脑时代的序幕。这是二进制数学最有效和最有价值的应用。这恐怕是莱布尼兹在发明二进制的时候也没有想到的吧。

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种认为《周易》促使了计算机诞生的说法,就是没有搞清楚莱布尼兹发明二进制和看到邵雍《易》图以及六十四卦时间前后次序,认为莱布尼兹先看到《易》图,受到启发,发明了二进制数表。在事实面前,这种说法不攻自破。我们只能说,《周易》当中包含了二进制的思想,而且《易》图可以用二进制数学来解释;但绝不能将《周易》与计算机的诞生直接拉上关系。

《系辞》和《易》图在中国流传历史悠久,然而中国人始终未能再进一步,从理性和抽象的角度进行高一层面的数学总结,却让莱布尼兹后来居上,这从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数学的悲哀。难怪莱布尼兹在发现了二进制和《易》学的相似之处后,兴奋地说道:“几千年来不被很好理解的奥秘由我破解了,应该让我加入中国籍吧!”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莱布尼兹并没有因此就低估中华民族的智慧,相反,他更加关注这块神奇的土地。他通过白晋等传教士,继续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现状,并主张东西方文化和学术的平等交流,希望中国也能像西方那样,建立学院和大学等研究机构。有人认为,莱布尼兹还给当时的中国皇帝康熙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希望能够与中国同行一起研究八卦、进行学术合作的愿望,并且送给康熙一台他发明的手动计算机。可惜他的理想和康熙“闭关锁国”的信念极端冲突,未被采纳。这种说法并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或许是人们美好的愿望也未可知;但是,从莱氏热

爱中国文化的情结加以考虑,人们想象中的“中西”文化合作之事,也有其内在的合理因素,可能是酝酿中的设想,而并非真的实现之事。这与中国现代的电视剧或小说家言,虚构康熙皇帝如何大胆引进西方思想相比,同样有待历史论证。但是孰合理孰荒唐,明眼人不难分辨。

虽然我们古代的数学家们未能继续走出一步,但是从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周易》中蕴藏着精妙的数学智慧。那么,除了二进位的思想,还有什么呢?我们再简单地对此加以介绍。《周易》给人的感觉神秘莫测,很大程度上与其中玄妙神奇的数字有关。例如《系辞》中关于占蓍的叙述就很典型,这段话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说,大致如下:用于占蓍的蓍草有50根,称为大衍之数。占筮只用其中的49根,将这些蓍草任意分成两组,再取出一根。然后分别4个一组地数,将剩下的蓍草放在一边。同样的过程重复三次,就可以算出一爻;一卦有六爻,那么就要重复18次,才能得出一卦。《系辞》中还说,1、3、5、7、9是天数,2、4、6、8、10是地数。天数5个,地数5个。天数之和是25,地数之和是30。两者相加,共55,是为天地之数。单单一个《乾》卦的运算,需要使用蓍草216根次;一个《坤》卦,需要使用144根次;两者相加,就是360,与一年的天数基本相合。八八六十四卦的推算,一共需要蓍草11520根次,在古人看来,这已经足够代表万物了,所以是万物的总数。从这里可以看出,《周易》的占筮,实际上是纯粹的数字之间的换算。因为当时数学知识并不普及,所以很能迷惑一般人。数学在《周易》的传播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代《易》学中的象数派,除了象征意义的“象”之外,称数变化运用的“数”,也成了解读《易》理的另一基础。舍象数则无以明义理,

这已经成为古今破译《易》理的一个准则。

在《易》学范畴中,还有所谓的《河图》和《洛书》,传说中认为他们对八卦的演进与《易》的发展有重要的关系。是否如此,难有确论。但是如果从数学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河图》与《洛书》,也是古人数学智慧的体现。它们的表现方式很神秘,全是点和圈组成,这很可能是在文字没有发明之前人们用来标记的符号。后来从《洛书》中发展而来的九宫图的数学意味就更加明显了,图中的九个数,无论横着加,竖着加,对角线斜着加,得数都是十五。这种奇妙的数字组合在西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引发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更被西方人加以发展,发明了风靡全球的魔方。

从神秘的数字符号到老少咸宜的魔方,正象征了《周易》与数学的关系。随着时间的发展,《周易》数学,正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为人们所熟知。(章 原)

## 2. 《易》乃中华建筑魂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中国的大都市里,越来越多地竖起了高楼大厦。这些建筑不乏新奇者,许多已经成了所在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成了现代化的象征。但是,在国外专家的眼里,中国的城市建筑缺乏内涵,只是一味照搬西方的模式和理论,没有自己的特色,他们甚至断言现代中国没有建筑文化。此论或许有些偏激,不过也道出了部分的实情。看看我们周围的都市吧,千篇一律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很难说这些建筑有什么特色。但是,若是提到西方的建筑,相信很多人脑海里立刻会联想到荷兰的风车、木屋,西班牙的哥特建筑,阿拉

伯国家清真寺院的圆顶……。虽然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共同致力的目标,但是很多国家在大力发展现代化建筑的同时,并未忽略本民族的特色。比较而言,我们中华民族在这方面却似乎有些滞后。

在这些外国专家对中国现代建筑不屑一顾的同时,他们对于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则推崇备至,认为是世界建筑大家庭中的一朵奇葩,体现了典型的东方美学特色。的确,四合院、胡同、皇宫、园林……,这些传统建筑文化的象征,变化多端,错落有致,融实用性与审美性于一体,在世界建筑大家庭中别具一格。而细细看来,中国建筑文化受《周易》的影响很深。可以这样说,中国的传统建筑,完美的体现了《周易》精神。

《系辞传》中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这段话,揭示了建筑和《周易》的密切关系。最初人类是居住在山洞里或者树上,当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甚至只能天当被、地当床,露天而宿,生命安全无法保障。后来有了房屋,房屋的出现则是受到了《大壮》卦的启发。《大壮》(䷗)的卦象下乾上震,乾为天,震为雷,均为阳刚之象,预示了建筑的阳刚之美;同时,雷在天上,自然是风雨大作的象征,或许在最初的时候,人们修建房屋时,考虑最多的因素就是房屋要足够结实,能够抵抗自然界的恶劣气候和野兽的侵袭吧。

《周易》对中国建筑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建筑理念和建筑美学上。因为《周易》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最早体现,是中华文化集大成者。所以,在《周易》影响下的中国古建筑,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诠释,因为建筑是人们日常生活所不可或



缺的,而《周易》精神也就通过这种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维。

例如,《周易》中贯穿着天人合一的精神,强调人和自然要和谐相处,这在许多卦象中都有很明显的表现。这种精神对于中国的古建筑中有深远的影响。如果稍微留心一下,就不难看出,古代建筑的选址是颇为讲究的,决不会是为了建筑而建筑;在构造房屋之前,一定会考虑到建筑本身和周围环境的协调。早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载了周代祖先公刘在率领部族迁徙之前亲自去选址的诗句:“相其阴阳,观其流泉。”从诗中可以看出,公刘考虑的因素很多,山的阳面还是阴面、土壤的肥沃程度、水源等等。虽然这只是早期的有关建筑的记载,但是已经看出古代的先民很早就具有了大建筑的意识,即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中颇有一些对建筑的描写,我们不妨举例一看:

“说着,进入石洞来,只见佳木葱茏,奇花闪灼,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再进数步,渐向北边,平坦宽豁,两边飞楼插空,雕檐绣槛,皆隐于山树之间,俯而视之,则清溪泻雪,石磴穿云,白石为栏,环抱池沼。”

这段话是描写大观园中“沁芳亭”的风景。“沁芳亭”的妙处在于“隐”,整个亭子“皆隐于山树之间”,与周围的景物浑然一体。这样,既能欣赏景物的妙处,又不至于破坏了周围的景致的和谐,可谓独具匠心。

大观园里还有一处叫做“稻香村”的宅院,本来是想在金碧辉煌的大观园里营造一处田野情趣的处所,增添一些雅趣;可惜思虑不周,有些不伦不类,失去了“天然”的韵味,引得贾宝玉大发感慨:“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

远无邻村,近不附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过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其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虽百般精巧而终不相宜。”宝玉虽然不喜欢读四书五经,但并非无才,他的这番评论颇为精当,在大观园这样一个富贵之所,凭空建了一个农舍,的确很突兀,与周围的环境极不协调。要知道,田园风光固然令人赏心悦目,但这种意境并不是一座孤零零的农舍就可以造就的,还需要有周围的山水相配,才能达到“天然”的旨趣。曾经看到一篇新闻,说是湖南张家界旅游区为了免除游人攀登之苦,把一座山的中间凿空,安装了一个极为现代化的不锈钢电梯。这样的“好心”,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张家界的招牌就是风光独特、富有原始情趣,电梯的出现真是大煞风景。

《周易》之“易”有多种含义,其中一种意思就是“变易”。这也是《周易》全书所体现的要旨之一。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古代的建筑文化。后世所流传的“风水术”其实最早也是从《易》学衍伸而出的分支,不过其中夹杂了许多阴阳五行的思想在内,但是基本的原理仍然是承接《周易》而来。风水术之大忌之一就是建筑位于死角,风水不能流通,对人不吉利。细想起来,似乎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如果空气不流通,必然会使空气污浊,对人体自然无益。风水术虽然思想驳杂,名堂多多,有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等充满神秘色彩的手续,但是其核心无非强调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注重气脉的流通,希望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

《周易》中所反复强调阐述的“无往不复”、“相互转换”的观念,在古代的建筑中也有反映。具体体现在,中国的建筑往

往注重含蓄,像西方推崇的大门进去一条笔直的道路一直延伸到主建筑的模式,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拿四合院来说吧,这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式的建筑,远在殷商时期的村落里就有了雏形。门口通常位于东南或者西北角落,进入大门后,面前就是一堵照壁墙。这样,院落里边的情况,在门口是什么也看不到的;绕过影壁后,进入二门,然后才能顺着走廊到达会客室;出来的时候,则是同一路线的反向而行。这种行走路线,呈现了循环往复的阴柔之美,体现了含蓄、委婉的特点,堪称是中国式的建筑特色。类似的布局不仅仅存在于四合院中,在寺庙、官府等古代建筑中,或多或少都留有这样的痕迹。

又比如,《周易》卦位强调“中”与“正”,也就是说,下卦二位为中,上卦五位为中;而初、三、五爻为阳位得正,二、四、上爻为阴位得正;位置如果既中且正,则大都吉祥如意。受《周易》“中正”观念影响,中国古建筑如故宫及各代京城等,大多讲究中轴线两边的平衡布局,体现了庄严宏伟既中且正的审美理念。

中国的古建筑深深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别具一格。遗憾的是,进入近代以来,在盲目推崇西方的同时,某些建筑忘却了自己的优势所在,逐渐落后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对建筑文化的探讨的深入,古代建筑文化必将重放异彩。

(章 原)

### 3. 阴阳相济乐和谐

音乐是最古老的艺术门类之一。中国传统音乐的起源,更是交织着巫术、宗教与日常劳作等神秘而又熟悉的因素。

千百年来,音乐渗透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国家的统治和人民的教化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对中国古代社会同样影响巨大的《周易》,与中国古典音乐的思想内蕴是息息相通的。

大家一般知道,《周易》有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分别对应自然界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构成宇宙万物的事物。事实上,八卦与古代音乐中的“八音”也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们分别是石(磬之类)、土(埙之类)、竹(管、箫之类)、木(柷、敔之类)、革(鼓之类)、丝(琴、瑟之类)、匏(笙、竽之类)、金(钟、铃之类),涵盖了古代演奏音乐的主要乐器。而《易传》的“五行”则对应了古乐中“宫商角徵羽”五声。其中土为宫,金为商,木为角,火为徵,水为羽。另外,音乐中的节拍也是贯穿了阴阳之道的:强拍为阳,弱拍为阴,只有强弱配合得当,比例协调,阴阳相生相济,刚柔互补,音乐才能圆润流畅,抑扬顿挫,动人心扉。可见,音乐的诸要素都与《周易》渊源颇深。

再说音乐的起源。《周易·豫》卦象辞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意思是说,上古帝王制作音乐是为了推崇褒扬美德,并且用来敬献给上天和祖先。足见在古代,人们相信音乐的创造与当时的巫术崇拜、宗教热情密切相关。古人眼中的音乐是十分神圣而又崇高的,是中国古代国家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祭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然而然,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有其特殊的教化意义。

《左传·昭公元年》中记载了一段秦国名医医和以乐喻病的议论,他说:“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

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这段话是说,先王的音乐是用来节制各种事物的,所以五声都要有节制,快慢要互相调节。各声交互演奏,前声停了,后声再起,五声既降,中声止息,就不能再弹了。再弹就要出现荡心塞耳的烦手淫声,让人忘失平和的本性,所以君子是不听的。这里提到的中声,是指合乎律吕的、有节制的乐音,不过高、不过低,无过无不及的适中之音。只有这样的音乐,才能给人带来平静祥和。其中的道理与《周易》暗合。因为《周易》也十分重视“中”、“正”这一对概念。所谓“中”,是指卦象六爻中的第二和第五爻。它们分别处于上卦和下卦中间,所以称之为“中”;而六爻中一、三、五为阳位,二、四、六为阴位。如果阳爻处于阳位,阴爻处于阴位,就称其位得“正”。一般来说,居中得正的爻一定是吉祥的,即使整个卦的发展趋势不吉,而居中得正的爻也会小有转机。有时,一卦当中,因二、五两爻的居中得正而使全卦沉着稳便,便预示着吉祥。《益》卦就是如此。而宋代理学家程颐在这两者中间又特别强调“中”,他认为:“以中为贵,得中则正矣,正不能尽中也。”(《伊川易传·节·九五》)实际上,《周易》对“中”的强调,是希望对事物的“度”有一种恰当的把握。这与中国的传统音乐崇尚平和之声是源于一理的。

而《周易》精神的另一重要内核“阴阳交融,以致和谐”,同样贯串了中国传统音乐思想。《周易》中《乾》卦彖辞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之说。将天地和谐、阴阳调顺视为万物化生的基础。《周易》追求世间万物的普遍和谐,它以天地和谐、阴阳协调为本,在阴阳刚柔的对立统一中追求和谐与流变,在山川相通、风雷激



荡、水火交化的自然现象中求证自然界的普遍和谐法则。而自然界的和谐,也孕育出音乐的和谐本质。《乐记》、《乐论》等重要音乐美学文献中都对此再三强调。在先秦典籍《国语·周语下》中曾记载了一则故事,也体现了传统音乐对和谐美的执着追求。

周景王二十三年的时候,景王想造一口无射律的大钟,却要它还能发出林钟之声。他的臣子单穆公劝景王说:“这样是不行的。首先,铸造这口大钟需要耗费大量的钱财,而你刚刚集资铸造大钱币,现在人民手头都已经很拮据了;其次,钟是用来奏乐的,如果发无射又要发林钟之声,听起来就不会和谐,违背了基本的乐理。况且人听觉能感受的美感是有限度的,如果音乐震耳欲聋,听起来不是很难受吗?所以您还是不要造这口钟吧!”

景王听了以后很不高兴,希望找另外的人来支持自己的举措。于是,他找了乐官州鸠,州鸠又从音乐本身的道理劝诫了景王一番。景王还是不肯罢手,仍旧一意孤行铸了大钟。

周景王二十四年,大钟铸成了,乐工报告说钟声和谐。景王得意地告诉州鸠:“你看,钟声是和谐的,并非如你所说的那样。”

州鸠说:“那还不能肯定呢。”

景王问:“为什么?”

州鸠说:“大王制作乐器,人民都因此而高兴,乐器所发出的声音才会协和。如今财物耗费,人民疲惫不堪,怨声载道,大钟的声音怎么可能协和呢?……”

第二年,景王驾崩了。这时候,人们发现大钟的声音果然不和谐,从前不过是乐工为了逢迎媚上谎报情况罢了。

如此看来,《周易》所倡扬的“和谐”,是世界万事万物都应当遵循的自然规律。和谐是一切具有美感事物的共同特质,而中正平和则是中国古代艺术创作所遵循的重要审美原则,它们都不能是单纯地为艺术而艺术,而是承担着净化人的心灵,涵养人的性情,提升人的品格等神圣的任务,让人们在获得美感享受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接受教化,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繁荣稳定。

此外,《周易》对于音乐能够陶冶性情,鼓舞精神的功能也格外重视。《周易·离》九三爻辞云:“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意思是说:黄昏的时候残阳附丽垂挂于西天,这时的老年人如果不击缶歌唱,自得其乐以鼓舞精神,而是对景伤情,叹老嗟病,兴日暮途穷之悲,那就会把人导入凶险之境。由此可见,音乐可以让人保持开朗活泼的心绪,去营造更加健康温馨的生活。音乐是最易于唤起、表现、传达情绪情感的艺术形式,它为表现情感提供了一种手段,并且这种表现常常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在歌唱聆听激越奋进的音乐后,人的情绪就会激昂高涨,对自己充满信心。因此,《周易》认为,决定吉凶的,不在于人的老少与否。即便人在暮年,只要唱起快乐的歌儿,精神昂扬,那么仍然拥有丰富而美好的生活。

音乐之中自有《易》理在。如果能随时体悟和领会,将会觉得其乐无穷,对于人生的认识又能更进一步,何乐不为!(谭 雯)

#### 4. 《易》道广大话科技

在研究《周易》的热潮中,一种新的研究角度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包括物理学家、数学家、

化学家、生物学家、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地震学家等等，都纷纷力图运用科学理论来揭示《周易》当中蕴藏的奥妙，同时又用《周易》的原理来指导科学研究。这一派的研究，因为角度与传统的研究迥然不同，因此被称为“科学《易》学”派。这样的研究思路最早是从国外传入，有几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都称自己的科学研究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过《周易》的影响，因此引发了众多科学家的浓厚兴趣。

或许正如苏轼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事物，总会有新的发现。看山如此，看《周易》又何尝不是呢？那么，古老的典籍《周易》与科学技术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有，两者有什么联系呢？

《周易·系辞下》中的一段话，或许是最古老的有关科技发明的记录吧。原文较长，并且全是文言文，这里简要介绍相关的内容如下：伏羲统治天下的时候，从《离》卦中受到启发，用绳子结成网，来捕食动物和鱼类；神农在位的时候，受到《益》卦的启示，砍削木头作耜，揉曲木头作耒，使人们耕种田地变得更加容易；神农又从《噬嗑》中明白了建立市场的必要性，让大家在市场中交换货物，各取所需；黄帝、尧、舜在位之时，从《乾》、《坤》中得到启示，奉行无为而治，他们从《涣》卦中明白了造船的道理，发明了舟楫，便利了天下的交往；又从《随》卦中领悟到了驯化牛马，让牛马来负重拉车，减轻了人们的负担；至于舂米的杵和臼的发明，则是《小过》卦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房屋是圣人看到《大壮》卦而灵机一动发明的；从前，人死了以后是抛尸野外，人们从《大过》卦中得到启示，发明了棺槨；从前，人们结绳记事，很不方便，后来圣人发明了书契，这则要归功于《夬》卦了。

这段话,现在看来自然有不少漏洞,尤其是将所有的发明都归功于圣人,明显不足为信。但是,其中透露的信息已经弥足珍贵了。《周易》不仅仅只是用来占卜和预测吉凶,它还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启示人们,促进了许多重要器具的发明,极大便利了人们的生活。其意义怎么估量都不为过。从某种角度上讲,可以说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如我们所知道的,人类社会发展中,有采摘阶段、渔猎阶段、农耕阶段。渔网的发明,无疑使人们告别了采摘时代;而耒耜的发明,则大大提高了农业的地位,促使社会进入了农耕时期。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获得的另一个信息是,《周易》只是从思维方法和观念上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周易》就是一部科技专著;如果这样认为,那只能算是得之一隅而失其整体。从《周易》到科技发明的诞生,中间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人。人们的发明,从《易》中受到了启示。这种启示,间接地在科技发明的进步中起到了作用。这也正是《周易》在古代中国科技发展中始终如一地发挥作用的方式。那种认为没有《周易》就没有科技,甚至认为《周易》引导出近代科学发展的观点,无疑是有失公允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科技很少有不受《周易》思想影响的领域,尤其是《周易》被奉为经典以后,《周易》所宣扬的观念也就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观察事物、认识世界的出发点。我们不妨举一些科技方面的例子来看。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比较发达,但是缺少系统的整理,多是零碎的资料,散见于各种典籍。《周易》中也有一些。例如《丰》卦中就有“月盈则食”的记载,意思是月食往往发生在满月之时。这很可能是人们在长期观察中经验的总结。《周易》

中还有一些天象的记载,诸如“密云不雨”等。《周易》中对于天地形成的解释,对于四季变迁的阐述,其中所反映的宇宙观,事物之间不断运动、转化等思想,都具有很高的哲学和科学价值。

化学是一个新兴的名词。在古代,凡是研究物质变化的都可以归为这一类。其中,炼丹术是重要的一个领域,与《周易》关系相当密切。炼丹术起源于战国秦汉时代,最初目的无非就是希望炼出黄金和仙丹。有了黄金可以发财致富,而人吃了仙丹以后便能长生不老。现在看来很荒唐,但是当初人们趋之若鹜。炼丹术不仅仅流行于市井之间,更被大官贵族奉为不传之密。例如西汉的淮南王刘安就从事过炼丹活动。《淮南万毕术》和《枕中鸿宝秘书》两本书,据说就出自他手。但是在这一阶段,炼丹书所记载的多是炼丹的方法,停留在实践的地步,理论上没有自成一体的系统。这一工作,是到了东汉《周易参同契》一书出现才完成。《周易参同契》比较系统地对于炼金和炼丹过程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强调要效法天道,遵循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规律。在具体的炼丹过程中,它都与《周易》结合,用卦象来配合阐述,尤其是在炼丹火候这一关键问题上,借用《序卦传》的卦序来排列具体的时辰。关于炼丹术的原理,该书的解释借用了《周易》的乾坤概念,认为“乾刚坤柔,配合相包”,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炼丹术最后自然没有炼成什么仙丹,不过倒是在宋代无意中发明了一样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东西:火药。但这已经是后话了。

《周易》与数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点已经为大家熟知。它的占卜过程实际上就是数字的组合排列的运用。还有人指出,《周易》中阴与阳的符号暗合了数学二进位的运算方式,而



这正是现代计算机的运行基础。《周易》中,乾象征马,坤象征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猪,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八卦象征着八种动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应关系,对于今天的生物学家研究古代生物演化变迁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物理学上,《周易》的影响也有所体现。例如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虽然它的产生与《周易》并无直接的关系,但是由指南针制成的罗盘,则与《周易》及八卦有着密切的关系。小小的罗盘上,六十四卦一卦不少,都按照方位整齐排列。

正如《易传》所说,《周易》大道,无所不包,弥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易》道至难也至简,它默默地对中国文化施加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古代的中国,科学技术被视为“小道”,为上流社会所不屑;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人文方面的问题。中国古人不乏科学智慧,但是却因为科学不受重视,而逐步落后。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强调的那样: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鼓励、甚至是抑止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在经历了长久的寂寞之后,科技迎来了春天。相信以《周易》为代表的古代典籍中所包含的科学技术因素,一定会在现在乃至将来发挥应有的作用。

(章 原)

## 5. 文学源头话《周易》

《周易》虽是一部哲学意味浓郁的古籍,但却不枯燥,里面有很多读来饶有兴趣的生动内容,充满了文学色彩。其实,这种现象在各国并不少见,很多宗教或哲学上的经典同时也是文学名著,比如《圣经》,不但是基督教的经典教义,同时也是

西方文学史上的经典,里面的《雅歌》更是精妙绝伦的抒情诗。《周易》的形式采用卦画与卦辞相结合,文字与图画相配合,与后世的连环画有几分相似,增强了趣味性。只是因为《周易》产生的年代距离现在太久,语言与时代有隔阂,文字读起来比较古奥难懂,所以现代人很难体会出这种韵味。其实稍有一些《易》学知识的人便能对此有所认识,比如唐代的孔颖达便说过:《周易》中用物象来阐明人事的道理,就好像诗歌中的比喻一样。比喻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法,经常在文学创作中被运用。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常与比喻修辞之微妙密切相关。可见,《周易》在艺术表现方面是相当注重技巧的。

《周易》中的卦辞和爻辞大多用散体写成,但是有不少却相当对称,从形式上看与民谣、诗歌没有什么两样。比如“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大壮》九三)、“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坤》上六)、“出涕沱若,戚嗟若吉”(《离》六五)等等,读来朗朗上口;如果单独来看,就是一则很有情趣的歌谣。

诗歌的发展规律之一,就是字数的从少到多。从二言、三言,直到四言、五言、七言,随着字数的增多,诗歌的容量在不断增长,表达的感情也日渐丰富,其中也可以隐隐看出人类思维能力的拓展。《周易》产生的年代比较早,在富于诗歌韵味的卦辞和爻辞中,各种体式并存,这也表明了本书是一部长期流传的产物。

二言诗是最早、最简单的诗歌文体。例如我们所熟悉的相传为黄帝时期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短短八个字,形象地概括了从砍伐竹子、制作武器,到投石、追逐野兽的生活画面,语言质朴,洋溢着生活的气息。《周易》不乏

此类优秀的爻辞。例如《中孚》六三爻辞：“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仅仅 10 个字，就描绘出了战胜回来后人们庆祝的场面，抓住了俘虏，在战争中大获全胜。这自然是欢天喜地的了，所以有敲鼓的，有唱歌的，欢庆胜利；有的战士鏖战一场，喜悦的同时也感到一些疲劳；但是战争毕竟也有残酷的一面，有的战士在战争中不幸遇难或者下落不明，他的亲人在这欢庆的场面中只能悲伤地哭泣，祈祷自己的亲人早日升天安息。复杂的情感，简明的语句，表现了作者高度的艺术表现能力。《咸》卦中“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咸其脢”等整齐的三字句，显然绝非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按照事物发展的顺序一步步展开的，具体展现了少男少女恋爱的爱抚接触过程。它犹如一首简单的叙事诗，生动而形象。

比《周易》同时略晚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诗歌样式多样，但以四言为主。将《周易》中的部分爻辞与《诗经》中的诗歌放在一起，或许更能看出《周易》的文学色彩。例如《明夷》卦初九爻辞：

明夷于飞，(鸛鹄在空中飞翔)  
垂其左翼。(左翅下垂受了伤)  
君子于行，(君子出门在路上)  
三日不食。(三日腹中未入粮)

我们再来看《诗经》中的《小雅·鸿雁》：

鸿雁于飞，(大雁高飞翔)  
肃肃其羽。(双翅沙沙响)  
之子于征，(使者出使忙)  
劬老于野。(奔波在四方)

很容易就能看出来，《鸿雁》中的诗句与《明夷》中的爻辞，

无论在手法、结构还是押韵的方式上,都非常相似;尤其是在意境的营造上,二者都具有同样的特点;比兴的手法也是如此,都是很优美的诗歌。类似的爻辞在《周易》中并不为少,例如《中孚》九二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描写的是一副温馨的画面:母鹤在树荫下鸣叫,小鹤闻声应和。作者用词表达了对朋友的深厚情谊,表示愿意与朋友共同分享杯中的美酒,同甘共苦。九二爻辞所描绘的场面以及艺术手法,与《诗经》中《小雅·南有嘉鱼》非常相似。难怪宋代的陈骙曾经说过:《中孚》九二的爻辞,如果与《诗经》的诗歌放在一起,谁能辨别出到底是爻辞还是诗歌呢?事实上,陈骙说的这种现象,在《周易》中并不少见。由此可见,诞生在殷周之际的《周易》卦爻辞,对于后来《诗经》的文学影响。

我们知道,一卦由六爻组成,六爻从位置来说存在着内在层次的逻辑联系,在某些比较典型的爻辞中,如果单列出来,六爻的爻辞便是一首层次分明的诗歌,例如《渐》卦: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我们可以看出,从初六到上九,六个爻辞以鸿雁处在不同的地方作为起兴,引出诗句;同时又用此来比喻人在不同境况中的不同遭遇。这与《诗经》中所采用的比兴手法并无二致。从江边、磐石、陆地,到树上、山陵、高坡,鸿雁所处的位置不断变化,而这些变化也与六爻的爻位变化相呼应;每一爻中所描

述的生活现象,也都被赋予了或吉利或凶险的含义。自然,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一系列爻辞并不很整齐,除了每个爻辞开端的起兴句以外,都长短不同,似乎不是很像诗歌。但这是从现代人的眼光看的,要知道,《周易》的产生比《诗经》还早,在那么早的时候,能够有如此层次分明、艺术手法高妙的歌谣,是相当令人惊奇的。

以上,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些《周易》中富有诗歌韵味的卦爻辞。这些爻辞在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代表了民谣向诗歌过渡的趋势。除了这些以外,《周易》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还在于它对于文学理论的启示。“象”、“意”、“变”等传统文学理论中重要的范畴概念都来源于《周易》。单拿“文学”的“文”来看,便是源出于《易》。《系辞》说:“物相杂故曰文。”认为不同的事物互相交叉错杂就是“文”。这里的“文”与后世的“文”相比,要广泛得多,可以泛指自然界和社会一切具有这一特征的事物和现象。正如《贲》卦彖辞所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无论天地,还是人类,都有文饰所带来的美感。后世的“文学”观念,就是从这种广义的“文”中演化而来,体现了“人文”的魅力。

总之,《周易》与文学有密切的关系,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发端的作用,在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章 原)



## 九、人物篇

### 1. 韦编三绝说孔子(上)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他与《周易》有着极深的渊源,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好《易》”;在把《周易》由卜筮之书转变成哲学之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思想与《易》理暗合之处甚多。这在《论语》、《左传》、帛书《易传》以及《吕氏春秋》等书中均有记载。

《论语·述而》记载孔子感叹地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史记·孔子世家》也有大意相同的话:“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晚年希望深入研究《周易》,只是担心岁月无多,时不我与,因此就有“假我数年”的祈望。现实而睿智的孔子的“假年”之望,表达的是他对《周易》的高度重视和对《周易》研究的热切,同时他把这种热情付诸行动,从此《周易》不离身,“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一有时间就打开简册反复钻研,由于翻检太勤,以至于捆书的熟牛皮绳子断了数次。他于其中学而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终于领悟到《周易》的真谛。

孔子“老而好《易》”，甚至引起了弟子的疑惑与不满。因为《周易》本来是卜筮之书，当时人就以筮书视《易》，而孔子平生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弟子曾以事鬼神之事问孔子，孔子都教育他们要着重于人事，远离虚诞。而现在作为老师的孔子却违反平生的主张，沉迷于卜筮之书，怎能不引起学生的疑惑呢？这似乎是言行不一，当然会引起学生的不满，甚至怀疑他是否有点老糊涂了。面对得意门生子贡的责难，孔子耐心地告诉他《周易》的巨大影响力：“故《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惭人为而去诈。”（帛书《要》）阅读《周易》，能使刚强者有所惧，柔弱变坚强，愚蠢的人不至妄为，奸诈者不敢诈伪。孔子看重的，正是它的精深哲理和巨大的道德教化作用。他晚年喜《易》，不是因为相信占蓍，而是其中蕴涵的社会人生哲理。《史记》曾说，孔子做了《彖》、《文言》等“十翼”。后人经过考证，认为“十翼”成书应在战国以后。但孔子曾联系社会人事解释《周易》，是不容置疑的。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如《论语·子路》记载，孔子直接引用《周易·恒·九三爻辞》之“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来教育弟子要德行有常。再如孔子曾经占卜得《贲》卦，卦辞是“亨，小利有所往”，卦辞、爻辞不错，可是孔子却“卦得《贲》，喟然仰而叹息，意不平”。原因是，孔子由“贲”的原意是“装饰”，联想到做人的品德。孔子原本对“紫”色之乱“朱”红、“乡愿”之乱“君子”深为痛恨，认为前者徒有形式，似是而非，就像“贲”饰驳杂不纯；质有余者不受饰，人若是仁义充身，则自然能洋溢于外表，又何必外加虚“饰”呢？君子进德修业，要注意内“质”的提高，而不能装“饰”外表以邀功世人。

《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着孔子读《损》、《益》二卦的故事：

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

正如《序卦》所言：“损而不已必益”，“益而不已必决”。“损”为盛之始，“益”为衰之初。由盛而至衰，衰极则慢慢变盛，盛极则渐渐转衰；孔子由损、益之理而领悟到了持满之道。做人君的需要特别注意此道：居上位要能虚心待下，处盛时须居安思危；要把“自损者益，自益者损”作为座右铭；处理国家大事时，要仔细审察事情的利害两端，以“损”、“益”二卦之精髓治理国家。总之，对于《周易》，正像孔子自己所说“我观其德义耳”，孔子更多的是阐发它的哲理意义，运用它来指导人事。孔子对《周易》哲理的挖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然，如果认为孔子于《周易》完全只重其义理而忽视象数也是不正确的。整理完《春秋》后，孔子曾经为之占卜，得《豫》卦。他也曾经为自己前途与命运占卜过，而且认为“吾百占而七十当”。他所占问的卦，经过自己的解卦和思考，大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可信性。他主张的治《易》方法是“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认为只知卜筮之用而不知利用易数去推演天文历法，那是巫者用《易》的做法，是最下等的好《易》者；只知用易数推导出天象历法，而不知从天道中推出人道，这是史者的行为，是次等的好《易》者。史、巫对待《易》的方法，都有许多不足之处。正确的治《易》方法，是通过占筮而明《易》数，由明《易》数而明《易》理，并且进一步由《易》理而明人道，由象数而探义理，最后落脚于人事。帛书的《要》篇，深刻地反映出孔子晚年对《易》学精深的研究水平。

（赵彩花）

## 2. 韦编三绝说孔子(下)

孔子与《易》有极深的渊源,还反映在他的思维方法以及思理都与《易》特别是《易传》暗合。

一是整体性思维与中和思想、以人为本思想。《周易》认为,阴阳交感造就了天地万物,阴阳二物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生成发展的基础。所有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可纳入由阴阳两爻组成的六十四卦系统。世界是一个“生生之谓易”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内,有着阴阳相生、刚柔相济、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等普遍规律。圣人能够顺应、运用上天所体现的自然规律,从而来指导人事,这就是运用《周易》的整体性思维。孔子由观流水而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由自然现象而联想到社会人事乃至天地万物的规律,把世界看作一个“生生之谓易”的有机整体;由“天何言哉”提出“我欲无言”,由“河不出图,洛不出书”而推断“吾已矣乎”,认为天的运行规律与人的活动规律有一致性,天的规律必然会在人的规律中得到反映。这种由天道而推人道,由人道而反思天道的整体性思维方法,在孔子思想中比比皆是。

《周易》在论述阴阳之间对立统一的基础上,提出了阴阳和谐的整体观点,强调阴阳当位,执“中”而协同,从而保持事物的平衡与稳定的态势。从静态的卦位来看,一卦六爻,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其中又突出强调二与五之位势,二为贞之中,五为海之中。假如阳爻在五、阴爻在二的话,就称为阴阳二五得位,这种情形就叫“中”。但一卦六爻之位,

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在动态的变化中产生了错综复杂的或相应相和、或相乘相悖的关系。其中,尤其重视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的对应关系。假如二为阴爻,五为阳爻,即二五阴阳相应的话,这种情形就叫“和”。阴阳既当位又相应,叫做中和。《周易》及易学家们进行爻位分析,断定吉凶的重要准则之一就是中和,历来被世人推崇为最和谐、最圆满的理想状态。孔子提出的“执两用中”、“和为贵”等儒学传统思想,便是《周易》的中和观念的延续和发展。

《周易》论述人事与天道是联系在一起的。天地人“三才”之道是其最重要的概念,离开了“三才”就无《易》可言。“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天地人既是构成客观世界的实实在在的内容,也是易卦形成的主要依据。因为,《周易》是一部阐述天地人及其关系的典籍。其中大部分内容是讲人的,讲天讲地的目的也是为了讲人。这从卦象的爻位排列次序上就能够看出来。八卦是三画一卦,上爻代表天,中爻代表人,下爻代表地。六十四卦是六画卦,初爻、四爻表示地道,二爻、五爻表示人道,三爻、上爻表示天道。《周易》尤其看重二、五爻位,“二五得中”把人道放在中心的位置,说明人在《易》中的突出地位,与天地相比较,更加重视人事,更加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人为本,也是孔子最基本的立场。他把《周易》之道重点落实在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有一次,孔子上朝回来,家中的马厩烧了,孔子只问伤及了人没有,而不问马怎样。在那个马价要高于奴仆价格的年代,孔子却把奴仆这样的人命看得更宝贵。还有,一向温文尔雅的孔子,出于对以人殉葬的痛恨,认为“始作俑者”应该受到断绝子孙的严惩。他提出的“仁”“礼”思想,



“仁者人也”，主张提高人自身的素质，由近及远地爱人，这些，都可见到孔子对人类的温情及以人为本的思想。

二是叩其两端的思维方法。阴阳对立的观念，是《周易》思维体系建立的基础。阴阳这对基本矛盾，在八卦中表现为天与地、雷与风、水与火、山与泽四对矛盾；在六十四卦中演变为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等三十二对矛盾；在卦辞中表现为得丧、凶吉、进退、往来、出入等对立的范畴与概念；充分反映了天地万物之间的矛盾对立现象。孔子在处理事务时，常通过事物对立的属性、对立的方面进行对比，从中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阐发他的思想观点。孔子称这种方法为“叩其两端”。他曾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他对别人请教的问题原本一无所知，无法回答，但他通过有关事物的两个对立面去查问这个问题，于是便知道了答案。

孔子广泛运用这种方法来阐述其社会、政治及哲学思想。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对于如何治理国家与人民，孔子不直接回答，而是通过“政”“德”、“刑”“礼”的比较，使其优劣不言而喻。人们在取舍中，自然而然地受到以德治国的教育。身处动乱之世，君子该如何对待富贵与贫贱？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富贵有合乎仁义而得到的，有违背仁义而夺取的；贫贱有合乎仁义而摆脱的，有违背仁义而摆脱的；仁人君子只有在合乎仁义的前提下才摆脱贫贱、享受富贵；反之，则安贫若素。对于取富贵与去贫贱的方法，孔子从合乎仁义之道与违背仁义之道两个对立

的方面考察问题,从而明晰地表达了仁义之道与富贵、贫贱的辩证关系以及仁人君子正确的态度。即使在教学过程中,孔子也常运用“叩其两端”的方法来启发、教育学生。他说:“温故而知新”,告诉学生已学知识与新知识的关系。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告诉学生“学”与“思”是学习活动中对立又统一的两方面,只学不思就会迷失方向,只思不学,则会空疏荒怠,十分危险。正确的学习方法是学与思的有机结合。

孔子的“叩其两端”,有暗合于辩证思维方法的地方。阴阳二物在对立中有统一,在统一中有对立,万事万物就在这种对立统一中不断发展、变化,“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形成了中国人重“变”的不确定型思维模式。它要求人们对待事物不采取极端的态度,把握对立的两极从而做出取舍,得出正确的认识。孔子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法,他对管仲的评价就是典型例证。管仲曾经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推尊周天子、抵御威逼中原的蛮族,所以孔子高度赞扬管仲:“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即使如此,孔子也能辩证地看待他,对于管仲生活方面僭越国君的越礼行为,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对于如何成为君子,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胜文则会显得粗野,文胜质则会显得华而不实,只有文与质恰到好处地糅合,才能够称得上为君子。当子张问如何才能做好官时,孔子回答说要“尊五美,屏四恶”。所谓“尊五美”,孔子解释为“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既要给人民实惠,又不能让国家财力过度耗费;既要让百姓勤力耕种,又不致因过度劳动而产生怨恨;有欲望但不贪婪;处世安泰但不骄傲;

为人有威仪但绝不凶猛;处理好了它们的辩证关系,则可以做好官、治理好国家了。可以说,孔子的“中庸”思想,寓含了辩证的思想光辉。

从以上所述,可见《周易》古经卦爻及其人生哲理对于孔子的深刻影响;同时,孔子又因其《易》理阐释对后来的《易传》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长江后浪推前浪。正是在经过后人科学思维的不断钻研探测之后,《周易》终于超越了筮卜算命的巫术局限,构成了“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文化精华。孔子于《易》学之建树,其功伟矣! (赵彩花)

### 3. 范蠡功成泛五湖

范蠡的事迹,散见于《国语》、《史记》,以及《吴越春秋》、《越绝书》等书,但说得大都不明白。我们知道范蠡与西施的风流韵事,千古流传;也知道范蠡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大企业家,世称“陶朱公”,是做生意人供奉的财神之一;还知道范蠡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勇敢坚毅的军事家,曾经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但再详细一点可能就不知道了。其实他还是一个多谋善断的谋略家,善于审时度势,真正做到了进退自如,明哲保身。尽管没有明确的材料说范蠡精通《周易》,但对照他的一生行事,我们可以推断,范蠡是精通《易》理而消化于无形,并且能够切实地付诸实践的人。

据《史记正义》引《会稽典录》记载,范蠡本是楚国宛城(今河南南阳)三户人,风流倜傥,自命不凡。当时文种为宛城令,曾派遣一名小吏前去拜见。大概范蠡没有好好接待这个小吏,于是小吏就对文种说:“范蠡本是一个狂人,而且生来就是

这样,实在不值得一见。”文种笑着说:“我听说有才的人都是看似狂妄,实际上内心里充满了睿智,这不是你这样的人所能了解的。我应当亲自去拜见才对。”于是文种就驾车去拜见范蠡,但范蠡却避而不见。不过他知道文种必定还要来,就对他哥哥说:“今天要有客人来,请把你的衣服借给我穿一下。”过一会,文种果然来了,乡里人都很吃惊。后来受文种的邀请,范蠡到了越国。

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在他继承王位的第三年,就按捺不住扩张的野心,准备征伐吴国。范蠡深知越国同吴国开战,时机与条件均不成熟,不具备取胜的希望,劝告勾践要随时以行,不要违背天道。但勾践已被自己幻化的胜利前景陶醉得忘乎所以了,对范蠡的逆耳之言怎么也听不进去,决心一意孤行,实施征吴计划。于是吴越双方激战于五湖(今太湖)。越军一败涂地,勾践狼狈逃回越国,最后又退保会稽山。眼看就要亡国,勾践只得向范蠡求教摆脱危机的方略。在范蠡的策划下,勾践派大夫文种至吴军求和,通过贿赂吴国权臣伯嚭,说通夫差答应保留越国社稷。为了麻痹吴王,范蠡建议由文种留守越国,行政抚民;自己则陪伴勾践夫妇一起到吴国,为吴王做了三年服役的奴隶。由于勾践与范蠡在夫差面前装得特别恭顺、矫情,骗取了夫差的信任,终于放他们回国。

越王君臣一踏上国土,范蠡又给越王出谋划策,要他向《周易》中的《坤》卦那“厚德养物”的大地学习,说是“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意思是说:只有大地能够生养万物。内政方面,遵从自然规律,不误农时,开辟田野,发展生产,充实府库,让利于民,增强国力;繁殖人口,扩大兵源,抚民保教,提高国民素质。外

交方面,卑弱以自持,柔顺以事吴;同时修好齐国,亲近楚国,依附晋国。以静制动,等待时机。在当时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策略是十分必要的,但要在近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牢牢坚持这一战略方针,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是很难做到的。果然,四年后,勾践就有点耐不住了,又要起兵伐吴。范蠡认为时机不到,劝他要忍耐。公元前484年,吴国君臣反目,极力主张灭掉越国的伍员被勒令自杀。勾践认为伐吴的时机成熟,向范蠡征询意见。范蠡再次以“天地未形”对之,不同意立即发动征吴战争。第二年,吴国蟹食稻,农业歉收,百姓饥贫。勾践认为天时人事均对越国有利,于是再次征询伐吴的意见,范蠡仍不同意,理由是“天应至矣,人事未尽”。这次,勾践被深深地激怒了,甚至怀疑范蠡故意拖延伐吴的时日。

公元前476年,伐吴的条件终于成熟了。越国经过近20年的精心准备,国力强大;而吴国方面,夫差倾全国之力,北上中原争霸,使国力严重消耗,后方空虚,且国内君臣、君民之间矛盾重重。于是范蠡建议勾践立即兴兵伐吴。越军以奇袭方式进攻吴国,吴国仓促应战,太子被杀。夫差急忙自黄池回军,双方在吴都对峙。吴军复仇心切,反复向越军挑战。但范蠡审时度势,主张对吴军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对吴军的挑战不予理会,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公元前473年,吴军全线崩溃,首都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就被越军攻克。吴王夫差逃到姑苏台上固守,同时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祈望勾践也能像二十年前自己对他那样宽容,允许保留吴国社稷,而自己也会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此时,勾践的复仇心理得到很大的满足,他甚至想答应吴国的请求。但范蠡却丝毫不为所动,力劝勾践拒绝吴国的求和之请;在勾践犹豫



不决的情况下,他不向勾践请示,带兵灭了吴国。

吴国灭亡后,勾践礼葬自杀身死的吴王夫差,杀掉吃里扒外的奸佞之辈吴国太宰伯嚭。之后,在范蠡的谋划下,勾践登上他梦寐以求的霸主宝座。范蠡也因功被任命为上将军,位极人臣,其政治生涯达到峰巅。依人之常情,此后的范蠡就应该心安理得地享受他应得的荣华富贵了。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范蠡却采取了一个似乎有悖于常理的惊世骇俗的行动,功成身退,对于到手的官位、权力、财富和荣誉弃之如敝履,上书勾践,决定辞官去职。勾践看了范蠡的辞职信,非常震惊。于是竭力劝阻范蠡不要辞职,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就出言相威胁说:“你不要走,我可以将江山分一半给你。否则,我就杀了你。”但范蠡决心已定,对勾践的威胁,以掷地有声的六个字作了回答:“君行令,臣行意。”意思说:你可以下令,但我却要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办事。于是,范蠡收拾一些金银珠宝,坐船从海上走了。当勾践知悉其出走的消息时,范蠡已经乘风破浪,航行在万顷波涛之上。勾践知道范蠡已经与自己决绝,于是下令以环会稽三百里作为范蠡的俸邑。但这不过是做给其他臣子看的,做做样子罢了。范蠡到齐国后,没有忘记与他共过患难的老朋友文种,他千里致书,劝文种赶快离开越国,以免遭杀身之祸。书中说:“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说越王这个人可以与他共患难,却不能与他同享乐。但文种接到书信后,半信半疑,认为自己功劳显赫,在臣民中有崇高的威望,勾践不见得忍心杀他;另一方面也不愿抛弃刚刚享受到的荣华富贵,因而没有离开越国,只是“称病不朝”。这时,有人向勾践进谗言,诬陷文种“作乱”。此时的勾践已经感受不到敌国的威胁,也就不需要治世的能臣了,于是就

赐剑,让文种自杀。一幕兔死狗烹的悲剧,应验了范蠡的预言。

范蠡离开越国后,来到齐国,隐姓埋名,自号“鸱夷子皮”,即盛酒的皮袋子,在海边住下来,自食其力,很快就“致产数十万”。齐国贵族知悉范蠡的真实身分以后,钦佩他的才能,聘他做了齐国相。但他在齐国为相的时间不长,也没有留下显著的政绩,就又辞官了。然后悄然远行,来到陶(今山东定陶),自号陶朱公,继续经商,成为闻名天下的富商大贾,活了七十多岁,得以终其天年,并成为中国商人公认的鼻祖。

反观范蠡一生,确实是按照《周易》来行事的,尤其是他功成身退的行为,更是体现了《周易》盛极思变的思想。《周易》一再强调要与时偕行,而且《遁》卦还专门讲人生进退的道理。说一个人如果有所留恋,就将会有凶险。《遁》卦上九说要“肥(飞)遁”。就是说要坚决高飞远遁,远离那名利是非之地。试想,范蠡在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将军之后,人生的富贵已经达到了顶峰,接下来只能走下坡路了,所谓“盛极则衰,泰极否来”,如果不及时脱身,等待自己的决不是好结果。所以他当机立断,不顾越王勾践的威胁利诱,飘然而去,做到《周易》所说的“肥遁”。而文种因为不能当机立断,犯了《遁卦》九三象辞“系遁”的大忌,所以落了个赐剑自刎的悲惨结局。在我们称赞范蠡,为文种扼腕叹息的时候,是否应该思考《周易》的启迪而有所深思呢? (曹建国)

#### 4. 李斯临刑悲恋“位”

《红楼梦》中写“智通寺”门旁有幅对联:“身后有馀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贾雨村认为必是“翻过筋斗”的人的切

肤之言。脂砚斋批为“先为宁、荣诸人当头一喝，却是为余一喝”。假如处富贵、高位、得意、显达之人，能及时地被它如当头棒喝般唤醒，还不至于无路可走；怕的是觉醒得晚了，想回头已经无路，那才是真正地可悲。李斯就是这样一个可悲的人。

《周易·系辞下》说：“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社会现象与社会学家也揭示了不同地位之间的事物存在着大量的不平等。同样是牡丹花，生在洛阳则“三千宠爱加一身”，长于幽谷则“零落成泥碾作尘”。同样是桃梗与土埂，一是于旷野中担忧八月水涨自己不可预测的命运，一是被塑造成佛像，为万千人祈祷、膜拜。《王子与乞儿》一类故事，总在讲述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孩由于“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遭遇和命运。正因如此，苏秦感慨系之：“人生在世，势利富贵岂可忽忽哉？”南人善水，北人善骑；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孟母三迁，难道不正是因为认识到现在所处的“位置”，将对儿子人生“位置”的定位与选择有潜在影响吗？古今中外无数的人生故事，哲人“慎其所处”的告诫，都透露着一个信息：“位”的重要。《周易》这本人生哲学的指导书，同样也极其重视“位”。它不但以爻位变化显示凶吉否泰，同时以言辞示之。如“卑高以成，贵贱位矣”（《系辞上》），“列贵贱者存乎位”（《系辞上》），“柔得位而上下应之”（《小畜·彖辞》），“其位在中，以贵行也”（《归妹·六五·彖辞》）。“位”有时间之“位”、空间之“位”。它也有贵有贱。一个人要为天下人做点事，一定要“得位”；没有一定的“位”，是办不成事的。

首先，人类的某一普遍经验，被特殊个体深刻领悟、接受，需要契机。李斯认识到得“位”与得“尊位”的重要，还是一个

偶然的事件。社会学家从主体是否可以主动控制着眼,把“位”分成两类:有些地位是个人无法控制的,例如年老或是年轻,男人还是女人,白人还是黑人,这样的地位被说成是先赋的;有些地位可以凭主观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这样的地位称为自致的地位。应该说,李斯的先赋地位并不好,他出身上蔡一个普通百姓家庭。按当时惯例,他将来的职业或是务农,或是做点小生意;最好的出路就是到郡府做个掌管文书的小吏,总之,不能摆脱卑贱的地位。在郡府掌管文书的时候,有一天李斯去厕所,看到正在吃不洁之物的老鼠因有人来而吓得慌忙逃窜;后来去仓库,看到官仓中的老鼠正优哉游哉地吃着粮食。这时他忽然明白过来,所谓贤愚不肖并不一定是品行、智力上的界定,重要的是看你处在什么位置,处身得“位”,才有显示能力、德行的舞台。他决定要摆脱“厕鼠”般的卑贱,赢得“仓鼠”般的清贵。因此,他拜荀子为师,学习治国安民之术。学成之后,他选择了为秦国服务。到秦国后,又根据秦国当时的情况,先选择吕不韦家做进身之阶。应该说,他寻求“位”的路线相当清楚。离开楚国时,他留给荀子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此非士之情也。”既体现了他摆脱卑贱之位、求得“尊位”的决心,也于其中可见“厕鼠事件”对他极深的刺激。他对“厕鼠”般的生活极度恐惧。这种怕坠入往日生活状态的恐惧成为李斯的人生动力之一。他尽忠竭力,出谋画策,职位也由舍人变为郎、客卿、廷尉,进而为丞相。随着官阶不断上升,李斯施展才华的舞台也不断扩大。秦国统一大业中到处可见李斯的策谋。他也于这种“货于帝王家”的过程中,求得自己的“尊位”,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

儿子李由回咸阳探亲,朝廷百官都来庆贺,门前车水马龙,李斯自己都认为已是“富贵极矣”。

但《周易》有言:“亢龙有悔。”追求合适自己的位置是应该的,但也不能过分。只知一味攀高,身处穷高之地,不能谨慎,就会召来悔咎。李斯自己也知道“物极必反”,但如何使处极盛之位的自己脱凶险而向吉祥,他在言谈之中表现得很迷惘,说是“吾未知所税驾也”。且看他此后一系列表现:秦始皇死于出巡途中,赵高要李斯同他一起诈改遗诏,扶持胡亥登位。李斯开始还知道自己身处丞相之位应当坚持的原则,义正辞严地表示:“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但当赵高晓之以利害时,为保住辛苦得到的荣“位”,李斯屈服了。后来,为保儿子李由和自己,李斯又一次上表附和二世的荒唐之言,而把臣子该尽的匡正之责丢在一边。被投到狱中,当二世派人来核实罪状时,他困于赵高的诈骗:“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当面临“位”与职责之间选择时,李斯总是舍原则而保“位”,严重违反了《周易》反复强调的持“位”要既“中”且“正”,即坚持正义的原则。

其次,人处在某一事件、某一关系的特定的“点”上,这个“点”就构成他临时的“位”。由于当时周围的关系或特定的情势规定了不同的“位”应有不同的表现,所以,《论语》中记载孔子在乡党、在朝堂,与学生相处、与长辈相处、与高于自己职位的人相处、与低于自己职位的人相处,表现各不相同。或谨小慎微,或随意自如;或侃侃而谈,或俯身聆听。根据场地不同,言谈举止也各不相同。《周易》以阴阳奇偶来显示不同“位”的不同性情。奇为阳位,偶为阴位。阳居阳为正,阳居阴为不



正。阳代表进取、积极；阴表示消极、保守；人们应根据“位”的性情来行动。在赵高、胡亥阴谋篡位时，秦始皇刚刚去世，余威还在，公子扶苏持重兵于外，以当时的情势和李斯的地位，还大有可为，可李斯被动、消极，随赵高等摆布，致使自己居位失正。当时赵高与胡亥已经沆瀣一气，胡亥被赵高玩于股掌之中，国家之事已到了不可为的程度，此时，李斯已是身处孤危之地，加之失正于前，情势已是万分危险；假如他采取“括囊”全身之策，也许“含章，可贞”，还有一线生机；但李斯为保荣“位”，不合时宜地上言，甚至在狱中仍然上书二世，妄想挽回败局，结果适得其反。

纵观李斯一生，也许“厕鼠”事件对他印象太深，他为保住荣“位”，甚至到了牺牲原则和不顾形势的程度，最后把自己和家中三代人的性命都搭在里面。临刑之时，他设想自己不要荣“位”，回上蔡做个普通百姓，日常打打猎而已，应该也蛮快活。只是刑场之上，随着刀光一闪，身断两截，——设想得太晚了。

（赵彩花）

## 5. 短命天才叹王弼

《周易》流传几千年，研究者数不胜数。其中，不乏著名的大思想家，但是，若论到最年轻有为的著名学者，则非魏晋时的王弼莫属。王弼字辅弼，生于公元226年，死于公元249年的一场瘟疫，仅仅活了24岁。虽然寿命不长，但是他勤奋著述，留下了大量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为《周易》和《老子》所作的注本。他在古代哲学史、思想史上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开启了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魏晋玄学。

王弼出生于一个地位显赫的大家族。他的曾外祖父就是在汉末称雄一方的刘表，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当时显赫的高官，具有很高的清望。这个家族同时也是一个学术世家。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中造诣很高的王粲，就是王弼的族祖父。因为王粲的两个儿子造反被杀，王弼的父亲王业被过继给王粲。王粲的藏书很多，其中很多都是汉末大书法家、文学家蔡邕所赠。这些丰富的藏书，为王弼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王弼早慧，辩才过人。他最喜欢读的书就是《老子》和《周易》，并且善于思考，才十多岁就已经很有名气，被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所看重。一次，他随父亲王业去拜访当时的著名学者裴徽，裴徽对王弼很看重，于是两人之间有一段很有名的对话。裴徽问王弼：“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意思是，“无”是万物的根源，但是圣人却不说，而老子反而阐述“无”，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容易留下破绽。但是才十来岁的王弼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圣人做事虽然是以‘无’为原则，但是因为‘无’很难解释，所以索性就不说；老子呢，他实际上是信奉‘有’的，所以常常说‘无’。”王弼的回答看似不合常理，但确是很难驳倒。他将道家学说用来解释儒家学说，这也正是当时社会所逐渐流行的风气。

当时思想界的领袖之一是位居高官的何晏，声名显赫。何晏很早就听说过王弼的名气，于是就趁一次聚会提出一个被大家讨论得很透彻的论题，让王弼来质疑，这无疑是在考验王弼。但是，王弼很快就提出了几个前人没有提到过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出来。于是王弼自问自答，滔

滔不绝地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又作了圆满的解释,其见识高妙令满座叹服。何晏也为《老子》作过注,自我感觉很好;但是看了王弼的《老子注》以后,他自叹不如,于是就把自己的注本改了名称,叫做《道》、《德》二论,而不称《老子注》,以示对王弼的尊重。从此王弼声名远扬,人们都以和他交接为荣。何晏曾经这样评价他:“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对王弼的才华和卓识高度赞赏。

王弼的天才,在《周易》阐释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他在《易》学上的最大贡献就是扭转了《易》学发展的方向,一改两汉的“象数《易》学”风气,开启了“扫象数,阐玄理”的义理《易》学的先河,成为《易》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众所周知,在汉代,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立包括《周易》博士在内的“五经博士”以后,开启了以经术谋求仕途的道路。无数的文人为了几部经书耗尽毕生的精力,甚至有劳累过度、暴死于灯下的事情发生。经学的死板僵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变得支离破碎,极为烦琐,甚至对经书上一个字的解释可以达到数万字。《易》学的发展也不例外,而且《易》学除了有以上的弊端外,还因为谶纬、阴阳等思想的混入,进而推崇象数之学、阴阳之术,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

汉代灭亡以后,儒家经学日趋式微,“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两汉象数《易》学发展失去了依存的空间,因此迅速衰落。王弼的《易》学思想恰逢此时诞生,给被汉代象数学禁锢了四百年的《易》学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因此迅速壮大,并最终取代了汉代象数学。王弼《易》学思想相当丰富,很难用简单的语言来概括。他在《易》学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超越了

前人。首先是他提出了“得意忘象”的观点，这也正是他《易》学核心所在。简单来说，《周易》的“象”就是指卦象、爻象，或者说是卦画和爻画；“言”是指卦辞和爻辞；“意”是卦象所包含的深刻含义。王弼认为，“言生于象”，“象生于意”，因此卦“意”是一卦的根本，只有把握“意”才是核心。相对于“意”，卦象和卦言都是为了获得“意”的工具，在达到理解“意”的目的以后，“象”和“言”就都是无用的，必须忘掉，否则人们会执着于对工具的追求，而阻碍对“意”的把握。为了便于理解这一点，王弼举了一个通俗的例子来说明：“象”和“意”的关系，就好比是捕鱼的工具“筌”与“鱼”的关系一样，如果捕到了“鱼”，那么“筌”作为工具就是毫无用处的废物了。由此出发，王弼提出了“寻言以观象”、“寻象以观意”的具体方法，就是根据卦辞和爻辞来理解卦象和爻象，然后再根据卦象和爻象去体会深层的内在的含义。站在《易》学的发展角度来看，王弼“得意忘象”的理论有深刻的哲理，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弼在《易》学的另一贡献则是对《周易》的传播和流传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一书包括两部分：《易经》和《易传》。在起初的时候，经和传是分开流传的。从汉代开始，就有学者开始力图将两者合起来，但是这一工作直到王弼才最后完成。王弼将《易经》与《易传》合一。他确立的这种体制极大方便了阅读和研究，一直到现在，《周易》都是按照这种体制在流传。同时，经、传合一之举，也帮助人们从原始《易经》的巫术符号的象征体系，进一步提高到对于《易传》哲学的高度认识，大大促进了后世理论思辨的发展。

王弼《易》学产生后,很快便风靡一时。据史料记载,魏晋之际的太原王济喜好谈《易》,看到王弼的《易注》以后,说:“见到这本书以后,领悟很多。”在晋以后,王弼的《易注》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在永嘉之乱以后,其他《易》学流派的著作都逐渐失传了,只有王弼的注本仍旧风行。当时朝廷在设置博士的时候,《易》学方面只设立奉行王弼《易》学的博士官。历经魏晋南北朝,《易》学都是王学的天下。唐代编纂《五经正义》的时候,《周易》又采用王弼的注本,一切旧说全废。终唐之世,王学定于一尊。700多年的时间,王弼的《易》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之大也就不难想象了。

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是每当想到王弼,人们仍然不禁感叹他的早逝。如果他的寿命再延续若干年,他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果。尽管如此,看到他的学说在身后如此受到重视,这位少年天才一定能含笑九泉了。(章 原)

## 6. 通《易》惜未通人生

让我们从关云长败走麦城谈起。

吕蒙白衣渡江奇袭荆州,关云长败走麦城的故事家喻户晓。话说孙权自从派遣吕蒙出征后,在后方日夜忧心,生怕大军有什么差池。待听说关羽被围麦城之后,孙权大喜,同时却又担心风云突变,发生什么变化,毕竟对手不是别人,乃是勇冠华夏、逼得曹操都要迁都的关羽关云长。然而前线的消息迟迟不来,孙权于是让谋士占卜来推断吉凶。关于占卜,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根据《三国演义》,吴国军队在将关羽围在麦城后,前后共有两次占卜。先是吕范揲蓍成象,乃“地水



师卦”，玄武临应，主敌人远奔。权问吕蒙曰：“卦主敌人远奔，卿以何策擒之？”蒙笑曰：“卦象正合某之机也。关公虽有冲天之翼，飞不出吾罗网矣！”然后令吕范再卜之。卦成，吕范告曰：“此卦主敌人投西北而走，今夜亥时必然就擒。”权大喜，遂令朱然、潘璋领两支精兵依军令埋伏去讫，果然擒得关羽。《三国演义》乃小说家言，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倒是另一种说法颇具说服力，据《三国志·吴书》记载，当时，孙权请虞翻卜筮。虞翻的卜筮结果先是兑下坎上(䷹)，即六十四卦中的《节》卦；后是九五变爻，由阳变阴，遂成了兑下坤上(䷁)，即《临》卦。虞翻分析卦象说：“不出二日，必当断头。”按：《节》卦上坎(☵)为水，下兑(☱)为泽，卦象是泽上有水，为防洪水泛滥，须加堤岸预加节制。虞翻以此说明必须有备而行，则关羽之害不足为洪水猛兽。又《节》九五之爻，变阳为阴，化为《临》卦(䷁)，其六五爻辞：“知临，大君之宜，吉。”喻孙权君临荆州以节防关羽，具有大智大勇之象，必然吉祥如意。也就是说，荆州之役，东吴上下用心，打的是有准备之仗；关羽则是骄狂自大，防患不足。战前形势，胜败之兆呈露，所以虞翻有此断言。后来战事的结局正如他所言，没过两日，关羽被潘璋部将马忠所杀。孙权不由称赞道：“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自此虞翻名噪一时。

虞翻(164—233)，字仲翔，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汉魏时期《易》学大师。虞翻学《易》具有家学渊源，根据他自己所述，他的高祖父虞光就开始治孟氏《易》，他的曾祖父虞成、祖父虞风、父亲虞歆都没有间断过《易》学研习。长期的家学积累，为虞翻从事《易》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虽然他“生遇世乱，长于军旅，习经于枹鼓之间，讲论于戎马之上”，仍然

在《易》学领域作出了很大成就。《周易》被推为六经之首，《易》学在两汉时期乃显学之一。门派林立，分支尤多，历来以《易》而成名者不在少数。但虞翻经过潜心钻研，大胆地对前人进行了批驳，他认为“经之大者，莫过于《易》，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其读《易》者，解之率少。”即便是对公认的经学大师如马融、郑玄，虞翻也敢于指摘其错误。虞翻把他的易学专著《易注》呈送给当时的著名学者孔融后，孔融大加赞赏，说：“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认为其《易注》是“与神合契”的穷通古今之作。令人遗憾的是，虞翻《易注》在流传过程中亡佚，今人只能从后来学者辑佚的只言片语来管中窥豹了。

虞翻自认为他和《易》学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传说虞翻所在郡的郡吏陈桃曾经做了一个奇特的梦，梦见虞翻和一个披发鹿裘的道士在一起。道士布《易》六爻，取三爻让虞翻吞下。虞翻请求吞下全部六爻，道士说：“《易》道在天，三爻足矣。”此梦或许真有其事，或许后人附会，但虞翻在《易》学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内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从某种角度看，《周易》是一本“人”书，它所传递的正是人如何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的信息。那么是不是精通了《周易》，就能够在人生旅途上一帆风顺呢？虞翻的人生经历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虞翻虽然是《易》学大师，对《周易》的领悟自非常人能比，但他的人生旅途却是坎坷不平，屡遭凶险，屡遭贬斥，甚至最后被流放到交州一带，客死异乡。

是虞翻生不逢时吗？显然不是。三国时期正是谋臣说客纵横天下的良机，虞翻先后跟随过王朗、孙策和孙权，汉朝廷

曾召他为侍御史,曹操也召他为司空辟。《三国志》中记载了一些虞翻在行军打仗时献出的奇策妙计,也多被采纳,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从这些来看,他显然不是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那么是虞翻未遇明主?也不是。他长期跟随的是江东孙氏兄弟,孙氏兄弟皆可算得上是比较大度恢弘的君主。追根究底,虞翻的人生悲剧正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是他为人处世上的失误而导致。

虞翻生性耿直,不懂得掩饰自己的好恶,批驳人毫不留情,为此得罪了许多人。孙权夺取荆州后,原先为关羽所擒的魏国大将于禁落入孙权之手,孙权为了笼络人心,对于禁另眼相看,恩遇有加。一天,孙权乘马出行,让于禁同他齐头并进。虞翻立刻当众呵斥于禁:“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拿起鞭子就向于禁抽去,幸被孙权制止。又一次,虞翻乘船与蜀国降将糜芳相遇,糜芳为将军,官阶比虞翻高,按常规虞翻应该为糜芳的船只让道。糜芳船上的人便大声喊:“避将军船。”虞翻厉声斥道:“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城,而称将军,可乎?”糜芳立刻关闭窗户,避开了虞翻。凡此种种言行,使受他责骂的人恼羞成怒,使孙权也怅然不平,对他大为不满。

在臣子与君主的关系上,虞翻也是失败者。虞翻多次不留情面地与孙权争论,使得孙权大为不满。孙权称号吴王后,大宴群臣,孙权亲自起来行酒,虞翻趴在地上装醉,不接孙权的酒。等孙权一离开,虞翻立刻坐了起来。孙权大怒,拔剑就要斩虞翻。满座中人唯有大司农刘基跪倒强谏:“虞翻虽然有罪,天下人怎么知道?大王您因为具有容人之量,才有了今天的规模,现在一下子丢弃了,多么可惜啊。”孙权听后强压怒火,虞翻才免了一死。

虞翻还有一个爱好——喝酒,适当喝酒自然无妨,但虞翻则是没有节制地喝。最糟糕的是,他酒后喜欢议论,因此多次惹来灾祸。一次酒后,孙权与张昭谈论神仙之术,虞翻竟然指着张昭的鼻子说:“那些全都是死人,妄称神仙,世界上哪里有什么神仙呢?”张昭是吴国的元老,孙策、孙权兄弟对他都是恭恭敬敬,哪里容得下虞翻对张昭如此不恭?孙权积怒之下,将虞翻流徙交州。交州时为蛮荒之所,虞翻在这里一呆就是十余年,直到病死。

《周易》中有关人际的哲理很多,可惜,虞翻虽然深谙《易》理,却未能在生活中活学活用。他被发配到交州后,痛定思痛,后悔自己疏于礼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于是只能依《易》设象,占卜吉凶,聊以自慰而已。

孔子有言:“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内中的感慨可谓良多。人到五十,按照当时的平均寿命来算,已进暮年,人生的风雨经历了许多,自然有许多教训,此时来读《周易》,更能体会到内中的哲理。虞翻被发配到交州的时候,年龄五十余岁,正是孔子所说学《易》的最佳时间。“客有故园思,潇湘生夜愁”。他身处蛮荒之地,回忆起在江东的欢乐时光,而眼下只能玩味《易》理以自娱,从《易》中悟出的人生哲理越多,便愈加后悔,虞翻内心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方有最真切的体会。(章原)

## 7. 占卜奇才数管辂

自从《周易》问世以来,历代研究它的占卜预测之学的学者不在少数。有许多人占卜星象研究得很透彻,留下了许多

神奇的占卜故事。在历史记载中,传说占筮最准、最灵验的人物,恐怕要推三国时的管辂为第一了。

管辂字公明,三国时平原人,容貌粗丑,十分喜欢喝酒。他从小就表现出了与其他小孩不同的地方。他8、9岁的时候,非常喜欢观望天上的星辰,有时候晚上都不睡觉。父母常常劝阻,他却说:“我虽然年纪小,但是喜欢观察天文。”还说:“家鸡和野鹄,都知道自然的变化,何况人呢?”在与小伙伴一起玩游戏的时候,他居然在地上画出天文以及日月星辰的图像。如果谈论起各项事情,他都有非常之语。连号称很有学问的人也不能难倒他。所以当时他的名气很大,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小神童。大家都知道他将来一定是个杰出的人才,只是不知道他的天赋会在哪些方面得到施展。等到长大后,他果然精通《周易》,喜欢风水占卜之术,成了一个占卜方面的专家。更为难得的是,他为人厚道,心胸开阔。对自己好的人,他不会过分亲昵;恨自己的人,他也不会心里记恨对方,总是抱着“以德报怨”的信念。对父母、兄弟以及亲戚朋友,他都相处得很得体,没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管辂还善于辩论,在他才15岁的时候,就已经声名在外。琅琊太守听到管辂的名声如此之大,有些不相信,于是大会宾客百余人,其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人,与管辂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管辂“文采葩流,枝叶横生,少引圣籍,多法天然”,面对满座众人的问难,他应对自如,众人无不叹服。经过这件事以后,管辂的名声更大了。

管辂曾跟名士郭恩学习。据说郭恩很有才学,擅长《周易》、《春秋》,也精通天文之术。管辂先学《周易》,几十天以后,他便领悟了《易》学的奥妙,言谈之中已经比郭恩还要高明了。然后他开始用心研究《周易》的占蓍之法,他为同学们占



卜疾病死亡、贫富等等,一点差错都没有。大家都认为他是神人。再然后他便向郭恩学习仰观天文,一个月三十天都是晚上通宵不睡来观察天象,很快便超越了郭恩。一年后,郭恩叹服管辂的学识,便反过来跟着管辂学习《周易》和天文之道。这种师生反过来互相学习的事情,估计在中外古今都是很少见的吧。尤其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管辂便能让自己的老师甘心拜自己为师,可见他的天分是多么高了。

郭恩三兄弟,腿脚都有毛病,走路一拐一跛。于是就请管辂来占问原因,郭恩说:“我们弟兄三个人,不知道为什么都得了这个毛病。请你为我们占卦,好知道上天惩罚我们的理由。如果是上天降灾的话,就请你为我们祈祷。”于是管辂便设卦观象,但是卦象非常复杂,内中有不可解的地方。正好碰到天晚了,于是管辂便留宿在郭恩家,接着思考卦象。到了半夜,管辂忽然有所领悟,便叫醒郭恩,对他说:“卦象中有你家的墓地,里面有一个女鬼,不是你的伯母,就是叔母。从前饥荒之年的时候,为了贪图她的几升米,有人将她推到井中,用大石头砸下去,孤魂野鬼于是上诉于天,所以上天便有所惩戒。”郭恩听了,痛哭着承认了自己当年的罪行,并请管辂为自己祈祷,希望上天惩罚自己,不要再祸及子孙。管辂观察了卦象以后说,这祸对后代没有报应。据说后来,果然如他所言。

广平的刘奉林妻子卧床不起,病得很厉害。家里人认为她无法救治,为她准备好了后事,当时是正月,便请管辂占卜她的吉凶。管辂说:“命中注定她将在八月辛卯日中之时毙命。”刘奉林不以为然,认为不可能这么精确。后来,到了秋天以后,刘妻果然在管辂所说的时辰死去了,一点也没有差。这件事传出去以后,有个叫鲍子春的名士便来与管辂相见,向他

请教。听了管辂的解说之后，鲍子春感慨地说：“我从小就喜欢《易》学，也喜欢占蓍之术，但好像是盲人想要分辨白与黑，聋子想要辨别清浊之音，苦而无功。听了您的高论，真是茅塞顿开啊。”

管辂曾经拜访魏郡太守钟毓，和他一起谈论《周易》的奥妙。钟毓在《易》学上也颇为自负，于是想了二十多条问题来诘难管辂。钟毓自认为这些问题是没有人能够解答的，没有想到管辂等他一说完问题便开始回答，一点也没有犹豫停顿，解答得相当精妙恰当。钟毓大为倾倒，向管辂谢罪。管辂在谈话中说道：“我占卜可以算出你的生死之期。”钟毓便请他先算自己的生辰，结果完全正确。钟毓大为震惊，说：“你太厉害了。我的死期就托付给上天安排吧，不敢让您来算了。”

清河令徐季龙派人去打猎，然后请管辂占卜看能打回来什么猎物。设卦观象以后，管辂说：“应当是小兽，不是飞禽之类。这个猎物虽然有爪牙，但是很短不强壮，虽然身上有花纹，但是不那么明显。不是老虎不是野鸡，应该是狸。”等到打猎的人黄昏回来以后，检点猎物，果然如同管辂所说。

管辂对风水之术也颇有研究。他有一次路过毌丘俭坟墓的时候，靠着树悲伤地长叹，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有人问他原因，他说：“虽然这里林木茂盛，但是不会长久；碑谿虽然华美，却不会有后人来守墓了。这座坟墓的地形，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种危险的情况都具备了，应该是诛灭九族的征兆啊。不出两年，便会应验。”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

类似的事情，史书上记载很多。他算得是如此灵验，以致他所在的地方，人们都夜不闭户，无人敢作违法的勾当。他的

名声在当时非常大。天下士人,当朝大臣没有不争相和他结交的。他的家里总是宾客满门。无论多少人,管辂都设宴招待,不论贵贱,一律平等接待。他的名声不仅仅是靠他精妙的占卜之术,也与他谦虚待人的品德有关。他的弟弟曾经想学习他的本领,管辂劝阻说:“你没有能力学习这些。占卜,除非掌握得极为精妙,否则不能看出数术;除非达到最高的境界,否则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孝经》、《诗经》、《论语》学好了,足以做到三公那样的高官。《周易》占筮之学,不是你能领悟的。”于是他的弟弟便打消了这个念头。管辂不仅给别人占筮极准,对自己的命运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曾经预言自己的寿命就在四十七、四十八的样子。后来他死的时候,正好是四十八岁。

《周易》具有占卜的功能,历代研究此道的人不在少数;但是能够像管辂如此灵验的占卜,史书上记载的也就他一个人了。到底是真灵验,或是事后诸葛亮?有待继续探讨。不过,正如管辂所说的,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种本领不是每个人都学得来的。可惜管辂没有什么著作流传,他的那些精妙的占卜方法,也就随同他一起葬身青山了。(章 原)

## 8. 诸葛亮名成八阵图

诸葛亮(181—234),河南南阳人。他在刘备“三顾茅庐”的诚心感发下走出乡野,加入群雄逐鹿的行列。从那一天起,到他病死五丈原,二十几个春秋的南征北战,把他锤炼成一个光耀后世的军事家、政治家。从此以后,他活在民众的讴歌祭祀中,文人墨客的诗文篇什里。如今,描述诸葛亮的小说、戏

剧、电视、电影仍然在继续产生与传播,并且还将继续下去。历史的诸葛亮将永远与“当代人”同在。这样的“诸葛亮现象”成为一种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

诚然,诸葛亮具备广泛为人接受的条件。他一旦出山,便忠贞不二,在失荆州、败夷陵、刘备之死、南中之乱时处变不惊,力挽狂澜;辅佐刘禅,尽心竭力,治蜀安民,兢兢业业;为让蜀汉走出困境,他苦思冥想,绞尽脑汁;为完成先主遗愿,他多次北伐,死而后已。历来“能臣”不少,但能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者又有几个?因而,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把诸葛亮做人臣学习的典范。而坚信“学而优则仕”、怀着强烈功名意识的知识分子,则于诸葛亮其人其事中品尝出更多的人生况味:豪气干云时,可以诸葛亮“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伟业自励与自期;壮志未酬时,可引“出师未捷身先死”为同调而自怜与自悲。“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是他们躁进时的清醒剂,失意时的安慰剂;即使“我”此生寂寞无名,也足以由诸葛亮非凡的才能与高尚的人格而“观我生”——回味走过的人生。至于老百姓,则更是思召伯而惠及甘棠,诸葛亮死后,蜀国人民思念他的恩泽,到处立碑、立庙祭祀他,与他有关的遗迹都披以美丽的传说。

诸葛亮活着的时候,就“长于巧思”,曾制造木牛流马,布八阵图。当人们带着敬爱叙说诸葛亮的传奇一生时,他的智慧被人们无限夸大而到了“神奇”的地步。下面,我们来考察诸葛亮八阵图的有关说法,看看神秘面纱下的八阵图究竟是怎样的,以及八阵图为什么让人觉得神奇,它与中华文化有着怎样的渊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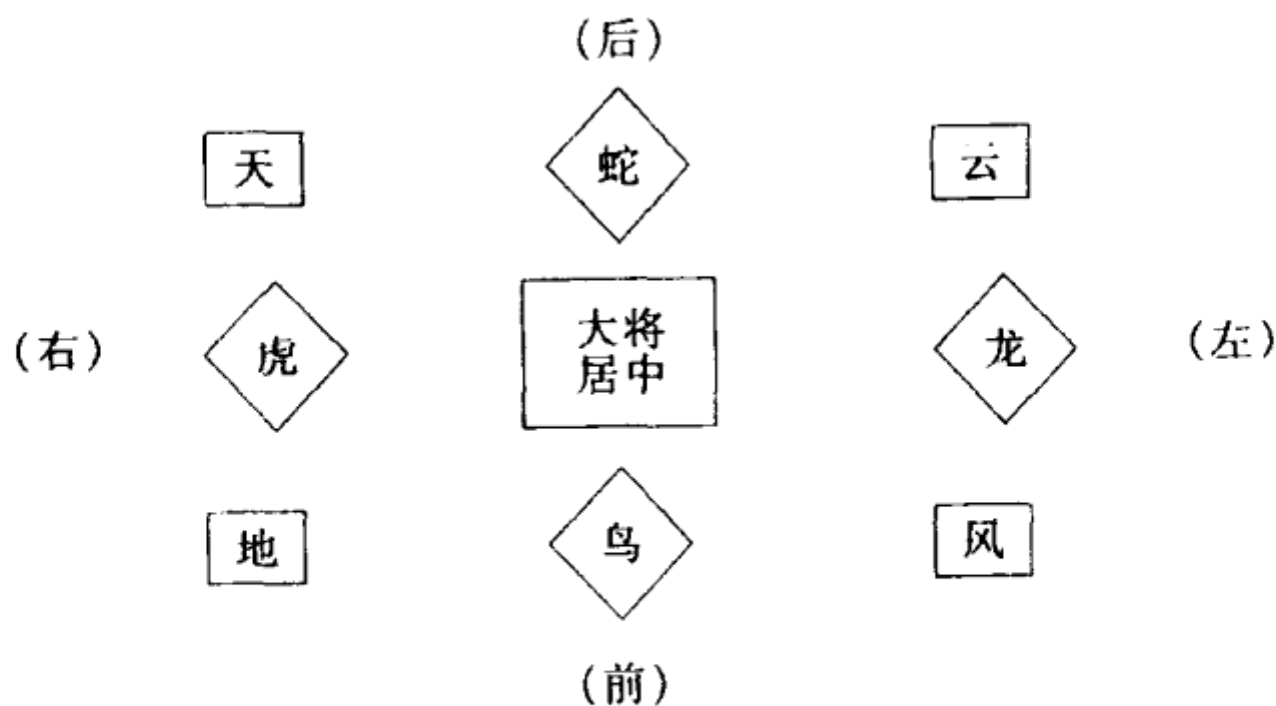
八阵图遗迹,传说有三处:一在陕西沔县东南诸葛亮墓

东,一在四川奉节县南江边,一在四川新都县北三十里弥牟镇,都是以石头堆垒出来的,其中以在奉节者最著名。《三国演义》中描绘了当年八阵图的威力。其第八十四回写陆逊追杀刘备至渔腹浦,误入八阵图:“一霎时,飞沙走石,遮天盖地。但见怪石嵯峨,槎枒似剑;横沙立土,重叠如山;江声浪涌,有如剑鼓之声。”正在吴军生命危险的时刻,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出手相救并告诉陆逊,诸葛亮入川时,布阵于此,名“八阵图”,“反复八门,按遁甲休、生、伤、杜、景、死、惊、开。每日每时,变化无端,可比十万精兵。”虽然历史学家早已考证此为小说家言,当年陆逊并不曾到过渔腹浦,可人们却乐于相信八阵图及其神秘威力。并且,它并不是肇始于罗贯中,唐代刘禹锡在《刘宾客嘉话录》中这样写道:“夔州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有诸葛亮八阵图。箕张翼舒,鹅形鹤势。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峡水大时,巴蜀雪消之际,汹涌滉漾,大树十围,枯槎百丈,破碛巨石,随波塞川而下……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惟诸葛阵图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仅已六百年,淘洒推激,迄今不动。”在能让“万物皆失故态”的洪波之后,“诸葛小石之堆”却“标聚行列依然”,它似乎含有一种超越时间之剥蚀与物力之削毁的神秘力量。苏东坡在《东坡志林》中描述了它的另一可怪:“诸葛亮造八阵图于渔腹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相去二丈……吾尝过之,自山上俯视,百余丈,凡八行,为六十四堦。堦正圆,不见凹凸处,如日中盖影。及就视,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八阵图是垒石而成,一共八行,每行相距两丈。从山上远看,可看清这八行石垒分别围成六十四圈。这六十四圈,就像中午时太阳投在地面的影子那么圆。可走近一看,只见卵石漫漫,杂乱无章。视点变化



而面貌不同,它似乎深含玄机。

其实,八阵之见于兵书者,其说有二:一是以八阵为八种阵势:即方、圆、牝、牡、冲、轮、浮沮、雁行八阵;或以休、伤、生、杜、景、死、惊、开为八阵。二是以八阵为一阵八分,它是古代作战时的一种战斗队形及兵力部署图。根据唐李筌《太白阴经》、李靖《问对》诸书所记,诸葛亮的“八阵图”应为后一种。示意如下:



八阵分别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命名。其中,天、地、风、云为“四正”,龙、虎、鸟、蛇为“四奇”;加上中军,为九大阵。周围八阵各由六小阵组成,中军由十六阵组成,共计六十四阵。另外,尚有二十四阵布于后方,作为机动。八阵图的构想与《周易》密不可分。从八阵图的特点看,李靖指出它是“外圆内方”,“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看似一整体,但于整体之中,却有矛盾对立,有运动变化之妙。它与《周易》的整体性思维,事物既和谐又有矛盾变化的观点息息相通。八阵的排列,实际上是一幅“文王八卦方位图”(又

称“后天八卦方位图”)。八阵中的每一阵都由六小阵组成,本之于《周易》各卦的六爻。八阵图的六十四小阵,与《周易》的六十四卦相合。至于“四正”、“四奇”,则把八卦的变化与方位又结合起来,更生出无穷的变化之机。六十四卦变化已经繁多,再把它每一个瞬间的空间与时间组合;罗贯中所谓“每时每刻,变化多端”,确有逻辑依据。正是因为相信《周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变”,再加上时刻、方位的变化,八阵图可于每时每刻因方位不同而变化无穷,便为人们所相信。八阵图的神秘,源于“生生之谓易”的《易》道“变”的思想。

其实,经人们夸张、演义后,诸葛亮所具有的深不可测的智慧,也是以《周易》智慧为蓝本的。《周易》认为,万事万物有着共通的普遍规律,圣人善于发现天地之道并把它施用于人事。“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文言传》)从而沟通天人之际,具有神鬼难测的智慧。《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深晓天地之道,其中,“五丈原诸葛禳星”与“七星坛诸葛祭风”就是典型代表。至于人事,诸葛亮更是先知先觉,特别表现在战争中,他对敌人的所思所想、计策意图更是了如指掌,因而占尽先机,以致司马懿这样强硬的对手,也只能仰天长叹“孔明有神出鬼没之机”。诸葛亮精通八卦变化,曾布成八卦阵困住陆逊。有时,敌我双方都知道是八卦阵,诸葛亮的运用也与别人不同。如《三国演义》第一百回写他与司马懿斗阵,司马懿明明认出了诸葛亮布的是八卦阵,按照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八门;便吩咐去破阵的部下从正东“生”门打入,往西南“休”门杀出,然后又从正北“开”门杀人,则可破此阵。可结果却是:

三人杀入蜀阵,只见阵如连城,冲突不出。三人慌引骑转过阵脚,往西南冲去,却被蜀兵射住,冲突不出。阵中重重叠叠,都有门户,哪里分东西南北?三将不能相顾,只管乱撞,但见愁云漠漠,惨雾蒙蒙。喊声起处,魏军一个个皆被缚了,送到中军。(《三国演义·武侯斗阵辱仲达》)

诸葛亮不但于八卦阵比别人要知道更多的变化,他把八卦变化与方位结合起来运用,则更是人所难及。如第一百十回写诸葛亮为收割陇上熟麦,亲自到魏军前吸引敌方视线。司马懿看到诸葛亮,便吩咐二千人马前去捉拿:

魏兵皆骤马追赶,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尽力赶了一程,追之不上。各人大惊,都勒住马言曰:“奇怪!我等急急赶了三十里,只见在前,追之不上,如之奈何?”孔明见兵不来,又令推车过来,朝着魏兵歇下。魏兵犹豫良久,又放马赶来。孔明复回车慢慢而行。魏兵又赶了二十里,只见在前,不曾赶上,尽皆痴呆。孔明教回过车,朝着魏军,推车倒行。(《三国演义·出陇上诸葛妆神》)

司马懿虽然知道诸葛亮“善八门遁甲,能驱六丁六甲之神。此乃六甲天书内‘缩地’之法也”,也拿他没办法,接着还被三个“诸葛亮”弄得心中惊疑不定,陇上的熟麦尽被诸葛亮早已布置下的人马收割罄尽。

从上面史实、故事、民间传说等记载,我们可以窥见诸葛亮智慧之一斑。同时,也可见到诸葛亮的智慧与《周易》的渊源关系。可以说,假如没有《周易》取之不竭的智慧源泉,塑造诸葛亮之“智”,将缺失多少魅力!

(赵彩花)

## 9. 杨仪默然遇《家人》

杨仪，三国时人，陈寿《三国志·蜀志》中有他的传记。建安时，他本是荆州刺史傅群手下的一个小主簿，后来投奔了关羽，被任命为功曹，还是属于下层官吏之列。在三国鼎立、求贤胜敌的时代，一个有才能同时又愿意有所作为的人比较容易被发现。杨仪奉关羽之命去见刘备时，他的机会来了。开始，刘备并没有在意他，他以自己的机警引起了刘备注意。他汇报有关荆州军务方面的一个问题时，刘备随意问了问他的看法。在回答的过程中，刘备的脸色变得越来越和悦了，兴致也变得越来越好。随后他回答刘备有关国家治理与军需军务方面之事的垂问，杨仪感觉满室已经如同春天般和煦、芬芳。这样，他被留在刘备身边。刘备称汉中王时，任命他做尚书。

受到刘备垂青的那些日子，连同当时所有的美好感觉，都被杨仪锁在自己记忆的神殿里。在以后得意的时日里，只要往神殿投以惊鸿似的一瞥，他的头就比以往更加高扬，而同僚们显得那么愚蠢、可笑，又怎能入他的法眼呢？幸亏那些人还知趣，对他敬而远之。他也就懒得搭理他们。可气的是那个刘巴，自以为是个尚书令，就了不得，指手画脚起来。而杨仪因为与刘巴不和，却受到了降级处分。

这种屈辱的感觉，由于诸葛亮给他以机会才慢慢淡漠起来。蜀后主建兴三年（225），诸葛亮召他为参军，参与丞相府事务。过了五年，杨仪便升迁为长史，并加封号为“绥军将军”。诸葛亮南征北伐之时，都是杨仪帮助“规划分部，筹度粮草”。而且杨仪做事得心应手，“不稽思虑，斯须便了”，深得诸

206

葛亮的赏识,军中人员、装备调配,都交与杨仪掌管。杨仪的人生似乎又变得亮丽了起来,可他的自高自大老毛病还是未改。他与魏延又闹上了矛盾。魏延是蜀国的一员虎将,跟随刘备之时,已经“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深受刘备器重。当年要派重将镇守汉川,大家都认为肯定是派张飞前去镇守,可刘备指派的人却是魏延,于此可见刘备对他的爱重。后主刘禅继位,封魏延为都亭侯。魏延为人矜持高傲,大家因他的职位与功勋,都让他一头。杨仪也是个目空一切、心高气傲的人,非但不敬魏延,还与他对着干。这样,他们的关系就如同冰炭、水火一般。多少次在一起议事时,魏延都气得把刀架到杨仪的脖子上。杨仪此时则痛哭流涕地诉说,总由旁人硬拉才分解开。他们之间的对立因此就越结越深。但是,由于都敬重、忌惮诸葛亮,所以杨、魏二人都隐忍着。

诸葛亮一死,杨仪便与魏延各拉起一班人马,两军对垒,算开了旧账。因诸葛亮临死时把一切军务暂时托付与杨仪,朝廷中对魏延平时印象又不大好,杨仪在对魏延争斗的过程中占了上风,最后斩了魏延的头,夷灭了他家三族,终于出了平生的一腔恶气。

人生暂时没有了碍眼物,让人感觉好了许多。杨仪此时盘算着往后的前程,觉得也是一片光明:诸葛丞相临终前把军务全盘托付给自己,难道不就是一个日后在朝廷接手相位的暗示?何况现在自己又有讨魏延叛贼之功,于是杨仪“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正在他得意洋洋、自以为十拿九稳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最好拿《周易》占筮一下,让天意来证明自己想法的正确。可大大出乎意料的是,他占得的竟是《家人》之卦。此时,杨仪一下如同掉到冰窖里,“默然不悦”,久久



说不出一句话来。

《家人》这卦,的确太不符合杨仪的心愿了。从字面意思来看,秦汉以来“家人”有三种意思,一是指奴仆,一是指庶民,一是指居家之人(特针对做官与否而言)。无论哪一种意思,对想占得远大前程的杨仪,都无异于判了他前程的死刑。更可怕的是,杨仪现在明明是要职在身,而《家人》之卦似乎在预示他要被革职做普通百姓。会有什么样的祸事在前面等着他呢?原本得意洋洋的杨仪,顿时觉得天地为愁云惨雾所笼罩。

果然,不久消息传来,说是诸葛丞相生前早有安排。他考虑到杨仪“性偏狭”,不能容人,不能和众,因而把国家重任交给了蒋琬;而杨仪,仅被封为“中军师”,是个闲职,没有任何实权。实际上,杨仪是被挂起来了。想当年,杨仪已经在先主刘备那里任尚书了,蒋琬还是一个小小尚书郎。后来,虽然两人都在丞相府做参军长史,可次次都是杨仪出大力,担重任;他蒋琬无论是出道早晚、才能高低、功劳大小,都不能与杨仪相提并论;但结果却是蒋琬胜出。杨仪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三国志·杨仪传》),他甚至还口不择言,说如果早知道有今天这样的结果,他就在诸葛丞相死后,带领军队投奔曹魏,怎么会像现在这样落魄?这些表达杨仪极度愤恨的话,经过政敌们的添油加醋,很快就传到了朝廷的最高统治层。于是杨仪又赚来了一个处分:削职为民,迁住边缘郡县。他占得《家人》卦的预言,倒是彻底兑现了。

如果杨仪此时还有足够的理智,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反复咀嚼自己占得《家人》卦的卦爻辞,他还有救。《家人》之卦,实际提醒和指明了杨仪该如何处事与保身。《家人》整个卦辞

为：“利女贞。”似乎主要是针对妇女而言，同时它也指出了作为一家之长的男子该如何修身，如何管理家人，在外如何与人相处。概括起来即是：男子打理外面事务时持身要正，行为处事要“反身自治”，多多反省自身的短处；对待家人，既要严格，又要有一定的温情；对待外面的同事、朋友，则应该“交相爱”，多以宽阔的胸怀和像对待家人亲友一般的爱心来包容他人，做好安定团结的工作。

假如杨仪能接受“家人”卦辞的启发，以爱心包容他人，“反身自治”，即使偏居穷乡僻壤，他还能拥有一份心灵的平静，保全自己身家性命。可他却与此背道而驰，到了流放地之后，怨气怒气仍然填满心胸。他看到、想到的，只是现实的不公不平。平素讲几句怪话倒也罢了，他还把它形于笔墨，寄给皇帝。上面对此事的批复是把他投到监狱去。这样，穷途末路的杨仪怀着满腔的愤恨自杀了。至死，他都没有反思那已经给他指出了光明前途的“家人”卦的卦爻辞的精神本质。

（赵彩花）

## 10. 苏轼与《东坡易传》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  
照却相迎。回看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后人都认为，这首词是苏轼淡泊通达、荣辱得失无系于心的旷达人生的写照。但你可曾知道，苏轼的旷达源于吸收儒释道思想精华外，更与《周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一生都在精研《周易》，用《易》理来指导人生，并把自己的人生认识与

《易》理结合起来,写成了一部《东坡易传》。

《东坡易传》是苏轼的主要哲学著作。因遭元祐党禁,苏轼不敢自显其名,他自称毗陵先生,便取以为名。所以《东坡易传》最初名《毗陵易传》。苏轼的《易》学研究有其深刻的家学渊源。其父苏洵老而好《易》,曾以诗句“十年读《易》费膏火”描写自己对《易》的执着。苏洵写有《易论》一文,并于嘉祐五年(1060)作《易传》百余篇。治平四年(1067)病逝前夕,命苏轼兄弟完成其《易》学著作。后来,苏轼先完成父亲的遗愿,苏辙便把自己所写的送与苏轼参考。因而可以说,《东坡易传》是三苏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其中主要的思想则是属于苏东坡的。

《东坡易传》始作于苏轼官贬黄州时,一直到谪居海南期间才最后定稿,它凝结着苏轼毕生的心血,也寄寓着一生坎坷坎坷的苏轼对社会、人生的沉思与认识。苏轼在《与李之仪》信中说:“某年六十五矣……前者皆梦,已后者独非梦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腐朽后人耳目也。”可见他认为相比于自己的诗文词赋,《易传》等著作更能代表他的学术旨归。

融合着儒佛道三家对宇宙人生的思考与认识,苏轼在其《易传》中展示了自己独特而高超的哲学智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人性的看法,提出“性命自得”的独到见解。在《东坡易传》中,苏轼几乎是开宗明义地批评性命之学,认为“世之论性命者多矣。因是,请试言其粗,曰:古之言性者,如告瞽者(瞎子)以其所不识也。”他反对当时理学的性命之谈,认为历来谈论性命者都如同对瞎子描绘事物形状,只能似是

而非。所谓“性”，即是“尧舜不能加焉，桀纣不能亡焉”的人人共有的共同性，是“其所以为人者也”的东西。比如饮食男女之欲、喜怒哀乐之情，都属于性的范围。性没有善或恶。而传统论“性”，总是把它与伦理道德相联系，强调性善性恶、性即天理，使高倡道德的君子，机械地遵循着道德而不知道德之根本是人性、人情。针对当时理学家到处贩卖错误的人性说，以及性、命难以简单概括的特点，苏轼主张“是以君子遗性与命也”，撇开不可见不可言的性、命空言，直接以“我”心去体验宇宙人生，而求得自得、自成、自达。

第二，认为“道”、“性”都是宇宙本体的观念。苏轼受老庄和玄学的影响，认为宇宙本体即“道”，“道”即“无”，不可名状、不可言说。“圣人知道之难言也，故借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者，阴阳未交而物未生之谓也。喻道之似莫密于此者……阴阳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谓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东坡易传》卷七）“道”是阴阳未交、事物未生之前的无形状态，是“无”；但又包涵阴阳两端，是宇宙万物的本原。道是“体”，由它产生的万物为“器”；道器一体，道体器用，“其本一也”——皆原于道。体用不可分离，而体为本，用为末。体不可言说，可言说的只是器。他认为“性”即“道”，属于“体”的范畴，因而不可言说。他说：“夫善，性之效也。”善是性表现于外的看得见的行为，并非性本身。既然“性”、“道”都不可言说，苏轼主张不去追求“道”或“性”，而强调重视人类生存环境及人事的变化，主张“一以自用”，或“人之自用”。他在解释《乾》卦时，称龙为“变化自用者”。这些，均可见苏轼解《易》，重在通晓《易》道来增进人的智慧，更好处理人生面临的层出不穷的实际问题。

第三,《东坡易传》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苏轼说:“《易》将明乎一。未有不用变化晦明寒暑往来屈信(伸)者也。此皆二也。而以明一者,惟通二为一,然后其一可必。”“统一”之中,包含着诸如晦与明、寒与暑、往与来、屈与伸这样的对立面,有了矛盾的对立统一,才会生出无穷的运动变化。对立统一是运动变化的源泉。一个事物发展变化到极盛,则物极必反,便向衰落转化。这种转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须居安思危。同时,刚健由于不息,弊患生于停滞。防止事物往坏的方面发展,并不是要停滞不变,而是只有不停地运动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蛊。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强则日长,偷则日消。”(《东坡易传》卷一)他强调的是君子自强不息、生生不已,永远保持其旺盛的生命活力。

苏轼在他的《易传》中评论《周易》对人的重大影响道:“未达者治其书……可以寡过,达者行其道,无出无入,无内无外,周流六位,无往不适,虽为圣人可也。”他正是从《周易》的宇宙人生观及处世哲学中吸取养分,指导自己的现实人生。同时,他又根据对生活的体悟来解释《周易》而成就了《东坡易传》。可以说,从《东坡易传》中,既可见到《周易》对苏轼的重大影响,也可见到融合《易》理之后而形成的独特的东坡式的人生哲学的深刻性。秦观在《淮海集·答傅彬老简》中评论说:“苏氏之道,最深得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正是以己心体悟而通达天道、人道之所以然,使苏轼处理事情了然无碍,在社会的风波激荡中始终显示出令人仰止的自信。他沉浮官场几十年,漂泊辗转于大半个中国。但政治的失败,并没有压



垮他,他反而成功地驾驭了生活。“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照常理推测,身处贬所,被人诬陷的凄苦与死里逃生的余悸,应该是其情绪的基调,然而苏轼却表达了其旷达和超越的精神境界。他在诗词创作中有形象的描绘: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西江月》)

作者以一颗纯净自由的心,沉醉于大自然的浅浪层云、芳草明月间;曾经的惊涛骇浪,似乎没有在他心中留下任何痕迹。流放岭南,自古被认为很难有生还的希望。韩愈曾面对前来送行的侄子哀哀嘱托“好收吾骨漳江边”;而苏轼抵达惠州后,表达的却是“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十月二日初到惠州》)的欢悦,作者以一颗完全敞开的心灵拥抱险恶的环境。在七年流放岭南生活中,他还写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赞语。苏轼那与宇宙精神相往来的澄澈无碍的心境,不管到哪里,都能“无往而不自得”,都能从周围的人事、眼前的自然界中,感觉生命的喜悦、通脱的欢喜,从而体现为乐天自适的性格。苏轼的“乐”是一种与道相依的大乐,是彻悟宇宙人生的达者的至乐。正因为苏东坡无往而不乐,无往而不自得,也就能无往而不自适。他的人生可谓潇洒人生、旷达人生、豪迈人生、乐天人生、自适人生。《记承天夜游》中的“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纵笔》中“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均可见出他在人生的各种境遇、不同时期,都拥有旷达心态和自适心境。他的诗句“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更是他深味人生的至理之言,是他参透后的心境写照。

正是“深得性命自得之际”，使苏轼能够不断走向超越，使其人生能兼具进取与达观、狂放与闲适等多种意态，将它们奇妙地统一于现实人生之中。

《周易》的思想与智慧是苏轼人生哲学的文化底蕴之一，而《东坡易传》则是他对以《易》理指导下的自我人生的感悟与实践的总结，是苏轼人生哲学既具宏观又具微观的生动展现。

(赵彩花)

## 十、占筮篇

### 1. 灵龟蓍草皆非神

蓍草和龟甲,都是古代用来占卜的器具。提到蓍草,或许很多人不熟悉;而对龟甲,则很容易理解。我们就从龟甲开始谈起。顾名思义,龟甲就是乌龟的那层厚厚的壳。乌龟全靠这层盔甲来躲避自然界天敌的攻击侵害,稍有动静,就立刻把头、尾和四肢都缩进壳里去。人们常将胆小怕事的人说成“缩头乌龟”。民间骂人,往往以“龟”相称,比如龟儿子、龟孙子之类。总之,在我们的生活里,龟是受人嘲弄和轻视的对象。

但在中国古代,龟却是吉祥的代称,被认为是一种沟通天与地的神物,地位相当尊崇。《礼记·礼运》记载:“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龟居然能与麒麟、凤凰和龙这些传说中的神灵动物相提并列,其地位之高可见一斑。考古发现中,屡次发现玉龟等装饰品。可见在古代,人们对龟的感情是喜爱有加的。

在古人的眼里,龟是神物。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两则材料。1987年安徽凌家滩第四号墓中,考古发现了一组玉龟玉版,上面刻着很富有神秘意味的指向四面八方、外方内

圆的图案。它象征着四极八方,体现出古代空间和时间的思想。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有这样的记载:“甲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长。上隆而文以法天,下平而理以法地。”“上”指龟背,“下”指龟腹,意思是,甲虫类的物种有三百六十种,以神龟为长。龟背甲隆起而有纹路,象征天象;龟腹平坦有纹理,象征地貌。作为天地精灵的象征,在巫风弥漫的上古三代,乌龟的“神灵”于此可知。另外,传说中乌龟长寿可达数百乃至千年,令人歆羡,因而被视为吉祥之物。这些说法,或许今天我们看来有些可笑,感到不可思议;但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这么一个时期,龟是被视为天地精灵的象征而受到特别的尊敬。而且,龟身上所笼罩的神秘色彩,因为被古人用于占卜而大大增强了神性作用。

龟的种类颇多,但是根据专家考证,我们在殷墟考古发现的占卜所用的龟甲绝大多数是水龟。这种龟体形不大,多生活在沼泽河流之中。这也可以证明,龟卜盛行时,人们还处在渔猎社会。龟是人们所习见的动物。奇怪的是,虽然殷墟发现了大量的龟甲,约有十万片以上;但是根据考证,殷墟所在地当时很少甚至是没有龟生存。这些龟甲,都是从其他地方收聚得来,甚至远的产自今天南海地区。这么远的路程,如何能汇集到一起,是一个很令人迷惑的问题。以前人们总认为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后来逐渐发现远古还同时有长江文明;而根据比较新的考古发现,珠江流域文明的发达,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或许,龟甲就是当时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产物呢。

当时占卜之风很盛,而龟被人们用作最主要的占卜材料。有需求就会有适应需求的产业。当时,从捕龟、杀龟,到剖龟

甲、打磨等等，形成了一条龙式的比较完备的生产和制作流程。其中，以杀龟的过程最为残酷。据说一种比较通用的方式，是将捕来的龟用重物紧紧压住，让它动弹不得；然后在龟的尾部用火烧灼，缩在龟甲里的龟疼痛难忍，便会猛地从甲里窜出来，留下一个空壳。看来，要作圣物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龟甲被供在神庙里之前，还要经受一番血与肉的折磨。龟甲经过一系列的处理，被制成大小合适、表面光滑的甲板，就可以用来占卜了。通常，占卜的过程是这样的：先在龟甲上凿若干小孔，数目多少不定，然后将龟甲丢到火里灼烧。在高温之下，龟甲“呼”的爆裂开来，甲面会有不规则的裂纹产生。此时把龟甲取出，等冷却之后，对上面的裂纹进行分析，根据纹路的走向等来占卜吉凶。我们知道，龟甲上面的纹路是灼烧所致，自然没有什么规律可循，结果多种多样。所以辨别纹路在当时也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有专门的官员来进行鉴定、研究，判断吉凶。从殷墟发掘的大量龟甲来看，当时所占卜的内容种类繁多，有打仗、祭祀等重要的国家活动，也有丢失牛羊之类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龟卜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多么重要。事无大小，都要虔诚的一番占卜后，按照龟甲上神秘的纹路所指明的方向来施行。

龟甲在殷商时代被大量采用。但到了周朝以后，虽然龟卜仍然在进行，但越来越多的场合开始使用蓍草，并最终完全取代了龟卜。与龟甲相比，蓍草身上的神秘色彩更浓。因为即使到了现在，关于蓍草到底是什么样子，学术界还在争论之中，连它到底是草本植物还是木本植物都不确定，甚至有人根本怀疑它的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历史上关于蓍草的记载的确太神了。相传为汉人所写的《易纬·乾坤凿度》记



载：“圣人设卦以用蓍，生圣人度以虚实，英草与天齐休。《万形经》曰：‘蓍生地于殷，凋殒一千岁。一百岁方生四十九茎，足承天地数。五百岁形渐干实，七百岁无枝叶也。九百岁色紫，如铁色。一千岁上有紫气，下有灵龙、神龟伏于下’。《轩辕本经》曰：‘紫蓍之下，五龙十朋伏隐。天生灵蓍，圣人采之，而用四十九，运天地之数，万源由也。’”这些文章里描写的蓍草，寿命有一千岁，一百年才有49根枝条。为什么不多不少偏偏49枝呢？因为49是天地之数，而且蓍草的上空有紫气缭绕，下面则有象征吉祥的神龟守护。这哪里是草，简直是九天神灵下凡！《说文》中的记载同样是比较神秘的：“蓍，蒿属。生千岁，三百茎。”认为蓍草是蒿一类的植物，一千年三百茎，寿命也够长的。如此神灵植物，看来很难普及。汉代司马迁见闻广博，二十岁就开始出门游历，足迹遍布九州，甚至连偏僻的巴蜀、昆明一带都去过，但是在《史记》中写到蓍草的时候，他也只能用听老人的说法，认为蓍草是“百茎共一根。又其所生，兽无虎狼，草无毒螫。”与《易纬》诸书相比，司马迁的说法似乎接近实际生活。但是，“无虎狼”和“无毒螫”的说法，估计也是为了凸现蓍草神性吉祥的夸张吧。

历代学者们出于种种考虑，不断增添蓍草身上的神秘色彩，以至使它成了圣物。其实这些说法明显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用蓍草来占筮在当时是很普及的事情，人们大事小事，都要求助于它，如果像这些书上描绘的那样神奇的话，又去哪里找那么多呢？考虑到这一点，蓍草无疑应当是在人们生活中所常见的一种植物才说得通。《辞海》里“蓍”字的解释或许最接近事实的真相：“植物名，别称蓍草、锯齿草、蚰蜒草，菊科。叶互生，长线状披针形……，我国北部和苏联西伯利亚分布较

广。”我们都知道，周民族生活在黄河中游一带，属于北方地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每每劳作之余，或在田间地头，或在村野小巷，随手抓取蓍草之茎来卜上一卦，倒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龟甲和蓍草本来就是自然界普通的一员，在古代，因为巫术占卜的需要被抬上了供桌，接受世人的膜拜。而现在，又因为人们不再以占卜为乐，它们便走下了圣坛。这个，恐怕是它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吧？它们作为工具，为人们占卜了多少年的吉凶，却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预测，也算是荒唐了。（章 原）

## 2. 蓍草占卜不神秘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祭祀与打仗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两者都离不开占筮。祭祀的时候，问问祖先神灵是否对自己满意，祈求福佑子孙。而祖先神灵的答复，就体现在占筮里。至于战争，它关系到一个部落或国家的兴亡，自然需要慎之又慎，请鬼神参与是不可或缺的。就是其他的日常生活，也时常需要先占卜凶吉。如《史记·齐世家》记载，有一天，周文王要出去打猎，就先占卜一下收获将会如何。可他得到的卦辞很奇怪，说什么“所获非龙非𪚩，非虎非黑，所获霸王之辅”。果然，他那次出猎时，遇到了姜子牙。两人深谈了一席话，文王喜出望外，把姜子牙带了回来，立为国师。修建新城，选择地址，也要占卜，据说周公营建洛邑，就先占卜过。修建房屋，也要先占卜，《诗经》中古公亶父在周原安家前，先占卜以选择房屋地基。结婚需先“尔卜尔蓍”，如果卦体没有

不吉利的话,男女才可成婚。生了小孩,要占蓍预测小孩以后的前途与命运;长大出去工作,也要占筮。著名的如春秋时候三分晋国的魏氏先祖毕万,占筮自己出仕晋国是否有利,遇《屯》之《比》,卦象很吉利,说是“公侯之卦也”,推断他的子孙以后在晋国必定发达,后来魏氏果然在晋建国。总之,先秦时期,占蓍在人们生活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用以占筮的东西,住在水边或容易得到龟甲地方的人多用龟甲占卜。据说龟有灵性,而且越老的龟灵性越高;也有以牛胛骨占卜的。住在内陆的人不大容易得到龟甲,便用一种据说也有灵性的草来占蓍。这种草称为蓍草,也是生长期越长便越有灵性。周部落在今天的陕西西边开始发家,地处内陆,蓍草遍地都是,因而多以蓍草占问。下面我们来看看《周易》以蓍草占筮的具体经过。

占筮者先要整洁衣冠、洗手、焚香,然后叩拜,向神灵祈祷说:现有某人有某事未知可否,现请求于神灵,请神灵显示凶吉否吝。祈祷完之后,便从竹筒里抽出五十根蓍草,开始布卦。之所以取五十根蓍草,与大衍之数有关。《系辞上》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以阴阳来分万物的话,天为阳,阳数奇,一、三、五、七、九属之;地为阴,阴数偶,二、四、六、八、十属之。从一加到十,得数五十五,这个数是天地之极数。以《河图》中宫之天数五,乘以地数十,得五十,这个数称为大衍之数。

先取出一根蓍草,以象征太极或曰太初,也就是象征天地浑沌时的状态。接着将手中的四十九根蓍草任意分为两组,置于左右两边,这就是“分而为二以象两”,也就是太极生两仪的意思。这是第一营。

再从右边的蓍草中取出一根夹在左手小指与无名指间，这为第二营。取出一根是为了“挂一以象三”。“三”即指天地人三才，左右两堆蓍草象征天地，刚取出的这根象征人。

接着将两堆蓍草分别用四来除，即四根四根地数，这是第三营。这四十八根分成两堆的蓍草，按四根分，所余有这样几种结果：左堆如果剩一根，右堆必然是三根；左堆如果剩两根，右堆必然也是两根；左边剩三根则右边是一根。这三种结果离不开四与八两数，这叫做“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即以四数之以象春夏秋冬四季，这是“两仪生四象”之意。占筮者将剩余的蓍草合在一起，夹在无名指与食指之间，这是第四营。《周易》说“四营而成《易》”，就是指以上四个步骤，这就叫一易。将左手指间夹着的蓍草合起来放在第一次拿出以象征太极的蓍草旁边，这是一变的余闰。

按规定，一易就是一变，三变才能确定一爻。每卦有六爻，十八变才能得出一卦，因而这时占筮工作才做了十八分之一。接着将剩下的四个四个地数过的蓍草进行第二易，仍然经过第一易那样的四营，将二变的余闰放在第一次余闰的旁边。再拿刚才四个四个地数过的蓍草进行第三易，仍然经过前二变那样的四营，并把第三变的余闰放在第二余闰的旁边。这样，三变就完成了。

三变所余闰的策，如果第一次余闰为五根、第二次为四根、第三次也是四根，则全是奇。把它们加起来和为十三，则揲数为三十六，以四除之，得九，九为老阳，其画为重 0，须变为阴；若三变所余闰的蓍草第一次为九，第二次为八，第三次也是八，则全是偶，余闰得数为二十五，而揲数为二十四，除以四，得六，为老阴，其画法是交 X，阴老须变为阳；若三变所余

的蓍草第一次是九,第二次为四,第三次也是四,或第一次是五,第二次是四,第三次是八,或第一次是五,第二次是八,第三次是四,则一偶二奇,和为十七,而揲数为三十二,以四除之,得八,为少阴,其画法为拆一,不变化;若三变所余闰的蓍草,第一次是五,第二次为八,第三次是八,或第一次是九,第二次是四,第三次是八,或是第一次为九,第二次为八,第三次为四,则一奇二偶,和数为二十一,而揲数为二十八,除以四得七,而为少阳其画法为单一,为不变化的阳爻。占筮者在旁边记上九、八、七、六作为记号。所以说“三变而成爻”,共进行六个三易,就产生了一个复卦,也称为本卦。占者根据本卦的卦形、卦德、卦象、卦辞来断定吉凶。

每个卦有六爻,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乾坤两卦还分别有一个“用九”与“用六”,所以占者只有根据卦辞卦象、爻辞爻象来断事才最准确。这样,须把占得的复卦的六条爻旁边的记号九、八、七、六这些数字加起来,得数称为营数,再以天地之极数五十五减去营数,将所得余数推知变爻。具体的推知方法,就是将余数从初爻向上数,再由上向下数,循环往返,最后落在哪个爻位上,这个爻即是用事爻。假如此爻是老阳或老阴,即是九或六,则阳须变阴,阴须变阳,同时以这条爻辞用事,例如《屯》之《比》指的就是《屯》初九爻;假如此爻为少阳或少阴,即七或八,七、八为不变爻,则以卦辞用事。于此可见,上古时代占卦是很复杂的事情,占卦的过程也很长,要有相当的耐心,必须有“专家”传授才能逐渐掌握,而非一蹴而就的简单之事。大概因为上古三代掌管占筮的巫、史,也即“王官”是属于当时最有学问的人群,非复杂无以显其神秘的力量。这与今天街头算命摊主几分钟草草了事的赚钱法,是大



不相同的。

占筮方法的产生,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无知而好奇的先民试图解释神秘的世界的一种尝试。随着人类认识世界的深度与广度的增加,占筮的作用与地位日渐降低。荀子就讲过不必重占筮的话。《史记》、《国语》、《左传》也有大量不信占筮而行事仍然吉利的事例。如周武王将要讨伐商纣王前夕,“卜,龟兆不吉。”占卜,龟象很不吉利,而且此时突然狂风大雨大作,诸侯公卿都很忧惧,认为战争将不利,不如暂时取消计划之事。只有姜子牙力劝武王,武王听从了姜子牙的劝告,前去讨伐纣王。最后是商纣王带着他的珍宝自焚于鹿台,武王伐纣战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周朝建立了。最终仍然是人的决断使周朝抓住时机,推翻商朝。(赵彩花)

### 3. 邵雍与《梅花易数》

邵雍,字尧夫,号康节。共城(今河南密县东北)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卒于神宗熙宁十年(1077),享年六十七岁。邵雍一生勤奋好学,著述甚富。因为学问极好,朝廷曾屡次授予官职,他都坚辞不受。当时的名人如前任宰相富弼、历史学家司马光等人,对他都非常尊敬。他钻研《易》学极其刻苦,“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数年”,终于建立了自己的《易》学体系。他将《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和道教的宇宙生成学说融合起来,再贯以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宇宙构造图式和学说体系,来推衍解释自然人事的变化,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象数学。

《周易梅花数》一书相传是邵雍所著,又称《梅花易数》,是

中国较为古老的一部结合《周易》运用象数学来占卜的一部著作。据说其得名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天，邵雍去观赏梅花，看见两只鸟雀为争占一梅枝而双双坠地。为这怪事，邵雍占了一卦，以《易》理推衍后断定：明天晚上，将有一女子来折此梅花；园丁发觉而追逐女子，女子失足跌倒伤了右边大腿。此预测，竟然在隔夜丝毫不差地得到验证。于是，大家将邵雍的这种预测方法取名为“梅花易数”。

《梅花易数》全书由两部分组成，一为推卦，一为拆字。前三卷为推卦部分，虽然都讲了推卦的方法，但各有所侧重：卷一主要讲述了推卦的理论基础，《周易》与五行生克的关系，同时阐述了《周易梅花数》用时间、声音、颜色等起卦的具体方法和事例；卷二介绍了推卦总诀；卷三分门别类详尽论述了推卦总诀中所述的体用生克之理，还就饮食、器物、屋宅的占法设有专述。后两卷为测字部分，卷四解说了八卦与字的关系，并介绍了以此推断吉凶的方法；卷五主要介绍了“四言”、“五行”、“六神”等测字方法，是卷四的进一步拓展。《梅花易数》的理论依据是，宇宙来源于“太极”或“道”，“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太极不动是“一”，一动就分为天地阴阳。天地阴阳一经产生，创造万物就开始了，日、月、四时随之而产生。宇宙之中的万物同源而“量别”，它们之间是息息相通的。一物变化前，与之相关的其他事物可以感觉到，从而呈现出“异态”。由象（一切现象）组成的宇宙具有数的统一性，天下万事万物皆由数定。象可以转变成八卦，象也可转变成数；数可转变成象，数也可以转变成八卦。有了数和卦，就能占卜。八卦所对应的数，分先天卦数和后天卦数。先天卦数是：乾一，兑二，离

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先得数,由数起卦,用先天卦数。如得到的数是一,那就是乾;得到二,那就是兑;如得到的数是六,那就是坎。后天卦数是: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乾六,兑七,艮八,离九。先得卦,由卦求数,用后天卦数。如得到《坎》卦,它的数就是一;如得到《离》卦,它的数就是九。由于宇宙万物是息息相通的,每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与整体相同,是整体的成比例缩小,所以《梅花易数》预测时,它以六十四卦作为自己的逻辑构架,同时纳入“四时”、“五方”、“五行”、“五音”、“五色”、“十天干”、“十二地支”、“卦气”、“易数”等复杂的参数因素,并且能够密切注意到周遭事物的动静变化,如时间、地理、天时、声音诸因素,全面立体采集信息,经过冷静理智的数理推衍,来预测事物可能出现的趋势和细节。

下面来看看有了“数”如何求卦。数小于或等于八,不用计算,根据先天卦数,数是一,就是《乾》卦,数是二,就是《兑》卦……数是八,就是《坤》卦。如果数大于八,即用八作除数,以余数求卦,余一是《乾》卦,余二是《兑》卦……,如果正好除尽,就是坤卦。求卦要先求上卦,再求下卦,合起来就是六十四卦中的某一卦,也称为重卦。重卦求出来后,还要求动爻。其方法是,用求得上下卦的总数除以六,以余数作动爻,若余一,即初爻动;若余二,即二爻动……。如果能够除尽,即第六爻(上爻)作动爻,也就是上爻发生变化。所谓动爻,或称变爻,就是假如原来是阴爻,则变成阳爻;原来是阳爻,则变成阴爻。如果总数小于六,不用计算,数是几,第几爻就是变爻。总数大于六,则除以六,取其余数,求其相应的爻。求出重卦后,还要推求出互卦。互卦是指一卦的六个爻画中,除内外或称上下两经卦外,另有二、三、四爻三者组成一个新的经卦,再

由三、四、五爻又组成一个新的经卦,这两个新经卦又组成一个新的重卦。《乾》、《坤》两卦推求不出互卦,可到变卦中去取互卦。互卦和变卦一样,在占卜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梅花易数》在卦中还讲究体用。一般来说,上卦为体,下卦为用;但有时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所谓“体”,就是主体,即求占者本人;所谓“用”,就是用事,也可以说成客观环境、他人或各种有关条件。从五行生克的角度来讲,用生体为吉,用克体为凶;体生用不利,体克用较利。《梅花易数》在占卜时,还讲究卦应。卦应的内容很广泛,如占卜时闻到哭泣声,是凶上加凶;闻到喜笑声,是吉上加吉。占卜看到圆形的东西,事宜成功;看到有缺裂的东西,事有缺憾。看到急速行走的人,事成宜速;看到静坐不动的人,事成宜迟。

《梅花易数》占卜的程序是,先求出卦,次看《周易》有关卦爻辞,第三看卦体之生克,第四看互卦和变卦,第五看卦应和卦气。

下面来看看《周易梅花数》对这些要求的具体操作实例。仍然以上面讲过的观梅占为例。邵康节观赏梅花的日子是辰年十二月十七日申时,即以年、月、日起卦,其方法是年、月、日相加为上卦,年、月、日、时相加为下卦。甲子年为1,乙丑年为2,依此类推,乙亥年是12。正月是1,二月是2,……十二月是12。初一是1,初二是2,……三十日是30。子时为1,丑时为2,……亥时是12。年、月、日相加除以八,余数作上卦,余1是乾卦,余2是兑卦……;年、月、日、时总数除以八,余数作下卦。求出卦后,还要求动爻。年、月、日、时总数除以六,余数为动爻,余一初爻变,余二二爻变……。有了变爻,就有了变卦,再从本卦中求出互卦,这样就可断占了。如刚才说的

辰年五数,十二月十二数,十七日十七数, $(5+12+17)\div 8$ ,得四余二,二数为兑,为上卦;三十四数加上申时九数,计四十三,除以八,得五余三,三数为离,为下卦。由此获得兑上离下的重卦《革》(䷰),这也就是人们所称的“泽火革”(经卦兑象征泽,经卦离象征火,重卦则是水火相生相息的《革》卦)。上下卦总数四十三除以六,得七余一,初爻动。这样,初九爻动,变艮䷳,互卦有乾䷀巽䷸二卦。在《革》卦(䷰)中,上卦兑䷹为体卦,属金;下卦离火䷲为用卦,克制兑金。本卦六二爻至九四爻互卦为巽䷸,巽为木,生离火䷲,克体之卦气旺盛。兑为少女,所以知道少女受伤,而巽木䷸又被乾金䷀所克伤。巽为大腿,所以有伤大腿之应。所幸初九爻动后,变卦为艮,艮为土,土使兑金体卦得以生扶,艮性为止,所以知道女子受伤,但不至于有危险。至于如何知道是明晚,从卦象看,巽木䷸受乾金䷀之克,自然是乾金旺的时候。古人的看法是,乾金在一年之中旺于秋季,一日之内旺于酉时(下午5—7点),金旺则木死,处于死地的巽木极易受到旺相之乾金的伤害,而腊月昼短夜长,酉时正值夜幕降临之际。

也可以姓名起卦。如果是三字,则以第一字的笔划数求上卦,以第二、第三个字的笔划数求下卦,以三个字的总笔划数求动爻,其基本方法与年、月、日时相同。如果姓名是两个字,则以第一字笔划求上卦,第二字求下卦,两字笔划的总数求动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字要用繁体字,勾折都算一划。

也可以字之声调占。如曾有客人问:“今日动静如何?”邵康节即以此六字起卦预测。平分六字,以“今日动”三字为上卦,“今”为平声,一数;“日”为入声,四数;“动”为去声,三数;相加总数为八坤,作上卦。以“静如何”三字为下卦,“静”字去声三数,



“如”字平声一数，“何”字平声一数，相加得五为巽卦，作下卦。又以六个字所得数相加除以六得二余一，得卦为地风《升》(䷭)，则动爻为初爻，变为《泰》卦(䷊)，互卦为震三兑三二卦。于是，邵雍便告诉客人：“今日有人请你，但是客不多，酒不至醉，吃的也就是黄小米之类而已。”当晚，果然如此。邵雍是如何推断出来的呢？《升》卦的意思是登上台阶进入厅堂（古时摆席都在厅堂）。互卦见震三兑三，震三兑三分东西方位，所以有东、西设席的象征。卦中兑为口，坤为腹，象征口腹之事，所以知道有人宴请。“客不多”是指坤土独自上立，并没有同类比合、相生的卦出现，“酒不醉”指卦中无坎水之象，“味止杂黍”指坤象征黄小米之类的谷物，《坤》卦又无相生之气，所以知道食品不多。

如何用物象起卦呢？这就需要联想了：看到圆的东西可以起《乾》卦，看到方的东西可以起《坤》卦，看到内软外硬的东西可以起《离》卦，看到内硬外软的东西可以起《坎》卦，看到残缺不全的东西可以起《兑》卦；看到老男可起《乾》卦，看到老妇可起《坤》卦，看到少女可起《兑》卦，看到山石可起《艮》卦；看到水流可起《坎》卦，看到树木可起《巽》卦，看到火可起《离》卦，看到运动的东西可起《震》卦，看到静止的东西可起《艮》卦；看到人搔头可起《乾》卦，看到人捧腹可起《坤》卦，看到人掩口可起《兑》卦；南方可以起《离》卦，北方可以起《坎》卦，东方可以起《震》卦，西方可以起《兑》卦。《梅花易数》无物不可起卦，无事不可入卦，但不动不占，无事不占。

同时它还提倡从实际出发，不要死抠教条，必须符合情理。如冬季黄昏，酉时左右，邵雍正拥火炉而坐，听到有人敲门，起初敲一下，继而敲五下，而且说要借东西，邵雍让他别说出来，令自己的儿子起卦，看他要借什么。以前一敲门声为乾

作上卦,后五声属巽作下卦,酉时十数,动爻为 $(1+5+10) \div 6 = 2 \cdots 4$ ,第四爻动,整个大成之卦为天风《垢》(䷫),九四爻动,变为巽卦三,互卦为两乾卦,这样卦中有三乾属金,二巽木,为金木之物,又因为乾金短而巽木长,应该是借斧头。他儿子却认为是借锄头,邵雍说:“不是锄头,是斧头无疑。”一问,果然是借斧头。儿子问原因,邵雍解释说:“起卦者应当明卦理。以卦象推测,斧头、锄头都可以,但以卦理推测,冬季的黄昏要锄头干什么,当然是借斧头用来劈柴。”占卦者要敏锐捕捉卦与所占事物的联系,紧紧扣住卦象与当时时空条件的内在逻辑联系,而不必过于拘泥于卦象。

《梅花易数》的特点是起卦简便,判占灵活,容易掌握和运用,因而后来很流行。但灵验与否,主要不在天意难测之鬼神,而是实实在在的人事,更在于紧扣时空环境及具体占问实际的逻辑推理能力。预测灵验,关键在于人的探索规律及其运动变化的能力。时下街头算命摊主也常用《梅花易数》来占卦,但读者千万别上当受骗,因为他们有的连小学文化都不到,他们瞄准的只是你那鼓鼓囊囊的钱袋而已,而绝非对人负责的大学问家邵雍可比拟。(赵彩花)

#### 4. 《易》无达占说占筮

“易无达占”,出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意思是说,解释《周易》的卦爻辞,可以不拘泥于筮辞本身而灵活解释,如同《诗经》时代赋诗时的“断章取义”一样。试举一例。王充的《论衡·卜筮》篇记载了一则故事:鲁国要征伐越国,就占了一卦,得到的是《鼎》卦的九四,其爻辞说:“鼎折足,覆公餗,其形

渥，凶。”意思是说：鼎器难以承受重荷而折断了足，王公的美食全都泼了出来，鼎身也被弄得龌龊不堪，有凶险。孔子的学生子贡据此断为不吉利，主张不能出师。而孔子却认为这是一个吉兆，利于出师。为什么呢？孔子说：“越人居住的地方到处都是水，他们平时走路都用船，而不用脚，所以这是一个吉兆。”于是鲁国就攻打越国，果然取得了胜利。

这就是所谓的“易无达占”。子贡拘泥于字面的“吉”、“凶”，而孔子则对此作了变通的解释。孔子的高明，就在于他是脱离了卦辞去说卦，不被具体的卦爻辞所限制，能灵活说卦。要明白这一点，还需了解一点《周易》的占筮方法。

《周易》是一本讲占筮、供占筮用的书，其作用在于为人们决定事情之前，以预言吉凶的方式提供一个参考。古人相信冥冥之中有万能的神鬼存在，所以在做什么事情之前，喜欢问问神的意志。问神的方法有两种：龟卜和占筮。龟卜主要是用乌龟的壳或者牛的肩胛骨，在进行一番削锯刮磨之后，凿孔，然后放在炭火上烧灼。掌管占卜的人就根据烧灼的裂纹，来判断吉凶。占筮则是利用蓍草，也有人说是用小竹棍，因为“筮”字从“竹”。它的方法即所谓的揲蓍成卦，《周易·系辞传》中有记载。

在社会生产力落后的时候，人们迷信于鬼神，当时就以占筮的结果来决定行事。而一旦人性得到解放，人们逐渐明白了神鬼的真相以后，占筮就成了以“神道设教”的工具。比如说“龟三卜”，为什么要卜三次？其目的就在于要增加解释和选择的空間，从根本上解放人的思想。所以尽管人们在行事之前仍然会占筮，但人们却不再迷信占筮的结果，而会对占筮的结果作出合乎自己目的的较为理性的解释。

据《左传》襄公九年五月，鲁成公的母亲穆姜死于东宫。当初，穆姜和鲁大夫宣伯私通，想要除掉季文子和孟献子，然而事败，宣伯被放逐，穆姜被囚禁在东宫。进东宫后，史官给她占了一卦，得到了“《艮》之八”。所谓“遇《艮》之八”，是说初步占筮的结果得《艮》卦。《艮》卦六爻中，九三和上九以老阳变，初六、六四和六五以老阴变，只有六二爻得八为少阴不能变，故《艮》卦变为《随》卦。所以太史说：“这叫《艮》变为《随》，《随》是出走的意思，你很快就可以离开东宫这囚禁之地。”而穆姜对史官占筮的结果，有一番自知之明的议论：“没用。这个卦象在《周易》里说：‘《随》，元，亨，利，贞。无咎。’元，是躯体最高的地方；亨，是嘉礼中的主宾相会；利，是道义的综合；贞，是事情的本体。体现了仁，就足以领导别人；美好的会见，足以协调礼仪；有利于万物，足以总括道义；本体巩固，就足以办好事情；因此不能欺骗。即使得到无咎的《随》卦，也于我无益。现在我作为妇人而参与了动乱；本来地位低下又没有仁德，不能说是元。使得国家不安定，不能算是亨。做了事情而害了自身，不能说是利。丢了寡妇的地位而打扮得漂漂亮亮，不能说是贞。有元亨利贞四种德行，得到了《随》卦才可以没有灾祸。我都没有，难道有合于《随》卦卦辞的吗？我行事邪恶，能够没有灾祸吗？我一定死在这里，不用出去了。”

虽然史官说《随》卦的卦象于穆姜有利，但她并不相信这些。她先指出《随》的卦辞是“元、亨、利、贞，无咎”，然后又对“元亨利贞”作了新的解释，认为只有“体仁”才够得上“元”，有“嘉德”才够得上“亨”，能“利物”才够得上“利”，有“贞操”才够得上“贞”。而她一样也够不上，所以《随》卦“出”的吉祥含义与她无缘而“必死于此”。这是对客观情况所作的符合实际的

预断,而不是对教条占筮的一味迷信。

因为不再迷信于所谓的“鬼神预言”,认识到行为中人自身的作用,“《易》无达占”的理论才得以应运而生。所以归根到底,它是观念变化的产物。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南蒯与季氏有矛盾,在情况不利的时候,想叛逃到齐国。当他刚刚准备叛变的时候,他的家乡有人知道情况,走过他的门口,叹了口气说道:“忧愁啊!忧愁啊,愁啊!愿望高而智谋浅,关系近而志向远,作为家臣而想为国君露脸,有这样的人啊!”南蒯不提什么事就占了一卦,得到《坤》卦变成《比》卦,卦辞说:“黄裳元吉。”就以为大吉大利,给子服惠伯看,问:“如果有事,占得此卦如何?”惠伯说:“我曾经学过《周易》,如果是忠信的事情就可以,否则就要失败。外表强大而内心忠顺就是诚信;用忠顺来占筮,这是信用;所以说‘黄裳元吉’。黄是内衣的颜色,裳是下面的衣服,元是善的第一位。如内心不忠,就和颜色不相称;在下位而不恭敬,就和服装不符合;事情办理不善,就和标准不合。内外和谐就是忠,根据诚信办事就是恭,崇尚上述三种德行就是善,否则就不合这卦辞的预测。而且,《周易》不是用来预测凶险的事,您打算做什么呢?而且能不能在下位而恭敬呢?中美就是黄,上美就是元,下美就是裳,具备这三者才能应得了卦辞的预测。如果有所短缺,即便卦辞吉利也不行。”

在惠伯看来,占筮的吉凶结果不能拘泥于字面,而要根据占筮的目的和占筮者品性的高下来决定。对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占卜者,字面的吉凶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解释。这说明,至少在春秋时期,我们的古人已经对《周易》的性质和作用,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了理智的判断。但遗憾的是,我



们注意到近些年,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们对《周易》表现出了较大的兴趣,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所谓“《周易》热”。与此同时,筮法、相术、风水术等,也都披上了《周易》研究的外衣,一一粉墨登场。我们认为,筮法、相术一类带有严重封建迷信色彩书籍的不断出现,与其说是“《周易》热”,还不如说是“迷信热”。毋庸讳言,占卜、相术、壬遁、风水术等迷信的内容,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根本旨趣上,却与《周易》所固有的强烈人文主义精神以及理性和科学的文化底蕴相抵牾。那些“忠实”的信男信女们迷失于占卦先生的如簧巧舌的时候,是何等的可悲可怜!他们不知道,早在二千多年前,我们的古人就已经有意或无意地撩开了蒙在《周易》上面的神秘面纱,明确提出:“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左传》僖公十五年)这种精辟的见解认为,看到卜龟也好,占筮也好,只是一种方法或形式;决定历史发展前途的是人事,是人的社会活动的客观存在。“物生而后有象”,还表达了一种朴素唯物论思想。“物生而后有象”的认识,就是“先人事而后说卦”(《日知录》卷一《卜筮》)的说卦原则,从而在人事的基础上灵活理解卦辞卦象的意义。而二千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却迷信于卜筮、占卦,这岂不是历史的倒退?愿那些迷信于占筮的人们早日觉醒!

(曹建国)

## 5. 掀起《周易》盖头来

《国语·晋语四》曾记载这么一件事:秦穆公帮助晋公子重耳重返晋国,晋大夫董因前来迎接。重耳问:“我这次回来

能成功吗？”董因于是占了一卦，得到《泰》卦，便回答说：“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今及之矣，何不济之有！”这句中的“之八”，是说遇到多个变爻时用卦辞断占。《泰》卦卦象是䷊，下乾(☰)，上坤(☷)，坤为地、为阴，乾为天、为阳。古人认为阴气下降，阳气上升，阴阳交合，天地交通，所以有“是谓天地配”的说法。“亨，小往大来”是《泰》卦卦辞。“亨”，意为亨通、吉利。“小往大来”在这里更是大吉大利之辞，它预示着重耳的到来，将以晋国的一个公子身分登上国君的宝座。董因由此推断重耳以后走亨通之运，一定能回到晋国。以上是古人用《周易》的卦象和卦辞来判断吉凶的一个例子。像这样的筮例，在《国语》、《左传》中一共 22 处。《国语》、《左传》保存的，多是春秋时期的史料。从这两书中，不难看出春秋时期人们利用《周易》占筮之一斑。

《周易》是一部笼罩着神秘色彩的奇书。汉代以降，《周易》的地位逐渐提高，成为“六艺之原”、群经之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和血脉。历来阐发《易》理的书很多。据不完全统计，仅专著就有三千多部，真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关于《周易》一书的性质，人们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周易》是辞书，刘长允等持此说。有人说《周易》是卜(占)筮书，从宋代的朱熹到近现代的学者郭沫若、高亨、李镜池、刘大均等持此说。有人说《周易》是哲学书，现代学者李景春、黄寿祺等持此说。有人说《周易》是历史书，近现代学者章太炎、胡朴安、李心平、黎子耀等持此说。有人说《周易》是科学书，从中国当代学者冯友兰到西方科学家李约瑟等持此说。有人说《周易》是一部百科全书，从《易传》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古代易学家多持此说。另外，还有“兵书”说、“逻辑书”说等等，可谓见仁

见智，众说纷纭。

其实，《周易》一书可分经、传两大部分。一般认为，《易经》产生于殷周之际，它由符号和文字组成，包括八卦、六十四卦卦形、卦辞和三百八十六爻的爻辞。《易传》产生于战国时期，“传”是对“经”的解释，是“经”的辅助部分，一共有七种十篇文章，又称“十翼”。汉代将“经”和“传”合在一起，称为《周易》。武帝时立“五经博士”，《周易》为其一，又称《易经》。这种广义的《易经》和《周易》的“古经”之名是一样的，极易混淆。而《易经》、《易传》又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书，《易经》是带有哲学色彩的占筮书，以占筮成分为主；《易传》是带有占筮色彩的哲学书，以哲学成分为主。总而言之，《周易》是一部占筮与哲学相兼的力作，其本源应是占筮书。

说《周易》本是占筮书，其证据、理由如下：

首先，《周易》是中国古代流传至今最古老的一部占筮书。它的起源，相传可以追溯到伏羲氏时代。《系辞下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这句中的“包牺氏”，就是伏羲氏，他生活在中国原始时代的中期。伏羲作八卦之说，说明了《周易》起源的确非常古老。远古时期巫风盛行，那时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有许多解不开的谜，人们普遍认为冥冥之中有一个万能的神在主宰一切，于是遇事便向神求助。而占筮就是他们沟通人鬼、达意于天的主要手段。因此，占筮问卜之风得以产生，流行。《史记·日者列传》说：“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所以，远古人们遇事总要通过卜筮来决策定计，祈福禳灾。在远古时代虽然已经产生了八卦，但那时的占

筮记录还是一些零乱、不成系统的东西。

“文王拘而演《周易》”。殷周之际,传说文王把八卦两两重叠,演变为六十四卦。又有许多人对原始的占筮记录进行了整理和加工,将其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搭配在一起,编辑成《周易》。因为《周易》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加工、编排而成的,所以在当时又有各种不同的本子。如《周礼·春官宗伯》说:“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四。”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它的六十四卦卦名和次序,与今天的通行本《周易》也不一样。可见今本《周易》,只是所传下来的一个最流行的本子而已。不管以上本子有多少差别,但用来占筮阴阳,预示吉凶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易》本是卜筮书的通名。

其次,古代的卜筮官员也有称“易”的,《易经》在古代是由卜人、筮人等掌握的。如《礼记·祭义》说:“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这句话中出现了两个名词“易”,很显然,前一个当为书名,后一个可能是官名,其职责就是抱龟占卜。《周礼·筮人》也说:“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以辨吉凶”,这是《易经》为卜筮书的旁证。

第三,《国语》、《左传》是官方的史书,其所记载的许多筮例表明,统治者十分相信《易》占,每逢大事,一般都要占筮,预测一下行为的吉凶、休咎。统治者的这种做法本身已经说明,在春秋时代以前,《易经》主要是占筮书。

第四,从《易经》内容方面看,六十四卦每卦卦象都由“—”、“--”两个符号组成,“立象以见义”,通过卦象中各爻的

变化,使人们能够找出一种较为直观地判断吉凶的方法。每卦的卦爻辞,主要是对该卦该爻吉凶的判断和说明,以《大有》为例,其卦爻辞如下:

大有,元亨。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不难看出,《大有》卦爻辞中包含着很多的断占之辞。如卦辞中的“元亨”,初九的“无害,匪咎,无咎”,九二的“无咎”,九四的“无咎”,六五的“吉”,上九的“吉无不利”。只有九三爻辞中没有断占之辞,但其中已包含了吉凶之意。“小人弗克”是说小人不能修德守正,无法担当大任。《象》解释说:小人如果担当大任,必致祸害,所以自然是“凶”。《易经》卦爻辞都是在直接、间接地说明或暗示吉凶,这有力地证明了它确实是占筮之书。

第五,考古材料业已证明,《易》为占筮之书。据李学勤先生介绍,目前考古发现的有关《易》卦的材料,最早的是殷周时的筮数。筮数有的是三个数字,有的是六个数字。可以按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原则,转译为《易》卦,如“一一六八八一”,便是下震上巽的《益》卦。这种筮数,在宋代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上已经有过。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出土的西周甲骨上出现。70年代,张政烺先生明确地证明它们与《易》卦有关。80年代,金景芳先生论证它们是进行占筮时所得数字的记



录,可称为筮数。有些筮数实例见于应用器物,有些见于甲骨。在陕西等地的商末周初遗存中,筮数的例子大为增多。这说明周人比殷人更广泛地运用筮法,并以筮数记录下来。

当然,从表面上看,《易经》是卜筮书,但从本质看,它也是想通过占筮来探讨宇宙、社会的变化规律,加以其卦爻辞经常采用了当时已经广泛流传的历史故事、神化传说、民间谣谚片断等,所以其中包含了许多人生经验和智慧,有些富有哲理。后来《易传》据此加以新的阐释,化为哲理之书,也是一种必然趋势。

(王启才)

## 6. 形形色色看占卜(上)

上古时代,科学技术不发达,无论大小事情,人们都要向神灵占问吉凶祸福,然后再决定自己的行动。龟卜和蓍草占,只是两种最常用的方法而已;在实际的运用中,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占问方法流传。比如卜问,虽然我们知道殷人习惯用龟甲,但在当时,甲兽骨也是一种颇为流行的方式。兽骨占主要采用牛、羊、猪等常见动物的肩胛骨及其他较大的骨头,在上面钻孔后,放到火上进行烘烤,然后根据上面呈现的纹路来判断吉凶。

我国古代物占的种类极为丰富,有星占、月占、气占、风占、雨占、禽鸟占、鱼虫占、植物占、器皿占等等。其中有些物占方式,从逻辑上来看,应该还早于《周易》中的蓍草占。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我们无法确切知道祖先是怎样来使用这些物品的。有一些物占在古代的典籍中有所保存,虽然其中也许有后人加入的痕迹,但是毕竟为我们了解古代物占提供了一

个窗口。

气占是古代一种比较常见的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云气,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君主,作为一国之君、天下共主,他的的云气也分外神圣。据说是内赤外黄,其云气笼罩之地,郁郁葱葱。根据《史记》的相关记载,秦末时刘邦身上的天子气就很明显,秦始皇曾经说过:“东南方向有天子气。”秦始皇东巡,一方面是为了镇压各地的反抗,同时也希望借此来压制这股具有威胁的新生的天子气。刘邦也疑心天子气是自己所发。刘邦在起事初期,隐藏于芒、砀山之间,行踪不定。但是,他的妻子吕雉与其他人每次找刘邦,总是能很快找到。刘邦感到很奇怪,于是就问妻子,吕雉告诉他说:“你所在地方的上空总是有云气缭绕。顺着云气去找,总是能找到你。”这件事情传出去以后,来参加刘邦起义军的人骤然多了起来。为什么呢?原来人们都认为云气是天子、贵人的象征,都希望能跟着刘邦打天下。后来在刘邦与项羽争霸天下的时候,项羽的谋士范增对项羽说:“我曾经派人观望刘邦的云气,都呈现龙与虎的形状,五彩斑斓,这是天子才有的云气。”这些记载是真是假,无从推断。吕雉和范增的话都有着自己的目的,吕雉那样说无疑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拥护刘邦,而范增则是借此来劝说项羽下决心去消灭刘邦。因此他们的言论是有私心的,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事。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当时,气占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物占方式。人们对于云气的存在是深信不疑的。除了天子气以外,还有贤人气、兵气等等。

鸟兽占也是古代很常见的物占方式。人们通过鸟兽异常的行为来推断事情的吉凶。人们认为:如果有凤凰、麒麟等吉

祥的动物出现,那么通常是太平盛世的象征;如果有兔子进入王宫之内,那么国君就会死亡;如果鸡与野鸟相斗,该国的政治必然混乱,大臣要杀君主,大臣之间也会互相残杀,血流成河;鸟雀如果与燕子争斗,国内就有兵乱,战争即将发生……,类似的记载在古籍中屡见不鲜。这些异常的现象是否真的能预测未来,还是偶然的现象,都只能是历史上的悬案了。

日占和月占是人们利用自然界天象来占卜吉凶的方式。根据汉代讖纬书的记载,如果太阳出现青黄白黑的颜色,那么就预示着君主行为不端,良臣被疏远,盗贼横行,民不聊生;如果君主力弱,则太阳颜色赤红略微发灰;如果大臣专权,后宫势力强大,国内有盗贼并起,则太阳的颜色就是青黄色;如果太阳夜晚出现,就象征着国家纲纪灭绝,大臣专权。关于月占的记录也有很多:如果青云绕月,就一定是有贼人要侵害君主,国家将要遭受灾殃;如果赤云绕月,则国家一定有大盗;如果黄云绕月,则女君主将有危难,死期不远;如果白云绕月,国军会碰到贼人;如果星云绕月,一定会有阴雨降临。类似的记载很多。有些是天文知识的总结,有些则是荒诞不经。比如相传京房说:“月亮如果从天上掉下来,有德行有才干的大臣就会死亡。”这些,只能博现代人一笑而已,但在古代却曾经被奉为神言仙旨而深信不疑。

物占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发明,在世界很多民族和国家中都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物占方式。俄罗斯的“姑娘占卜”是非常有趣的方式,里面也有不同的分类。比如姑娘们会走到别人的窗子下面听人说话,从所听到的第一个词来推断自己的命运;姑娘们还会在晚上撒一把米让母鸡来吃,母鸡全部吃完、剩下一点,剩下的米粒是单数还是偶数,都代表着不同的含义,借此来

占卜吉凶。最有意思的恐怕还是扔小鞋来占卜了。女孩子们通常在夜间来到院子里,脱下鞋子扔出大门,然后出去看鞋尖所指的方向。这时候,她们的心里是忐忑不安的。因为鞋尖所指的方向就是新郎要出现的方向。如果鞋尖朝向自家门口,怎么算呢?很不幸,这预示着这个姑娘在新的一年里别想嫁人了。缅甸的克伦多人生病的时候习惯用鸡骨头来占卜,看看到底是被什么鬼魂附身了。如果鸡骨头所指示的方向同占卜书上所讲的一致,则要前往该地进行祭祀来免除灾难。撒米占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方法。人们随手抓一把米然后撒开,根据米粒是偶数还是奇数推断吉凶,一般认为偶数吉利。飘布占是让风吹起一块布,布被风吹得越远,说明运气越好。

种种稀奇古怪的物占方式在世界各地屡见不鲜,不同的民族根据本民族的传统都会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方式流传。这些物占,有很多只是一种心理的寄托,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有着相当大的随意性和不可控制性。但是在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有不少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天文学、气象学、生态学等知识,不能一概认为是封建迷信来加以排斥。比如中国古代的日占,有些记录就是农业知识的总结。例如谷雨季节,正午时日影应当长九尺一寸六分,如果没有达到这个长度,那么第二年就会多旱,麦子不熟,人多病等等。这些,无疑是古人在长期农业生活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素朴真理。还有风占,如果恶风、黑风不断乱起,当日必定要下雨。雨占也是如此,如果春天的时候,甲寅日乙卯日下雨,雨水入地有五寸深,那么当年谷米就会比较贵。这些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科学,但是,在它荒诞说法外衣的包裹下,的确寄寓着某些合理的内核。上述日占、风占等形式,就

包含了农业学、天文学、气象学等方面的知识,值得我们去好好研究。  
(章 原)

## 7. 形形色色看占卜(下)

### 一、金钱卜

钱乃天地间之至宝,外圆内方,具有“乾坤之象”,又有天地阴阳之象。它作为占卜的道具极其合适。古人便开始以金钱替代蓍草占卜。金钱卜亦称“钱卜”、“金钱课”,以钱占问吉凶祸福。它的方法来源极早,相传始于西汉《易》学大家京房。又西汉术士严君平,曾隐居于成都市中,以卜筮为业。他就是用汉钱为人占筮,掷钱成卦,断其吉凶。后人诗句“岸余织女支机石,并有君平掷卦钱”,即载此事。具体操作如下:用钱三枚,有字的一面为阴,背面为阳。摇动三枚钱,然后抛撒在桌面上。假如三枚钱朝上皆为无字的一面,则为老阳,为九,以0代表。假如三枚朝上皆为有字那面,则为老阴,为六,画×标识。假如是两字一背,则为少阳,为七,以-标识。假如是两背一字,则为少阴,为八,以拆一标识。摇六次得一卦。也有的用六枚钱币置于竹筒中祷祝后,连摇数次,使钱币在筒内翻动,然后倒在桌上,按其前后位置排成长行,视六枚钱币正反面的排列次序写成阴阳六爻以推断吉凶。这种占卜方法,古代知识分子偶或玩之,在诗句中留下痕迹,如于鹄《江南曲》:“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王士禛《灞桥寄内诗》:“闺中若问金钱卜,秋风秋雨过灞桥。”

### 二、星占

星占,就是依据日月星辰的变化,对人事吉凶作出判断和



预测。《周易》中有关星占的内容不少。如《乾》卦,就是通过龙星位置和变化的观察,来决策人们的行事。“潜龙勿用”,就是看到秋分的龙星时,劝人们不要有所举动,应该耐心等待时机。“见龙在田”,田,即天田,也是一个星名。意思是说,见到龙星在天田星附近出现,有利于拜访有地位的贵人。

《小畜》、《归妹》、《中孚》等卦,都谈到月亮的变化和人事有关。《小畜》上九爻辞说:“月几望,君子征,凶。”意思是说,月亮接近圆时,人们外出打仗或旅行,都是不吉利的。《归妹》六五爻辞说:“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意思是说,少女在月中举行婚礼,是个吉利的日子。《中孚》六四爻辞说:“月几望,马匹亡,无咎。”意思是说,在月中的时候容易丢失马匹,但对人没有大的伤害。

《周易》之《丰》卦,详细记载了太阳的变化和人的关系。《丰》六二爻辞说:“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日中见斗”,是古人描述太阳黑子的专用词。《周易》已经认识到,当太阳黑子活动时,人类容易患上“疯痴”即“发狂”一类精神病。《丰》九三爻辞又说:“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沫,《子夏易传》作“昧”,“昧,星之小者也。”即太阳出现像星星一样的斑点。当太阳有这种斑点时,人们容易伤其“右肱”,即患上“偏枯”。《周易》这些观察和论断,虽然是以星占的形式出现,但有些被现代科学证明是正确的。比如有关太阳黑子活动对人的影响,科学研究证明,太阳黑子活动加剧时,人容易患脑卒中、心绞痛和烦躁不安等病症。

在《周易》的影响下,我国形成了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的占星术。古人将人间万象投射到天上,因而在天上出现了一个与人间对应的天上社会。天分为五官,紫微垣是中宫,为“帝

星”常居之所。“帝”星旁有“四辅星”佐政,近身有“太子”、“三公”,后面是后妃所居的“后宫”;文有由“贵相”组成的“文昌”,武有执“天枪”以振天威的三“将军”;有主纳言的“尚书”,有管司法的“执法”。还有世俗社会,既有熙来攘往的“天街”、“天市”,也有储存粮食的“天仓”、“天廩”;有“天河”有“阁道”,有“帝车”有“天船”;宫外还有二十八星宿组成的“苍龙”、“白虎”、“朱雀”、“玄武”镇守四方。总之,天上的格局与人间是一样的。民间有俗语“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天人同构而且可以互感,天象常常可以预告人事,天上陨落一颗星,相应预示地上将有一人死亡。《三国演义》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比如第八十回写许芝之言:“夜观天象,见炎汉气数已终,陛下帝星隐匿不明。”第六十三回孔明看见正西方一星,“其大如斗,从天坠下,流光四散,”便惊惶得杯子都掉到地上,掩面痛哭说:“哀哉!痛哉!……庞士元命必休矣。”占星家通过看天文,可知人事之吉凶,年成之丰欠,兵役之胜败。比如《左传·僖公五年》载,晋献公问何时可攻陷虢国,卜偃根据当时童谣及星象,预测应该在丙子日这一天。

由于皇帝大都相信星占,致使有人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如王莽为达到自己篡夺汉室的目的,便叫人造了许多的所谓星象瑞应。隋炀帝大业初年,太史令袁充“候帝意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见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此后每当炀帝想征讨,袁充都“假托星象,奖成帝意”。这就明明是为某种目的而捏造相应的天象了。

### 三、梦占

梦占,即以做梦的内容作为征兆和启示,来预测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国古代很重视梦占,有“众占非一,梦占为大”

的说法。

《周易》中的梦占,主要反映在《履》、《剥》、《姤》、《归妹》等几个卦里。《履》卦卦辞说“履虎尾,不咥人,亨。”意思是,梦见踩着老虎的尾巴,但没有被老虎咬伤,这是吉利的象征。《姤》卦九四爻辞说:“包无鱼,起凶。”意思是说,梦见厨房里没有鱼,一举一动都会带来灾殃。《归妹》上六爻辞说:“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所利。”意思是说,梦见女人提着空筐,男人杀羊不出血,这都是不吉利的象征。

在《周易》的影响下,我国古代占梦术十分兴盛,出现了许多释梦家和不少释梦专著,如《黄帝长柳占梦》、《周公详梦书》、《师旷占》等书。梦被当作征兆,经过占卜而融入人事,古代人视为自然之理,同事实一样不怀疑。如《诗经·小雅·斯干》中赋梦:“下莞上簟,乃安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诗人真心希望主人入居新房子之后有吉祥的好梦并兑现它。

有些梦古怪荒唐难判吉凶,解释时具有灵活性。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前有一梦:“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晋文公梦见敌人将自己打翻在地,而且吸自己的脑髓,似乎是大凶之兆。可子犯却解释为,晋文公被打翻而仰面朝天是得天;楚成王压在他身上是面向地,是伏罪;吸柔软的脑髓是“柔之矣”,文公应以柔克刚制服敌人。由于子犯的这番话,树立了晋文公的信心,结果楚师大败。

即使解释梦的随意性大,但中国人仍然认为梦是对即将

降临事件的预兆,因而朝廷一般堂而皇之设置了占梦的官员,民间也有解梦的术士。东汉王符在《潜夫论·梦列》中综合考察了古代卜梦现象,揭示了解梦卜梦的真谛与吉凶自然之道:“夫占梦,必谨其变故,审其征候,内考情意,外考王(旺)相,即吉凶之符,善恶之效,庶可见也。且凡人道:见瑞而修德者,福必成;见瑞而纵恣者,福转为祸;见妖而骄侮者,祸必成;见妖而戒惧者,祸转为福。……凡有异梦感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气色,无问善恶,常恐惧修省,以德迎之,乃其逢吉,天禄永终。”王符认为人可控制梦、左右梦,将梦视为道德修省的契机,可谓是明智之论。

除这几种占卜方法外,还有所谓星禽,即将二十八星宿与各种禽兽相配,附会人事,以占吉凶。还有揣骨,通过揣摸人的骨骼高低、广狭、长短等,以推断人的贫富、智愚、贵贱、寿夭等等,不一而足,这里不再啰唆。(赵彩花)

## 8. 冷静淡看“《周易》热”

《周易》,一部笼罩着种种神秘色彩的东方奇书,在传世的几千年中,一直是高深学问的代名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专有,虽然在知识界历来不乏研究者,但是与普通老百姓之间似乎总隔着一道鸿沟,可望而不可及。

但是,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华大地上骤然兴起了“《周易》热”,迄今,这股热潮不仅没有消退的迹象,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众多的《周易》研究专著、无数的研究论文纷纷登上了大小书店的书架,在许多省市甚至县乡都成立了《周易》研究会,名目繁多的各类《周易》研讨会层出不穷。而

且,《周易》热并不仅仅局限在学术圈内,更多的是体现在民间。很多大小城市之中,都有一批打着《周易》招牌来为人们占卜、预测吉凶的卦师,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更有许多的《周易》算命网站纷纷建立,还有众多的《周易》算命的小游戏……一时间,《周易》这一长久与热闹无缘的名词,成了一个时髦的字眼。而且,这一浪潮涌出了国门,在欧美各国,都对《周易》开始了相关研究工作。

面对这股热潮,许多人包括一些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纷纷撰文认为属于《周易》的时代已经到来,认为《周易》热的出现体现了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与向往,为这股热潮唱赞歌。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透过表面的喧嚣与热闹,我们不妨对《周易》热的形成进行一番冷静的思考。

对时下所盛行的《周易》种种研究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类:一类是学院型,对《周易》及历代相关著作进行学术方面的研究;一类是创新型,主要是将《周易》与现代科技、现代经济等相结合,力图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周易》这座宝藏;一类是应用型,主要是将《周易》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具体体现为算卦、风水等等。稍加比较,就会发现,在三种类型的研究中,最热闹、参与人数最多的无疑是第三种,第一和第二种类型的研究者仍然处于曲高和寡的局面。然而,第三类型的《周易》研究,实际上与《周易》本身的关系并不大,最多只是一个分支而已,而且算卦之类向来为正统的研究者所不屑为,认为是俗不可耐之事。

这样看来,对现在所谓的《周易》研究热盲目乐观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大众对《周易》的兴趣更多的是集中在占卜、相术之类;而我们知道,《周易》的精髓并不是在这方面;所以,看



来《周易》热只是《周易》的局部热,而且还是无关痛痒的局部。

《周易》最早的确是作为周民族占卜经验的记录而存在,这点毫无疑问。在长期的流传和成熟过程中,它也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成熟的占卜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占卜中所反映的某些具有普遍性与宏观性的哲理,确实具有某种程度的前瞻性,能够起到一定的预测作用。比如,《周易》中所揭示的“亢龙有悔”,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哲理,无疑是正确的。如果居高位者不懂得这个盛极必衰的道理,从趋势上来说,是会逐渐衰落的。但是,对某一个个体来说,却不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因为,造成事情结果的因素太多了,除了必然的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偶然性因素在里面。民间不是有句俗话吗:“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总体来看,这是对的;但是,如果都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的话,怎么还会有另一句俗语“好人命不长,恶人活百岁”呢?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每当社会不确定因素增多,生存环境面临巨大挑战的时候,占卜算卦以及宗教迷信活动就特别活跃。东汉末的时候,天灾人祸不断,有“五斗米道”开始在巴中地区盛行,而中原地区更有张角以“太平道”来号召起义。清朝晚期,洪秀全起义也是利用宗教作为掩护,来动员群众。趋利避害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当面临困境,人们无从适应的时候,特别需要借助一种外来的神秘力量,来帮助自己完成人生的抉择。占卜算卦正是迎合了人们的这一心理,所以在社会变动比较大的时候特别盛行。

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来看,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周易》研究可以说少之又少,当然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从80年代末开始,《周易》热开始增温,然后便愈演愈烈。

不难看出,《周易》热潮的兴起,正是与时代剧变同步的。整个社会都在经历着重大的变革,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不断递增,尤其是生存在大都市之中的人们,繁忙的工作与复杂的人际关系,使得人们很难有正常的沟通渠道,前途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内心的迷茫和恐慌,于是纷纷希望借助神秘文化来了解自己的未来和命运。《周易》作为中国神秘文化的代表,于是恰逢其时,而为人所推崇。算命和占卜之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与《周易》有一定距离,但是也趁此浪潮,纷纷打出“《周易》研究”与“生命预测”的招牌。因为算卦、看风水、看手相等,是被国家禁止的,被认为是宣扬封建迷信思想;但是一旦挂上“《周易》研究”与“预测学”这个金字招牌,则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营业。昨日的街头算命先生,见了警察就躲,唯恐避之不及;自从加入“研究”协会以后,见了警察也理直气壮了,动辄拿出“会员证”来证明自己是在进行科学研究。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是内地某县的县政府领导人长期未能升迁,很是忧愁,经人指点之后,为了自己能够确保高升,于是花重金聘请某位据说精通《周易》的风水先生来给政府大院看风水。风水先生对政府大院的布局大为不满,认为这里不好,那里压制了官气。领导人经其点拨,恍然大悟,恳请风水先生指点迷津。先生玄而又玄地作了一番指点,领导一一照办,不惜将政府大院的大门改位。结果事情被人举报,该县领导不仅没有升官,反而因此丢了乌纱帽,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可见风水先生的《周易》“预测”也并不灵验啊。街头那些自称精通《周易》预测的算命先生、风水先生,本身文化水平很低,他们之中又有几个是真正读懂了《周易》的呢?可悲的是,在科技文明发达的现代,读书的被不读的算命瞎子所骗,心甘情愿地

交钱,这还不启人深思吗?而那些算命的风水先生,拿了钱之后,早就离开了,或许又到其他地方继续给其他人看风水去了。而受到伤害的,则不仅仅是那些愚昧的信奉者,还有《周易》学术。《周易》无辜,竟被人拿来卖狗肉的羊头,可叹可悲。

《周易》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代表,有着长生不衰的生命力。结合现代实际情况,对它进行研究,无疑是一件大有裨益的事情。当前兴起的《周易》研究热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映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回归。但是,大潮中难免鱼龙混杂,许多糟粕的东西又被当作宝贝来供奉,这对于《周易》研究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章 原)

## 9. 象数、义理主千年

我们平时都说,《周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那么,它是怎样对中国历史施加影响的?《周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命运如何呢?下面,我们简单从纵的方面来看看《周易》的传播。

《周易》最早是用于占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人们逐渐从《周易》中发现了其他的因子。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看来,这些因子又截然不同。于是,在历史上就形成了众多的解《易》派别。

《易》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是后世所谓的《十翼》传世。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都是经过后人编辑加工的本子,里面包含了战国人的作品。但在战国以前,《易》书只包含卦象、爻象和卦辞、爻辞。战国人发

现了《周易》的大智慧,于是纷纷著述阐释自己的观点,流传下来的共有七种之多,分别是:《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传》、《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有十篇。这十篇都是解“经”的,好像羽翼一样,故此汉代人把它们合称为《十翼》。后世则把它与《周易》的古经合编,统称为《易经》,把《十翼》又称为《易传》。《易传》的作者,曾经有人认为是孔子,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这点,而且作品的观点也不完全一样,所以应该是多人所作。总体来说,《易传》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周易》经文而发,利用《周易》经文来阐发自己的哲学观念。所涉及到的内容方方面面,简单地说,包括了时人对宇宙、对人类、对国家等的认识,揭示了关于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从所反映的思想倾向看,多是儒家的观点。从《周易》的古代经文到《易传》的出现,是《易》学发展上一个重要的飞跃,表明人们理性思维的极大发展。它使《周易》的哲学色彩愈加浓厚。

汉代的《易》学发展比较复杂,派别比较多。但从总体上看,汉代的《易》学主流是“象数”派。这与两汉社会流行灾异、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学说分不开。诸家学派纷纷把《易》与数术之学相结合,根据卦象的排列与五行、干支、历律等相互配合,来预测吉凶,占卜灾异。因为此种学术特别强调卦象的排列,从卦象进行预测推断,所以后世称之为“象数学”。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孟喜、京房等等。这一派特别强调《周易》的占卜功能。但是传统的《周易》占卜非常复杂,为了适合当时社会上的需要,所以后继者发明了许多比较简明、适合普通大众使用的占卜方法,比如“金钱卜”等,此外,还有许多占卜方面的术语、规则等,对后世占卜之学影响很大。汉代“象数

学派”的这种倾向,是与当时官方的纵容和袒护分不开的。因为它在总体倾向上与官方意识合拍,甚至成了天人感应学说的有效传媒,所以,自然就逐渐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汉朝灭亡后,依附于它的“象数学派”也就走向了衰落,起而代之的是以三国魏王弼为首的玄家义理《易》学。王弼是哲学天才,死的时候不过才24岁,但在学术上他却是一代宗师。他的学术中心思想,可以用“扫象数,阐玄理”来概括。也就是说,王弼解释《周易》,注重从哲学的角度,用当时流行的玄学思维模式来阐释。对于厌倦了汉代繁琐象数的人们来说,王弼的方法在已经充满了腐朽气味的思想领域中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使之面貌一新。因此王学一诞生,便风靡一时,取代了两汉诸家学派。历经两晋南北朝,王学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后来唐代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其中的《周易正义》便是采用王弼的注本。因为《五经正义》是官方编纂修订,科举取士也都以此为标准答案,所以王弼的《易》学思想在唐代仍然是居于中心地位。

宋代在中国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一个分水岭。单从《易》学来说,到了宋代,《周易》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个显著的特征,便是大量《易》图的出现,运用图画的形式来阐明《易》学。我们知道,《周易》最早的卦画也是一种象征性的图画文字,但是宋代的这些《易》图更为玄妙难测。比较出名的有《无极图》、《先天图》、《后天图》、《河图》、《洛书》等等。其中有些图乍看上去与《周易》关系不大,但其原理都是从《周易》生发出来的。这些《易》图对后世的《易》学发展影响很大,促进了《易》学的传播。比如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各种《阴阳鱼图》、《太极图》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但是不了解《周



易》发展的人,往往会误认为这些图示是与《周易》一起产生的。实际上,它们的产生比《周易》晚了几千年。宋代的《易》图学派,也注重《易》的占卜功能。这一点,与汉代的象数学派有点相似。因此,也有人把宋代的《易》图学称之为“象数派”。但是与汉代相比,宋代的《易》学具有自己的特色,两者并不相同。除了注重图示以外,宋代《易》学的另一特色,便是将《易》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进行阐述,同样注重义理之学。但是与魏晋玄学家王弼、何晏等提倡“无为”的自然本体不同,宋代儒家理学大师如程颐等,逐渐把《易》理转移到提倡儒家积极有力的伦理道德的本体论上去了。其社会实用性无疑增强了,但是,在抽象的形而上的理论思辨方面,却有日渐萎缩的不良趋势。其代表人物朱熹,在很多学术领域都是继往开来的人物,在《易》学领域也不例外。他继承了宋代《易》学当中《易》理和象数两派的观点,形成了自己庞大的《易》学体系,具体体现在他的《周易本义》中。书的前面,首先列举的便是太极图、河图、洛书等九图,但在具体阐释的时候,他能够结合儒理进行分析,加上他学问渊博,文字简洁,因此,该书一直作为明清两代钦定官方定本《易》学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

元明两代的《易》学,基本上是在朱熹《周易本义》的影响下发展的。直到清代以后,随着汉学的复兴,汉《易》学说重新有所抬头。惠栋、张惠言等都是汉《易》学复兴的重要人物。但是他们的贡献,更多的是在对汉代《易》学材料的整理和校勘上,对于汉《易》的理论则少有发展。进入近现代以后,《易》学发展更趋多元化,出现了杭辛斋、尚秉和等大家。而地下有关《周易》文物资料的不断发掘,更引起了《易》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从《周易》发展的历史来看,虽然门派林立,著述众多,但是从大的方面讲,可以一分为二,即将诸多的学派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进行研究。虽然在许多学者那里,这条界限并不明显,他们往往兼采象数和义理的观点。事实上,《周易》本身的“象”与“数”,本来就是相辅相成,二者不可偏废。设卦观象,阐明哲理,缺一不可。在周人那里,他们是完全统一的。只是到了后代,学者各有所好,遂导致了“象数”与“义理”的分分合合之争。我们今后研究《周易》,最好的办法仍然是二者兼取,通过具体象数的卦爻分析来阐述义理,这样才能从尽量客观的角度来审视祖先流传下来的这部神秘著作。 (章 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周易》与人生

作者=蒋凡主编

出版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ISBN号=7-5325-3669-6

中图法分类号=B221.5；B821

页数=341；20cm

丛书名=传统文化与人生丛书 原书定价=20.00

主题词=周易（学科：人生哲学 学科：研究）周易 人生哲学

参考文献格式=蒋凡主编．《周易》与人生．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内容提要=本书分为自然篇、成长篇、婚恋篇、社交篇、事业篇、为政篇、养生篇、阐释篇、人物篇及占筮篇十大方面。

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3136580&d=B93062952A784964E6BDE5D8B0019251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 录	
一、自然篇	
1 . 中华古人宇宙观	
2 . 同声相应通天人	
3 . 切实保护水资源	
4 . 人要学习大自然	
5 . 天人和合敬自然	
6 . 生生不息说《乾》卦	
二、成长篇	
1 . 人生万事开头难	
2 . 父母老师先上课	
3 . 初生牛犊不怕虎	
4 . 防微杜渐谈教子	
5 . 人生莫要忘等待	
6 . 识时务者为俊杰	
7 . 走出困境有诀窍	
三、婚恋篇	
1 . 当议 “ 生殖崇拜 ” 说	
2 . 血泪涟涟话抢婚	
3 . 夫妻反目成仇人	
4 . 老夫少妻来相配	
5 . 家庭分工不可少	
6 . 琴瑟和鸣万事兴	
7 . 劝君莫娶文盲妻	
8 . 《咸》卦谈 “ 性 ” 坦荡荡	
9 . 夫妇相处有学问	
四、社交篇	
1 . 巧读《贲》卦妙包装	
2 . 解读 “ 人无信不立 ”	
3 . “ 元亨利贞 ” 话君子	
4 . 多结交大人君子	
5 . 谦谦君子终获福	
6 . 安全防范慎莫忘	
7 . 小心谨慎过难关	
8 . 同舟共济渡难关	
9 . 忧勤惕厉人生路	
1 0 . 女性交际善与同	
五、事业篇	
1 . 君子宜有所不为	
2 . 怎样做个能干兵	
3 . 人间沧桑循正道	
4 . 坚持不懈才能赢	
5 . “ 另类 ” 智慧作领导	
6 . 柔弱也能胜刚强	
7 . 得意之时莫忘形	
8 . 处泰虑否防隐患	
9 . 趋吉避凶成大业	
1 0 . 邮政大臣洗马桶	
六、为政篇	
1 . 泪眼婆娑话刘备	
2 . 任贤图治兴家邦	
3 . 顺天应人谈改革	
4 . “ 万国咸宁 ” 摅暴力	
5 . 水能载舟也覆舟	
6 . 飞龙在天话君威	
7 . “ 弹性限度 ” 莫超越	
七、养生篇	
1 . 扶正祛邪阴阳通	
2 . 颐养以正说养生	
3 . 勿药有喜说预防	
4 . 以《易》治心疑病消	
八、阐释篇	
1 . 《易》理暗合计算机	
2 . 《易》乃中华建筑魂	
3 . 阴阳相济乐和谐	
4 . 《易》道广大话科技	
5 . 文学源头话《周易》	
九、人物篇	
1 . 韦编三绝说孔子（上）	
2 . 韦编三绝说孔子（下）	
3 . 范蠡功成泛五湖	
4 . 李斯临刑悲恋 “ 位 ”	
5 . 短命天才叹王弼	
6 . 通《易》惜未通人生	
7 . 占卜奇才数管辂	
8 . 诸葛亮名成八阵图	
9 . 杨仪默然遇《家人》	
1 0 . 苏轼与《东坡易传》	
十、占筮篇	
1 . 灵龟蓍草皆非神	
2 . 蓍草占筮不神秘	
3 . 邵雍与《梅花易数》	
4 . 《易》无达占说占筮	
5 . 掀起《周易》盖头来	
6 . 形形色色看占卜（上）	
7 . 形形色色看占卜（下）	
8 . 冷眼淡看 “ 《周易》热 ”	
9 . 象数、义理主千年	